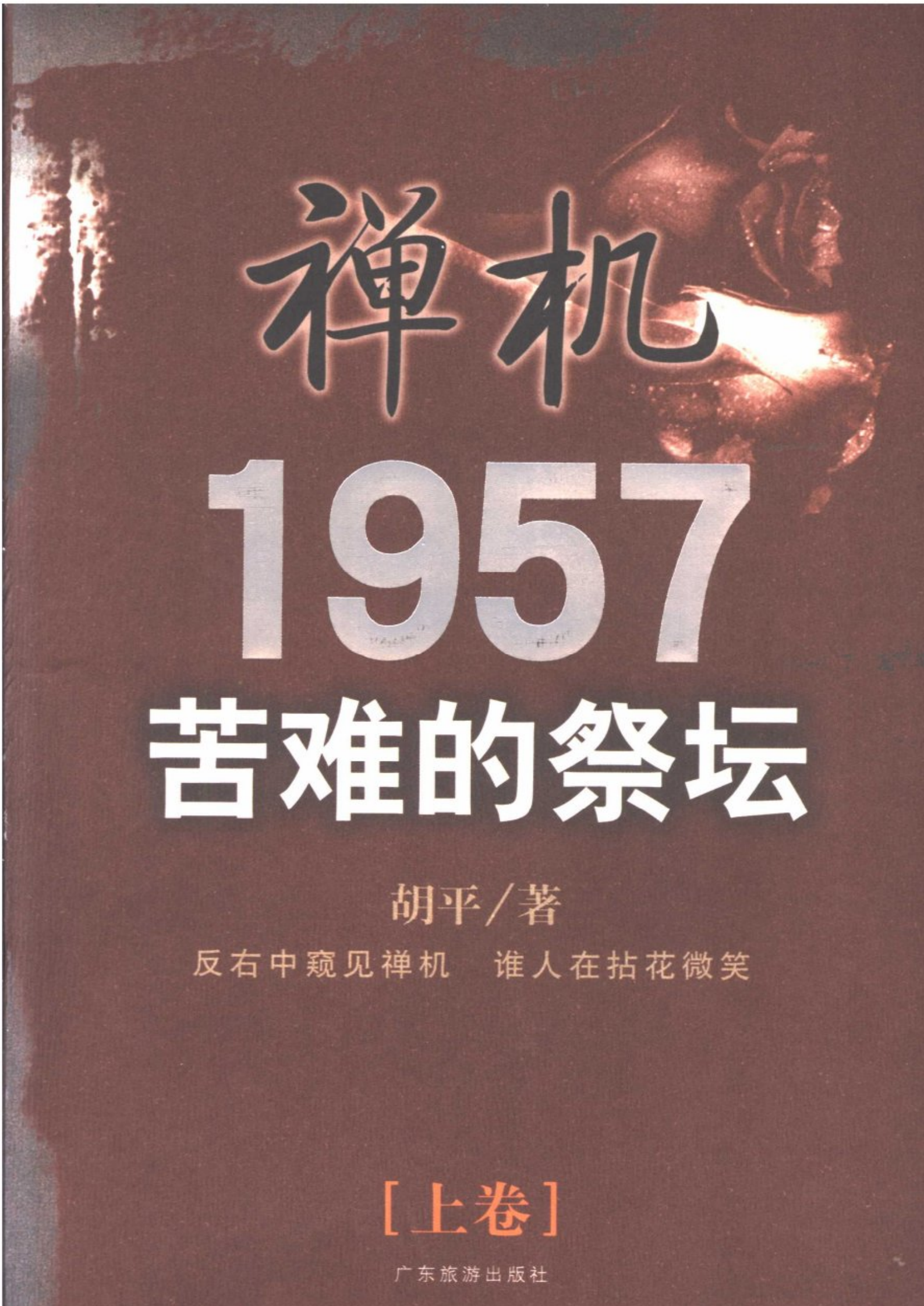




禅机

1957

苦难的祭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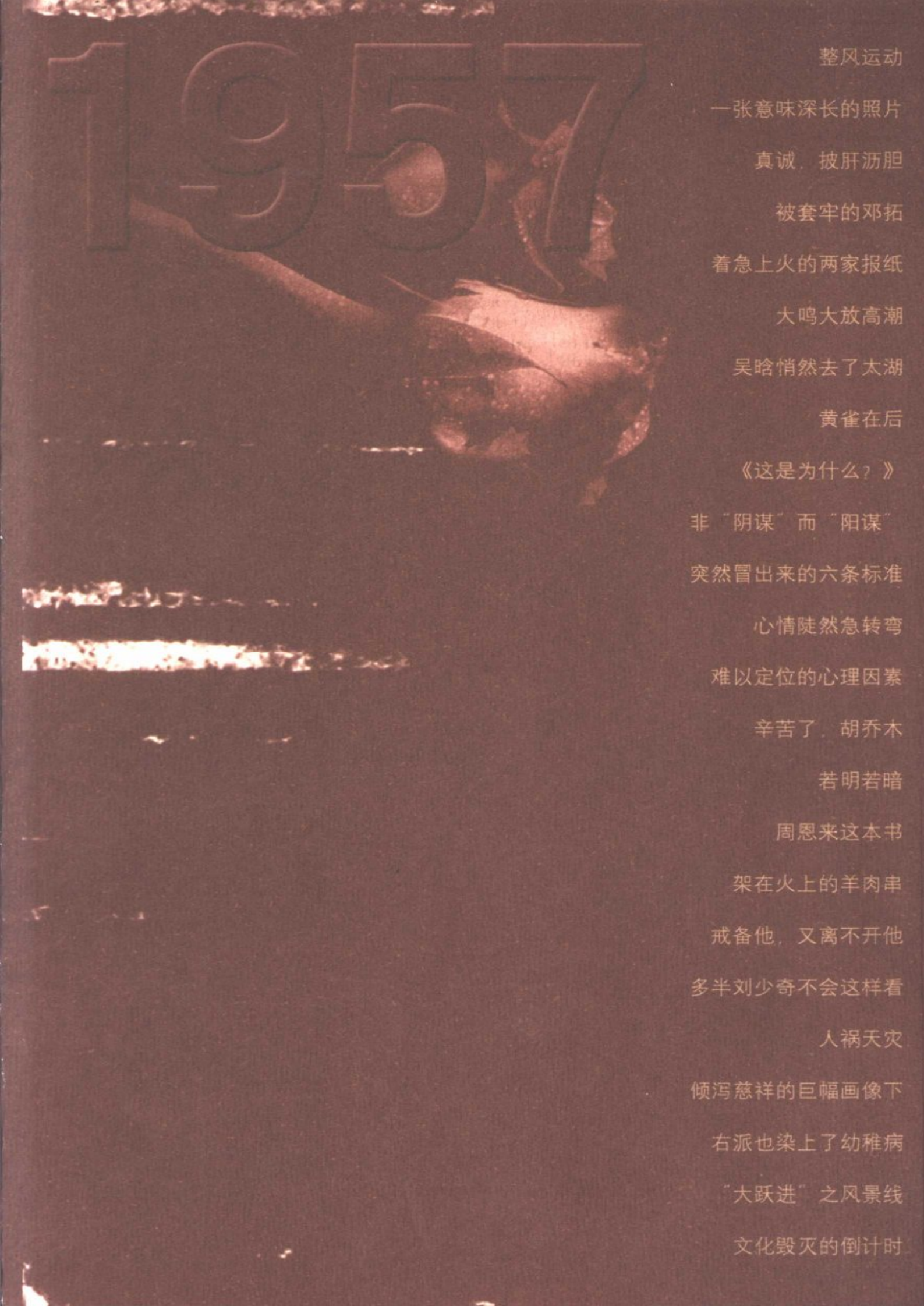
胡平/著

反右中窥见禅机 谁人在拈花微笑

[上卷]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57



整风运动

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

真诚，披肝沥胆

被套牢的邓拓

着急上火的两家报纸

大鸣大放高潮

吴晗悄然去了太湖

黄雀在后

《这是为什么？》

非“阴谋”而“阳谋”

突然冒出来的六条标准

心情陡然急转弯

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

辛苦了，胡乔木

若明若暗

周恩来这本书

架在火上的羊肉串

戒备他，又离不开他

多半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人祸天灾

倾泻慈祥的巨幅画像下

右派也染上了幼稚病

“大跃进”之风景线

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上卷]

禅机

1957

苦难的祭坛

胡平/著

反右中窥见禅机 谁人在拈花微笑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 / 胡平著. — 2 版. —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4

ISBN 7-80521-925-7

I. 禅… II. 胡…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反右派斗争—史料—1957 IV. ① I25 ② D6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442 号

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

著 者：胡 平

责任编辑：唐建福

出 版：广东旅游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68mm 1/16

印 张：47

字 数：62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二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80521-925-7/J · 334

定 价：58.00 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与承印厂直接联系。)

序

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5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生机盎然，到元气大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

从各色鸟儿跳跃、啁啾不已的新枝，到铅灰色的混凝土最终威严地、冷冰冰地覆盖了中国思想的大地；

从热情火焰般燃烧的1950年代，到挤牙膏一样竭力挤出热情的1960年代以及热情满是伪劣产品的1970年代；

从知识分子伸展理想和智慧的双翼在共和国的蓝天下飞翔，到一排又一排越来越密集、猛烈的铜弹铁砂折断翅膀，溅出无边的血泪纷纷坠落，最后成为一个个被原罪感的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粽子，在翻滚气泡的碱

水里煮着：

从大门半开、窗帘半掩、对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Q般地膨胀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人们才知晓东方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茧在一片黑暗中孕育了什么东西……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是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闷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能从咖啡杯里的沉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一样读出运动的含义：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它的规模、目标、策略、手段得以凸现，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地震栗之后，并越来越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的共和国列车，靠的是炉膛边挥洒的理想和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

那么从1957年开始，中国便日益成为一个面容枯槁的吸毒者，对“阶级斗争”的海洛因沉迷不已。好似瘦瘪的乳房需要胸罩托住；偷工减料、裂纹条条的阳台必须要支柱支撑，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运动”造成了她的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中国，又必须靠一个个“运动”的支柱才能维持存在。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那么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样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

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皇出逃，于是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也成了英雄主义……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直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黄钟毁灭，瓦釜雷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这一些，诚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次指出的——

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
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必说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既然1957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具有如此分水岭的意义，那么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开展的一场据官方统计使55万知识分子（按另一种说法则有近百万人）数月沦为“右派分子”，牵连者更是恒河沙数的反右运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轮廓和过程呢？

它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重重的门槛？

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

派史的重要章节，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乃至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重大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愧对1957年。

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个人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以1957年为主题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一度还是个时髦。但是，太平洋再汹涌澎湃，那溢动的还是水分子，人类更需要的是铀分子，以便在理性选择时能发出巨大的力量。

我们一直没有在历史和文化的广阔参照系下，对反右运动作出认真而深入的研究。似乎我们是一群不称职的考古队员，只满足于发现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名誉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麦克法夸尔所著的另一部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均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和论证，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对此也有一定的涉及；这方面我读了些书，还有美国人罗斯·里特尔的《毛泽东的后半生》，英国人纳拉纳拉扬·达斯还就此写了一本专著，这便是他向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反右运动》……

由于作者们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之外，他们的分析与论证难免会有粗疏和偏颇之处，但是只要是认真读过这些书的中国人，除了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多维的思辨方法上受到启迪，更会对他们在迷雾重重的中国问题的群山中盘亘、探索的勇气与执著，抱以崇高的敬意，并由此感到深深的汗颜……

199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了葛佩琦先生，此时他已届80，一副萧然的长者之风，苍苍白发下脸上显得有些浮肿，心肺方面也有点毛病，时有胸闷气短之感。如秋日的阳光一样，我们散散淡淡地聊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谈到为他写的一本回忆录联系一家出版社的事，在这本名为《艰苦奋斗六十年》10万余字的书稿中，一大半的篇幅，是写当年他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出入于刀光剑影、虎穴狼窟中的传奇经历，似乎和他1957年后身陷囹圄近二十年的遭遇比起来，他更希冀这一段经历不会被岁月的风尘所埋没。

当他走到房门口一定要送我时，我虽然已感他来日无多、可绝没有料到，此时他生命的历程已进入倒记时阶段，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就在报纸上读到了他魂归道山的消息……

此次在北京，我还去了住在东大桥的吴祖光先生家采访，那时他思路警策，游刃有余，谈笑风生，一副以大半生时光坦荡穿过大劫大难的潇洒劲。他给我写了一幅“一身无正经半世作闲文”的中堂，又给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打电话、介绍我去采访。其时，他既是伴侣又是挚友的夫人新风霞，一直坐在轮椅上听着，对这双文坛著名的伉俪来说我只是个不速之客，她的脸上却始终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给我的感觉有几分像观世音佛……

这些恍若在昨日的事，其实已经有十几年了，而两位老人已分别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之后飘然远去。不久前，我从一本书上下载他们的照片，帮助扫描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说：“男的好精神，女的好漂亮，他们是一对夫妻吗？”我说：“是。男的叫吴祖光，女的叫新风霞。”

宛如听到了“外星人”“印第安人”两个词一样，我注意到姑娘那鹅蛋般光洁的脸上没有一丝反应……也是这一次在北

京，我还和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探望了正在这里住院的艾青先生。

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单人病房里，他躺在一张可以自动调节角度的病榻上，脸色并不苍白，还是他家乡土地的颜色，但是灰白色的头发稀疏而又凌乱，目光里失去了他诗歌中的一片清明，显得模糊不定。思绪也像柳絮点点一样有些飘忽，再加上牙齿几近掉光后说话时带有些许嗡嗡声，要想听清、听懂他的话，颇有些像要在掺了水的茅台酒里品出茅台味来一般困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唏嘘感叹：

“我是协和医院的常客了”；

“我是协和医院的人了……”

他本是大堰河的儿子，他还是中国、现当代诗坛上彪炳日月的巨匠，他诗歌中力透纸背的正义感、奇丽的想像和博大的气势，使他穿行于几块大陆之间，囊括了几个时代的风云。

然而，现在他只能躺在这里，渐渐耗尽睁开眼便是被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及白色的天花板所淹没的日子。我顿感在医院里流行白色的内涵，它并不仅仅为着清洁，还为它泛动的其实正是人生的某些苍凉……不久，艾青先生亦做了古人。

我曾想获取几张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先生生前的照片，大多先生们在1957年蒙难后不会有心境和机会拍照了，能留下来的照片，一定是在这之前奔走国事、指点江山的。作为后辈，我想通过这些沉甸甸的照片，去领略先生们心系天下的热肠、说言高论的风采以及历史斗折蛇行的痕迹……

结果，我却大失所望：自“文革”期间，储安平先生自杀未遂突然出走后，偌大一个中国，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罗隆基先生也没有直系亲属，我想民盟中央总会有些历史资料，果然，通过

几层朋友的介绍，在那里，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套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年的图片，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面容。

惟一算得上是照片的，还是在章伯钧先生的亲属家里，翻拍自墙上挂着的、被一盆橘黄的秋菊供奉着的先生的遗照……

我觉得自己的心房在一次次地抽缩。

我似乎看见那些古董陶器的残片又在渐渐埋没于岁月的河床之中……

我想，当年几十万人乃至近百万人的命运，在一场风暴的摧残下化作了纷纷的残片，这是悲剧性的；而现在倘若不能将这些残片恢复原状，并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去警策后人，那就更充满了悲剧性……

我们这代被称之为“老三届”的老家伙，少年的梦幻是碧波粼粼的北海里高耸的白塔，是博大而又幽静的北京城里为绿阴掩映的红墙，至今当我听到哪里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时，我还依稀觉得这是一片来自天国的歌声。

不到10年，我们这代人又在一个月黑风高、烈焰熊熊的晚上，一边咬牙咧嘴唱起《造反有理》，一边像第三帝国的褐衫队一样，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最后自己也被洗劫得两手空空……

如同“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苦难的摇篮，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是我们的父辈青春或壮年的炼狱之地。

其实，性格的信息，命运的密码，我们这代人非得跋涉的一道道坎坷和必须付出的一次次代价，乃至在下面的两代人潇洒起来的今天，我们不会潇洒或是戴了假面具般难以潇洒，总觉历史和生活的重轭在我们已经失去光泽与弹性的脊背上压上了一条条印子……

这些无不是1957年在冥冥之中早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规范好

的。

我有了写这部书的强烈冲动。

“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我没有宫女的情致，因此这不应该是一本收罗毛泽东时代逸闻野事的书。也许有一天，人们将会像今天拍出《唐明皇》、《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一样拍出数十集成百集的《毛泽东》来，我期待它的作用不是如一袋话梅、几包香烟，仅仅给人们消遣……

面对这一题材的巨大包容性和显而易见的政治分量，我感到才疏学浅，不胜惶恐。如果我终能完成这部书，那将主要得力于1992~1997年这五年来我能在红尘滚滚外安于书斋里的清冷与寂寞，而这是犹如一种初春冰封的江面下的大寂寞，它每一天都在无声而又丰沛地吸取中华民族踏上新生之途后观照过去的思想锋芒……

同时我也感到，在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并和经济一样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今，在外国人过江之鲫般自由出入于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越来越执著地发表客观或不那么客观的见解的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习惯于等待官方的诠释、官方的文本，在拥有手机、电脑乃至小车、别墅的同时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索与声音，那将是对已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某种讽刺……

我不想静止地去写1957年。

这首先因为我无法获取这一年躺在档案馆里的全部静止的材料。反右运动迄今已近50年了，它们仍像九重深宫里的佳丽，不能向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

其次，在动态过程中，才有可能展露1957年既是从近代以降的历史链条之果，又是从20世纪中叶以降的历史链条之因。也许这样展露，比起档案馆里那一大堆冷冰冰的文字，更能清楚

地在思想史、政治史的坐标系上凸现1957年，并能在这一展露中徐徐地吹送出一阵阵活气，正是这活气使我强烈感到：我并不是在考古。

我也不想孤立地去写在1957年蒙难的知识分子。

这本书将至少涉及两代知识分子，我想尽力全景式地写出这台大戏来，通过序曲至尾声，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升降沉浮，不过是命运经盘上的一次次轮回。这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也没有真正的侥幸者和发迹者，有的只是一片历经烟熏火燎、遍布断垣残壁的废墟，以及在这废墟里被埋没的血泪渐渐浇灌出的人格的新芽……

我将不可避免地写到一些领袖人物。

如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如此长久、如此夺目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即使他早已退出了舞台，我们如今仍能感觉得到他巨大身影的存在，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我写他们并不着意于对他们的褒贬。读者们将会和我一起发现，他们只是20世纪中国某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和作品，这一文化形态，犹如长江黄河一样裹挟中国的伟力，与他们个人在当今所受的褒贬、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比起来，后者软弱得不过像几个符号……

这将不是一部报告文学，更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会像报告文学那样好读，也不会像学术著作那样难读，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它并思考它。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疲惫、倦困，不是才疏学浅，而是捷克作家昆德拉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极易染指的媚俗。

我尽力像拔去虫牙一样拔去假话，像吸烟者警惕肺部的阴影一般警惕中国人久以习惯的套话。

我将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路，但修正的前提只有一个，那便是来自于我心灵与眼前这个越来越发生着深刻嬗变的时代的对话。

随即，几代知识分子的欢欣、憧憬、困惑、痛苦、苦难……将很快地似滔滔河水一样向我们走来，我们由此将在东方的这块土地上结识很多人，经历很多事。

最终，我们会发现本书不是在写1957年，不是在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鸡鸣风雨，天哭劫数，也不是在评说那些曾经强大得足以改变亿万人信仰前程、身家性命的人物……

而是在用心血和泪水搅拌着笔墨书写我们自己——

即在百年的茫茫风涛中，我们的民族从哪里走来，将向哪里走去……

目 录

[上卷]

序

第一章 小试牛刀

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
2. 从井冈山到延安 9
3. 两难境地之间 16
4. 圆，一种美妙的平衡 26
5. 双方都未找到感觉 33

第二章 一九五六

6. “上帝”打道回府 49
7. 被忽略的两次会议 61
8. 毛泽东记住了一个名字 72
9. 中国，日朗星明 89

第三章 整风运动

10. 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 108
11. 真诚，披肝沥胆 119
12. 被套牢的邓拓 133
13. 着急上火的两家报纸 151
14. 大鸣大放高潮 164
15. 吴晗悄然去了太湖 181

第四章 阴错阳差

16. 其实都是左派（之一） 189
17. 其实都是左派（之二） 214
18. “红门”汹涌地撞开 240

第五章 黄雀在后

- 19. 这是为什么? 248
- 20. 非“阴谋”而“阳谋” 256
- 21. 突然冒出来的六条标准 269
- 22. 心情陡然急转弯 276
- 23. 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 290
- 24. 辛苦了，胡乔木 297

第六章 煮豆燃其

- 25. “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301
- 26. 最懂方块字的人们 306
- 27. 精神返祖现象 331
- 28. 党对自身动了真格 344

[下卷]

第七章 流水线上

- 29. 鳄鱼大而阔的嘴巴 361
- 30. 质量之外还得有数量 372
- 31. 风味各异的萝卜干 386

第八章 海面如血

- 32. 倘若突然讲起民主来 407
- 33. 一张万能的膏药 413
- 34. 毛泽东找到了感觉 416
- 35. 无须一兵一卒 422

第九章 若明若暗

- 36. 周恩来这本书 438
- 37. 架在火上的羊肉串 454
- 38. 戒备他，又离不开他 471
- 39. 多半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484

第十章 人祸天灾

- 40. 倾泻慈祥的巨幅画像下 490
- 41. 右派也染上了“幼稚病” 513
- 42. “大跃进”之风景线 518
- 43. 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529
- 44. 吉尼斯世界纪录 539
- 45. 主席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548

第十一章 千古浩劫

- 46. 右派在碱水里泡过三遍 560
- 47. 左派在盐水里煮了三遍 592
- 48.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603
- 49. 剪不断，理还乱 612

第十二章 欲说还休

- 50. 农历戊午年末 626
- 51. 三个人和一个小数 643
- 52. “奇文共欣赏” 661

第十三章 方生未死

- 53. 被审视的黑匣子 670
- 54. 影子倏然一闪 687
- 尾声 世纪之交 699

权作后记

修订本后记

附件一

附件二

第一章 小试牛刀

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5年7月，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黄炎培先生异常激动，几乎每遇见一个亲朋好友，他都要叙述他和那位在他眼里视为当今尧舜的伟人的——一次谈话——

在延安，透过窑洞里一盏光芒温暖的油灯，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这片怀抱几代皇城的黄土高原之上，他又不能不想起历代王朝的兴衰……

他问毛泽东：假如共产党人夺得了中国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以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毛泽东睿智的目光，一下注视在油灯的火焰上，沉缓而又坚定地说：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

1947年冬天，在上海市立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的孙大雨先生，心情却有点沮丧。几个月前，他用自20世纪30年代留学归国后积攒下来的2两黄金，买了一台灵敏度较好的收音机，经常邀请进步的师生来自己家里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

这年春天，他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参加了“大教联”（“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和进步教授们一起积极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学生运动，他感到腐朽、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像一块肮脏的抹布，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了。

自淮海战役打响以后，每天晚上他家里更是高朋满座，他和戴望舒先生，俨然成了一对军事专家，绘声绘色地向学生和同事们评论战局。

从收音机里奔泻出的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军脚步声里，他们看到蒋家王朝的覆灭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真恨不能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这时，延安电台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对全国局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右起：黄炎培、彭真、毛泽东、张奚若、李济深。

全国解放还得用上几年时间。一时间，在“大教联”内部，他和其他教授争论不休，是作为书生的自己太乐观了，还是共产党太谨慎了……

仅仅一年之后，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发出的无线电波里，便有了海纳天下豪杰贤士以共商开国大计的召唤。

1949年年初，一条名为“阿尔丹”的苏联货轮行驶在东中国海上。

这条船几天前还泊在香港，圣诞节的次日，在一片弥漫节日喜庆气氛的初上华灯之时，章乃器和李济深、茅盾、马寅初、柳亚子、翦伯赞、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孙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分头登上了这条船，并于当晚悄然驶离，



开始了北上的航程。

船行至青岛海面，遇上强台风，船又坏了一台马达，每小时仅能走6海里。当延至1月7日到达大连港时，李富春、张闻天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来此迎接。

如同在船上刚刚度过了元旦，章乃器先生一下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大陆。在东北，他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和电站，人们一边挥汗如雨，埋头生产建设，以愈合战争的创伤；一边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涤卖淫、吸毒、赌博等旧社会的恶习……

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他写道：

在这一片新天地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已经变成坦白而亲睦，彼此间的隔阂和警戒似乎很少遗留下来了，进入这里，真觉得浑身轻松，得着了精神的解放，仿佛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在记叙了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之后，已过知命之年的他，竟有了怀春的少男少女极易染上的癖好：

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

一次参观途中，章乃器先生听见人们唱起一支在解放区广为流行、旋律优美的歌曲，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感到这一提法不准确，当即提议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突出肯定共产党在中国五千年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说：

“章先生，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请作者将歌词改了……”

1949年5月26日夜，风声鹤唳中的上海。

一辆轿车疾驶进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虹桥疗养院，自前年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后，沈钧儒先生和民盟其他的主要负责



1946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开会。民盟代表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七人。会议选出常务委员会21人，沈钧儒为常委会副主任。图为常委会合影。一排左四毛泽东、左三朱德、三排左一周恩来；一排左二章伯钧、左五沈钧儒；二排左一黄炎培（民盟中常委，代表民建参加筹备）。

人，先后撤退到了香港，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却相继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开车的正是看守这里的特务头子阎锦文，不由分说，两位被押上了轿车，罗隆基已经探听到蒋介石发来了密令，要军统东南特别站站长毛森尽快将他和张澜先生押上海轮，强行带往台湾。想到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此去将会铸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他的心里好似刀割般的痛楚……

轿车几乎刚驶回霞飞路，一辆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大卡车便跟在了后面，阎锦文将车开得如离弦之箭，直驶外滩方向，到一小弄堂口时猛打方向盘，卡车被甩在了弄堂口外。轿车在确信没有“尾巴”之后，才折进环龙路（今南昌路），并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前停住，门当即悄然打开，一行人刚一进去，它又无声地关上。

守候这里多时的人群中，有一位穿国民党高级将领服的，即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这里也正是他的公馆。杨虎等人匆匆地将张、罗两位扶进地下室，未及对方惊魂甫定，又匆匆地告知事情原委，原来杨虎决意立地成佛，弃暗投明，是他命令阎锦文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将两位先生救出……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27日凌晨3时，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便犹如一把锋芒闪闪的巨剪，在太平洋上空剪断了大上海的最后几缕黑暗。当天，陈毅将军未及拂去遍身战尘，就派人前往杨公馆看望两位先生。

29日，张澜先生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6月1日，张澜先生即收到复电：

今后工作重在建设，极盼告各方好友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京，极表欢迎。

心向北平，车向北平。

一程程，沐虚怀若谷之风，一站站，浴嘘寒问暖之情——

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为张、罗一行送行，并派出干部、医生各一名，以便沿途照料；路过南京，新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设宴迎送；

车经济南，时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亲自陪同游览太明湖等风景名胜；

抵达天津，天津市市长黄敬接风洗尘；

6月24日下午，列车徐徐驶入北平，站台上已是人头攒动。站在最前面的是一身戎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亲自陪同至张罗一行下榻的北京饭店，刚安顿完毕，操持了两天两夜、刚打了一个盹的周恩来又接踵而至；

朱德设家宴，为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洗尘；

周恩来设家宴，与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40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600多位代表中，有来自新闻界的徐铸成和浦熙修。他们一位是

名噪遐迩的《文汇报》总编辑，一位是正筹办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

徐铸成40年后都未忘记在毛泽东的开幕词里，以下的一段话，几乎句句在怀仁堂里腾起了春雷般的掌声——

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的行列，
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幸福。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个被人侮辱的民族。
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从此站立起来了！

徐铸成庆幸自己随一位旷世的巨人，站在了一道光芒四射的历史门槛之上，他更庆幸《文汇报》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是一张百折不挠的报纸，1938年1月创刊，发刊词即告“本报本着议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先为该报执笔社论，后成为总编辑。1939年5月，因坚持抗战，被敌伪勾结租界当局加以扼杀。1945年9月复刊，因鲜明地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编辑方针，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里一座民主的灯塔。为了倒掉这座灯塔，陈布雷、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多次亲自出马，趁《文汇报》经济困窘之机，提出“由政府投资十亿，扩充设备，提高职工待遇”，遭徐铸成严词拒绝。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查封。

这却是一张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纯民间报纸，靠着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扶植了她的成长、壮大。当因国民党施以政治高压和在纸张配给、银行周转等方面刁难，使报社几近抱恨终天之时，报社公开了自己的危机并征募读者股份。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这时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可在短期内就收足了预定额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是一股、两股的零散户，这说明基本来自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劳动人民……

他想，如果说在国民党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文汇报》都能够得以存在的话，那么在一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新时代里，这张民间报纸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能以呼应人民的心声作为自己的神

圣使命。新闻记者不一定是无冕之王，但肩头担负着这一神圣使命的新闻记者一定是无冕之王。

在北上的海船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想法：除去上海版外，《文汇报》还得办北京版、成都版、长沙版、西安版……以办成一张信息迅捷、丰富，版式活泼、生动的全国性大报。此刻在多少人对未来抱有壮志豪情的怀仁堂里，徐铸成先生的这一想法更加坚定了……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刚刚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一个记者的存在。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又因为自1946年以后，先是在重庆，后是在南京，她都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新华日报采访部和梅园新村的常客，并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她，总是说：“熙修是我们的亲戚。”现在周恩来走到她身边，又亲热地称呼她“熙修”，并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1958年，徐铸成被划为右派后，与夫人摄于上海嘉定县。

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

他当即牵过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

毛泽东的脸上似乎更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

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6000余人向参政会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零”血案。浦熙修率领当时她服务的《新民报》的记者采写了事件的全过程，并争取报社负责人的认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篇揭露事件真相的长篇报道，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如骨鲠喉。不久，《新

民报》被勒令停刊。

次年的11月26日深夜，仍留在南京、应香港《文汇报》之邀，决意要把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报道于世的浦熙修，遭突然逮捕，临危中她先抢去厕所里，将正写作的稿子撕碎咽下。她先被关押在南京卫戍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李崇仁代总统求和，并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再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浦熙修才重获自由，前后70天。

她万万没有想到，作为无时无刻不在把握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巨匠，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过去的经历。

这是她第二次见毛泽东。

1945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组织一批记者访问延安，《新民报》也分到一个名额，那时她就想去看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妹夫。但那时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已岌岌可危，对她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的丈夫，担心她此行将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回，便去报社加以阻止，结果报社另派了赵超构去，为此她几年里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

次年，毛泽东飞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她曾去机场迎接。那次，她大约只是站在远处，看到了那划破山城薄雾的魁梧身影。事后，在给妹妹安修的信中，她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她对这位如雷贯耳的中国革命传奇式英雄的崇仰之情。

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言语的功能顷刻间萎缩了，惟有泪眼婆娑。她透过晶晶亮亮、溢荡不定的泪影，看到的是一片瑰丽、祥和、遍及人间的金光，她的耳边顿然回响起一支歌来，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2 从井冈山到延安

没有没说过谎话的孩子，哪怕他长大了成为人间最诚实的君子。
也没有通体光洁似一个玻璃球的历史，哪怕它是一部世界上最神圣的历史。

历史总在掩盖自己，以一面掩盖另一面。方式是两种：

一种是漫不经心、似有若无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似江河奔腾，而另一面还是溪流汨汨。一种是精心刻意、欲盖弥彰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已经摇摇欲坠，而另一面则生龙活虎。

人类社会曲曲折折的痛苦进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悲剧命运，证明了人们大抵能看清楚的只是后者，被忽略的总是前者。

1949年前后，对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抱以巨大热情与无限憧憬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同样不会有着更高的智商。

1927年松涛起伏的井冈山。

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便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初中都未读完，在这些肤色黧黑、手大脚大的劳动者中间，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一公布计票结果，他当选了，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

结果选了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

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待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的工作还是陈正人干得多，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近40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呵……”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

1930~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处决了，全军为之覆没解体。大批地方干部亦惨遭杀害，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的、讲话有条有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一股滥杀无辜的整肃狂潮，使整个江西苏区陷入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时任赣西南特委书记的陈毅，一次被召去总前敌委员会开会。因他反对搞刑讯逼供，反对凭口供和以钢笔、眼镜捕人，也被怀疑为“AB团”。临行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肖菊英交代：如果下午6点我还未回来，你就快走，去老家信丰藏起来。

也许是慑于陈毅的声威，此次开会他赴的并不是“鸿门宴”，他早早踏上归途，不料途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与警卫员绕道步行，直到晚上8时才匆匆赶回兴国驻地。而在这之前不久，以为丈夫已被扣押的肖菊英，竟跳井自杀！陈毅悲愤异常，唤人将妻子的尸体打捞上来，就这么湿淋淋地抱在怀里，当众失声痛哭……

不仅仅在江西苏区，20世纪30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党员人数由

原来的8000人锐减为5000人。即便是进入了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

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清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到狼群出没的嚎叫声。

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首当其冲。一个来自兰州、时年仅19岁的学员，名叫张克勤，在长达一天一夜的“逼、供、信”中，被迫承认自己来延安是受特务组织派遣，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社会部负责人康生，犹如23年后抓住聂元梓、蒯大富一样，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坦白典型”，让他披红挂彩，骑上高头大马，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及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西北公学等处，作开展“坦白运动”的“现身说法”。此后，康生亲自出马，去一个个报告会、号召会上烧火加温：

“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

“要在此地就下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即坦白自己的问题”；

“对不愿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

“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

“×××要不是奸细，把我康字倒着写”；

“×××长得那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

“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

“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

我读过的不少回忆文章中，都强调了当时康生的煽动和蛊惑，似乎他的一双手能遮住宝塔山。山下，延安当时的气氛颇为诡异：

据张克勤回忆：

“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行政学院9班一个组的学员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随后大家凑钱买来花生、红枣，以庆祝自身“坦白”的“光荣”，并邀请其他组还没有“坦白”的学员一起参加，以激发他们也走上“光荣”之途，

其实，不管“坦白”不“坦白”，“光荣”不“光荣”，最后都得面临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既有嫌疑，必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根据地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特务头子和联络关系，只有供出这两者的人，才被认可“坦白彻底”。自然，只有靠编织精神上的幻觉，诸如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饭、睡好觉、保留党籍……以及肉体上的折磨，诸如车轮战、甩耳光、压杠子、举空摔地、五花大绑、假枪毙……才能使对方服从这个逻辑。

一位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在连续审问三天三夜不见口供后，审讯人员以再不交代便放两条毒蛇去关她的窑洞里相威胁，她在“出卖”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组织”的同时，也“出卖”了文学，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编造了一套颇为曲折的口供。

一位拒不承认是“特务”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绑整整两天两夜，松开绳子后，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疤痕直至建国后还没有蜕尽……

后来人都听过一支气势雄浑的歌子：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却少有人知道，在“抢救失足者运动”里，在这群“优秀子孙”中，延安所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

余人，挖出了十几个“特务”。有着一千多人的延安通讯部门，因“特务”如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致使一段时间里延安和各省、各根据地的通讯中断。西北公学 500 多人，只有 20 多人没“抢救”，96%的“特务”。绥德师范，一个 14 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来，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一个 16 岁的半大小伙子，手提一大包石头，交代自己是“石头队”的队长，而石头是他们的杀人武器。在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中，共揪出 230 个“特务”，占了该校总人数的 73%……



1946 年 10 月底，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又不得不派代表来沪，请民盟等第三方面出面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图为国共两党和民盟等第三方面代表会谈后在吴铁城住宅门前合影。前排左起：张君勱、陈启天、沈钧儒、邵力子、周恩来、左舜生、郭沫若、李维汉、曾琦、吴铁城；后排左起：黄炎培、杨永浚、华岗、章伯钧、余家菊、罗隆基、胡霖、蒋匀田、李璜。

都是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有的还是来自海外的归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投奔到延安——这漫漫长夜里一座光明的灯塔，却犹如飞蛾扑火，深深地灼痛了身心。有人在被“抢救”时激愤地责问：

“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数，外面来的人皆不可相信？”

“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越大？”

“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特务的？如果是这样，我不如在家乡当汉奸，我还冒风险跑出来干什么？！”

极个别的人以“反革命奸细”罪招致处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实味。

他满腹经纶又桀骜不驯，延至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撤离途中，他仍未幸免，一颗对马列主义造诣极深的脑袋，滚落在山西兴县的山沟里。据说毛泽东闻讯后，一时间大为震怒，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少数人在身心皆不可忍受的境遇里含冤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多数人熬到1944年春夏之交审干基本完成后，获得甄别。有的人则由满头青丝变成垂垂老者，直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

1945年3月，曾先后参加“青委”和“民委”的“抢救”工作的蒋南翔，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呈送给党中央和刘少奇。在这份被称之为“忘身进谏”的意见书里，有一节专门论及在党内已产生的对知识分子排斥、打击的倾向，不妨摘录如下：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个前提。对于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做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

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奇怪的，但事实确实是如此……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然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何况有些工农干部，甚至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虽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伤是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

1992年，一位经历了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老人，在读了邓贤所著的《中国知青梦》一书后唏嘘不已：我们不也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吗？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理想和信仰，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又在“理想”与“信仰”的石臼中被捣个粉碎。与“文革”中插队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们的惨痛境遇相比，前前后后的历史怎么会这样相似？

其实，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这一幕，与后来的一些运动比起来，还算不上是“江河奔腾”，可也算不上是“溪流汨汨”，它早该为世人所知晓。显然，因为山重水复，天各一方，也因为抗日救亡和国民党颠覆的严峻环境，使它似乎有了某种矫枉过正的合理性，这一幕即使不被封锁，也在略有耳闻的人们心里被冲淡了……

3 两难境地之间

中国人化简为繁的功夫，可谓卓尔不群，举世皆知：

多少年里，一个人生下来，从幼儿园直至殡仪馆，进校，分配，当兵，招工，提干，提级，加薪，出差，看病，坐车……进入每一道门槛都有林林总总的规矩；一个工程要立项，几百个公章盖下来，犹如当年长安城里的杨贵妃，要吃岭南水灵灵的鲜荔枝，不知要跑断多少匹马腿……

中国人化繁为简的本领，其实也常让人叹为观止：

非爱即恨，非友即敌，非红即黑，非左即右。长期以来，在“左”派理论家的枪口下，凡是不合他脾胃的东西，均被视为从“右”边来的不明飞行物，而欲将其一一击落；直至今天，大凡磨难历史、扭曲社会、压抑性灵的东西，一旦被我们拾起来，便好像一块烫手的洋山芋，一下给扔去了“左”的筐子里……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涵盖一切。

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左”为何物。“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益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他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何时何地作过任何检查……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要了解20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有一种文化形态，它绝对不像“中学为本”一样，散发出沙滩上

死鱼的腐臭气息。它也运筹帷幄，殚思极虑，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锯，一一去锯断从政权到文化、从经济到风习……这皇权社会赖以生存的种种制度。当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它期盼在皇权社会的坟场上，崛起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它也不像“西学为体”一样，隔着大洋抛洒着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惧西方现代文明，多少年里，这文明总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穿着一条连裆裤。它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家伙一旦进来，便会一脚踢翻中国这只装满小生产者的马铃薯的口袋，贫富不均由此派生，尔虞我诈由此繁衍，男耕女织将何寻？田园牧歌将安在？

如果说，这种文化形态在这之前的面目还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已经充分展示了它的两翼，一翼是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号召的强烈、饱满的民族主义；另一翼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同样强烈饱满的反传统主义。它期待以飞翔的双翼，在迤邐的天际线上，为中国绘出一条诗意的出路：一边彻底抛弃皇权社会那又长又臭的裹脚布，一边断然杜绝西方现代文明那光怪陆离的霓虹，对我们社会的瓦解，伦理的诱惑，以及对中国人至今还抱有的天朝大国心态的讥讽。以自己的文明资源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跨越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五四”运动，总是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集体记忆，乃至精神的盛大节日。殊不知，“五四”运动已经开始在暗处造就着文化人的大尴尬。

这种文化形态，严格地在中国的两类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里，选择自己的载体：它看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扬幡招魂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皇权社会肌体上见头上有肉就去舔头、头上烂了就去舔脚的一群跳蚤。

难怪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凡俘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仪者，西方文化的撒播者。

在时代的暗房里，他们在进口的胶片之上，冲洗出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国的嘴脸：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平均主义……他们将胶片踩在脚底下，冲出暗房好似冲出一个幽深漆黑的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没有比卢梭、华盛顿、法国革命纲领、美国独立宣言，更能让他们感到长风掠耳；也没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使他们觉得阳光如瀑。为了这片古老而又苦难的土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愿走上险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个任凭雕鹰叼去眼珠也要盗得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只要秦皇汉武，还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却从来不需要普罗米修斯。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虽然以慧星般夺目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可终归也如慧星一样，很快便和他们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坠落在长夜难明、云沉天低的封建暗空里……

知识分子是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

比起单纯的“面条”来，“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嘘、太多的动摇，自然也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躁动、太多的探求。

对于前者，犹如对一个郊荒岛瘦、迎风落泪的弱者，人们很难喜欢，难怪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王明、张国焘就视自己的同类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险分子”，并宣称“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

对于后者，好似走来一个精力充沛、咄咄逼人的强者，人们更难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将划破正进行庄严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让观众看到布景后不那么庄严的东西……

林黛玉不会找焦大做老公，这种文化形态不会寻知识分子做自己的载体，由此也是确定无疑的了。剩下的一群惟有非文化人，在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弱小的情况之下，他们主要当然是农民。似乎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强选择，其实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的联姻——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世代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金戈铁马

声中，我们听到了农民对皇权社会、专制制度断然有革命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决不会引起中华文明的巨大断裂，我们拂去历史弥漫的烽火硝烟，不时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旦冲进了紫禁城下，便要黄袍加身、分封诸侯，而不会厉兵秣马，再展长缨，席卷巴士底狱、凡尔赛宫，并迎风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来……

农民虽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条刷在土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握纛而起，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他们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说知识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罗飞船登月，农民的渴望只是借梯子上墙，后者不但渺小，有随时实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剧烈震荡。墙外也是早已熟悉的炊烟与村庄，小溪与山冈，月球上却绝对是反差强烈的气候，完全陌生的地况地貌……

农民动如脱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极大的革命动力，可一旦满足了生存需要，顷刻间便静如处子。

农民能去疆场上出生入死，却不会在思想上出生入死。他们的思想得有人规范，一旦被规范，他们则终生难以逾越。

因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紧密联系，农民安道守常，循序渐进，他们是民风淳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稳定的磐石……

犹如无垠、丰饶的尼罗河流域，托起了辉煌、雄伟的金字塔一样，中国的农民完美地托起了这一种贴近乡村的文化形态。这一种远离城市的文化形态，也用一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精心包装了农民的理想、农民的哲学。

这一种文化形态，面对自己上帝的赞美，是极为动人的。且看李大钊先生的笔下——

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故土？……早早

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做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地还了农村……，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晨报》）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

——（《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晨报》）

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从脱去长衫、身无几个铜板、却携同学少年走向湖南乡间的毛泽东，到20世纪20年代倾心在农村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风云一时的梁漱溟……身上无不跃动李大钊笔下的热情。

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见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

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

今之道德，大半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禅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

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它一被这种文化形态奉为了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玉妆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并最终和20世纪的历史虽未公开举行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厮鬓磨呢？

也许取农民是民族精粹之义，这种文化形态被称之民粹主义。

20世纪之交的中国，病入膏肓，积贫积弱。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怆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这是一曲民族主义（反帝）与民主主义（反封）的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

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憧憧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农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欲，将会坚硬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

它是砂纸和凡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从此油光闪闪；

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

它是发动机和灯炬，前者驱动我们民族走出耻辱的泥淖而抵达富强的新途，后者则在这同时警惕着社会不会如资本主义一样失去道义与公平。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皇权主义，而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以及本国西化过程一再受挫后，对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最高文明的由“羡”到“恨”的民众心理机制，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并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造反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毛泽东，作为韶山冲里一个农民的儿子，长期的乡村环境熔铸了他农民本色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他喜欢读人物传记，尤其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从陈胜、吴广、张角、张鲁，到王仙芝、黄巢、李自成……读来无不兴味盎然。一部《水浒》和《三国》，从少年时代的牛背，一直放到晚年被书籍淹没了的床头，两个儿子在苏联念书时，他也托人将这书送去，担心他们在啃“洋面包”时却忘了啃这“土面包”。

他还着迷于古代戏曲，八个样板戏一扫天下时，他躲在丰泽园里

一个人看《李陵碑》，看旧戏录像。暂且将“风雷激”、“云水怒”的小小寰球放在一边，一看就是五六个钟头。看完，他又常常发出如是的评点：

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太炎断定了知识分子道德的低下，毛泽东除此之外，还真心实意地相信在经验和才干上，农民也比知识分子高上一筹：“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热衷于打发知识分子去农民那里领上一张“毕业证”，无论是对儿子、作家、犯了错误的干部，还是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他曾经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过：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食。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个填饱肚皮的问题，在他眼里，夏日田野里那带着庄稼成熟气味的热风，肩头铜钱般厚的老茧和脚上总洗不去的牛屎，以及老农的旱烟袋上吊着的一串串天文地理、掌故逸事……不但是人间最宝贵的财富，更是使人脱胎换骨的不二法门。

毛泽东的思想，尽管风涛茫茫，云水变幻，可一条逶迤而来的河床从来不曾改变方向：少年时代，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善待农民；大革命时期，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区别在于他能否正确对待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如何看待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一个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在于他是否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毕生为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制定了浩如烟海的原则、方针、政策，其实这一切大抵树立的是一个标准，即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态度。他对农民的肯定与推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同韶山冲农民亲切交谈。

中是独一无二的。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民粹主义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也排斥民粹主义。

他是个农村化了的知识分子，而在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上，中国正是世界的农村，与动辄论西方、言必谈马列的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个中国化了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在吸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建党学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学说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能将民粹主义悄悄地嫁接进来，使得原属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起来，不那么伤神费心，只像三伏天喝青岛啤酒那样，一下顺畅地灌进工农大众的脾胃……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在实践上，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的知识，既在微观上表现于对农村小农经济的矛盾、各阶层人物的习性、关系及历代农民起义传统的了然于胸，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一个个脸上苍白失血，也使成百上千个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恨不能爬上总统府的高楼纷纷往下跳去……

他的中国化了的的知识，更在宏观上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编织为一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于历史几十年里一直死心塌地地坚信：在圆中国二百年来痛苦的强国之梦上，解放农民这一人数远为广大的阶级，要比满足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更为重要！

此外，也只有在民粹主义的氛围中，自以为机敏和狡黠的农民，才愿意领教知识分子的博大和深沉。而毛泽东似乎特别乐意充当教师的角色，他从不忌讳自己只读过师范，当过小学教师，即使在“文革”之中，林彪踩在红卫兵的肩膀上，为他戴上了四顶金光灿烂的帽子：“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他也摘下了三顶，留下的只是“伟大的导师”。

毛泽东大概明白，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的特权，俯身教诲村夫桑妇——除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外，这在历史上是最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历史上一切清教或准清教运动，无不因此而获得狂热的群众支持……

如果说，“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掺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那么，随着重视农村、发动农民、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民粹主义便犹如1979年中越边界的崇山峻岭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在中国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不过，这一文化形态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它常常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当我们称道“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之时，好似当今一些写手用电脑给报纸的周末版写作，搞不清楚打出来的究竟是炙手可热的稿子，还是一张张活蹦乱跳的钞票，我们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赞美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讴歌民粹主义……

此时，民粹主义躺在历史的床上，大抵还相安无事。

这把剑的锋芒似乎与中国革命的方向并无二致。

即使是民粹主义的推崇者毛泽东，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在遵义会议之前屡遭打击，他还记得真理一旦被冤屈是个什么滋味；也许是因为在严酷无情、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里，夜晚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他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在别人“左”的时候，他还能识别出“左”来，在延安为“抢救失足者运动”承担责任并加以甄别，便是一例。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从总体上说，还远看不清楚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竟会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即便是来自解放区、身心已留有斑斑伤痕的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隆的开国庆典的礼炮声中，蓦然回首过去，除了难以忘却康生那藏在镜片后的一对冷蛇似的幽光，更多的还是庆幸自己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从而才能在今天站在十月蓝湛湛的晴空下，分享这革命所带来的无限光荣与巨大憧憬……

不过，民粹主义一旦睡在了历史的床上，揭开掩体的被单，“左”倾思潮的突起与泛滥，便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指针，正越来越接近这个时间……

4 圆，一种美妙的平衡

当中国卸下从民族解放的大道上——一路驶来的满肩风尘，摆在眼前的已是一条奔向现代化的大道。

随之骤然而至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全社会吃喝拉撒睡的全方位管理。与战争环境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截然相反，毛泽东感到了陌生。在没有其他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欣然接受了伊凡大叔的经验，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他用一个小小的幽默道出了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极为虔诚的心情：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思·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

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般的秩序，春江花月夜一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份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越来越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种尤物：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既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农民们道德的魅力与身份的优越感，日益稀薄于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益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

“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得开始习惯响起不同的声音；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总能在牙缝间剔出几点肉丝来，作为西方文明的心仪者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能让人从中捕捉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之后，它不会甘心就这么悄然地离开历史舞台……

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毛泽东自然感觉到这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挑战，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素来讨厌繁文缛节、又着迷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感召力的毛泽东，将会怎样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吻，去嘲讽那个庞大的将他和自己人民隔离开的法理型组织形式，并使这一组织形式的驾驭者周恩来，如同在泥泞地里驾驭一挂重载的驴车，日益陷入一种动辄得咎、狼狈不堪的境地……

对于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毛泽东早已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传达出他鲜明的倾向——

长期以来，他交了不少党外朋友，诸如黄炎培、柳亚子、章士钊、陈叔通、马叙伦、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士钊、周谷城、冯友兰……翻一翻《毛泽东书信选集》，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

对于党内干部，毛泽东宛如只接受香火、而从不离开庙宇的庄严的菩萨，基本只保持工作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即便是对几十年跟随左右的周恩来，建国后他也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其他领导人家里，他则一次都未去过。

而对于这批人，他则由“菩萨”还原成了有着儿女情长的人；迎

送出门，上下搀扶，挽手搭肩，泛舟漫步，嘘寒问暖，送钱送物，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程潜早年当过他的老师，一解放，程潜来北京，他亲自去车站迎接，据说这是他惟一一次移动大驾，去车站欢迎一个人。周谷城曾和他共事于湖南师范，在他的鼓动下，周谷城还参加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并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建国后，自1957年到1965年，毛泽东到了上海，或是周谷城去北京，总会安排两人见上一面。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时，念友心切，竟特意派了架飞机到上海接周谷城。

1920年，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和蔡和森等人赴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颇大的款子。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帮忙，后者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措到2万银圆。43年后，章士钊早已将此事置于九霄云外，毛泽东却记起了，从这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都派秘书从他的稿费中取出2千元，给章府送去。到1972年，累计“还债”已满2万元，秘书自作主张将此事停办了，一生不爱摸枪更不爱摸钱的毛泽东，对这笔钱则记得牢牢的，他告诉秘书说：

“我‘还债’是假，给老先生生活补助是真，哪能真的10年就停？不过对行老可不能这么说，你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是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吧，只要行老健在，利息就得还下去……”

毛泽东很强调在阶级社会里生活，每个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的这批朋友们身上的旧烙印可不是一点点，要能刮下来，大抵每人都能刮个一斤、半斤。以章士钊为例，其人当过北洋军阀时代的教育总长，对其所作所为，鲁迅曾写文章加以斥责。毛泽东却能网开一面，以旧谊新情轻松地抹去了他们身上的烙印……

和他们在一起，毛泽东更能挥洒自己性格的魅力。无疑，他会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和党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与他们一道纵横古今，吟诗唱和，意溢于海，情满于山，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在这派洋洋暖暖的气象中，他们无不为毛泽东的通今博古、上天达地的学识所折服，但更被他的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所倾倒，眼前的这位不就是集历代圣王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吗？

于是他们或效行皇权时代的礼节，对毛泽东执君臣之礼，或在呈送的诗文中多有溢美之词：

“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涤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

在这一氛围里，自尊心极强、在党内生活里从不向别人袒露心迹的毛泽东，紧绷着的神经在浓厚的书卷气中得以放松，“高处不胜寒”的心灵，在融融的友情吹拂下有了暖意；更重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特权，去俯身教诲村夫桑妇一样，胜利者放弃胜利的特权，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这在历史上同样是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

毛泽东一定感到了这种魅力，并醉意微醺地沉迷于这一魅力……

早就有人注意到：

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成为毛泽东的私交朋友却不多。（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是，这批“旧式”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儒学修养自然也不在话下，但倘若不夹起尾巴做人，而认真地表现出儒教的风骨来，毛泽东仍会这般温文尔雅吗？

1953年9月9日，梁漱溟先生在听取了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之后，在小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发扬民主的即席发言。反应颇为热烈，周恩来便邀他去大会上



1942年初，梁漱溟自香港脱险后，息影桂林时的留影。时年五十。

发个言。

11日下午，他走到了主席台上，稍作应景之词，便直指他一向关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这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这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仿佛这涉及到了“专利权”，而“专利权”是不容侵犯的，次日，大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当即写信，要求往日那位胸襟博大、谈笑风生的毛泽东站出来讲理。次日晚上，两人匆匆晤面，那位毛泽东似乎从此离他远去了，站在面前的依然是以九雷轰击他脑袋的毛泽东。16日，他又在大会再次发言，表白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以求公众评理。会场上一片沉寂，他没有料到当虎皮的斑斓之色出现在草丛中时，公理也就从森林里失踪了……

第二天，一位中共领导人登台，将梁漱溟的历史剥得一丝不挂。毛泽东斜睨着这一丝不挂的历史，点燃起一支香烟，顺吐出一缕缕袅袅烟雾，不时送过几句话来：

“你虽没有以刀子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少有人提及早在1953年，顺缕缕袅袅烟雾飘过来的，已经不是

烟卷味了，此话一出——“以笔杀人”，毛泽东打量知识分子的目光里，就有了浓浓的火药味……

梁漱溟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讲。次日，在这本该是他“刑场”的地方，“杀人犯”却更加倔犟地挺直了自己瘦长的脖子。他的话刚开头，便不断遭人打断，不让他再讲下去。他转过头，不含一丝乞怜的目光直逼毛泽东：

“……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以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当即回答：

“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此刻一定感到了一种大厦将倾般的彻骨悲凉，一种即将在玉石俱焚的火焰中腾空而去的悲壮：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

两人的对答声不时被台下狂愤的呼喊所打断，共和国最高级别的会议，俨然开成了“文革”期间七月流火般遍布国中的批判会：

“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这是建国后，在党外人士里，敢于当面“犯上”的第一人，也许还是惟一的一人！

梁漱溟未免过于迂腐，极端认真，但仿佛正是他宁折不弯的人格

力量，使个性同样分明的毛泽东，觉得了几分踌躇，倒是毛泽东的口气有些缓和，答应给他十分钟陈述。

他却不依不饶，为了充分袒露心中的冤屈，他要求和批判者一样“有个公平的待遇”。结果有人提议表决，自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他就此被哄下台，这一驱逐便是悠悠20余年……

露水对霞光是敏感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敏感；

猫头鹰对夜色是警惕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警惕。

他终生割不断自己与农民阶级的感情脐带，但当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压在他的肩头时，他又能够驾驭自己的感情：农民可以打下江山，夺取政权，农民却不能设计机床、电站，规划铁路、通讯，培养出中学生、大学生，并用文字为后人记录下眼前这个被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史诗般的年代……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他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毛之不存，皮即不毛之地。

他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一个圆：圆心是工农做主的政权，半径则是意识形态的尺度与他的忍耐。

他觉得，有了这个圆，在保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和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建设成就来——这两者之间，便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

作为感情源于农民阶级、胸怀与视野又远远高于农民阶级的毛泽东，他的想法无疑是对的。但是犹如物理学上著名的加速度实验只能在真空中进行，如果换在非真空中实验，其数据便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在民粹主义躁动不已的氛围里，在知识分子的价值感与荣誉感泯



1983年摄于北京梁漱溟家中。

灭多年之后，一旦经工业文明春风的触摸，已经如柳芽一样小心翼翼地绽开之时，这种美妙的平衡，便常常被不美妙地打破了……

5 双方都未找到感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这样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惠，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 年》）

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内，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远不像以武力去收缴农民的粮食那样剧烈。可在中国，建国之初，首先发动的便是以 200 万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

运动的缘起，是一部名为《武训传》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它说的是 20 世纪一个教育家的真实故事，他依靠行乞成了地主，然而这却是一个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乡村教育的地主。自 1951 年年初公映

以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并将它列为本年度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在家基本闲坐无事、养得白白净净的江青，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并向丈夫介绍了它。他震惊的倒不是这部影片像一只苍蝇那样令他恶心，而是它在众多知识分子心灵的湖畔，怎么会像白天鹅一般翩翩起舞……

毛泽东从不摸枪，但常喜好在《人民日报》上玩弄“社论”这把“枪”。他当即握起“枪”，向这只“白天鹅”开火了：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从生物学到法学，从哲学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人们在组织或在觉悟的驱使下，纷纷站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水龙头下，尽力洗去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以便能穿上一件清一色的、但在外面的大街上可以通行无阻的马列主义外衣……

虽然中央强调这是一次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但要解决大象无形的观念形态问题，除了在延安时期就用过的批判、揭发、检讨、斗争，乃至人人过关，引导者们和帮助者们实在使不出别的什么高招。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孙大雨过思想关，一个批判会连着开了八个小时。

在北京大学，曾当过旧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周炳麟教授，因为解放前和国民党有点瓜葛，整了又整，就是不被认可过“关”，他绝望地说：“你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在为国民党殉节吧……”据说此事毛泽东知道了，也劝阻道：“不要再搞了，再搞就

过了。”

在西南政法学院，一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去“天堂”无望后，便买了一张去“地狱”的票，从走长江的客轮上跳下了……

如果说最后没能过思想关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后期“三反”、“五反”运动的介入，使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多数算是过了关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怀疑也远未能卸去。



孙大雨先生遗照。

最突出的是司法界，建国伊始办了个新法学研究院，原本是想在里面改造旧司法人员，但一个命题好似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便挑破了这个短暂存在的“肥皂泡”：

列宁讲，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军队、法庭，就是监狱、警察。按列宁的论断来理解，政法工作就是国家的刀把子。旧法学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新法学的本质则是阶级压迫阶级。旧法学讲诉讼程序，工人、农民哪懂什么程序，这显然是刁难老百姓。旧法学鼓吹在法庭未判决之前，对罪犯应该实行无罪推定，这又是资产阶级标榜“人权”的虚伪把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既然已是被告，便确定无疑地成了罪犯，对他们不实行有罪推定，罪犯是获得了“人权”，可人民群众的“人权”却被剥夺了……

一句话，旧法学理论必须抛弃，旧司法人员必须调离。

在经过“大扫除”后的北京司法界，能留下来的旧司法人员似雪泥鸿爪，而大量涌进来的是一批血气方刚、摩拳擦掌的店员，他们正是在“三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

多数部门的旧社会留用人员，则被调任与他们的资历、经验远不相称的低级职务。与此相反的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

的党员得到了普遍地提升，似乎从此开始，刘胡兰面对铡刀的威武不屈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董存瑞在高举的炸药包上炸响的、令山河变色的豪言壮语也慢慢风流云散，他们可以进“幼儿园”，毫无羞愧之色地“排排队，吃果果”了……同时享受起怀疑他人批判他人的专利，与前者比起来，这同样是在精神上“吃果果”。

韩素音如是描绘道：“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

郭沫若也私下告诉韩素音一个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有两位摄影师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突然爆炸了，他们当即被警察抓走，并被指控为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同志……（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1898~1998》）

1953年年初，党宣布了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年3月5日，在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等政治局委员的急切心情中，斯大林同志终于闭上了他那双深不可测、令人常常不寒而栗的灰色眼睛。凛冽的寒风中，葬礼是极为隆重的，但他的水晶棺材几乎刚刚送进红场的列宁陵墓，一个词——“解冻”，便随伏尔加河上泛滥的春汛，诞生在苏联政治生活的辞典上。

《人民日报》感应到了什么，它拂去满篇尚未散去的硝烟，透出了一缕温熙的阳光，在次年3月25日的社论里，出现了这样的规劝：干部们必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这里的“他们”，指的便是知识分子。

似乎党已经察觉：在某些颐指气使的党员干部的手下，知识分子有些无所适从、疲惫不堪了。得让前者收敛一点，并让后者坐下来喘口气，以便能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上……

对此，俞平伯先生也许是麻木的。如同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便醉心于《红楼梦》研究，他的看法是该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而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意旨；他本人也长期关在书斋里，心静如墨池，超然于中国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外。此时，他写了一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在红学上基本保留了过去的观点。

一定是出于对后者的尊敬，文章发表前送给胡乔木看了，此君正

当风华之年，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口碑，徐铸成在这5年前的一篇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此君年仅38岁，思想细致，知识面广，判断亦清楚，实为难得之人才。闻彼亦清华出身，苏北人，曾任毛主席机要秘书多年，平日沉浸于工作，私生活极严肃，惜因多年劳瘁，身体很不健康……

胡乔木提出了某些意见，并让俞平伯重新改写。他不敢苟同，他不知道中国式的尊敬，意味着不敢苟同也要苟同，起码是在面子上。他把稿子送《新建设》发表，不久《文艺报》又刊文介绍，称之为它“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两个小人物却认为俞平伯的红学思想是该扫除的“梦呓”，他们投书《文艺报》，被主编冯雪峰扔进了字纸篓。

似乎冥冥之中，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切，在小人物的文章被母校的校刊全文刊出后，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已有座席的江青仍不足以打发无聊，她又被放出来解闷了，她要冯雪峰再去字纸篓里把稿子拣回来。冯雪峰不得不拣回来，拼上了版面，只是在亲自撰写的编者按里，曲折地表达了些许对毛夫人的不敬：

这两位青年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加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加全面。

犹如救火队出发去救火时，却收到了一打舞会的入场券，过了不到一周，大都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运筹的中央领导人，收到了一份文件，打开一看，激情沛然的毛泽东，又在猛烈地“开火”——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是对30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又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批判，俞平伯先生刻骨铭心地感知了：在中国，即使是在最远离政治的学术“桃花源”里，也有着穿便衣的政治警察在巡视，从此《红楼梦》垫在了他的脑袋下，20余年哑然无声，恍若一场长长的冬眠……

此外，处在台风中心的俞平伯并无多大损伤，而遭他株连的《文艺报》则被狂轰滥炸，从1953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开了八次批判会，认定其“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冯雪峰被罢官，另组编委会以夺回无产阶级的阵地。

另一个被株连者胡适先生，号称“百科全书”的学者，如今这“百科全书”被五花大绑地押上靶场，一批大陆最优秀的学者：艾思奇、



1954年夏，胡风在北京寓所书房前。

胡绳、任继愈、冯友兰、罗尔纲、周汝昌、金岳霖、李达、侯外庐、向达、汪子嵩、范文澜、黎澍、何其芳、游国恩、蔡仪、王瑶、余冠英……顷刻间，变成了最优秀的“射手”，按照“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被集合成了一个梯队，在轮番、交叉的火力下，“百科全书”被打得千疮百孔，想来远在彼岸的胡适，也会感到心惊肉跳吧？

与超然物外的俞平伯不同，胡风先生则是一位始终以理性和热情在拥抱社会现实的作家。

也许正是在开国典礼之夜，他浑身热血喷涌，坐卧不宁，仿佛只有将自己投身于燃烧的诗行之后，他的心才能够冷却下

来。在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之一章《欢乐颂》里，他如是放歌道——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胡风周围，似乎存于着一堵吸音的墙，党没有听到他热情的歌声。建国以后，他成了一条晾在沙滩上的鱼，日子一直不好过。

这大抵要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他与周扬在现代文学史上那场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作为鲁迅先生臂膀之一的胡风（另一个是冯雪峰），他视自己为鲁迅忠实的学生，他所追求的正是先生毕生追求的，即将“五四”时代的文化多元化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国的文化。

在他眼里，周扬是一个长着一副教条主义的面孔，自己得与他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的人物；而在周扬看来，胡风长时间地蒙蔽、挟持了鲁迅先生，他的在国统区颇有影响的文艺主张，始终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异己力量。

在开国大典之夜，胡风绝没有想到，建国后不久周扬就当上了中国文坛的红色沙皇，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从此便在自己的头上悬着，为了这把剑不至于掉下来，他不得不用沉默来承认周扬的胜利。

但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上半年，事情似乎有了某种转机，他被列入《人民文学》编委会，又当上了中国作协的执行委员，他还听说毛泽东在评《红楼梦》事件时也批评了中国作协……他渐渐感到周扬头上的“皇冠”岌岌可危了，他的胸中也越来越会聚了“进谏”的勇气，他想让毛泽东知道：在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几近被奉为“图腾崇拜”之时，其思想和观点在许多场合却遭到了曲解，以及机械地搬用。



晚年周扬。

不是他蒙蔽了鲁迅，而是周扬蒙蔽了中央。

1954年7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从胡风手里接过一份装订讲究、字迹工整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时，胡风决没有料到这部在众多朋友协助下完成的、长达三十万言、厚似块砖的意见书，正似一块块砖，搭起了送自己和朋友们上政治断头台的阶梯——

次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送上《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报告里断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胡风真是冤枉了周扬。

在他眼里，周扬是红色沙皇，而在毛泽东看来，大概周扬不过是一个区区视线只盯住文艺运动的蝼蚁，怎能蒙蔽洞察天下的毛泽东呢？当毛泽东对此报告的批示回到周扬的案头，片刻间，周扬、林默涵等人也张皇失措、冷汗淋漓了，仿佛被批回来的不仅是胡风问题的

升级，还有他们自己已陷于瓜田李下的命运……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在外张贴的反革命标语、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也不是枪支弹药、集团纲领、暴乱计划，而是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按语是如何一种写法呢，不妨略举一例——

1944年5月13日，在重庆的绿原给胡风写了一封信：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对此，毛泽东如是按语道：

……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绿原便被“钦定”为板上钉钉的“特务”了。

事实却是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时，考进了设在校内的译员训练班，结业时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绿原感到震惊和痛苦，便去信给胡风，胡风当即回信：那地方是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随之逃亡，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一所中学里。不久，对他的通缉令

发到了复旦大学，时在该校任教的靳以先生即通过冀仿转告绿原，要他深居简出，务必机警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又写了三批材料的总序言，使其汇编成册，江洋澎湃一般发至全国。毛泽东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胡风与马思聪、史东山、艾青、巴金在北京华文学校留影。

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于是，从2月起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陡然转折为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5月16日深夜，胡风被带出了家，暮春柔和的晚风里，他却浑身发冷，宛如走在一条寒气逼人的冰道上。附近若隐若现、造型柔和的白塔，此刻也凄然高

耸，好似一个着白衫的巨大冤魂，徘徊于北海之上作无声的呜咽……

第三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名义批准了对他的逮捕。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这些人的逮捕令均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签发），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78人中，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196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6年，判处骨干分子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12年。“文

革”中，加判胡风无期徒刑，并收监关押至秦城监狱。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桩冤案才被宣告平反。

毛泽东的脑海里，不仅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梁漱溟了，对于一两个人，哪怕已被称之为以笔杀人，他也可以有此雅量：让其枯坐家里，犹如一串吊在房檐上的腊肉，听凭岁月去风干他们的灵魂。

此时却有了一群“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的几十号人，后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想像出来的“集团”，但对于只需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的毛泽东来说，他的预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想像。

对这个“集团”，他不存在雅量，因为在他严峻的想像里，这个“集团”只是第一片蛇信子，第一支罍粟花，在党政军系统和社会各界，还存在更多的披着“干部”、“文化人”外衣的敌人。

他不知依据什么搞出了个定量分析，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约占5%的估计。

也不知为什么，这是一个犹如初恋的情人一样，让毛泽东难以忘怀的定量分析，在此后的每一个运动里，他都要拿出来，似棱镜分解出阳光一般，以此分解出中国人的政治色彩来……

何况，在胡风的同类——作家、艺术家神圣的殿堂里，只有一个人敢于走上主席台，站在两个虎视眈眈的门神——坐着的周扬、郭沫若之间，说了半句话：

“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反……”

随即，这个叫吕荧的人，被推下台，随斥责与咒骂的滚石，一下掉进了命运的深渊。

此外，就是一片黑发怒耸的脑袋，一片揪土不已的铁锹。犹如嗡嗡乱叫的苍蝇急于舔血，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到“墓穴”前，纷纷给胡风的“尸体”压上一锹“泥土”——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又当过狐狸的徒弟……”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恍若这是一个忙着给动物取名的智力竞赛。最沉重的几锹“土”，似乎是由手无缚鸡之力的郭沫若掀下的，他发言的题目便是《请依法处理胡风》，内称：对于胡风这类“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既然毛泽东有了一个5%的基本估计，又有了神圣的殿堂里海浪一般汹涌的回声，所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便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这是一个警惕的眼睛好似海藻般四处漂浮、并锋利得几近能削去果皮的运动。

在中国作协，有一个叫冯大海的行政十七级的党员干部，时任《文艺学习》创作组的代理组长，他的文艺思想颇接近胡风，为此也去过胡家几次，但谈不上有什么深交。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海军任中尉枪炮官，两人倒是经常来往，一起下舞场，逛公园，中尉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据此，冯大海便像虫子一样被运动的蛛网给缠住了：十有八九，他是从中尉那里套取我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显然胡风不会拿军事情报来写诗，或是擦屁股。

对于这一具有惊险电影效果的案情，公安部异常重视，派出一位处长，加上海军司令部保卫部的一位上尉，和时任中共作协总支委员的黄秋耘，联合组成专案组。虽由黄秋耘任组长，但专案组的工作均属“绝密”范围，作协不得过问，归公安部直接掌握。31年后，黄秋耘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命令逮捕的，签发了逮捕证和搜查证，指定由我去执行。在1955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深夜里，我带领了几个人去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觉得根据一些不实不尽的材料，就随便怀疑一个人有间谍活动，加以逮捕，这样做未免过于轻率。同时我认为，即便胡风一伙真是反革命集团，跟胡风一伙有些来往、甚至赞同他们文艺观点的人，也未必个个都是反革命分子。至于说冯大海奉胡风的命令窃取军事情报，则更是无稽之谈。根据那个海军军官的交代，他告诉冯大海的只限于军中的一些逸闻趣事之类，作为军事情报，

那是一钱不值的，况且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尉军官，根本不可能知道多少战略性的军事机密。但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我有意做得宽容一点，我没有给冯大海扣上手铐，当人们带他上汽车的时候，我扭过脸去，在房间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低声对他的妻子说：“要照顾好孩子！”这句话等于暗示她，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她想开一点，我真害怕她会自杀……

这是一个波及范围不大也不小的运动。

在复旦大学，100多个有问题的学生被隔离在一个地面潮湿的大教室里，睡在用木板搭成的几排通铺上，吃饭、上厕所，则有专人在后面盯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与外界不得有任何联系。这些20岁左右的莘莘学子，有些什么问题呢？有的是因为在贾植芳任课时和他接触较多，而他现在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的因为曾是上海的震旦中学的学生，而曾经做过该校教导主任、以后又担任了天主教上海教区大主教的龚品梅，已经被指控为“美国间谍”……

还有的则为一个玩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某系有一个调干生，年纪虽只比考进校的同学大上几岁，春情发动得却好似正欲升空的火箭，任何一个女同学随便看上他一眼，他都能在这目光里挤出浓情蜜意来。他总觉得在这个同学里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占多数的班上，自己的贫农出身、党员身份，无疑有着大街上邮筒般的醒目，他每天都在期待有哪一位女生能向这“邮筒”塞进一封情书，可每一天“邮筒”里除了失望，便空空如也。似乎班上的女生暗中有约定，即便得在鳄鱼和“邮筒”之间作出选择，她们也宁可把情书扔进鳄鱼的嘴里。

终于他收到了一封信，他兴冲冲赶去了约会的公园，在长久的形影相吊之后，从附近的树丛里爆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他虽然常常念别字，将“狠狠地打”读成“狼狼地打”，人却并不傻，一下他就明白了这封信出自于眼前的这几个男同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领銜者一下便成了打击党团员的“反革命”……

肃反运动中，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里已使用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大搞株连、以势压人等手段开始推广开来。在政治高压下，自杀身亡虽不像“文革”时期那样令人麻木，但在文化机关中已屡见不鲜。到底有多少人含冤而去，又有多少人无辜遭罪，至今不见有官方的统计。但早在1956年9月，作为肃反运动第一线领导人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说明肃反运动伟大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字斟句酌地承认：

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至1955年，建国不过六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竟有六次。

它们的锋芒即便不全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只是小试牛刀。

思想改造运动，有人投河上吊，但事过之后，照旧教书写作，未有人身迫害的现象。关于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几次批判，虽说是把文艺现象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现象，但均没有构成对当事人的迫害，孙瑜、俞平伯还加了工资，升了职称。即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真正触及到的，在全国也只有二千多人，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压力。

毕竟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不等于欢呼雀跃的太平军，带着农民阶级的全部理想，也带着它的全部文化，杀进了六朝粉黛的南京。毛泽东口袋里的东西，颇为琳琅满目。除了民粹主义外，还有马列主义，尽管这在当时只意味着将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照搬一遍，当时最能像火炬一样映亮中国人心扉的口号之一，便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还有新民主主义，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的

前途尚在未卜之时，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放进自己口袋的。

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它必须得有民主的内容；

针对国民党的昏聩、腐败，它必须得有反封建的内容。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的那次对话，表明后者决意要放好它，并不让它丢失在沿路的风尘之中……

民粹主义既在渗透着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也在制约着民粹主义。

犹如一个调酒师，面对一大堆中西饮料，尚不知怎样调制出一种风味独特的鸡尾酒，好似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突遇两个男士罗密欧般的垂青，还不知对谁报以朱丽叶式的微笑，

毛泽东面对一个版图辽阔、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一支与他指挥起来出神入化、恍若鬼斧神工的军队在心理结构、生活习性上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队伍，似乎还未找准感觉——

每当他打开口袋，放出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之时，它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尽兴，毛泽东又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间摩挲起另两只鸟儿。

它感觉毛泽东在感性上是偏好自己的，每当他激奋之时，手往口袋里一掏，摸出来的准是自己。但在理性上，他又倾向于另两只鸟儿，否则他不会自延安的枣园开始，一直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呕心沥血地为它们编织了那么多漂亮的羽毛，并常常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不时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翅膀，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又一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似乎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感觉。

一边，为一个新时代到来而涌动的热情与憧憬，尚没有退潮，饱经忧患与动乱的祖国，200年来何曾有过一天的统一，片刻的和平？而我们现在正切实地享有磐石般的统一，秋日碧空般的和平；

另一边，这一个新时代又不如自己希冀的那样宽敞，算是一条大道吧，但大道上时有月暗星稀之夜，以及似陌生似熟悉的影子，如翦径者一样令人心悸的一闪……

一边，目睹一批批的工农分子，宛如当年抢占平型关一样，占据

了共和国各级、各个领域权力的高地，内心由衷地承认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社会性质的必然；

另一边，眼见有些高地上，权力正使打败贪婪的人变得贪婪，挑落张狂的人又披张狂，走过卑微的人重返卑微，心头不禁一闪：怎么又嗅到了一股农民起义的气味？

一边，为难过去的思想改造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工农是泪，我们是水，水变不成泪，就少有工农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工农是河，我们是沟，沟水引不去河里，沟中便要孳生资产阶级的水蛭，小资产阶级的蚊蝇；

另一边，又为自己身上总也洗刷不去的怀疑，深感一阵阵悲怆：难道非得将肉刮出血，骨头碾成灰，才能让怀疑远走遁形？

一边，发现几乎在每一场运动或斗争里，自己思想的尺码都得小去一寸，满街跑着竹竿似的瘦汉，这世界是否太单调了？

另一边，又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地震所带出的不可避免的余震，重要的是，在这地震中塌毁的确是旧社会留下的、尚不时弥散毒气的死角、暗堡……

在1955年，中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计384万人，其中10万人为高级知识分子。

如果说他们（也许得除去其中占7%的共产党员，还得除去那些提前洞悉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堂奥、却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参与这一堂奥的聪明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新社会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感觉只是矛盾——

一种既有动力也有压抑的矛盾；

一种既有希望也有失望的矛盾；

一种衣食无忧确又心绪难宁的矛盾；

一种被共产党疏远而自己又竭力想去靠拢共产党的矛盾。

历史，带着这般复杂的文化蕴涵，走向了1956年……

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揣种种矛盾，不知疲惫地走向了1956年……

第二章 一九五六

6 “上帝”打道回府

在1956年，周恩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时起时伏的斗争，却大抵忽略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或隐或现的冲突。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变幻莫测、风诡云谲、几乎从未消停的党内斗争中，并不因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心怀戒备，后者便成了周恩来的盟友。毛、刘均来自湖南的农村，两人的家乡仅隔着一座大山，两人也就操着同一口乡音，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忠诚的理想主义者，不过一个是教条型的理想主义者，另一个则是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只为幻想与心潮所逐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现实主义者周恩来，

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由此，我们便能体察在“文革”中，周恩来对刘少奇的遭际既有同情、又感某种解脱的微妙心境……



194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扬在延安。

也不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心存芥蒂，前者对后者便像对刘少奇一样，面孔日渐秋风黑云，手中日渐剑拔弩张。两人虽如阴阳相克，又如阴阳相依，由此便能理解在“文革”的惊涛骇浪里，刘少奇为什么死于非命，周恩来多少回如履薄冰却得以善终。但这又不意味着，毛泽东缺少对周恩来银针般的警惕。

大约可以说毛、刘之间隐隐存在权力之争的影子，而毛、周之间表现的则多是文化形态的冲突。

权力之争总要因地因时，总有低潮、高潮和间歇，总带有韬晦与心机的痕迹；文化形态上的冲突，则是本能的，经常性地表现于

一抬手、一投足之间的排斥。在影响力方面，前者波及最厉害的是中国的权力中枢，而后者犹如两团巨大的各带正负电子的乌云相撞，引起了中国土地和山河的震荡……

我想，刘少奇能不时感到自己身上由毛泽东投射过来的第三只眼睛；而周恩来心头，永远有一片挥之不去的毛泽东的浓重阴影。

早在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次著名的延安之行里，便有了对毛、周泾渭分明的印象——

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

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并且没有四张王牌决不冒险赌博。当革命的钟摆达到平稳之点时，周的工作最为精彩。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斯诺在中国》）

斯诺的印象大抵是准确的。不过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此做了某些修正：也许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远不如他早年希冀的那般圣洁、辉煌，也许是暮色越来越逼近他生命的窗口，他日益沉溺于自己心灵里那个虚幻、还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世界。他也日益变得像个反复无常的孩子，刚刚还想搭所房子，积木搭到一半，一气推了，又想搭个别的什么东西……

让我们回到1956年。

这一年4月，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华人、自己加入了英国籍的作家韩素音女士，自1949年年底以后第一次来到中国。

1941年在重庆她访问过周恩来，这次来中国，她准备了许多问题要采访周恩来，其中一半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6月25日，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她的采访。韩素音注意到：

15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19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聂荣臻等会见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代表们。

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像1956年6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这是一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被韩素音女士称之为“改变了我的一生”的采访，从此，她对周恩来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与景仰。

在这里，我们与其去注意周恩来说了些什么，不如去研究有着良好修养的他，为什么会在这时表现出他毕生罕见的“兴高采烈”，乃至“有点欣喜若狂”？

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不会有自己的私敌，他也不会去醉心于一己的私利。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这时“革命的钟摆”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平稳之点，周恩来可以走出心中的那片阴影，去从事“建筑师”的“精彩的工作”，并醉心于脚手架上日日攀升的共和国……

那么，1956年，在中国，在世界，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在1956年，对毛泽东来说，由他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严重受挫，大概是令他第一件气馁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毛泽东毕生对工业不熟悉，只熟悉打仗、意识形态和农业，也许是因为他对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渐渐感到了失望，他的目光又再度投向了农民。似乎他想以广袤的原野为战场，再打上一个“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然后以社会主义的生机勃勃的农村，去包围正被法理型苏联管理模式压抑得透不过气来、还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来……

毛泽东太了解农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在于一开始便抓住了农民的根本要求——土地问题。他又太不了解自己的父老乡亲：犹如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一过门，丈夫和老子，他就一块儿给当了；农民一旦土地分到了手，他们的经济要求和民主要求便一起给解决了。除了希冀自然界的风调雨顺和行政权力的不横加干涉，他们不会再要求什么东西。

从此，土地将掏空他们的汗水、心血，他们的智慧、狡黠，他们的黎明与夕照，以及能走动路的全部日子。他们则在上地上一茬茬耕耘天伦的和谐有序，一回回播种发家致富的强烈冲动和欲望。如同无

法想像地下没有巢穴的虎豹，天上没有窝巢的燕子，他们也无法想像失去自己土地的农民。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真理、荣誉，意味着家庭的维系、子子孙孙繁衍下去的根基，还意味着一部大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从来没有社会主义的烫金封面，也从来不被集体生产所装订，里面记载的只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小私有观念和狭隘心理，以及对小私有制和小生产方式被侵犯时的种种抗拒……

中国的亿万农民在一片冲天的火海里烧毁了地主的地契，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证之后，未等收上几茬庄稼，便发现怀里的土地证扑簌簌响了，恍若有了艳遇的鸟儿要飞了。因为小农经济是一种相当脆弱的经济力量，缺乏对天灾人祸的承受力和抵抗力，少数贫苦农民要求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以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和防止经济上的破产。对于贫苦农民的这一要求，共产党理应给予支持和扶植。可局部的要求被视为普遍的愿望，中国农村的上空，很快有了一场遮天蔽日的驱“鸟”运动。

在浙江省，1954年才有农业生产合作社3800个，第二年便发展到55000个，一下子膨胀了15倍！由于合作化运动的盲进，造成农村人心浮动，干群关系紧张，更严重的是，自1954年年底以来，农村出现了“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等情况……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紧急指示，认为以上情况，“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对此，中央指示除了适当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外，应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再放慢一些，以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的紧张情绪。几天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说道：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3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向浙江省委发

出电报，建议浙江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中央农村工作部并与中央第二办公室共同派人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省委整顿农业社。结果，农业社由53114个，收缩到37507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30%退到18.6%。加上其他省收缩共约5000个，全国总计缩减合作社2万个左右。

仅仅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生产力的暴动”弃之于脑后。他看到的是农民，正在自己的一部历经岁月变迁、已经发黄、脱页的百科全书上，印上社会主义的烫金封面，并以当年“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软又香”一起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激情，在殷殷翘首集体生产的装订机给它装订成册。他的心理误差还使他多看到一个0，即全国被缩减的合作社不是两万个，而是二十万个……

7月下旬，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里，他一改自己上半年赞成过的缩减方针，以全国被一刀砍去二十万个合作社为由，对当时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陈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口气之愤慨，言辞之激烈，讽喻之辛辣，与会者无不感到震惊。

毛泽东又找回了那种个人魅力型领袖的感觉，他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智大勇者，既能发现和唤起群众的巨大热情，又能征伐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

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和按语里写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顽症，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这些人思想上极其顽固保守，行动上则像个“小脚女人”，但是一经领袖的巨掌将他们从前进的道路上一把掀开，1955年上半年还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下半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高潮”出现了：

千万户农民抛弃世代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入合作社，走上一条新的集体生产的道路，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

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后头”……

如同将千万农户怀着痛苦和敬畏的心情，在不敢当“妖魔鬼怪”、“小脚女人”及“绊脚石”的各级干部铁了心地驱赶下，勉强地带着小块的土地和不多的生产资料涌进合作社，被视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又将从鹭鸶腿上好容易割下来的一点点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思想泛滥”，在《严重的教训》一文里，他列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人做贩鸡生意，“拿一百元买鸡一百二十只”，如此几乎白送的价钱，恰恰证明当时商品的流通几近一条鱼要在墙壁里游泳；

第二个人因为口袋里有了几个钱，“瞒着社里贩卖牲口”，未写具体数量，大约这数量写出来，也会让人觉得可怜；

第三个人是“把自己价值三百多元的好驴子卖掉，用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头瘦牛，余下钱来搞商业投机”，区区这点亦农亦商的经济头脑，就被拎出来示众，足以让今天坐着“奔驰”、“宝马”、动辄便谈上千万元大买卖的农民企业家们，自感若生逢彼时，自家的“罪恶”被枪毙20回也够了……

对此，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依靠行政手段和所谓思想教育的道德说教，像扑灭蝗虫一样去扑灭中国的田野里任何一点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此刻，犹如当年他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航船胜利的桅杆一样，他在该书序言里，充满豪情地预言道：

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第三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于毛泽东骇然变色，批判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被

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在此氛围里，1956年工业产值、农业产量、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社会商业零售总额等控制数字，纷纷加码，一时间，方方面面“试与天公竞比高”，连体育界也在批“妖魔鬼怪”，决心在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夺取世界冠军……

此会结束的次日，中南海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这是一个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声音。

如同“文革”中，它至少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命不凡的红卫兵面前，响起过100次以上，它称他们是“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茁壮成长”，然后便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它也随主人晃动红宝书的手臂，喊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实际上却在给江青激进味儿浓得似咖啡的话里兑上一杯杯水；眼下它也是这样，绝不去和毛泽东威严的声音相撞，它声东击西，或是将毛的话照单接收过来，然后一点点“偷工减料”……

这便是属于周恩来的声音。

在2月8日的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说：

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个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也在此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内称：

在扫除了右倾保守思想的障碍以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像潮水一样奔腾前进，超过了原有的预料。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适应国家和人民的

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它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明显地呼应着周恩来的声音——

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本来是要在5年、7年和12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定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急躁情绪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在下层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层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强调：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这一篇由该报主编邓拓起草、经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胡乔木修改，最后由刘少奇审查通过的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并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为之耿耿于怀。社论发表之前，刘少奇派人将清样送毛泽东批准时，毛只扫了一眼题目，便在天头上批道：“不看了。”

18个月之后，他在一次批评财政部的谈话中，仍愤愤难平地回顾了这三个字批语的内涵：“为什么我要读那些说我的东西呢？”

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篇社论是在谁的羽翼下孵化出来的一只蛋。刘少奇却在“文革”中，因为这一只蛋，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视为自1956年6月起，便在精心孵化反毛的阴谋。罗德里克注意到了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位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负责人要刘少奇解释的许多问题中，没有这一点；刘少奇本人被迫做的3份交代中也没有这一点。或许能说明刘的态度的最重要表白，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谴责那些对阻止1956年跃进负有责任的人，他的用语说明他不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或许是为了开脱刘少奇，1967年4月6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承认：

“56年反冒进，我负有责任，我是检讨了的……”

周恩来之所以发出一个小心翼翼、却不失锋芒的声音，显然因为他是总理，他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即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陈云，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等人，最清楚将他们精心编织的1956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方案给冲决得落花流水的“社会主义高潮”，将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些什么。

也不排除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无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他们宁愿上帝站在七彩祥云的高处，去光照寰宇，普度众生，而不愿上帝走到尘世，将教会冷菜汤似地置于一边，直接去和信徒们沟通。他们感觉上帝已有插手人间烟火、冷淡教会的企图，而这片“人间烟火”正是经济领域，“教会”更是他们多年苦心孤旨构架出来，如今刚刚层次有别、运转有序的经济管理系统……

1956年严峻的经济形势，也强有力地支持着周恩来的声音——

从下半年开始，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陕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出现农业合作社部分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少的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占5%。思想动荡、潜在的退社户，所占比例更大一些。

浙江省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达到了20%。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余户，并有102个社垮了台，个别地区形成群众性的退社风潮，有的要回入社的土地、耕牛，有的擅自到社里的鱼塘打鱼，有的把入社的土地翻锄，自行冬种，有的地方

还不断发生殴打干部的行为。

在河南省的临汝、永城等12个县，退社、闹社现象多及278个社，700多个生产队，有的到乡、县、专区、省各级告状请愿，有的光天化日之下牵走社里的牲口，有的私分了社里的粮食、种子、饲料，闹得严重的地方，恍若国民党又回来了，乡、社干部被打得不敢出门……

各地闹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系入社后收入明显减少所致，各省一般都有10%—20%的农户减少了收入。此外，生产计划脱离实际，种什么、怎么种，都得上面来安排。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里提出，在3~5年内，要生产并推广600万张双轮双铧犁，这是按开垦过西伯利亚处女地的苏式犁仿制的一种粗重的犁，在中国的南方，牲口没有足够的力气拉着它穿过潮湿的土地。因此，1956年上半年生产出的140万张犁，只分配出去10%，其中又仅有一半被社员实际应用。据说，邓子恢办公室对此下了个指示，即“毁犁还铁”，一下子有70万张犁被拖回去，化为了铁水……

还有，社员的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白天劳作之后，晚上又安排扫盲，其结果往往是农民白天疲惫不堪，晚上也疲惫不堪。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财务不清，乃至动辄打人、骂人、捆人，一个社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作价偏低，给社员的感觉是社里的那把算盘，几近于当年地主收租时的粮斗。

最为社员不满的是，跳进河里洗澡，身上还可穿条裤衩，可要你进社，屋前几株散见的柳树、桃树，屋后一小块巴掌大的苇塘、鱼沟，也得从你身上给扒个精光……

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家气象局给毛泽东送来了一条迥然不同于政治气象的自然气象报告——

重要的小麦生产省份吉林和黑龙江，遭受了自建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而河北、河南的水灾，比起1954年黄洋浩荡的水灾还要严重。惟一能让毛泽东感到稍许宽心的是，自5月末以来，尽管洪水、风暴、

旱灾，恍若赶庙会一样在大江南北接踵而至，但就全国而言，其破坏力尚没有达到1954年的记录，全国只有7.1%的可耕地受到了影响。

更有让毛泽东的心揪得发紧的地方，这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广西。当时中共广西省省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好似沉醉于邕江如诗如梦的水光山色之中，听喜不听忧，报喜不报忧，在愈演愈烈的灾情面前，未能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致使全省14700多农民流离失所，550多人活活饿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当即给有关人员分别以撤职、留党察看和行政记过处分。

城市的情况也不见美妙。首先，当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到了食物的供应。其次，1956年投资的大规模增加，超过1955年投资的60%，工人的增加量一下比原计划多出了三倍，更使城市负重不堪。此外，由于1956年干部、职工普加了一次工资，以及银行向农村、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成倍贷款，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压力。结果，1956年年底和1957年年初，城市里消费品普遍缺乏，迫使政府拿出了10%库存，削减了居民布匹和粮食的定量，机关、部队和学校也不得不减少15%~25%的炊事与取暖用煤……

毛泽东并不以为自己冒进，或许他以为这顶“冒进”的帽子，对自己正得其所哉：不“冒进”，怎能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掀翻蒋家王朝？不“冒进”，又怎能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在一张“一穷二白”的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他毫不怀疑经过自己编撰的一部农民的百科全书，会有什么错页、漏页、倒页，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阻力，只能证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蛀虫，在疯狂地蛀咬装订起这部书的皮绳。

他不会对此袖手旁观，只要看看两年之后，集体化程度更高、公有制成分更彻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好似钢筋铁索一样穿起了这部书，便知道事情一旦涉及了两军较量，两垒对峙，毛泽东的性格和意志，就是一把从不卷刃的刀子……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1956年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声音，保持了短暂的沉默。

9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指示针对前一阶段农村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具体方针和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生产；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积极、稳步、因地制宜地实行技术改革，推广先进经验，必须纠正计划过大、步骤过急因而导致强迫命令等错误做法；生产队、生产组过大的，应加以调整，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必须与当前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内容相适应。现有的大社凡不利于生产、多数社员要求分开的，应该适当分开；做好合作社的分配工作，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对林木、耕畜、农具和副业工具入社没有作价的要认真作价，作价过低的要适当调整。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拂去那些星罗棋布般的统计数字，报告里透射出的依然是周恩来的语言风格与领导风格，即必须有积极的发展速度，但速度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地发展。

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只在开幕词中提到一句：“一步步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此外闭口不谈经济问题。

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大概交流了一下彼此意会的目光，一年多来他们一直悬着的心，此刻可以放回原处了。

7 被忽略的两次会议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常常以为，没有苏共二十大，便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从时间上看，像是这么回事。前者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后者提出于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正式公布于5月26日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

会。在这个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一新方针。

这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是这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二个会议，是几乎与苏共二十大同时举行的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召开，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这两个会议温暖、湿润的子宫里，已经萌发出双百方针的躁动，并足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种冷冰冰的声音长期打磨下显得僵硬的耳朵，犹如柳芽一片向春雨里，竖起来一样，鲜活地听到了这一躁动……



陆定一（左二）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秦川（右一）、胡绩伟（右二）和王若水（左一）在一起。

建国之初，毛泽东说过：苏联是只大乌龟，我们是只小乌龟，只要跟在后面慢慢爬就行了。这话里确有乍上了一片陌生的河岸，草深蔓卷，只有暂且依前迹而行的虔诚，但也有几分戏谑的成分。他怎会亦步亦趋？很快他对苏联模式便渐渐有了失望，并且在公开场合不时流露出来。

纵观他的批评言论，其焦点集中于苏联模式的“规范性”对人精神的压抑和束缚上：

他不满意法治，一个社会倘若只有靠铁青色的法律才能存在，那么理想和道德肯定失业，只好流落去前门外卖大碗茶。他讨厌繁文缛节的各种规章制度，它们将社会构架成了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每个人成了塔上一块动弹不得的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腐败与浪费，在上下自如的电梯上发出令人心悸的荡笑。

他更反对形式化的教学和考试制度，如果他还想上学，又让他自己作出选择，他一定会去满黄土高坡上简陋的“抗大”、“鲁艺”、“西北公学”，而对高耸于列宁山上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学嗤之以鼻……

有史为证：无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里，还是在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即使斯大林在毛泽东的眼里，被视为俄罗斯大地上一株伟岸的橡树，可在许多的问题上，后者的做法与前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何况今天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无异于一个想砍倒这株橡树的侏儒，他怎会去接受这个“侏儒”的影响？

毛泽东有自己的一颗硕大的脑袋。

在这之前，还有周恩来一双无微不至的眼睛。

在1956年6月韩素音女士的那次采访中，周恩来谈到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境遇时，也许他想起在有关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也许是韩素音的脸上流露出了几分不信的神情——

他停顿了一会儿，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

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犹如风了解森林，五谷了解土地，离愁了解爱情，死亡了解生命……

周恩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延安归来，斯诺曾十分激动地告诉西方世界：

周恩来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信仰都充分融合在他的行动之中。

但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可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他几乎总在玩着猫作弄老鼠的把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却有勇气将知识分子的肝胆给剥碎了，做成一笼笼的人肉包子卖，以在自己的政治收支表上不断添上血染的进项……

这也不仅因为1937年至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期间，和1946年他作为三人停战委员会中共代表，先后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马思南路（现名思南路）107号调停内战期间，在国统区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开辟的“第二条战线”，以及随之建立的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友谊。

在这些地方，他不再是满脸的络腮胡子、一看便知是从马上下来的造反者，也不见一身臃肿的军装，脚上蒙着土灰，恍若刚走出延安窑洞的模样。他英俊的面容，潇洒的风度，宽广的襟怀，渊博的学识，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游刃有余的斗争艺术，以及对国际事务、国内形势的深刻了解，尤其是他对于民主的呼唤，他在中国的学者、记者、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及外国的外交官中反复重申的这句话：

目前的形势……需要有一种全国性的民主制度……我们希望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创造一种民主运动……

都会聚出一种既典雅又现代、既浓烈又温柔、既奔放又安泰、既深沉又坦诚、既明晰又丰富的魅力，并通过他一身质地优良、做工讲究的西服时时透射出来，让凡接触过他的知识分子，大抵都痴迷不已，难以忘怀。

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正是因为他的魅力，才使得溃败于江西瑞金、颠仆于长征途中、最后在陕北的一片不毛之地找到立足点的共产党人，未被外部世界视作历朝历代犯上作乱、杀富济贫的草莽和流寇，而看成一支具有如铁的纪律、如火的激情并在理想光芒照耀下的民主力量，直至最终被中国的政治生活所接纳。

在很大程度上，周恩来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正是因为他的魅力，黄河之滨、宝塔山下，才在广大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蒙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视其为天新地新人新的香格里拉，并抛弃世俗看重的一切，千里迢迢投奔到延安的怀抱中来，

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投身于他在国统区所开辟的“第二条战线”，这正是被蒋介石和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都忽视了的中间阶层，然而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最终的交战中，这却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蒋介石正是因为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乃至践踏知识分子的忧患与希冀，使民心

的天平很快发生了对他不利的逆转,从而使毛泽东拿下一个个固若金汤的城池,犹如探囊取物……

此外,还不仅因为在建国以后,周恩来墨突不黔,席无暇暖,却总挤出时间与知识分子保持着联系。从党内知识分子到党外知识分子,从民主党派人士到无党派人士,从科学家、教授、学者到作家、艺术家……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几乎遍及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在禁卫森严的中南海里,他的住处兼办公室——西花厅,是接待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很早便有人在后面诋毁他:“周恩来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

他倾听他们的建议和牢骚,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乃至婚姻,他也似乎更愿意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品茗聊天,听音乐看戏,或是在充满家庭的氛围中围桌小酌,以找回大脑里被繁重的国务活动与高深莫测的政治风云给掏空了的常人的感觉,不妨打个俗气些的比喻,他像个婚姻并不怎样圆满的女儿,从公公家回到了娘家……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1951年盛夏,已当上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先生,去了庐山避暑。当他回到位于北京东单乃兹胡同的府第,不禁大吃一惊,原本房里铺着的花砖,一下全给换成了地板。他一了解,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给换上的,因为花砖地在冬天显得太冷……此后多少年里,家里每有客人来,他便要指着地板说:“共产党待我真好!”

吴祖光先生还提起这么件事,也是建国初期的一年秋天,中南海里像是一片金菊怒放的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请了老舍、曹禺和他3对夫妇到家来吃螃蟹。恰好当天晚上,他也在家里请客吃螃蟹,想想在这秋风起菊花香的日子,能想起请客品赏这在京城里少见的螃蟹,除非是心目中的挚情好友,否则谁会这么做呢?

他和新凤霞不能不匆匆地改自己的约,去赴周总理的约了。他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周恩来自己还去厨房炒了一个家乡菜上桌,而且桌上的螃蟹远比自家的螃蟹个头小,也不热,想必这并不是他专享的,而是公家煮熟了统一配给的,吴祖光感觉到了周恩来身上一股浓浓的平民气息……

最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

何人比周恩来更清楚这个新生的国家需要知识分子,也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个新生国家的境遇更感到焦灼不安。

圣西门有一则著名的《寓言》说:假如法国不幸地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大财主,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幸,但倘若法国优秀的物理、化学和数学方面的学者、军事与民用工程师、诗人、作家,突然各自损失50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但在中国,事情似乎颠倒了个。

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读懂这则寓言的日子:

1949年10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作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

1988年,一位当年参加了政府工作的党外学者,对韩素音女士回忆了当年的情事后说:“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此时我们深信自己的一生都是光辉灿烂的。”……

没有多久,民粹主义便拿这则寓言去擦了自己的屁股。

一份关于政协地位的文件里这样写着:“在召开任何会议之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决定。”“然而,到了1955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作出的决定”,人们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

“周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票可以抵上12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政治上异常清醒的周恩来,竟也有天真的时候。他大约很快就明白,这无异于兔子去找老虎商量大森林里的民主规则……

不给权就不给权吧,那就让知识分子安心心地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也罢。可还不行,怎么看也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钉在脚板上的一只鸡眼。20世纪50年代中期,据统计,共产党70%的党员来自

农村，属于半文盲。仅有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只占1%。然而知识分子却必须接受比自己文化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

如果说，在中国封建的农民宗法社会里，便有仇视知识分子的传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炀帝以拒谏嗜杀遗臭于万年。唐代虽以开明见称，但也有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人，均因诗文“语涉讽刺”引起龙颜不悦而先后遭贬。明末袁崇焕，虽以儒生身份执掌军权，戎马倥偬，保边卫国十余年，最后还是在朝廷一片“卖国贼”、“死有余辜”的狂喊声里，被崇祯皇帝处死。明清之际大兴文字狱，尤以清代康、雍、乾三朝为最烈，从康熙二年（1663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125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就达107个……

那么，眼下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或海外关系，总的工资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要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及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所培植起来的平均主义要求，便更是“强化了这种中世纪的愤恨”。在这种愤恨下，所谓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与“指导”，不过更多地意味“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

1953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

（以上引言均摘自韩素音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88》）

它们应该是被官方所认可的观点与材料。其理由是，此书非由国

外出版后再翻译进国内，而是先由国内权威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再次，该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该书责任编辑谭德山、廖心文两先生，本身就是该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周恩来急于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毛泽东是如何同意的呢？

诚然，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圣西门的《寓言》的，在他眼里只有失去理想、革命精神以及无产阶级主动把握的阶级斗争，中国才会真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可也许正因为他膨胀了它们的作用，才认为通过建国这些年来的一系列运动、批判、斗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造，让他们再瑟缩于梁上，做一个上不入天、下不落地的“君子”，不但是对他们的苛求，也是对具有深厚道义力量的共和国的丑化。该让“梁上君子”们下来了，并在地上给他们一个合适的位置……

还不排除如是的意思：1949年1月，当解放战争的隆隆春雷，开始由中国的北方向南方挺进之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便作了这样的预言：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是一个古老得已长出青苔、发出磷光的轮回。毛泽东立志要率领自己的队伍走出这个轮回，但总是有人被青苔所纠缠，被磷光所吸引。

建国以来，最让毛泽东震怵的，无疑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了，两人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造船贷款、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万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两人还勾结不法奸商，投机倒把，使国家资产损失达21亿元。案发时，他们用于个人生活腐化的贪污款多达37825万元，这在当时对于一般的工人、农民来说，是一个操劳终生也换不来的天文数字。毛泽东可不

是孔明挥泪斩马谡，他怒眼圆睁，肝胆陡立，拈起桌上的那管狼毫，当即便在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几笔结果了这两位天津市委前任书记与现任书记的性命……

“三反”斗争中，毛泽东曾要求对全党的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他强调其中有些也应开除出党。至1953年6月底，经过整顿，全国有238000人被开除党籍，9万人被劝告退党。

某些党内干部的骄横，正是在与知识分子的对比中滋生的，他们的贪婪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知识分子的缄默里，像夏夜潮湿暗处的蟑螂一样繁殖开来。

毛泽东深谙以夷治夷，犹如“文革”中，他起初以几个笔杆子来制约几个枪杆子，当枪杆子在庐山上被他一举摧毁之后，他又还让这几个理论上左得可爱的书生，制约起几个实践上总右得令他担心的政府元老。眼下，他是否会这般想：何不声张起知识分子被敲得蔫蔫的兴致来，以此制约党内某些总也走不出水泊梁山的“好汉”？

我想，毛泽东还有这样的考虑——

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眼前一个如此庞大、纷繁的控制体制。纵的方面，是党的系统，由刘少奇在控制。他犹如一个年轻力壮的推土机司机，不知疲倦地将党的意志、党的声音，推向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他的眼里，党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党不但是神圣的，革命的，而且还是无所不能的。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几乎任何一件事情，若不通过党的审视，它肯定来历可疑，不经过党的指点，它必将寸步难行。

毛泽东显然不把党看得如此神圣。对此，他在“文革”中大大地嘲讽了刘少奇，他仅写了一张大字报，上了几回天安门，便发动起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弹指之间，让刘少奇和他的各级“司令部”成了秋风里的簌簌黄叶……

与刘少奇的以党治国相比，周恩来更像个“专家治国”论者。

虽然周从未打出这个口号，但对这个自上而下渐显僵化的党的系

统，他的心里一定有着某些保留。他不会去顶撞个子高大的刘少奇同样高大的“神圣感”，他的办法是在这个纵的系统边，建立起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即他自己的行政系统。通过尽可能地吸收党外的专家、学者进这个系统，以便使整个的控制体制，不但建立在意识形态上，也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不但是绝对的，也是科学的，不但是强有力的，也是充满弹性的……

与同对刘少奇的“神圣感”不以为然一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

番煞费苦心，看来也大谬不然。在他眼里，虽经过周恩来的修修补补，这体制还是苏联模式的翻版。此外，十有八九，更让他感到不快的是，在这两个系统犹如巨大的齿轮时而咬合、时而摩擦的过程中，他的权力在不断地被磨损，官僚主义则好似润滑油一样，从这过程里嗤嗤地冒出来。

1954年以前，毛泽东有权发布法令、政令，废除和修改政府决定，任命总理和所有重要官员，处理战争与和平等事项，而现在党和行政系统林林总总的各部、委员会、办公室，好似雨后大森林里冒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蘑菇，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而且在这些“蘑菇”的充塞下，他离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愈加遥远，连近在一箭之遥的《人民日报》上发篇社论，也得先经刘少奇看了……

或许，毛泽东正这样想过：知识分子热情地被调动，全社会上下一定程度对话气氛的形成，不正有利于对日益官僚化、并渐远于自己领导的那个庞大、纷繁体制的冲击吗？

颇像是周恩来来找毛泽东借钱，后者却盯上了前者的口袋。

周恩来不会料到这将最终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只是为当时毛泽东支持他为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而感到了欣慰。于是，呼号的北风抖撒着塞北的黄沙，还在一阵阵地扑向紫禁城巍峨的琉璃飞檐之时，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头，涌起了一片绿茸茸的希望……

1954年1月，在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他强调——

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22年后，当饱经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地聆听邓小平再说这句话时，他们以为这是属于邓小平的版权。）

用粗暴的办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

毛泽东最后一天到了会，以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表示自己对这项新政策的支持。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党：

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党外的知识分子，为早日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在3月3日结束的全国第五次统战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

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投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倾向。

8 毛泽东记住了一个名字

1956年，中国的宽松，似乎首先体现在大街上人们衣着的变化上。

2月间，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纷纷指出：漂亮的衣服并不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反，与新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一致的是，人们的衣着也应该丰富多彩起来。

3月中旬，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时装展览会，观众潮涨潮涌，以至于展览会不得不延长到月底才闭幕。初夏时，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作家参加了一个舞会，在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格什温的两首曲子里，北京的姑娘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裙在旋转，宛如春之田野上

一片翩翩起舞的蝴蝶。他注意到还有穿旗袍的，其两侧的开口高至膝上一英寸。

作家戴晴则清楚地记得，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巨幅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甚至连“行人和车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

对此，一位曾创造了一个新词“蓝蚁”，来形容中国人服装之单调、统一的西方记者吉勒恩，大吃了一惊。众多的国人，也在心里嘀咕：这一切不会是梦幻吧？这一份宽松，会不会也和季节性极强的时装一样，不用多久就得收进箱子里去呢？

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毛泽东还在不断地推出色彩愈加斑斓的一套套“时装”来——

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一篇建国后他对中国社会的诸种矛盾，总体把握最为客观、清醒的讲话，其基础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中央34个部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恍若梦中的呓语，酒后的昏话，这又是一篇在他的著作里，最不为他本人、也不为全党所重视的文章。

在这次讲话里，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

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这便是不久后提出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出处。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是否

属于毛泽东的专利，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同年5月13日，刘少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次谈话：

“实际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口号最初是由陈伯达提出来的，后经毛主席修改加工，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许多东西最初都不是由毛主席想出来的，只是由他进行了加工。”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大相径庭。

据1957年之前《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位记者告诉我，1990年前后，他曾去北京看望过饱受折磨、多病缠身的陆定一，后者告诉他：在一次规模很小的中央会议上，鉴于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教条主义猖獗，例如在遗传学上，持苏联李森科学派的便成了唯物主义，而同意美国摩根学说的则被视为唯心主义……陆提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应该允许自由讨论。毛主席则说，自然科学领域应该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也该如此……

又据黎澍先生回忆，1955年9月或10月间，他随陆定一去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毛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黎澍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瓜地里，没有比党史这只瓜的青藤上；长有更多的阶级性锐刺的瓜了。他又一次问道：“党史也百家争鸣吗？”大约是在上述的会议上，陆定一心中已经有底，他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代毛泽东作了回答：“是的。”

当时在场的还有毛的秘书田家英。

是否是党内素称“夫子”的陈伯达，将这一方针浓缩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个字，以便全党干部念起来能朗朗上口；还是毛无须陈代劳，自己也能做此概括，早在1951年，他为戏剧改革的方向便提了八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这一方针不像是高层集体讨论的结果，而像是毛泽东自行设计并认定适宜于在某种季节里穿的一款“时装”……

陆定一为之欢欣鼓舞。5月2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面对台下一千多位学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像一个模特儿一样，娓娓“走”来，从一个又一个角度，尽情地展示这款“时装”的风采：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

不知道是陆定一兴之所致，还是毛泽东兴之所致，在这个报告里，陆定一代表党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道歉。在宣布人们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从此享有诸种自由之后，他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文革”里，陆的这个报告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他被视作“肆无忌惮地篡改了党的双百方针”。

与中国政治生活呈现松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却日趋严峻起来。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他恍若一个超级气功大师，将多年来蜷缩于一个宇宙黑洞般恐怖的体制内所聚敛的全部内气，猛烈地给释放出来，顿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隆隆地滚下了山，倒在了“暴君”、“刽子手”的泥沼边，一个原本堂皇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也剧烈地摇晃起来，再也承受不起的虚假成就和血腥味，随吊有巨型水晶灯的天花板往下掉。痛苦与泪水，则好似从地板的裂缝里纷纷钻出来、吱吱乱叫的老鼠，窗上一块块信仰的玻璃也大面积迸裂开来，发出一阵阵令人心碎又心悸的声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巨大的震荡。

社会主义怎么竟会是这样？

在1927~1936年的党内大清洗中，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逮捕。在军队内，5位元帅被处决3位，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空军首脑被处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除一人外，都走了黄泉路。而且，在开国元勋里，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有4人因在大清洗之前去世而幸免遇难，另外两人，被留下彪炳十月革命光辉的，一位是早已逝世的列宁，一位则是斯大林本人……

人们又问：斯大林既是这般专制与暴戾，他活着的时候，你们这班今天坐在主席台上义正辞严的家伙去了哪里？不是在二十大的开幕式上，你们还领着全体代表为全党的“父亲和导师”肃立默哀吗？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犹如狂风卷起的沙石，劈头盖脸地向人们砸来。仅西欧英国共产党内，在当时近34000名党员中，在此后的1年之内，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退党，好似那纷纷交出去的党证上，不再凝聚着工人阶级美好的理想，而是沾染有一斑斑的霍乱病毒……

东欧更是风雨飘摇。

同年6月28日，波兰工业中心——波兹南的工人们首先发难，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和允许更多的行动自由，在部分群众游行示威的口号里，也表现了对苏联的敌视。当局出动军警镇压了骚乱，结果却引发了全国更大范围的抗议浪潮，经济领域的要求迅即上升为政治领域的要求，人民呼吁撤去虽是波兰人却加入了苏联国籍、元帅也由苏联任命的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长职务，强烈要求为哥穆尔卡恢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籍。后者原是该党总书记，1948年9月因不同意农业集体化和亲苏政策而遭到解职，次年11月又被赶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从1951年到1956年4月一直身陷囹圄。

这一事件惊动了克里姆林宫，10月19日，赫鲁晓夫匆匆率领一个强大的代表团飞到华沙，想把自己放出来的魔鬼又收回瓶子里去，显然“魔鬼”的逻辑，与他本人在二十大上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既然斯大林这个大菩萨倒了，那么粘有大菩萨身上金粉的小菩萨也必须倒下。赫鲁晓夫一行于20日早晨离去，21日在统一工人党的中央紧急全会上，哥穆尔卡便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其长期对手希拉里·明克被解除职务，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也被清除出政治局……

在匈牙利，同年7月，素称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的拉科西，因“健康原因”被解除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他的副手格罗取代。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20年后，才把社会主义投入政治恐怖的深渊；而他的学生在匈牙利被苏军解放后的两年时间内，将老共产党员、前政治局委员拉伊克等6名党的高级干部，以“南斯拉夫间谍”、“美国情报机关代理人”等罪名，处以死刑。接着又在全国展开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运动，被捕、被杀者竟达20万之巨……

人民要求为拉伊克平反，举行国葬，并为匈牙利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血腥时代的所有受难者昭雪。格罗不得不立即将还关在监狱的300名“铁托分子”释放，同意为拉伊克平反，却不同意为其举行国葬，理由是尸骸下落不明。

在一个包括党内反对派和受害者家属的小组的努力寻找下，拉伊克及其他三个人的尸骸，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被发现。10月6日，布达佩斯有30万群众排着长队，等候去堆满鲜花的4具棺材前志哀。每5分钟换一批人，当轮到政治局委员志哀时，顷刻间，乌云会聚，狂风大作。这时，即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会相信这是亡灵在冥冥之中，对政治局里仍有拉科西的影子表示着愤怒。

随之，这支30万人的送葬队伍，组成了一次无声的反政府示威，无际的沉寂与无边的悲愤，压迫得首都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气罐，仿佛只再需一点外力，这匈牙利的心脏就要爆炸开来……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拉伊克的遗孀和一副学者模样的纳吉。后者师从布哈林多年，曾致力于将老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运用到祖国的建设上来。1949年，因“布哈林倾向”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都存在这一大好玩味的现象：大抵政治家们在高层斗争中倒下一次，便在人民的心目中高大了几分。

在人民的呼唤声里，也靠赫鲁晓夫的提携，1953年斯大林死后，纳吉东山再起，出任总理后立志实行一条政治上民主、经济上自由的改革路线。历史好容易给了匈牙利一个医治自己遍体疮痍的机会，拉科西恶狗般叼走了这个机会，又转过头来狠狠地咬了纳吉一口，1955年他既被解除职务，又被开除党籍……

拉伊克葬礼后的第8天，与匈牙利的贝利亚——法尔卡什被宣布开除党籍，一边弯曲着身子、一边放声痛哭地离开党中央大厦的同时，政治局恢复了纳吉的党籍。格罗以为该做的都做了，便去了南斯拉夫访问。他没有料到，自10月17日起，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作家协会、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等群众团体，进一步提出了立即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吸收纳吉参加最高领导、撤走驻匈苏军等强烈要求。

23日，首都几十万群众兵分三路，一路到国家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政治主张；一路前往国会大厦，要求与高层对话；再一路到英雄广场，推翻斯大林铜像。当晚9时半，这座高25米、重几百吨的铜像，在滚雷般的欢呼声中轰然倒下，而国家电台里，早晨才赶回来的格罗，以恍若比斯大林的铜像还要顽固的声调，一遍遍地呐喊：

“我们希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

“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兄弟情谊……”

此时，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格罗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山呼海啸之中：

“格罗滚下台！”

“我们要纳吉！”

“人民相信纳吉！”……

据官方统计，当时在广场上有30多万人，近首都人口的四分之一。除了什么职务尚没有的纳吉被朋友们拉来这里，讲了一番人民得有耐心的话之外，没有任何高级官员出来与群众对话。无视如此壮观的山呼海啸是危险的，一旦和平的通道被堵死，它便会寻找其他的通道！

恰恰就在这时，国家电台楼顶上的保安部队枪响了，没有人敢下令向几十万人开杀戒，也许是哪名战士因为惊吓，握着扳机上的手一下失去了控制，但一旦子弹出膛，便划出了一条血染的通道。群众开始夺枪还击，保安部队当即开火反击。

片刻后，国防部出动了正规军以制止流血事态的扩大，可士兵们一到现场，他们的使命感，便像遍地的群众尸体上的累累枪眼一样破

碎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十分清楚正是拉科西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父老乡亲们生活日益凋敝，而纳吉任总理时允许农民私人耕种的政策，曾使亲人们的脸上有了短暂的红润……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往日也不满于保安部队对人民的暴戾，眼下他们的枪口几乎同时掉转了，与群众一起向保安部队发起了进攻！

布达佩斯，倒在了冲天的火光和殷殷的血泊之中……

多瑙河畔如诗如画的匈牙利，濒临于内战的边缘……

从10月23日到11月4日，13天里，被冠之以“斯大林”型的苏军巨型坦克，两次隆隆地碾过匈牙利的土地。

十三天里，先是匈牙利的一届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取消一党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并呼吁联合国的援助以捍卫它的中立；而后，是另一届政府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去讨论。

13天里，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最后一个付出生命的是纳吉，不过他是在一年之后，因为这主政13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当他走上绞刑架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这13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各国共产党纷纷发表声明，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称匈牙利事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眼里，这一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认为，“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策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则说，这是“一次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密切关注着苏联和东欧事态的发展。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更应该是一个异常复杂、心绪难宁的时期。

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他的反右倾保守的经济观点受挫外，他在全党全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也遭到了挑战。

在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里，有4处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提到的：

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热情洋溢的政治报告里，则有104处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他着力赞颂的正是毛“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天才与能力，而未提及毛对集体领导的尊重。

这一显著的变化，也许出自于刘竭力将毛泽东与斯大林区别开来的一番好心；也许也出自于刘暗示毛本人得与斯大林划清界限的一番苦心……

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必须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却删去了这句话。在讨论时，一些代表对此有些议论，刘少奇不动声色地作了解释：

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七大上确立的，现在即使我们不谈它（意指毛泽东思想），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

（此条引文可见多种“文革”资料中，这里引用的是《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由北京第四人民医院井冈山战斗队于1967年5月编印。）

毛泽东在看到非斯大林化的船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欧的海

面上划开层层翻腾巨浪的同时，无疑也隐约看到了在中国的海面上也有几只企图追逐那船舷而去的海鸥……

两年后，他在成都会议上这样说道，对于苏共二十大，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处想必在于这证实了他对斯大林管理模式早就有过的怀疑，这将促使他探索出新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忧处呢，赫鲁晓夫主旨为“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无异于送来了一面镜子，有人想把它挂在中国的墙壁上，以不时正他的衣冠。

大概有过两年的迟疑，此后也是在成都会议上，他站出来决心摘去这面镜子。他这样说道：

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像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正确一面的崇拜。我们要尊重这种崇拜，永远尊重这种崇拜……

还有一种错误的个人崇拜，也就是不加分析，盲目地遵从，这就不对了……

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搞个人崇拜，而在于崇拜的个人是否代表真理，如果你代表的是真理，就应该尊崇你。要是不代表真理，集体领导也没什么好的……

对待东欧局势，毛泽东的心情大概也是亦喜亦忧。

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受共产国际干涉的痛苦经历，以及建国后他与斯大林打交道的经验，他十分讨厌希拉里·明克、拉科西这类领导人物，他们犹如当年的王明一样，不过被苏联的牛奶、面包养肥了肚皮，便以为这肚皮里盛的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而视挺立于自己土地上坚持斗争的党为孩子，自己该来充做孩子的教父。

他理解波兰、匈牙利两党要走出克里姆林宫影子的渴望，他乐意看见一个党，哪怕是一个石子般小的党，表现出自己的意志来，使感觉一向良好的莫斯科在享用精神盛宴时，被硌得一阵阵牙痛……

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似乎故意怠慢“老大哥”，他安排苏联、波兰两党代表团一起与自己会见。在与波兰代表团的谈话中，他以明确的口吻表明了他对哥穆尔卡的同情。以至于米高扬的脸上涨红得似

掉进滚油里的龙虾，当天即率代表团飞离北京，而不是与其他 50 多个代表团一起，等到大会结束。

这年 11 月 29 日，伦敦电台《世界广播内容综述》节目里报道：哥穆尔卡承认他上台后，波兰得以避免苏联出兵干涉，不重蹈匈牙利的命运，这一切多亏了中国。他强调，这一事件证明中国党已经是波兰党的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好朋友”……

对于匈牙利事件，毛泽东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态度。他鄙视似头野牛、把多瑙河边一个原本光彩照人的瓷器店给搅得天昏地暗的拉科西；对戴着夹鼻眼镜、有着教授头衔的纳吉，他也持有某种怀疑。那十三天里，他徐徐地抽着烟，还想等等再看，可 10 月 23 日一过，他把烟头重重地按灭在烟缸里：

他理解人民拿起斧子，削去社会主义的大树上被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还有腐败蛀空了的树皮，但他决不容忍用斧子砍倒这棵大树；

他支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实际发展自己的要求，可这决不意味能借此跑去社会主义阵营的航船上，纷纷拆走自己的甲板，从而让资本主义阵营在一边享用牛排、小红肠与马提尼酒的同时，一边美滋滋地观赏这航船逐渐解体，并最终沉没于人类历史的海平线下……

于是，“据一位前匈牙利外交官说，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对情况十分了解，似乎已预见到局势的发展并向北京发出警告。他不赞成米高扬与纳吉谈判撤出苏军的问题，可能正是根据他的建议，中国方面迫使苏联镇压叛乱。”（詹罗德·拉德万伊《匈牙利革命与百花齐放运动》）

匈牙利事件后不久，邓小平也这样告诉一个西方作家：“至于中国人民，他们十分不满的是，当帝国主义用飞机把反革命分子运回匈牙利的时候，苏联却迟迟不进行干预。”（克罗夫特《红地毯通向中国》）

而毛泽东本人，很快便视莫斯科在匈牙利的新监护人卡达尔，为一位凯旋回来的英雄，一年内他在北京两次盛宴款待卡达尔。

尽管布达佩斯街头的硝烟，很快被金秋的鲜花所淹没，残存在马路石缝之间已经发黑的血迹，不久也被涌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第一场冬雪给润化，但这一震撼了世界的事件，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一

个十分尖锐、重大的课题：

“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你到底是什么？”（赵启强《走向绞刑架的纳吉》）

要真正认识并回答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课题，历史已经证明人类耗费了此后30年时间。但在当时，毛泽东似乎有意干涉这个课题，不过他大抵是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这个方面去涉猎的：

从匈牙利事件的刀光剑影里，他看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在党与群众之间、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地表现为非对抗性，倘若处理不好，便会被国内尚未肃清的反革命分子和境外的敌对势力所挑拨、利用，前者如摇唇鼓舌的斐多菲俱乐部，后者如在整個匈牙利事件期间，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以及其他西方电台，不分昼夜连篇累牍的煽动性广播，而上升为剧烈的对抗性，并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

因此，党必须在一手永不放下阶级斗争之剑的同时，另一手建立起能有效处理这些矛盾的矫正机制。

也许，正是由此开始，毛泽东在这一矫正机制的设计草图上，填上了全党开展整风的内容。

相形之下，我们感到了刘少奇的“浅薄”。在党的八大通过的、据说毛有某些不满但来不及修改的政治决议里，刘少奇给我们呈现的是另一幅图景：

……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犹如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并未因此而放下阶级斗争之剑；鼓噪农业合作化的热情尚未散尽的菊香书屋主人毛泽东，也并非将经济的发展搁在了临天花板的书架之上。

但这里确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导演风格：前者首先关心的是舞台上那块颜色脱落、铺满灰尘的布景，他以为只要换上一块气韵新鲜、气势博大的布景，中国的舞台上便会光彩夺目起来；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台上的演员，随情节的推陈他们将表现出怎样的冲突，以及自己手中的导演本子里该怎样驾驭这些冲突……

此外，匈牙利事件的腥风血雨，那些压迫心脏、刺激瞳孔的镜头：用钢绳、切割枪、重型卡车去捣毁斯大林铜像；

爬上政府大楼摘掉红五星，并挖去国徽，在国旗上留下一个斗大的窟窿；

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和他的同事，打着白旗，战战兢兢走出市委大楼，走在最前面的书记当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他人随即也被击毙；

大街上一堆堆焚烧的党旗、国旗，滚滚的黑烟漫过电线杆上吊着的一具具尸体，他们大抵上是党的干部，或保安人员。有的还像当年罗马市民处置墨索尼里一样，给倒悬起来……

这在极大地激起毛泽东无产阶级义愤的同时，也一定给了他一个在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

也许是当时混乱且又止于表层的传播媒介所致，也许是这一事件所提出的一系列口号纲领，比起非斯大林化的苏共二十大来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也许是他口袋里的民粹主义此时亢奋无比，好似脱兔般跃到他的胸前，使他的想像也亢奋起来……

总之，他看到的是：

一个温文尔雅、从来只使用思想不使用枪杆子的阶层，却在13天之内，比明火执仗的军队，更能有效地颠覆一个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更能迅捷地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沦于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悲惨境地。

这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

其中，他又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斐多菲俱乐部”。

其实，纳吉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位有着40年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说他有“罪”，这“罪”便在于他批判了非马克思原意的专制性质的社会主义，而且这一批判，天真地超越了提携他的赫鲁晓夫，更超越了还处于大梦不醒的历史。

在最后一次审判时，他说：

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牺牲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历史证明了纳吉的预言，三十几年后，匈牙利人民以比当年安葬拉伊克更大的规模，举行了他的国葬。但历史也嘲讽了他，匈牙利人民摘去了“社会主义”的招牌，欧亚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摘下了这一招牌，在世界的大街上剩下的几块招牌要坚持下去，无疑得付出极大的勇气。

细想想，这到底是纳吉本人的悲剧，抑或是未能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痛里感应出什么的共产党人的悲剧？

其实，被毛泽东视为这一场腥风血雨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斐多菲俱乐部，它的20个人的领导机构中，有13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此外便是科学家、作家、记者和大学生。

从1953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对拉科西的政治、经济路线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讨论和批判：这是一个耗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巨大机器，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实际上却用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

保护了少数寡头的权力……这无疑是1956年匈牙利的天空上聚会的第一阵乌云。

然而，知识分子拿不出钢绳和切割枪去推倒斯大林铜像，也少有勇气爬上高度足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楼顶去摘掉红星，匈牙利事件的主力确是工人阶级。枪林弹雨中，与苏军对抗的民间武装力量里，两支最大的队伍均由工人组成。即使在纳吉内阁被苏军的坦克所推翻、新内阁还没有从莫斯科到达布达佩斯之时，也是由各民族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在维持匈牙利大地和天空的呼吸，并从中传达出人民的意志。

有这样一个细节。11月23日，匈牙利事件过去的第一个月。下午，该委员会举行会议。4点时，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来，向与会者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的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在一种半是威严、半是悲愤的气氛里，在场的苏军高级军官无不动容，他们也和与会者一样站起来，低沉地唱起匈牙利国歌，并脱帽向死于自己枪下的殉难者志哀……

大概不会有人告诉毛泽东这类细节。即使有人告诉了他，一生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的他，此时也会忽略这类细节。其实，在整个匈牙利事件里：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

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人民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去区分，到底是知识分子愚弄、瓦解了工人阶级，还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全民族的长远利益面前，工人阶级终将和知识分子作出同一选择？

也许本节里对于匈牙利事件的描述过于冗长，但搞清它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事件在毛心里所引起的挥之不去的梦魇，是如何在下一年起作用的，并由此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日益处于一种严

酷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心理误区，不但影响了毛泽东，也影响了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从而使匈牙利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也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在19世纪80年代末，我们已经浩叹不已地看到了它苦涩、沉重的后果……

在淫雨如罩的日子里作画，纸上难免不带着几分凄厉之气。

在毛泽东的笔下，依然是阳光明媚，花香鸟语。

与年初比起来，他对于国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眼下并无多少改变。他在长江里一口气游了20公里，又痛快地吃了一盘武昌鱼后，挥毫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他还对高级干部们说：

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骚乱，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至多是一小撮人到处闹事，要求所谓的大民主。大民主并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中有的同志对此感到害怕，我看没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庆幸自己建国后一直关注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的同时，仍相信思想改造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已起到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斯大林，更不是拉科西。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之无愧的缔造者与领导者。

他从未枪毙过自己的政敌，祸及满门，或是将他们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即使党的八大好似一张能试出酸碱性的石蕊纸一样，让他觉得已经试出了他的某些同事心灵的真实颜色，他对他们仍客客气气。

他还在金刚山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

让只有三条半驴腿的贫下中农，改写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历史。

他叫一位星期一尚拥有一家工厂的资本家，星期五便拎着装了午饭的包，高高兴兴地去这家工厂上班。

他还鼓励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与士兵睡同一个炕头，并为他们洗袜子……

中国老百姓，也不是苏联、匈牙利的老百姓。

无论是每年国庆节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还是他去全国各地视察，“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犹如滚滚春雷一样摇撼着山川。他亲眼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他面前情不自抑，红光满面，嘴唇嗫嚅，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握着他的手的双手颤颤抖抖，久久不能舍去。

他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从全国各地来的列车快到北京时，列车里都要广播：“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了……”，这时沸腾的车厢一下安静了，无论大人、小孩，几乎人人望去窗外，几乎人人眼里泪光莹莹，脸上沉浸于一种朝圣者式的宗教表情。随着车轮的飞驰，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位巨人深沉、博大的呼吸……

1955年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李辉《关于杜高档案的对话》）

当然谦逊是一种美德，但这是一种充盈着无限快慰的谦逊；

毛泽东不想搬去莫斯科住，但这不妨碍他企及登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奥林匹斯山。

为此，毛泽东没有打算放弃关于矫正机制的设计草图，相反倒急于完成它。因为他的肩上，有了一种使命感：

斯大林走了；

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也给丢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航船上，必须有人把正舵轮，开辟出一条新的航道来。

9 中国，日朗星明

伴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享受了建国后第一个没有斗争、更没有运动的一年。

1956年里虽有争论，但争论像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争论的问题是，是否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双百方针的贯彻。有两派意见，一派是肯定的，另一派则认为如果确立了马列主义为讨论的基础，那么这实际上便意味着所谓争鸣，不过是仅有少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五星级宾馆。

郭沫若先生是第一派的代表人物，也许是他的党性修养真到家了，一举手、一投足间，便流露出浓浓的布尔什维克味；也许是他的聪明真到家了，这时已经料到毛泽东最终甩到桌面上来的是一张怎样的底牌，他在同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此强调：

百家争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最终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的交响乐要围绕这个主题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乐曲来，不论千万支乐器如何独奏或合奏，总得按照旋律演奏……

这一争论因7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得到了部分解决。社论信誓旦旦：即便其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人们也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该报一向高居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法庭之上，这时，对是否要以马列主义指导双百方针的这一重大问题，却放弃了法官的角色。社论颇为谦恭地说，该让知识分子们去决定在争鸣中，是以马列主义为其基础，还是运用马列主义来明辨是非。

此外，真可谓云淡风轻，日朗星明。

一条一向变幻莫测、车少人稀的道路上，如今推车骑车，提笼挑担，老老少少，汗光津津，中国的上层建筑有了一次蔚为壮观的“赶

集”——

不再机械地引进苏联的一切，大大地拓展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世界的视野。各出版社相继宣布自己引进西方学术经典的出版计划，所涉及的学科几乎应有尽有。到1957年已出版的经典译著有：门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美国当代学者巴斯教授的《胚胎学》、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安东尼·梅勒的《语言史比较方法》、美国数学家斯特鲁克的《简明数学史》、美国经济学巨匠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斯宾洛莎的《伦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集》……

据郭沫若1957年7月5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一年来国家用于进口西方世界书刊的外汇为180万英镑，而在前一年只用去60万英镑。

除去了传统文化的政治镣铐，投之以重新评价的从容目光。1951年一年里，上海一个城市就有237吨书籍化为了纸浆。广东汕头市更是“只争朝夕”，在1953年5月22日至25日的4天里，焚烧了30万册书籍……恍若是为它们招魂，1956年6月，北京成立了一家古籍出版社，专门重版古籍中的珍版本。这一年里，全国有180余种传统文化方面的名著问世，其中包括历代骚人墨客的佳构，又尤其是清初大家的作品，以及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的著作。

还记得，1956年后，我常常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孙文全集》，以及安娜·斯特朗女士写的有着针砭意义的《斯大林时代》，里面有很多图片，我看得津津有味，以打发比当今的孩子远为单调的童年……

同年5月14日，中国画院在北京成立，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宣告成立。这两院的宗旨均为将传统艺术家们组织起来，鼓励他们按照各自的风格进行创作，并在不同流派间的切磋中共同发展。

过去被视为封建主义糟粕的一些京剧传统剧目，如《谢瑶环》、《二郎探母》等，这一年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又被搬上了舞台，寂寞了多年的票友们奔走相告，乐而忘返……

自然科学宛如成了一个天体浴场，进去这一领域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被脱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衣服，里面再没有了阶级性，科学家们可以显示真理的赤裸，或去追求赤裸的真理。在全国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里，“向科学进军”成了当时最神圣也最时髦的口号。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该院制定了一个从1956年开始为期12年的科学发展综合规划，主要项目无不经天纬地：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新型电子技术研究，喷气式动力装置研究，生产自动化流程开发，石油及稀有金属储量勘探，矿藏资源开发，重型机器的研制与开发，整治黄河与长江的技术问题探讨、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及化肥使用问题研究，严重疾病研究，以及基础理论研究等。

1955年年底，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只有47个，到1957年年底，已增加到68个。政府拨给的科研经费也陡然增长了，1956年比上一年高出2.3倍。该院在为科学家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外，并于1956年首次设立了一套奖励办法，次年1月即对34项科研成果颁发了奖金。

此外，也在1956年，送往迎来，胜友如云，高言说论，标新立异，该院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60个学术代表团，并派遣了16个代表团前往10个国家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次次“咳嗽”，中国的文坛上也就一回接一回地“感冒”。这持续不退的热度不是别的什么，正是政治。

作家们宛如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冥思苦想地图解当前的政策和运动，批评家们长着一副水手的胳膊，不遗余力地打捞思想特征、政治倾向。在两重外力的挤压下，文学好似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除了一身硬突突的政治骨头外，几乎摸不到艺术的乳房了。哪怕一点点怡情悦性的作品，只要刚从文坛的话筒里传出自己的声音，便立即会被教条主义奋不顾身地给摘去，比如当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晓的《柳堡的故事》，是一个在军事斗争的故事里又糅进爱情的颇为动人的故事，批评家们以八路军不许谈恋爱为由，批评它“不典型”、“具有坏的影响”，很快就淹没无闻……

1956年，毛泽东微呷了一口茅台酒，中国的文坛又很快醉意醺

然。大批的刊物应运而生，恍若灰蒙蒙的天地里涌起的一片新绿。《萌芽》、《北方》、《奔流》、《山花》、《红岩》、《星星》、《雨花》、《新港》、《东海》、《延河》、《海燕》、《漓江》、《青海潮》……中国所有的省级文学期刊，大抵都是在这期间创刊的。

作家们好似流徙的鱼儿，从一口浊重的政治泥塘里，兴冲冲地游去水波清纯的艺术之河中。在这条河里，也许他们中不少人可能成为大作家，却未能成为大作家，因为不到一年，这条河便干枯了；相反，那些未随波流徙、以在那口泥塘里的痛苦与焦灼去审视生活的人，却用一两篇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奠定了自己无可争辩的地位。其中，当时就有广泛影响的，有三位——

秦兆阳，无论是按他自延安时代开始的红彤彤的政治履历，还是



王蒙。

看他已经担任的中国级别最高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主编的显赫地位，他都该是文艺庙堂里周扬左右的一把寒光逼人的大刀。这把大刀却倒过来使了，竭力要挑落的是一片片坚硬的铠甲，是一路无视于生活、却只映射政治光泽的文学身上的铠甲。在他1957年主要为此而罹难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他棱角鲜明地主张：

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

在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里，正像在其他一切学术性和非学术

性的问题上一样，一切这样那样的教条主义是有害的。就连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问题上的许多名言，我们也决不应该当作教条来脱离实际地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

正因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所以任何人也不应该用他的死硬的教条给人们画出一条固定不移的小路来。一切正确的理论都只能帮助作家找到通向高度成就的现实主义道路，但决不能代替作家自己对于现实主义途径的探索……

秦兆阳且说且做。在1956年，他费尽心血将《人民文学》筑成了一座反对教条主义的“碉堡”，并着力地推出了两个“火枪手”。

一个是刘宾雁，时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他有一个好思考问题的大脑，1939年，他还只14岁时，便拖住大人问：苏联为什么占领芬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在不经人家同意的情况下，将军队粗暴地开到人家的境内去呢？他不是一般地问，而是忧心忡忡地问，仿佛他为之忧虑的不是远在黑龙江那边的陌生国度，而是自己一个青梅竹马的伙伴……被问的人一下怔住了，倒不是回答不了，而是为这个问题与他本应还只是梦见蟋蟀、柳笛的年龄不相称感到吃惊。

在中苏关系有如蜜月的日子里，他四五次访问或途经苏联。在自己餐桌上面包、鸡蛋、鱼子酱、伏特加水一般流淌的后面，他窥探到苏联的农业始终没有过关，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十分好过。身边的苏方翻译，代表团接触到的群众，大家可以谈得非常亲热，喝个一醉方休，他们对中国确有感情。可临走问他要个地址，恍若向贾宝玉讨那块“通灵宝玉”，他怕你和他通信。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到处抓“间谍”、揪海外关系的肃反扩大化，至今还在人们的心头留有阴影。

他到远东问题研究所，从外面整个铅灰色的花岗岩建筑，到里面人们讲话时吞吞吐吐的口气，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下来的内容，感受到了理论界的沉闷空气。到书店里去买政治方面的书，拿到手里一看，不是关于列宁某本著作的解释，就是发掘斯大林某次讲话的非凡意义……他失望了，外表强大且强大到能扳去希特勒头上的芒角的苏

联，却好似一个感情生活上屡遭挫折仍无归属的老姑娘，怎么内心表现得如此缺乏底气呢？

失望之余，刘宾雁更加佩服起苏联作家奥维奇金，这是一位在自



意气风发的王蒙夫妇。

己的纪实性作品和短篇小说中攻击官僚政治毫无怜悯心的党员作家。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意愿，被称之为“解冻文学”的一大批作品，犹如呼啸的砂轮，纷纷涌去政治生活的瓶颈处。奥维奇金更是金光油亮，俨然成了民主枪膛里的子弹，刘宾雁也为之深受鼓舞。

1955年，奥维奇金到中国

访问时，刘宾雁接待过他，两

人有过深谈。在谈到自己要写的一个剧本《两张党证》时，刘宾雁说：

一个共产党员，把党证坐在屁股底下，生怕出什么事情，战战兢兢，在最迫切的需要面前也怕犯错误，惟恐失去党证，其实是怕失去自己的职位。另一个呢，党证在他心里，却不去想它，而是大胆地、按照党的良心所指引那样为党的事业而斗争……这两个人，谁是真正尊重党证的呢？

1955年岁末在兰州，主人盛情邀请刘宾雁去正施工的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看看。到了那里，工地上的一位团支部书记给他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这几年，风尘仆仆，奔波于大江南北，他总想在写新闻之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表达出来，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故事，宛如一个尺寸准确的衣架，一下撑起了他思想的全部线条。他马上住下来，利用春节放假的那几天，映着窗外一片厚实的雪幕和屋里暖烘烘的炉火，一鼓作气，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题目是《在桥梁工地上》。

这个故事写了两个人的冲突：一方是罗队长，他更关心自己“不犯错误”，不愿意做上级没有交代做的任何一件好事；另一方是曾工

程师，学有专长，又有进取精神，总想在节约原材料的同时又提高工效。工人们支持后者，批评前者，而罗队长的答复是：“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要批评，得局里批准。”

稿子写毕后，当即投去《人民文学》，秦兆阳如获至宝。他以最快的速度发在了4月号上，并亲笔加了一个编者按，内称：“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一时间反响非常。

秦兆阳又鼓励刘宾雁再写一篇，因为对党报使命的某些想法早烂熟于心，他便写了一篇小说《本报内部消息》。故事的女主人公黄佳英是一位记者，还是一名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共青团员。她调查了某处官僚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能，对人民呼声的冷漠，并写成稿子想在报纸上揭露他们。她得到了编委会一些成员的支持，可她的努力最终纸上画饼，因为报纸只刊登党的宣传口径以内的东西……

此文经过秦兆阳亲自校定和部分改写后，又很快发在7、8月合刊号的《人民文学》上。

另一个“火枪手”是王蒙。

这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和祖国的未来抱着美好信念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也许1952年在北京东四区读书的中学生里，至今还有人记得，这年夏天在北京大学蔚秀园墙外的西苑草地上举办的“马特洛索夫”夏令营吧，这个夏令营便是由此时在团区委工作的王蒙组织的。

有一次，开全营的文艺晚会，当晚霞失落于未名湖里，穿着各色花裙子的少女和换上洁白衬衫的男孩子们围坐在草地上，在节目开始之前，静听着营长王蒙的讲话。他讲了什么，现在无从查考了，只知



王蒙先生近影。

道草地上蚊子很多，上身一件短袖汗衫、下身一条又肥又长的短裤的他，不得不一边说，一边拍打叮在脖子、腿上的蚊子，不时招来同学们友好的笑声；只知道穿着不像个团区委的领导干部、倒与中学生无异的他，讲起话来却极富逻辑性和激情，恍若一对欢跃、刚劲的鼓锤，不时在一片青春的胸脯上叩响了热烈的掌声；只知道他讲完话，一个男孩子站起来，以洪亮的声音朗诵了王蒙为这次夏令营写的营歌歌词：

我们有一个亲爱的朋友，
他就是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
他为他的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热爱祖国的人民……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起于被夏令营的篝火染红的诗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终于少男少女们去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表决心：“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干……”这本书里的一切，大抵都是王蒙自己青春的经历，青春的证明。

这又是一个几乎将创造的欢娱全都抵押给了文学这头魔鬼的年轻人。在他那间办公室兼宿舍、堆满文件、活动计划、工作汇报等一类材料的北向小屋，他夜夜吸吮俄罗斯文学的乳汁：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上作蝇头眉批。对契诃夫的《草原》、《带阁楼的房子》、《泛味的故事》赞不绝口。既爱看法捷耶夫、安东诺夫、纳吉宾等人的作品；从他1956年的笔下，我们又看到了加琳娜·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子……

从1953年至1954年，当他用两年的晚上和节假日，写完处女作《青春万岁》时，他尖嘴猴腮，满脸死灰，走起路来飘拂不定，几近一挂空空如也、被淘尽血肉和性灵的蛇蜕。

犹如一个如花似玉、追逐者论打计的姑娘，却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按照《青春万岁》的路子走下去，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坛，王蒙均可以前程似锦。他却吃错了药，在写了三个短篇之后，又写了篇

《组织部来的年轻人》。

该年轻人名叫林震，当他被派去检查一个麻袋厂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时，他为傲慢、懒惰、无能的厂长与努力增加生产反而受挫的工人之间的冲突感到震惊。他支持后者，在区委书记找他谈话之后，他仍动员工人写信给《北京日报》反映。与刘宾雁笔下的黄佳英一样，林震也坚信报纸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结果在报社的“干预”下，却是厂里的个别中层干部受到处分，而厂长依旧是厂长。

1956年六七月间的一天，王蒙来到一个在区党委工作的朋友处，从随身带的布书包里拿出了这篇稿子。朋友一看题目，就被吸引住了，匆匆翻了一遍，觉得写得不错。但出于职业性的敏感与友谊，没有说一句称赞的话，只问他：

“这么写，好吗？”

想想又加了一句：

“能不能把结尾写得更圆满些？”

朋友的言外之意是，在区委书记找林震谈话之后，矛盾就该解决了：厂长接受批评，工人生产热情高涨，无须林震动员群众给党报写信，麻袋厂的面貌便焕然一新。朋友十分清楚，这皆大欢喜的结局掩盖了生活的真实，但这也在遍布清规戒律、动辄得咎的文坛，掩盖了你王蒙的一点小小讥讽……

王蒙看出了朋友的担心，眼睛在一对镜片后眨巴了一圈：

“那不行，我把稿子投给《人民日报》，党报难道不会欢迎这种东西？”

不知怎的，王蒙没有去《人民日报》领奖状，稿子却去了秦兆阳手里。秦兆阳一定大大地称赞了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又以最快的速度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一时间洛阳纸贵，并很快引发一场国内外关注的轩然大波……

1956年里姗姗来迟的《文汇报》，也赶在年底之前粉墨登场了。

上一年的9月30日，该报刊登了一则《本报启事》，内称：

“《文汇报》从1955年10月1日起改为周双刊（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出版），每期出版对开一张。改出周双刊后的《文汇报》将以苏联《教师报》为榜样，努力改进内容，全面适合全国中小学教师和教

育行政干部的需要。”

其实，徐铸成有苦难言的是，这主要是为着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的需要。有的对口学习《真理报》，有的对口学习《消息报》；既然苏联还有个《教师报》的师傅，就得在中国找个这样的徒弟。于是，1949年6月21日在上海复刊的《文汇报》，在自己的历史上又被第二次停刊了……

徐铸成颇有些百无聊赖。报社迁往北京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去叶圣陶先生家里喝老酒。有时邀叶老一起去听昆曲，因这几年该报记者谢蔚明常驻京都，算是半个老北京了，也把他给拉上。谢蔚明陪着他几乎看遍了各个大小戏院，就连杂耍也不放过。

徐铸成1926年借他人文凭考取清华大学，读了半年，借文凭一事被原籍母校举发，再加在车站当一名小文书的父亲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退学。次年，又考进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师大。于是，这时他又去这些地方转转，在沧海桑田、物在人非的境界里，去凭吊自己这代人凋零的青春……

谢蔚明默默地观察着总编，感觉在他的心里回首人生有些许苍凉，可瞻望未来：一个在时代的风涛里放纵笔墨、也放纵风骨的老报人，却要将自己的缆绳系在教育部的桩子上，从此失去自己的声音。

未料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中宣部分工领导报刊工作的张际春副部长，电邀徐铸成和浦熙修去谈话。谈话中，正式通知《文汇报》复刊，并希望在一星期之内交出一份编辑方针和一份复刊计划。

顿时，报社里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上上下下忙得人仰马翻。一连邀请首都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对复刊后报纸的希望和意见。编委会讨论通过后，由徐铸成执笔写成初稿。

因解放前两度在《文汇报》工作过、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美洲组组长的钦本立，来报社串门时多次讲过：《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徐铸成的办报风格颇为欣赏，并以为复刊后的《文汇报》要充满“书卷气”，该是“读书人看的报纸”，徐铸成和浦熙修便又带着初稿去征求邓拓的意见。

在金鱼胡同附近陈设很是简朴的家里，邓拓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他们。看完初稿后，邓拓率直、具体地谈了几点意见：

《文汇报》一向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对开展双百方针，比别的报更容易取得他们的信任。报纸复刊后要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消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更大地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报纸要及时介绍国际间科学、文化方面的最新成就，以扩大知识界的视野。也应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安排好家庭环境和文娱活动。随着文化高潮的即将到来，应放眼祖国各地。不妨多派记者深入各地，直接下到基层采访，不必由党委层层介绍下去。否则，只看到领导让看的事物，报喜不报忧，看不到真相和全貌；

目前《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止限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西欧、美洲、日本和东南亚，《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你们要多发言，多组织报道……

不转弯抹角，无浮词套语，这番直截了当的交谈胸臆，使见多识广的徐铸成也有了醍醐灌顶之感。告别时，一种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大干部面前总会有的矜持，或者说像糖纸一样包裹某种程度自卑的矜持，也像大热天的糖果一样化了。他视邓拓为老朋友，并不客套地说道：

“我们将尽全力把《文汇报》办好。但要求你两件事：一、经常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二、把钦本立同志割爱给我们。”

邓拓面含笑容，连连点头：“这好办，我一定尽力帮你们的忙。”

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如期送到了中宣部。张际春审阅后表示，要徐铸成先干起来，不必坐等中央批示。当报社迁回上海后，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加了一句话：“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他怎不感激涕零，他怎不想在眼前新中国上层建筑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赶集”中，让过去7个月里如坠烟海的《文汇报》，又头角峥嵘？

年底，刚复刊两个月的该报，就敲响了中国“电影的锣鼓”——

恍若点穴一下到位的武林高手，徐铸成的目光不但顺理成章，也顺应民心。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影片上座率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国产电影的现状。建国后虽也有观众欲睹为快、耳熟能详的片子，

如《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董存瑞》、《平原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广大观众表现了相当的失望。

影片《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的上座率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则为23%。据统计数字表明：从1953年到1956年6月，上海国产影片总共发行了100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了成本的10%，更有甚者，全部门票收入还不够画几张电影海报……

上海又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会聚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一边影片拍得惨不忍睹，似乎是在肉类加工厂屠宰车间里冲洗出来的；另一边他们又不必为此羞愧得心肌梗塞，纷纷送去医院抢救，因为他们的艺术生命，多半都在隔壁的冷冻车间里被搁置起来。

赵丹5年来没有正而八经地拍过什么片子，东两三个镜头，西三四个镜头，好容易在《为了和平》里当了一回帝国主义分子，有了两场戏，名字却不能打在片头上，理由是片头只能是正派人物待的地方。

在香港时，有着一身喜剧细胞的韩非，3年时间里拍了20多部影片，可从1952年回到上海后，只在《斩断魔爪》里演了一个角色，此外整整4年里一直没有上过舞台和银幕。一有朋友和观众问他：怎么如今在银幕上看不到你的影子？他便嗫嗫嚅嚅，不敢说实话：我没有戏可演。他怕被拖去“屠宰车间”，视他满身为浸染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细胞。

小家碧玉型的上官云珠，更是被手大脚粗的“工农兵群众”一脚踢下了银幕，像是为防迷恋她的老观众为她举行追悼会，七年来仅仅让她在一部片子里，彗星似地露了一下脸。在银幕上说不上台词，她便在生活里说台词，若有人似问韩非一样问她，她马上伶牙俐齿地说：“我们正忙着学习呀！现在拍一个戏可不像以前那么草率了，慢工出细活，所以剧本也少呀……”

为此，《文汇报》发起了题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大量的读者来信、来稿中，对国产影片普遍存在的“题材狭隘，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便知道结尾”的状况，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社论”，听报告人们不敢抵制，也无须抵制，反正是公家的时间，还可以接毛线干活，或是在报告的催眠下处于半寐状态；而看这样的电影，耗的是自家的时间，掏出的是自家的钱，人们自然会加以抵制。

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甘惜分指出了这一状况的症结：电影界存在一个框框，原本生动丰富的生活被套进这个框框之后，就失去真实感了。这个框框就是总在粗暴地蹂躏艺术创作规律，总恨不能从电影院里崛起对一代新人的“教育”与“宣传”功能。

每每看见著名演员戴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镣铐，在银幕上跳舞，便忍不住落泪的老舍先生，在其《救救电影》一文里列举了这些“镣铐”：

一对青年男女刚刚进入恋爱交谈阶段，镜头一摇，却使他们大谈起世界革命，或是工作学习来；

老人刚刚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孙女，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来：“小兰，你是国家的孩子，我不该不放心你”；

本来一个很明白的问题，非要让一个有四个口袋、作深沉状的干部出场，作上十几分钟的政治报告……

电影圈里人士更是纷纷冲出“冷冻车间”，占领了这场讨论的半壁江山。

演员们大声疾呼：“请尊重人，我是演员，我要演戏！”

导演们强调“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深影人无不呼吁，该“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

这场为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因钟惦斐先生以“文艺报评论员”署名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而具有了影响全国的规模。这一阵阵密集的锣鼓敲下来，其回声一直响彻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了新中国电影繁荣期的先兆。即使在当时，也震脱了一批解放前优秀影片身上的绳索，如《夜半歌声》、《风云儿女》、《桃李劫》、《马路天使》、《十

字街头》等，它们被重新印制拷贝，血液般源源送往影院的血管，以紧急抢救严重虚脱的中国电影……

1956年，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也有了新的气象。

当新中国宣告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似浩浩荡荡的马队，滚过东方大地的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面对十月的胜利与世界的关注的，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牛耳者外，还有12个民主党派的代表。这12个党派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

中国人民救国会；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无党派民主人士。

只要看看这些名称里多带有“民主”字样的党派，就知道它们多是在蒋介石政权统治最黑暗的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知识分子痛楚得滴血的向往，奋力啄破那专制的蛋壳而下地的……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告解散。这就形成了沿袭至今的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中国9个民主党派。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导下，各民主党派确定了各自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重点：

民革的对象是原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

民盟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

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和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

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

农工是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

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

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

台盟的对象是在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

好像是一副经过全面而又精心运筹出来的棋盘，几乎各个领域里的知识分子都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可是这棋盘太小了，解放初期，人数最多的民盟，也只有七千余人。有几个党派少得只有一二百人，大概中央委员要比普通成员多，开起会议来坐台上的要比坐台下的多……

1951年，毛泽东在听了这年1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汇报后说，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两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到了1953年，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共发展了两倍，即六万人左右。

无法做这方面的统计，但可以估计，从中央开始，到省、地、县各级，做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干部，加起来即使少于六万，也不会少到哪里，基本上会是一比一。世界上找不到一名学生配一个教师的学校，一名运动员配一位教练的运动队，中国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但统战工作做得如何呢，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30多年后作了这样的回顾：

第五次全国统战会议期间，反映出统战部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会议决定切实检查一次统战部门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

这段检查，确实揭露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和缺点，主要是：

一、党外人士安排后，不少人无事可做，或有职无权，坐冷板凳；

二、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联系不够，同进步分子往来

多、同中间落后的人接触少，有时偏听偏信，助长了党内和进步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三、对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尊重不够，往往以多数压少数，堵塞言路；

四、以领导者自居，只教育别人，不注意向党外人士学习；

五、同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差，尊重组织独立性差……

透过这些公文式的简约、笼统的文字，我们可以感觉到众多的“教师”“教练”们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机构林立，经费浩大，郑重其事，视统战工作为党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另一方面，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存在，表现得似鱼儿在水里撒籽一样漫不经心。

一方面，干着开门的工作，欲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

另一方面，有人敲门了，那从门上小窗里投出来的刀锋般的警惕，使你有几分怵然，自己像是刚刚乘台湾特务机关的橡皮艇，借夜色在东南沿海登陆……

怎样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呢？可能的解释似乎是，如同众多党外人士的有职无权一样，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只不过是一道布景。既然是布景，无论是制作者，还是观众，都不会太认真地对待。

但在1956年，毛泽东杜绝了这种可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也使众多的党外人士确信自己并非一道布景。尤其是周恩来在阐述这一方针时，借用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们花前月下的盟誓：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生，但可以同年同月死，更让民主党派异常温暖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博大的胸怀里，自己是一个鲜活的政治实体。

这年的下半年，李维汉又掏出自己的笔记本，翻过自我检查的那几页，极为认真地记下了来自外部的批评。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上，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

部部长罗隆基等人，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有：

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应该有法律的保障；

民主党派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应该有质询权；

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的“防区制”、“包干制”，应该破除；

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

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自感比党员低一等；

政协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政协委员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治待遇……

工作勤勉的李维汉，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汇集综合为七款四十八条。除发动各民主党派深入讨论外，10月里又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对改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进行认真地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各地征求意见试行。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

“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

然而在这一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大概在他们眼里：当苏联和东欧奢谈民主、玩弄民主并最终遭民主炙痛身心、被民主乱了阵脚乃至社会风雨飘摇的时候，中国民主的钟摆声，正日益清晰地接近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也进入到一种安定、祥和又勃勃生机的状态。

不但领袖们感觉良好，许多普通人在1956年里也留下了此生少见的美好印象——

一位1956年正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退休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本那一年班级集体活动的照片：“五一节游行”“举行盛大的化装晚会欢迎‘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代表”“热烈欢迎苏联英雄卓娅的妈妈柳葆芙·柯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来校参观并作报告”“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代表伍竹迪来校作报告”“欢送蒋本良、甘章贞赴苏联留学”“在十三陵野营”“参加军训”“在市郊义务劳动”“郝建秀锻炼队在练双杠”“黄继光锻炼队在练起跑”“古丽娅锻炼队”的

合影，还有春游，野营，野炊……可谓丰富多彩，意气风发。在那一张张红扑扑的青春脸庞上，看那一双双溢满火热憧憬的黑亮眸子，谁不以为社会主义一定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实现呢？！

195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总共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在匆匆的年夜饭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央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一串金色大字“迎接伟大的1957年”悬挂在主席台上。

“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10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前途灿烂的日子！”

其时正是严冬，“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

自然，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由红变黑的怪异莫不是某种异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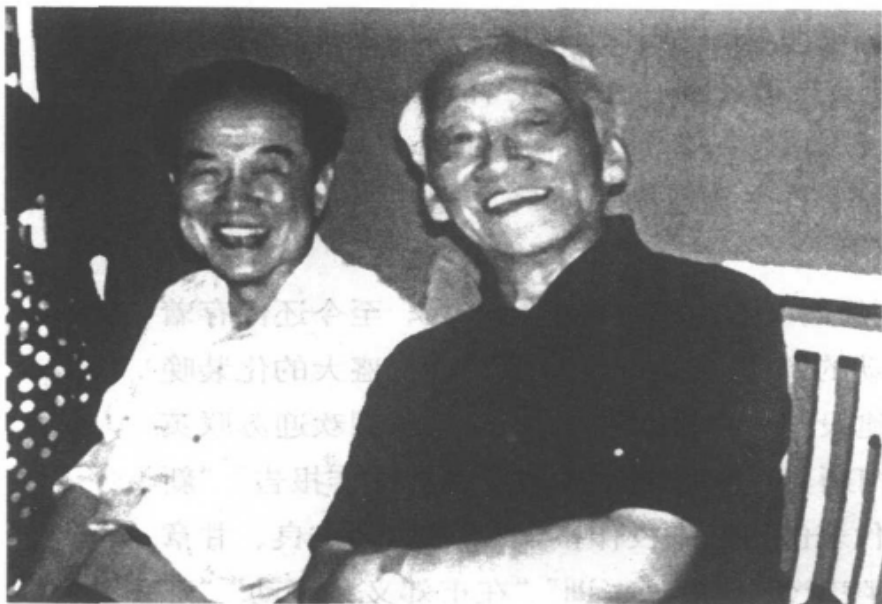
午夜11时30分，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大餐厅，登台贺年。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一片沸腾，八千学子高呼——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

随之，“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



曾卓与邵燕祥在武汉。

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接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以上均见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诗歌是善良的，诗人是热烈的。

14岁时便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职的邵燕祥，在这年复刊号的《文汇报》上，为庆祝国产的安二型飞机试航成功，发表了一首诗，题为《中国张开了翅膀》，这首诗大抵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1956年的基本感受——

连疾驶的骏马也停住脚来仰望，
空中的轰鸣化为地面的鼓掌。
因自信而坚定，既矫健又顽强，
请看，中国张开了翅膀——
银亮的翅膀！万里的远航！
在晴朗的日子闪射着辉煌的阳光，
一旦若阴云四起，雷霆劈击，
那就电一样，剑一样，百折不回地
冲破雨暴风狂！

第三章 整风运动

10 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

195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都要早。

草丛还留着残雪，湖里还结有冰层。只不过经过几次急骤而又温和的雨水，冬日枯索的树枝便在雨水的浸染中膨胀起来，茸茸的鹅黄新牙渐次爆开。随即一冬懒于梳妆的画眉，就在日益转绿的树枝上一试自己的新声……

然而，最浓郁的春信，并不来自让江南铺上一层锦绣的粉红桃花，嫩绿的柳雾，以及雪白的山茱萸花。而是来自北方一位魁伟的身影，一个从1956年风跌浪宕的大河里撞击思索也获得力量的中国之春的纤夫。

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在这个有1800位党内外负责人士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

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如果说，去年一月间周恩来的报告是一级火箭，苏共二十大后《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在匈牙利事件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二三级火箭，那么，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则在它们的连续助推下，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升到一个新的、从未有人涉及的高度——

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人民”界定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一个人如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但列入“人民”的人，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只要他有爱国心并乐意为国家工作，就将允许他保留思想上的那块“自留地”。

毛泽东指出：我们面前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当然要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在政治上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抗性的矛盾，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处理得当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如中国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反之，非对抗性的矛盾，如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内与党外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作风及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处理不好便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即使是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也不必杯弓蛇影，谈虎色变，而应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着力铲除阻隔党群关系的官僚主义壁垒。

“这显然是一种更加人道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既可防止斯大林主义的暴虐，又能警惕匈牙利事件式的混乱。但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昔日浓浓的乡音送出了同样浓浓火药味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宛如一个大家庭睿智而又慈祥的父亲，在这里以“团结”一遍遍地告诫自己的儿女：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

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继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之后，这是第二次在中国的大家庭里，令亿万儿女竖起来的耳朵都在倾听的声音。在随后举行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及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召开的会议上，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举行了传达和讨论。

至3月底，北京市约有35万党内外干部、教职员、大学生、工人、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听了传达报告；

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全省约有198000人，在无边的温暖里聆听了他的亲切乡音……

然而，无论是传达，还是录音磁带的播放，都不会反映最高国务会议现场的气氛。

对此，韩素音从某些渠道获知了以下情况——

在场的大多数党的官员，要不是对此心怀抵触的话，至少感到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起身走出会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领导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88》）

罗德里克则从《人民日报》3月3日刊登的这次会议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查阅了这一期间刘少奇的行踪，自2月14日以后，他就没有在北京露面。3月，新闻媒体里，他出现在河南省，由此开始了长达2400英里的外省视察。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未出席这次会议，理由是这不是一次突然召开而是酝酿多时的会议，即使他2月下旬已到河南，但只需乘大半天的火车便可赶回首都。

此外，照片上毛泽东的右侧坐着彭真，这个位置本应是刘少奇的。这类场合的惯例是，国家主席的右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坐，左侧则由国务院总理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坐。这一惯例已为1956年2月间举行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所证实，在这次会议的照片上，彭真作为排名第八位的副委员长，坐在离毛好几个座位的地方。如果作为委员长刘少奇真没有出席会议，那么毛右边紧挨着坐

的应该是首席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惟一的解释是，在新华社记者拍照的那会儿，或是那半天，刘少奇暂时离开了会场，并要还兼着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代他坐在那儿。

似乎那会儿，或是那半天，有事情的人都凑一块了，不仅仅是刘少奇缺席，还有五六位政治局委员也不在自己相应的座位上……

罗德里克认为：

刘这种态度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毛在发表共产党政权产生以来他或其他人关于政治问题所作的最重要讲话时，刘却不打算在这个场合出现在他的身边。没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读者不会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刘不同意毛所说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我以为这并非空穴来风，或是捕风捉影。

还在1955年6月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个报告，其主旨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思想，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在人民内部应该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据此，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雅克·洛甘先生，当即向巴黎发了一篇关于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次日，他翻阅中国的几家报纸，想看看有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使他惊异不已的是，自己送往巴黎的是一碗香味浓郁的肉汤，而在北京，肉不见了，有的只是几根骨头和一碗清水……

这年年初，在一个很小的场合，章伯钧先生告诉民盟中央的几位同事，他最近与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干部有过一次谈话。他的印象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可以作为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曲》来听听，但千万别指望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真会出现个新世纪。他建议民盟将主要精力放在双百方针的贯彻上，也许这一方针真得到了落实，前一个方针才有希望。后来在3月间举行的民盟中央全会上，章伯钧提到了这位高级干部的名字——习仲勋。

同年元月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和他的三位同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批评已被一些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的人所利用。现在文坛的情况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这一来自军方的意见，显然其矛头是直指秦兆阳的“碉堡”，刘宾雁、王蒙一类的“火枪手”，及徐铸成的一场“电影的锣鼓”。

王蒙被首当其冲，在这前后，整整四个月时间里，首都的一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除少数持不同看法外，其他的对他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采取了激烈的批评态度：或联系国际背景，认为它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或回顾斗争历史，指控它为王实味一类的《野百合花》；或是混淆小说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根据小说里有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便认定故事写的就是首都的有关单位，并对小说的写作过程进行查究，由此殃及不少人……

一向待在玻璃房子般太平的团机关里，王蒙哪见过这种风呼啸浪涌涌的阵势，他坐卧不宁，忧心如焚，对来看望他的那位朋友说：

“照这样推理、演绎，这样乱扣帽子，今后还有谁敢去写小说？”

……

如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定嗅到了来自他右边的冷漠，他也一定看见了《人民日报》上那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他不会不想起党的八大来，在这次会议上，他似乎是个配角，仅仅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而洋洋洒洒的主角，是高个子的刘少奇和矮个子的邓小平，前者作了政治报告，后者作了修改新党章的报告。可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利用了这次大会的主角，因为八大不仅是一条能试出他的同事们心灵真实颜色的石蕊纸，还是一张挂在1956年墙上、能测出他们政治目光的视力表——

刘少奇如是说：

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能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

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

邓小平如是说：

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刘少奇。

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刘少奇似乎否定了党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他承认的只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在他眼里，共产党的这座庄重的神殿，从镏金的尖顶，到雕花的廊柱，无不折射人民美好的理想，无不镌刻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进入这座神殿的人们，同样也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在神龛上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的光芒照耀下，有什么个人的私利不可舍弃的呢？虽会有主观主义的尘灰随风弥散进来，但并不会影响大殿里的神圣与和谐。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必须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此外，可以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唱诗班”，以及党员“一日三省”式的个人修养，从而达到心灵的进一步净化。

犹如教会不愿听到“狎妓”、“赌博”这类词一样，好像刘少奇对“官僚主义”这个词也有些忌讳；犹如多少世纪以来，神秘、静静的梵蒂冈，从不让尘世干预自己的事务一样，刘少奇也坚信：党不是通过别的什么，而只有通过自身，才能使高大的党更加高大起来……

邓小平似乎在持有另一种观点。

他肯定党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矛盾。在有人群存在的地方，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是普遍存在的，它不足以概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所引起的矛盾的特殊性。主观主义的尘灰可以随风吹进任何一扇心灵的窗口，但官僚主义的青苔，悄然爬上的只能是权力的磐石。

他对党、对这部自20世纪20年代自己留学巴黎起便参与创造的历史的热情，丝毫不比刘少奇逊色，他却有多少前者身上宗教式的气息。似乎他并不太欣赏“唱诗班”，与“一日三省”式的个人修养，共产党的“唱诗班”少吗？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个人修养的天地小吗？从马列的洋洋经典，到毛泽东的雄文四卷，直至刘少奇的《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走得完南极至北极，也走不尽这“山脉”的连绵博大。但哪一程都有人从党的大门里被清除去，他们在人格上远不如用一般廉价材料做成的人。他在同一报告里说道，一些人，即使仍在党内，如果“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因此他们出的主意，也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

邓小平强调以党内外监督的巨大力量，让那块爬有青苔的磐石在中国的大地上滚上几滚，窃以为，这既出自他历来务实不务虚的个性，也多半得益于他深谙1956年以来毛泽东的心境。在党的八大上，继刘少奇的报告在代表们的嘴巴里留下难以咀嚼的某种暗示之后，他很快便随自己的报告，给代表们送上两支能剔去这暗示的牙签，一支是他根据1948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采取措施以保证集体领导；另一支是他认为对于毛泽东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毛泽东自然欣赏邓小平的忠诚，在自己不便启口的时候，他将刘少奇藏藏掖掖的东西，以合乎逻辑的理由给摊开在八大的桌面上。

但作为一位总在不知疲倦地注视政治风云的伟人，毛泽东应该更欣赏他在1956年墙上挂着的视力表上，所表现出的1.2以上的政治目光。

由此，我们便有几分明白，邓小平何以从“八大”前政治局里排名第12位，而在“八大”之后名列第6位，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也能理解在“文革”的暴风骤雨里，刘少奇何以被真的打得“永世不得翻身”，他作为仅次于头号的二号“走资派”，却能东山再起……

此外，毛泽东也不会不记起他读过不久的两份报告来。

一份报告是周恩来送来的。

1957年1月7日至19日，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自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总觉得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不对劲了，也许，他还不很清楚赫鲁晓夫在这带着异味的风里，将会拧出一场怎样的雨来；也许，为了维持住社会主义阵营的篱笆，他还不愿激怒那头脾气暴戾的俄罗斯熊，他给对方开的帽子工场尚在勘测地皮阶段。但他并没有让周恩来的这次访苏，变成克林姆林宫里的欢宴、伏尔加河上的畅游、乌克兰大草原上的漫步，他拾到了一张让胡志明惴惴不安的纸条，在这纸条上，赫鲁晓夫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建议联合国秘书长考虑将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吸收进联合国。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手里还有一份复印件，并将套上粉红色的信封寄给美国总统。他可以暂不评论苏共的内政，却难以对此等背叛兄弟国家的“外交”保持沉默。

临行前，他交代周恩来：

“你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

周恩来如数将毛泽东胸腔里的“炸弹”，扔在了赫鲁晓夫的头上。据说，后者盯了一眼头上的“飞机”，迅急“开炮”了：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思量了一会儿，在投弹孔里扔下了自己的“炸弹”：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你我却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这“炸弹”，在毛泽东的眼里划出了十分优美的弧线，在一个星期以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这样赞叹道：

“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

们也抬了……”

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带回了这样一个结论：

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国外，而正是因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国内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没能及时发现，没有妥善处理，相反却越垒越厚，愈演愈烈。这显然使毛泽东实施自己绘有矫正机制的蓝图的决心，更坚定、也更迫切了……

他却没能使刚刚卸去一肩旅尘的周恩来感到些许慰藉。

在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里，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并由陈云任组长。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被架空了，党掌管经济的权力却大大地加强了，能将一头如此的巨象逐出山林的，惟有毛泽东、刘少奇连手的膂力……

在上述赞叹周恩来莫斯科之行的同一个会上，毛泽东开始公开表露自己对于去年反“冒进”的看法：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另一份报告则是彭真送来的。

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2月1日，他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南斯拉夫外，这些国家的局势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震荡，眼下也都在或深或浅地修补执政党的错误。彭真似乎被鲜花与美酒包围了，他强调的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此外在对于东欧局势一年来的教训的理解上，也与周恩来有明显的不同。

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此次出访的讲话里，彭真强调的是：

“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所以，他们代之利用各共产主义国家内和各国家之间的分歧意见，以造成分裂……”

“匈牙利事件和他们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行为，是这种犯罪行为的铁证。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犯罪行为清楚地告诉各社会主义

国家和人民：根本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国内的团结，根本的问题是提高我们的警惕和消除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彭真眼里，无疑是艾森豪威尔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点燃了波匈事件的导火索……

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一定深长思之：

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学到了什么呢？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卖甘蔗，你们兴冲冲地批发来几捆，光顾着啃一头，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蔗屑撒得遍地，却忘了啃另一头。这一头才值得使劲啃呵，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这把刀子给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开始丢，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社会主义时期林林总总的矛盾该如何梳理，没有人在前面给我们当大乌龟了，得中国人自己想，得中国人自己走。走得好，中国可以给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走不好，匈牙利人给我们做了十三天的老师——山河变色，人头落地。你们这边“反对个人崇拜”，那厢又不情愿放弃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你们是夹在一本教条主义的硬壳书里啃甘蔗呵……

怎么如此麻木呢？无非是官做大了，出门有小汽车，还带着个警卫员，人民群众的呼声听不到了。说是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的水平，我读马列的书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不注意研究方法，读的再多，也只能是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按马列主义的精髓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真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电影局自己恭喜自己发财，人家一批评，就把门关得死死的。《文汇报》上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电影是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还有篇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也搞得地球都好像不转了，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我要给他解围。有人指责作者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我看北京的官僚主义比起下面来还厉害。这个年轻人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或是在哪家报上辟个专栏做个专栏作家，对人民内部的问

题进行批评，刀利才能裁纸，文章尖锐才能帮人，可这得等我把主席这个职务辞去才成……

看起来，目前的思想倾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得尽快发动整风，你们用教条主义来掩护官僚主义，我就要在整风中第一个反官僚主义；你们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听不到人民的呼声，我就要在整风里让群众起来说话。过去战争年代里整风，只有关起门来自己整自己，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说，谁说？人民不干，谁干？……

如同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周恩来反对“冒进”，让他耿耿于怀一样，毛泽东不会忘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如罗德里克所说“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某种姿态。

在他的心里，有一本政治收支账，谁帮过他，他记上；谁在何时何地欠他的，他更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

还称：“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性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但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很激赏《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当时，他刚从外地回京不久，便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几个副总编辑及编委召来，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也参加。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与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

毛泽东与他们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眼下，刘少奇等人此种不啻于挑战的某一姿态，只能激发起他依靠知识分子，或者说利用知识分子，去率先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正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愿望，比起1956年来更强烈、也更明确了，因为他已经为他们找到了第一块滩头阵地——



1949年时邓拓的标准照。虽只三十几岁，却已是满脸沧桑。

11 真诚，披肝沥胆

这年3月初的一天，刚刚调到《文艺报》任副总编辑的萧乾先生，接到一份通知，要他6日去参加一个党内的会议：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建国以后，他知道不少党外人士去过中南海，他心系之，情系之，却又从不敢存这份奢想。1947年，喝多了洋墨水，且刚从英伦回到上海的他，看不惯作家圈内有如士大夫林里称公谓老、酬唱应和的风气，便在应邀为《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里，以西方年届90仍勤奋创作不敢言老的肖伯纳为例，作了一点小小的规劝。年甫50已赫然

被称为“郭老”的郭沫若，看毕当即血冲天门，双眼发黑，从此也将他看做鸦片似的黑色，如同在这之前，已视朱光潜为蓝色，沈从文为桃红。

建国后，郭老更是“老”了，萧乾的“黑”也更是洗不去了，岂敢觊觎住着红太阳的中南海？这回，他能去了，而且又是参加如此高级别的党内会议，6日这天，他穿上了陪外宾时订做的蓝呢制服，再将眼镜擦得晶亮亮的，有模有样地去了……

吴祖光也挺激动。听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报告的录音，又开了几天地方小组和专业小组的会。12日这天通知下午两点钟开会，他不到十二点就离开了家。在离中南海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时，他碰到了同去开会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绍春，两人的脸上都挂着抑不住的兴奋。

进了中南海，到了会场——中宣部礼堂，人已经黑压压的，大约有七八百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党的高级宣传、文化干部，五分之一为党外知名的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其中还有外地的，比如徐铸成先生和抱守书斋、从不旁骛的傅雷先生，也被从上海请来了。吴祖光尽可能地去前面坐下，他看见毛泽东满面春风地坐在主席台上，手不离烟卷。当快抽完一支准备再接上一支时，毛泽东



1971年全家于湖北咸宁。从照片上看，萧乾（前排居中者）的脸上已无过去的风采，一家人显然都处在一种茫然、无奈、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

从口袋里掏出红色的“中华”烟盒，一摸是空的，他转过头，拍拍坐身边的陆定一的肩膀：

“喂，伙计，借点粮食给我……”

先是大会发言，至5点，毛泽东再一次作了长篇讲话。首先，比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他进一步披肝沥胆地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1957年2月27日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以下这段此后被经常引用、“文革”中造反者们更是喊得山摇地动、阻遏流云的话里，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扮演成了这支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先锋部队的统帅：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一遍遍地激励着这支部队的士气。在自己披肝沥胆的真诚映照下，他期望“士兵”们也会披肝沥胆地将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统统从“枪口”里放射出去。为此，他没有在任何一

处强调，得给“枪口”设置批评的“准星”，而是相反：

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一口气讲到下午6点50分，神采飞扬，毫无倦意。经过删节后发表的正式文本有了文牍气，在现场他却并没有讲稿，完全是信马由缰，随口道来。

他反复讲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坐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里，每年得开一次这样的会。他嘱咐各省市回去，也要召集党外人上一起商量党内的事情。

他表示支持一些外面正挨批的作品，他点到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他说虽有片面性，我看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它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此，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舒芜先生在晚年回忆道：我就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最近北京有一个战役，有几个解放军在那里围剿王蒙……这几个解放军指的就是当时总政治部以陈其通为首的那四个人，他们站出来对王蒙提出批评，当然是比较左的立场。毛泽东说：我要替王蒙解个围。王蒙又不是我的儿女亲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他写了一个小说，叫《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有人问我赞不赞成那篇小说，我告诉他，我很不赞成！因为，他写的还不是影射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是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

够。他们没有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现在我拜托你们诸位，千万千万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

那次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个流沙河。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接着他就讲《草木篇》的事，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舒芜口述自传》）

在谈到中国社会必将要发生的伟大变化时，毛泽东聊起：我女儿从街上回来，告诉我说：爸爸，街上有看相的，我也去看了一个。我回答说：好极了，你抓紧看，多看几回，以后也许就看不着了……

他还风趣地讲道，我的年纪大了，将来我只能唱唱老夫人了，红娘只能让恩来、小平他们做了，我要上杭州的灵隐寺。我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要朝拜我，现在就朝拜一下吧，日后再想朝拜可就天高路远了……

此刻，全世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中国，宛如在注视一条搁浅于海滩的鲨鱼，又被冲天的巨潮带回了大海，雪谷里一头负伤的孤狼，在曙光酡红的映照下，正一步步地攀上阿尔卑斯山脉……

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说：

“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

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

……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了题为《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的文章，内称：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赫鲁晓夫却不如是看，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

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最后的遗言》)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先生,对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持之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在读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这样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尽管日后毛泽东给了赫氏显示自己哲人式的睿智,杜氏证明自己野狐般多疑很有必要的机会,但当时他的接连两个报告,尤其是后一次在鼓励讨论政治问题方面,似乎比几年来忙于“解冻”的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的讲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引起的震荡,也决不会亚于喷珠溅玉、势若奔雷的黄果树瀑布,对于几百里间山河的震荡。而且这震荡,似乎将一些知识分子的记忆也给撞成了粉末,仿佛这瀑布的水源,没有历经草莽丛生的沼泽,崔嵬嵯峨的山脉,而是直接从九重天外倾泻而来……

3月18日,北京夜阑更深,连日来东奔西颠忙于开会的傅雷,强持精神,给远在波兰留学的爱子傅聪写信,信中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

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家省市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

在傅雷先生貌似淡漠的清瘦躯体内，竟藏有如此一副颇为热烈的心肠。过去他无视过很多知识分子很看重的东西，寡妇守节般将自己的性灵与才情献给了罗曼·罗兰的鸿篇巨制，但他一旦如沐春风般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点，他就毫不彷徨地将翻译工作暂置一边，走出书斋，以满腔热情并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即完全按照毛的讲话字面上的意思，去上海市各种会议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彷徨的呢？

他在同一封信里还如是写道：

他们的知识分子（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这年年初，京城下了几场尚未落地的小雪之后，费孝通先生便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要说比起几近两袖清风的傅雷先生来，他已是一身显赫：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犹如一个孩子插上一排光闪闪的金笔，一个老妪戴了一件做工精美的胸罩，这对他并无多大意义；对他具有生命般意义的，是他自20岁进入燕京大学起便孜孜不倦为之构架、而且他的26岁的爱妻随他



费孝通与王同惠合影。

“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着她。”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这样说道。

在广西徒步调查途中为之献身的中国的社会学。但新中国不要社会学，理由是苏联没有社会学，它只是西方资产阶级腹腔里的一截盲肠。他和燕京的老师、如今又是民院同事的潘光旦教授，半是反对半是哀求一年多，它还是在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一场大“手术”里被割去……

费孝通大约会感慨：官僚主义者们，教条主义者们，穿起白色的大褂，在“革命”的无影灯下，为中国做过多少这样荒唐的“手术”。

他极想在这中南海里萌动春信的时候，告诉党：得关闭这样的“手术室”，得让这样的“大夫”失业在家，得让中国的林子里飞出五彩缤纷的鸟儿来！

1956年，开始再呈现这般的迹象，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在文章中，费孝通又以为——

“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文章写完了，费孝通刚想寄去报社，几位好心的朋友，便扛着忧虑轮番上门——

“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

“报社里收到的稿件，大多是你这一类型：牢骚太多，暴露太多。现在已经不准这样写，大概双百方针被搁浅了”；

“你的文章，天气说对了吗？如果这半年算早春天气，那前几年算什么天气？这不分明在影射思想改造便是冬天吗？再说了，百花开不了，并非一定怪天寒，还有草木自身生命力的问题。自己不成器就怨天，这不又意味着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在于思想改造，而在于批评领

导……”

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与这倾泻一房的忧虑相比，便是九牛一毛了，他将文章锁进了抽屉。因早年发生意外、只剩一条腿的潘光旦先生听说了此事，拄着拐杖来到他家，一进屋，便横扫起满地的忧虑来：

“不对！我在城里听说毛主席最近有过一次讲话，中心意思不是收，而是放。孝通，你别顾虑重重了，文章寄出去真有什么事儿，我老潘和你一起担着。”

那一房间的忧虑，不见扫去多少。过了几天，潘光旦再度光临。他红光满面，一身挂不住的精气神儿，直溜溜地往手里的拐杖上蹿，以致那拐杖只要往地板上一戳，便溅起一连串兴奋来。原来，他刚从中南海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孝通阿孝通，你的‘早春’怎么还不寄出去呢……”

忧虑自然一扫而光。此刻，费孝通的耳边已是春风融融，眼里更是桃李满枝，一个新的忧虑不禁葛然而生。他问潘光旦：

“现在再寄给报社，天气已经转暖，岂不成了马后炮？”

“不，正当时也。早一个月寄，岂不泄露了大好春光……”

就在这个春夜，费孝通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修改了一遍。次日一早，他便寄去了《人民日报》。

此文在该报刊出后，知识界一片喝彩。一时间，“早春”一词由此滥觞……

徐铸成先生也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而且，他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新闻日报》总编辑金仲华、《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位，作为新闻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召见。

他留下了两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丰泽园内，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看上去斑斑驳驳，未经整修。会客厅里，只有一张长桌，周围是一圈任何办公室都能见到的普通椅子。“功高任重的伟大领袖，生活如此简朴”，使他“惊讶不已”。

再一个是，陪同接见的人里，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有一位康生，几年里他一直在家养病，政治的风景线上



康生在延安反“敌特”的恐怖运动，在1945年4月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激起了强烈的批评，但是正如这张照片所示，他依然能够微笑。

颇为沉寂，此时他却破门而出了，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是吟风弄月；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结实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

他又像是一头颇得毛泽东赏识的狮毛狗：主人不用它，它无声无息，偏于一隅，悲哀与凄凉，只伴着华贵的狗食咽进自己肚里；然而只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来了，总能让主人在颇为孤单的时候平添几分温暖，或是让主人在某种世相未脱混沌之时就变得异常地“警醒”……

一进门，康生就向毛泽东介绍：

“主席，这位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泽东立即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徐铸成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呵，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

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落座后，康生先开口：

“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主席的，请提出来。”

默然了约一分钟后，邓拓轻轻对徐铸成说道：

“铸成同志，你先谈谈吧……”

因敲响了一场“电影的锣鼓”，遭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徐铸成心头正有几分沮丧，便先开口了：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底。抓紧了，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办好？”

毛泽东含笑讲了半个多小时。他明确地支持这一场“电影的锣鼓”，却没有明确地给徐铸成一块能不犯错误的“法宝”。他只谈到了

尽可能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里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

第二天晚上，在上海代表团开全体会议时，徐铸成特地将此话转告了姚文元，后者此时不过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能恭忝如此盛会，已叫他如醉酒里，如今又蒙“钦点”，他几乎当场晕了过去。可徐铸成绝没有料到，日后正是此人，在上海滩上与张春桥沆瀣一气，将原本充满书卷气的《文汇报》，给阉割成了一头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怪物，让他给晕了过去……



1945年4月康生和毛泽东在延安。尽管他过于恐怖的“抢救”运动饱受批评，他依然能够同主席直接接触。

不过，此刻徐铸成还在心涌热流之中，毛泽东下面的一些话不能不让他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

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他们是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谢蔚明先生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徐铸成从中南海里一出来，

便径直来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浦熙修出去有什么事了，他等不得她回来，当即拉上在家的谢蔚明、杨重野等二三个人，去了中山公园。叫了几杯上等的龙井茶上来，那碧清的茶水颇像徐铸成此时的心境，经过毛泽东这一番耳提面命，似乎不仅是这一年以来国内外的风风雨雨，他看清楚了，就是中国前二百年、后三百年的事情，他也一眼见底。

兴奋，更似茶水里冒出来的腾腾热气，他反复地交代：《文汇报》本来就持有“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办报方针，在眼下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与宣传中，在年内对于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报道中，《文汇报》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信任，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首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云蒸霞蔚之地，驻京办事处工作得怎样，采访的范围和角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报纸的分量与影响……

徐铸成也如是地向浦熙修作了交代，并和在上海主持编务的常务副总编辑钦本立通过电话。有这样一件事情，在京开会期间，内定徐铸成参加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团长由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担任。钦本立听了，既是新闻界的代表团，而徐铸成又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这样安排显然不合适。他向当时还担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邓拓反映了，于是在出国前夕，邓拓通知徐铸成，由他担任团长，并交代说：

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已关照徐晃同志（团的临时党组书记兼副团长，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除了讨论党内事情外，党组开会都得请你列席。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带着一肚子的感激涕零，也带着一身的大红大紫，徐铸成踏上了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主持《文艺学习》编务的黄秋耘，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近四个月时间，在自己的刊物上对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发表了大量毁誉皆有且态度异常激烈的评论文章。他自己的面目却没有锁在云雾之中，在这年最后一期的《人民文学》上，他露出了“峥嵘”：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害，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

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这一番话，即使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时期，也够让“马列主义者”们，好一阵“中流砥柱”般的英勇反击了。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而推波助澜的一些文人，其中也有鄙人，在忧患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未免还有几分先知先觉的自得。

但实际上，我们不过在重复自己的前辈，而中国也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自身。这证明了文人的浅薄，抑或证明了中国极其坚韧的惰性？

让我们还是回到1957年来。3月里，毛泽东一讲完话，黄秋耘便让自己的刊物走出了云雾，他也想构筑一个秦兆阳式的“碉堡”，并拥有自己的“火枪手”——

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上来了，他们极力推崇王蒙的小说，因为它“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些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痛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

青年诗人邵燕祥上来了，他为王蒙的小说辩护道，“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去病和苦口》）

……

做了几个月的惊弓之鸟，王蒙又成了一只在春风中一展新喉的小鸟，约是在4月份，他在《文汇报》发表了三首短诗，其中一首题为《春风》——

快乐地走在北京的街头，
新盖的楼房向我招手，
春风四面八方吹来，
寒冷哪儿也不再停留……

这年春天，北京却发生了一起非正常死亡。

死者叫马寒冰，提起这个名字，中国人里没有几人知道，但他作词的一首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流水蓝蓝的天……”，在20世纪5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他便是与陈其通等人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从而在与徐铸成等人的谈话中被毛泽东称之为“陈、马”中的那位“马”。

此外，他本人还在1957年2月号的《文艺学习》上发表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章，批评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道：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

在傅雷、费孝通、潘光旦、徐铸成、黄秋耘、王蒙、丛维熙、邵燕祥等人的激动、兴奋、憧憬之中……

他的委屈、失落、幻灭，便是可以体会的了。

但他何必要以自杀来表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死谏”或是怨恨呢？其实，后者在多次批评他们四人的文章时，也曾强调陈其通等同志的动机是为了党的事业，对党是忠心耿耿的。

真可谓英雄气短，一双火眼金睛尚欠火候。倘若他多少有些赫氏哲人式的睿智、杜氏野狐般的多疑，他就该像他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一样，去无限相信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卓尔不群……

这是一个在书写1957年风云时本可以忽略的悲剧，

但看样子，这却是一个早被有关的人们充分汲取了教训的悲剧，

因为此后，尽管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似恒河沙数，但阴森森的酆都城下再也不见马寒冰式的冤魂……

12 被套牢的邓拓

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声音，并没能像孩子们玩溜溜板一样，一下溜进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他们好似火车，只能在两轨上行走，一轨是靠看《人民日报》，另一轨则靠聆听当地党委的指示，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

《人民日报》在1月7日刊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直至3月1日才发表了一篇口气温和的批评文章，作者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辽，一个普通的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直到毛泽东称陈、马为“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之后，该报又在3月18日发表了文化部长茅盾先生的文章，口气虽严厉多了，但鉴于他只是非党人士，他并不能代表谁，甚至都不能代表文化部，在读者心目中，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而真正中国文坛“红色沙皇”周扬对于陈、马的批评，却是以与记者对话的形式，刊登在4月9日的《文汇报》上……

更严重的是，《人民日报》犹如一片倔犟的沙漠，尽管在2月27日、3月12日，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下了两场滂沱的大雨，沙漠就是不见反应。各省不一定注意到了3月3日该报那张照片上刘少奇的消失，但一定会注意到该报的沉默。

这意味两种可能：要不，中央高层发生了严重的歧见；要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个疯子，但一副书生模样的邓拓决不会是个疯子。

高层的歧见让人们谨慎起来。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倘若是搞“左”的运动，只要毛泽东刚把牌摆上桌，这牌便会顷刻间形成多米诺骨牌的阵势，哗啦啦地由上而下地倾倒开来。但此次，他老人家好像吃错了药，支持的是一连串非左行为，无论在思维习惯还是在行为习惯上，都是逆向而动的。这种别扭更让人们踌躇起

来……

《人民日报》在4月13日才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这天，它就毛泽东的第一次讲话发表社论，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意义。同时，开始报道各省对于这一讲话的“热烈”反应。



邓拓。

从中可以发现，辽宁省委是在3月7日向高级干部传达这一讲话的，以后“西线无战事”，直到3月下旬，下面才开始有了一点忙碌的迹象：云南省委组织传达这一讲话，北京市委和山西省委以中央为模式，召开了各自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意味深长的是，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却没有在这个会上讲话。他魁伟的身影出现在人大常委会上，尽管东欧一行已过去两个月，他仍在人民大会堂里，以洪亮

的声音强调必须从波匈事件里记住的教训：加强国内的团结，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

进入4月后，仍有一些地方对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持拖延与观望乃至抵触的态度，《光明日报》4月20日的一篇西安专电中说，到这天为止，“在西安十三所高等院校中，绝大部分尚未向全体教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一些大学校长说，这个讲话要不要传达，如何传达，我们还不了解，也没有接到指示。”

在湖南省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对于讲话中“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的论述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这一论述得以成立，官僚主义者有责任，人民群众也有责任……

大江南北，日见柳色转绿，花深似海，由初春而仲春，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心有余悸。

江苏一些党外人士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成都的教授们似乎约定俗成，全都“金人缄口”，害怕“零存整取”，将来算总账；

四川大学一位教授在自己书房的墙上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守口如瓶”，下联是“身心安宁”；

西安动力学院一位教师感喟道：北京春暖花开，西安春寒料峭，刚刚被“公私合营”了的工商界人士则说，私方好比刚进门的新媳妇，摸不透婆婆和丈夫的脾气，不敢放也不敢鸣；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与费孝通一样，他也使用了“早春”这个词。不同的是，前者还让人感觉到一种欣喜之情，而他传达出的多是某种担心。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早春”之感，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大都在口头上喊“百花齐放”，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知识分子不得不猜测：鸣放的号召是否真有诚意，或许正是领导们期待发现错误思想的一种手段；

章伯钧先生甚至从1956年的认识上退了一步，去年他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难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却有可能，现在他看待后者也云天雾地了。也许眼前的乍寒乍暖，促使他想得更深更远——

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与国民党更是打了多年的交道，许是这种相互映照的经历，使他异常推崇邓演达：邓公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流亡苏联、德国等地，与宋庆龄女士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0年回国后，他同情共产党人的事业，却未参加共产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以进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一次次的奋斗，压上一层层理想的破灭，使他曾有感而发地说：在中国这个国家搞政治，就像在茫茫的沙漠里要走一条长长的道路，工作就是痛苦，前进就是痛苦……这里所谓的政治，便是中国的民主进程。



1956年的章伯钧。

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章伯钧永远怀念这位中国民主的先驱，他也永远将这句话默默、痛楚地刻进了心底……

1952年的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东荪突然被捕。作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被告之，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至于通了谁，怎样通，又通了些什么？章伯钧不得而知，民盟却必须开除他的盟籍。以后，外界传说五花八门：有说是他将一份中央政府的文件传给了国民党特务，有说他在家里用电台与美国情报机关联系……

章伯钧始终存有怀疑，张东荪是一个把人格和信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学者，抗战时期，他被日寇囚禁了4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因狱中的坚贞不屈，在到达重庆时受到知识界盛大的欢迎。他和张君勱是多年至交，同出研究系，政治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多相近，又同为民社党党魁，可到为蒋介石受封加冕的伪国大召开，民社党与青年党入阁，他即毅然退出该党，并与张君勱割席绝交……

共产党对他待遇也不薄，他有什么理由去“里通外国”？而且作为一个偶尔被请去开开会、发发言的党外人士，他又能窃得多少机密去“里通外国”？

在章伯钧心里至死都藏有一个想法，他只对夫人李健生讲过：张东荪的被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对那些受过欧美教育、“奢谈”民主的大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严峻的信号。因为国人虽不那么清楚，张东荪先生却是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在中国最有资格谈民主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索，不但是深刻的，往往也是超前的……

于是，新华社1957年4月21日的《每日新闻发布》里，刊登有

章伯钧的这样一段话，话里隐约有赫氏哲人式的睿智、杜氏野狐般的多疑：

知识分子仍然在摸索着他们的道路，并且推测政策是真诚的
呢还是一种姿态，它是目的呢还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显然感到自己蒙上了一层羞辱。这羞辱来自于人们对他的怀疑：要不，就还怀疑他鼓动鸣放的诚意，要不，便怀疑他驾驭全局的能力。

他就是这样：

人们越是怀疑，他便越是要吹旺真诚的熊熊之火，让怀疑化为灰烬；

人们越是观望，他就越是要加速坚定的铿锵之轮，将观望碾成粉末。

大约一开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便南下巡说了。

这是建国以后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巡说，再一次是在次年，还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文革”前夕，和据说是刀光剑影的“九·一三”事件之前。后两次南下巡说，虽披上了一种神秘乃至诡谲的色彩，但总起来说，毛泽东的这四次南下巡说，均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走向，并影响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

这一次南下巡说，具体日期与路线不甚清楚，但已查阅到的是——

大约第一站是天津。在此毛泽东讲了以下一段话：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不完全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



晚年的李健生。

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指出：革命胜利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争名誉、地位，比较薪水、吃穿和享受。必须经过整风运动，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再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者重新振作起来；

3月19日，他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高官、靠老资格吃饭，要靠正确地解决问题吃饭。在战时，我们有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在和平时期，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便很难原谅；

这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下面这段话，便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两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两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以后，毛泽东到了杭州。在这里，他似乎多待了些日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本来就是建国后他来的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况且此时正值江南春日，杭州城里墨燕低飞，黄莺欢跃，苏堤白堤桃云

柳烟，千娇百媚……

值得注意的是，3月21日，周恩来也出现在杭州。表面的理由可以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是来此迎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的。但无论是北京，或是上海的鲜花与美酒，均不会比杭州逊色。显然，周恩来日程的安排并不是冲着前者的。

罗德里克也认为：

周是毛推行1956~1957年的“自由”方针的主要支持者，他到杭州很可能是与毛磋商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对毛的讲话作出反应的问题。然后他带着毛的意见返回了北京。因此，周从杭州返回北京不久，北京市委就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这绝非巧合。

毛泽东在4月10日前回到了首都。在这一天的中午，毛泽东召见了邓拓。

可以说，这时的邓拓已经试图在转变自己的态度。他随手拎着的公文包里便有一张当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的社论里实际上已视陈其通等人为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指出了他们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并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之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杯水车薪，大势已晚。

毛泽东要将自己这几个月所蒙受的羞辱，统统连珠炮式地倾泻到邓拓的头上：

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

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

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

你们到底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报社里要敢于给你邓拓提意见，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撤职……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可以想见此刻，邓拓在他老人家面前那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的模样。

邓拓有可能反对毛泽东吗？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始终以理性指导自己行为的高级干部，如果说在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这时倒表现出他对毛泽东倒行逆施、天怒人怨的许多做法，有了相当程度的清醒，但是在这时，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比起20世纪40年代来，大概不会有多少改变：

1942年7月1日，他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他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是共产党党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之一。

1944年5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的选集。在《编者的话》里，他写道：毛“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且，“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这一论断，比起与之精神完全一致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来，整整提前了一年……

延安枣园的烛焰，一定为之欣喜地跳跃。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八头骡子上办报的年轻人。194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邓拓由两人扶着走下小汽车，拖着被残酷的战争环境也被焚膏继晷的编务给摧残得羸弱的躯体，走进位于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出任总编辑兼社长时，他只有37岁。

毛泽东欣赏他的忠诚，也欣赏他博闻强记、文思如潮的才华。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商业改造等运动中，他亲自撰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不少得到毛本人的称赞。195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中央办公厅给邓拓打电话，要《人民日报》次日就朝鲜战争问题发表一篇社论。放下电话，他立即动笔，三小时后，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草稿便送进中南海了。黎明前毛泽东批回这篇社论，只是用铅笔改动了几个字，天头上写着“照发，很好”。

除去历史渊源外，作为清朝最后一届科举举人的儿子、本人也自幼喜好文史的邓拓，如果说也和众多袒露着身上的伤疤踉踉进城的党的官员一样，存在着被权力的腐蚀、对知识的偏见的话，但可以肯定地说，文明与科学对他的影响，要远胜于这一腐蚀与偏见。因为他的学术造诣和创作成果，也因为他与社会科学界、教育界、文学界的广泛联系，他曾被受聘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兼任教授，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似乎这些头衔，犹如秋夜那轻卷蓝纱似的天空上浩瀚的星子，比起部长、副部长的级别来，更能让他感到人生的博大和生命的分量。他注意倾听知识分子的心声，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有记者从上海采访回来，他甚至这样问：你们除了接近工农兵，同“鸳鸯蝴蝶派”的人有来往吗？

邓拓不应该对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极力推行的双百方针有所抵牾。

更有力的证据是：徐铸成“感激涕零”地当上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之后，去苏联访问了整整50天，待他5月下旬回国时，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这一很快就被毛泽东称之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期间，《文汇报》的编务是由钦本立主持的。在这一期间，据说钦本立几乎每天都要和邓拓通电话。

为了查实这一“据说”，我曾问过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先生，他告诉我钦本立办报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调报纸在关键的时候，要起关键的作用。其二是报纸要“得气”，即能把握高层的想法，了解幕后的动态。在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期间，钦本立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打，给宦乡打，给杨培新打，给苏绍智打……与一切在他眼里能“得气”又能将“气”输送给他的人联系。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他的家，每月电话费都多得让报社会计的心狂跳不已，仿佛他的呼吸器官放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每天如果不能从话筒里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他的生命、他的思维就失去了活力……

由此可以认为，在1957年上半年里，作为原本就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钦本立，给自己的前上司邓拓打电话，不但是自然的，更是必然的。

那么邓拓是不是也心怀叵测，有意发布假的“天气预报”，将《文汇报》这条船及船上的老部下，引向大鸣大放的风急浪高的海上，并最终导致其触礁沉没呢？

有两件事能作相反的佐证：

其一发生在萧乾身上。这年5月下旬他给《人民日报》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夫人文洁若知晓后一定要他抽回来，他听从了，并给报社打了电话。当晚邓拓来了电话，表示萧乾此文提意见的立场是好的，对党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也很有帮助，力劝他不要抽回稿件。于是这稿子被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因为这篇稿子和他发在《文汇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一个月后，他被“请君入瓮”，这结结实实地证明女人有时直觉的准确，往往是惊人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萧乾以为邓拓头上的翎带沾有众多知识分子的鲜血。但是到了1966年5月16日，在这后来被称做“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日子，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萧乾一下注意到了文内这样一段：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次日深夜，在天空上越集越厚、越涌越低的乌云中，年仅54岁的邓拓闪电般地扑上前去，在滚滚而来的“文化革命”的车轮下，掷去了一颗书生血迹斑斑的头颅……

萧乾为此永远地认定了当时邓拓的真诚。

其二发生在刘宾雁身上。这年4、5月间，他奉命来上海采访一个厂因官僚主义所引起的罢工事件。采访中他强烈感到，应该给记者以更多的条件来发出也许是嘈杂紊乱、但却是发源于生活的真实、新鲜的声音，并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写下了《记者这一行》一文，内称：

而今天，这支力量并未充分动员起来。有人要求记者名副其实地做一个“记录者”，踏着首长的足迹去找例子，证实别人发现的定理；不要求或不允许记者独立发现问题，分析矛盾的结果。有的记者就真的走上了轻便的路：仿照别人的思想，寻找现成的“线索”，采写现成的“典型”，稍加剪裁，便成文章。四处寻找喜事，逃避矛盾，锦上添花的也大有人在……

此文寄给了《人民日报》社。无疑在反右斗争中，这些言论确是板上钉钉的“右派”言论了。如果邓拓也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



1954年，萧乾与文洁若在北京结婚后自拍了这张他颇得意的照片。

完全可以将此文发表出来，他却在自己被撤去总编辑之前，扣下了这篇文章，并在以后悄悄地退回给刘宾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无比热情拧下的两场滂沱大雨里，居然表现为一片倔犟、沉默的沙漠呢？

似乎邓拓并非不想让这片沙漠变成一块让毛泽东心旷神怡的绿洲。

5月11日，即徐铸成率新闻代表团访苏归来的次日晚上，他与徐晃等人同去了邓拓家，向后者汇报此行的经过。汇报完后，在谈起这一段《文汇报》干得不错时，邓拓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人民日报》也有计划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写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但报上去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其中只发了二篇，把我的计划全搞乱了。”

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徐铸成回忆录》）

邓拓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听取了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之后，他回到报社便立即作了传达，又制定了宣传计划，并赶写出两篇文章送交中央审查。从1956年6月《人民日报》所发的一篇关于反冒进、并让毛泽东批示“不看了”的社论的审查程序中，我们已经得知这社论是经陆定一、胡乔木修改、最后由刘少奇审查并通过的，

再翻翻《胡乔木文集》第一卷里，在1957年下半年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几篇社论里，除经过毛的修改外，也经过了刘的修改，因为胡乔木在序言里特地注明：毛修改所加的文句用黑体字印出，而刘修改所加的文句则用仿宋体表示。由此看来，无论是邓拓拟就的宣传计划，还是他赶出来的两篇文章，大约最后都到了刘少奇手里。

刘少奇对邓拓交代了些什么呢？是告诉他在最高层对于整风的形式有不同意见，整风发动的日期也没有确定，因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尚无必要对形式与日期均未最后明确的整风运动发表社论，以免造成全党的思想混乱，

或者，刘少奇什么都不会告诉他，如将自己与毛之间的分歧摊开

在连中央委员还不是很的邓拓面前，对十分强调共产党员修养的刘少奇来说，大概会感到某种不妥。但鉴于邓拓建国前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彭真的手下工作，在来《人民日报》之前，还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宣传部长，他还是能从彭真及北京市委的态度里感觉到什么……

因此，面对外面已经跃跃欲试鸣放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报社内日益感到不安的编辑、记者，邓拓只能再三强调：

“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此时，在4月10日的中午，邓拓几次想向毛泽东做些解释，但几次足将进而踟蹰，口将言而囁嚅。他能做些什么解释呢？

宛如一个初进股市便遇大面积崩盘被一下套牢的股民，在党内高层日益激烈、日益复杂的斗争中，邓拓过去总游刃有余的聪明与才华，被死死套住了。无论他怎样做，都得撞上信仰或是党纪森严的天条；无论他说些什么，都只能使他的处境更危如累卵。

毛泽东似乎也不想听他的解释，如果说从《人民日报》过去发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里，毛已经嗅到了几分“鬼”的气息；那么现在毛更明白了“鬼”在何处，“鬼”是何人。他召邓拓来，除了要想羞辱得后者斯文扫地外，只是想要证明：在“上帝”的震怒与那“鬼”的纠缠之间，《人民日报》这头迷途的羔羊，还能不能归队？

终于，邓拓站了起来，他向毛泽东请求，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职务，但没有得到允许。

此后，他又向胡乔木多次请辞：我现在实在不能再干了，请求中央让我辞职。

也许邓拓感到自己党内报人辉煌的生涯，已经走到了末路。他是识时务的：不久除胡乔木几乎每日来一次报社、亲自坐镇报社的反右斗争外，还调来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任该报总编辑，比起邓拓来，他深得毛的青睐，他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并代毛泽东起草了大量文件。在后来与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论战之时，“九评”写作小组的组长为康生，副组长便是吴冷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里，他几乎淹死，又是毛泽东及时地给他丢去了一个救生圈……

邓拓又不那么识时务：

当他空挂一个人民日报社社长头衔百无聊赖之中，1958年彭真将他要了去，安排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思想文教战线，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60年起又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由此使毛泽东并没有随他离开《人民日报》而将他从记忆里抹去，并使他党内一个大笔杆子“文章满纸书生累”（邓拓离别《人民日报》书诸同志诗）的人生悲剧，一步步地逼近悲怆、血染的尾声……

在毛泽东召见邓拓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此后开始宣传毛两个讲话的五篇社论的头一篇《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社论明确断言：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社论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的思索，以及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报告的思路。犹如秋风渐起时各服装店都在喊着“出血价”、“跳楼价”贱卖的T恤衫，刘少奇的克服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的论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整风以毛泽东同志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及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显然，这时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的看法，在周恩来、邓小平的说服下，也在他本人不屈不挠的推动下，在高层已渐成气候，即使有人是不得不喝了几碗酒，才脱去厚重的毛衣以勉强适应这政治气候的。

以北京为例，4月1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一些工厂的几千名干部热烈拥护毛的两个讲话，彭真的背脊上一定隐隐有了“全聚德”的烤鸭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在这之前，上海的柯庆施已召开一系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会，天津在市委第一书记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为期9天的宣传工作会议……

外火与内火蔓延在一起燃烧是异常可怕的，除非彭真真想做毛泽东政治筵席上的一道烤鸭。4月20日，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委的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规模比前一次大了一倍，他在会上作了主要报告。与3月份在人大常委会上作的报告相比，他不得不痛苦地闭上了一只面对东欧局势业已证明的内乱可能性的眼睛，而让另一只眼睛努力溢出热情、柔和的光芒来——他强调了党外人士参加整风和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必要性……

刘少奇是否也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呢？

自3月份以来，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五个省。自1956年9月以来的近半年里，全国各地，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从沿路视察对这些事件的高度注意里，可能他感觉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广泛存在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他不能不承认他的那位湖南老乡的两个讲话有着一定的新意，从而大概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上与前者有了某种默契。

但是，从刘少奇的五省沿途讲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又无疑认为毛的新意不过是秋叶上蒙上的一层淡淡晨霜，而河网似的“叶脉”所真正呈现的，主要是因分配所引起的矛盾：即工农之间、新老工人之间、工人与干部之间、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能按个

人的专长分配工作、不能按个人的水平分配接受教育的机会……

与其说群众的牢骚与不满，是冲着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来，不如说它们大浪滔滔，是追逐较多的工资、较好的住房、较充裕的食品供应以及人与人之间较多的平等而去。

而这一切无不被现阶段国家落后的经济所制约；

要改变它们，又无不归结到必须首先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好似走了一段貌似离开大路的小道，走着走着，刘少奇又走回了“八大”的讲坛前。在这张被严重分歧的榫头给拼起来的讲坛前，他的那位湖南老乡是很难与他达成什么实质性共识的，而且毛泽东也不耐烦了，他不愿再让讲了几个月的整风运动，还只是手里一只玩熟的信鸽。

在4月27日这一天“信鸽”腾空升起的日子，刘少奇远在上海，并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仿佛这是1957年春季的一道最时鲜的蔬菜了，但刘少奇从“篮子”里首先拣去的还是主观主义；他将整风运动需除去的“三害”依次排列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篇幅上讲主观主义的错误，也比讲官僚主义的危害要多得多。

千万别小瞧了这一类词语排列顺序的意义，它往往有如中国官场名字顺序的排列，甭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就是在一般的局、处级单位，你不是在其他场合，仅仅是在用公款宴请的饭桌上把头头脑脑的座次颠倒一下，大概就能弄得你恍若自己的脑袋与脚被颠倒了一样难受……

毛泽东本人就极善于从这一类词语的排列顺序里，察觉“项庄”们悄然舞动的飒飒剑影。

1959年，他在抨击彭德怀的“万言书”时说：

例如他们说，“有失有得”。把“得”放在后边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将“官僚主义”一词后置，在刘少奇这里，肯定也经过了深思熟

虑。

我揣摩，似乎从1956年起，他就嗅出了毛泽东身上的一股日益浓厚的水泊梁山气息，并日益担忧随蔚蓝色水母般的烟雾，一个频繁地从前者唇边吐出的词组——官僚主义。

母亲对儿女的保护是天然的，终生视党为神圣殿堂的刘少奇，对于这座殿堂将可能遭受的某种侵袭的警惕，也几近是天然的。诚哉斯言：

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并且官僚主义导致人民与党危险的疏远，那么，就可以要求不仅改善党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求改变党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的担忧是深刻的，仅仅九年后毛泽东便在中国上演了一部新的《水浒》。

刘少奇的担忧又是保守的，他绝没有料到在那万炮围轰的殿堂里，第一阵排炮对准的正是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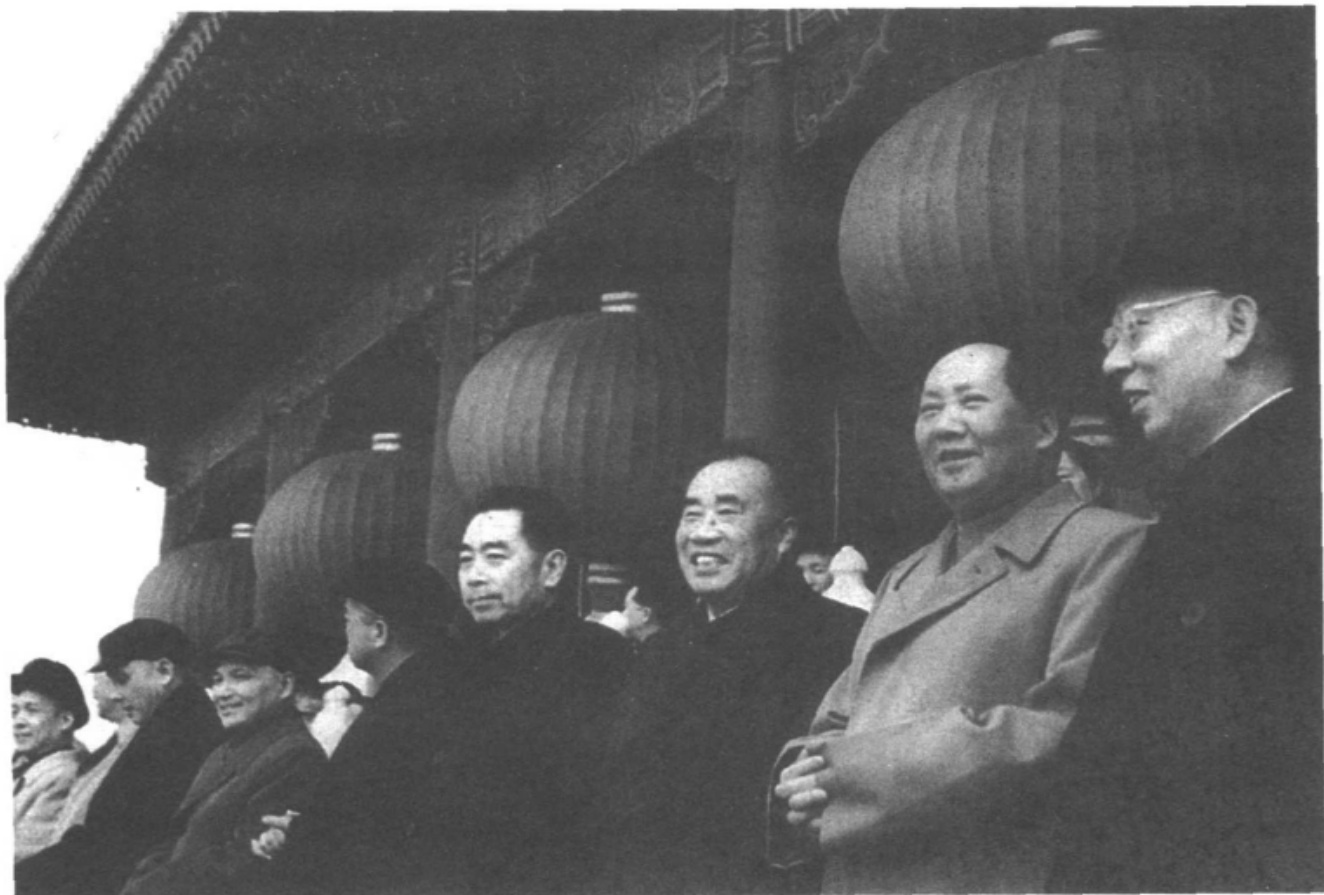
但眼下他并不岌岌可危。五省视察下来的结果，一定使他坚信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他是长辛店炉火正旺的机车，他是安源煤矿闪亮的乌金。他的政治观点与他的革命意志一般坚强。在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在整风运动的形式——是开门整风还是关门整风上，他大抵未与毛泽东作任何妥协。

在那只“信鸽”腾空而起，在中国广阔的天宇里飞翔了三天之后，毛泽东似乎感到有必要在自己的战略部署上，再添上色彩浓重的一笔。

他是个登山则情满千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诗人，他挺讲究“诗眼”。

“文革”初期，他一身戎装八次检阅千百万红卫兵，这里有他御驾亲征再率中国人民“重上井冈山”的“诗眼”；

这回在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中共主要领导人物全部登场。受约请座谈的则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



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城楼上。

一边放眼已被红灯笼、彩旗、鲜花等装饰起节日气氛的首都，一边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同操国事，纵论山河，岂不也有“世道清明”、“周公吐哺”的“诗眼”？

在这个被称做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诚邀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今后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在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并提出由邓小平负责召集党外人士，就他们的有职有权问题和高校的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

据说，他还极诚恳地说了一句让日后储安平先生极当真的话：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戴晴《毛泽东在1957年》)

大概他要说的都说罢,他能做的也都做罢,其殷殷期盼之心,已是日悬中天了。自五一节以后,便不见毛泽东再出来,像一位深山古刹里的老道,他要静静地倾听尘世间的反响了……

13 着急上火的两家报纸

自5月1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以突然获得的自由批评的权利,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政治的压力都稀释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来自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杂冰渣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从大气层进入太空会产生失重。

从黑暗里猛来到阳光下会有一时的晕眩。

最初几天,知识分子们便有这种“失重”与“晕眩”之感——

我们说些什么呢?

我们能这样说吗?

对此,似乎没有比钦本立、储安平两位更着急上火的了。

徐铸成访苏前夕的嘱托,邓拓电话、信函里的一再肯定,已经使钦本立食不知味、寝不能寐了,何况在这之后又有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7年7月1日刊登的由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中点了浦熙修的名。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夜访。

那是在4月份，上海市委办公室通知他，说毛主席要来《文汇报》看看，交代他这段时间不要外出，同时还得严格保密。他好容易将草原上马驹腾欢般的兴奋赶进了心灵的马圈，又布置下面将各办公室和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望穿秋水似地等了几天，一天夜里十点多钟，走进报社的是陆定一。

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主意，有办法。”

进了办公室，往钦本立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他问：

“这个位子是谁坐的？”



浦熙修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

“是徐铸成先生坐的。”

陆定一两手往扶手上一摊，又打量了办公室一圈，似乎被这房间里浓浓的纸墨气息所陶醉，又问钦本立：

“你看我来当贵报的总编辑好不好？”

尽管是句风趣话，可钦本立感到在这风趣之中也未免不含有几分羡慕。而作为有如此显赫身份的对方，决不会去羡慕一般的报纸和一般的报人生涯……

陆定一是来鼓励《文汇报》积极投身大鸣大放的。事后钦本立听说，本来是毛主席准备在经过上海时，亲自要来作这番鼓励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来不了，才特意委派陆定一前来。“女为悦己者

容”，“士为知己者死”。既知己，又悦己，钦本立怎不拿出双份的苦心，双份的努力，将《文汇报》引向后来被斥之为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驻京办事处，12名记者，除了留下一位看家，包括已升为副

总编辑兼办事处主任的浦熙修，全都似离弦之箭一样撒去了京都的各个角落。近一点的地方，乘公共汽车去，远一点的地方，便坐小车去。浦熙修与国务院打声招呼，办事处就进口了一辆英国产的轿车。那时，中央领导人和部长们坐的车，不过只是“吉姆”、“华沙”一类的苏联、东欧车，局长们能坐上小车的，就像今天要找不坐小车的处长乃至科长一样艰难。显然，坐着这样鹤立鸡群的轿车走进了哪个单位，心里的感觉更有几分像是“无冕之王”了……

浦熙修除统领全局外，还亲自组织有关恢复社会学研究方面的鸣放，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刘光华，才气横溢，性格活跃，他便跑高校，尤其是掌握北大的鸣放动态；几乎每天要去梅兰芳府邸串一次门，程砚秋请客吃饭也常常被拉去作陪的谢蔚明，则在戏曲界如鱼得水般穿梭，他着重为被称之为京剧花旦一绝的筱翠花鸣不平：解放后，后者的一出出拿手好戏，不是因有“封建毒素”被封，就是以“宣扬色情”遭禁，弄得后来他不必出门了，成了挂在凄冷角落的蛛网里，一只靠编织昔日舞台绚烂回忆而打发日子的蜘蛛……

杨重野则对肃反“扩大化”有了兴趣，也许是出自于自己遭际的某种坎坷：

他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汇报》工作，出于对共产党的仰慕之心，他不畏风险去了东北战场采访，并发回了一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道。据说他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有几次热烈得将他抬起来，往上抛去，周而复始，宛如他是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为此，林彪、陈云、彭真等人也都认识他。

他随“四野”进关到了华北，华北一解放，他留在了《石家庄日报》，报社社长是张春桥。此后，他便渐渐成了一条被晾在海滩上的鱼了，再转去新华社，连海滩上也不让鱼待了，晾在海滩上多少还能触及涨潮时推上来的海水，这时更将鱼挂了起来——他被分去搞资料。他明白在自己的履历上，几乎从他走出《文汇报》的大门起，便有一道怀疑如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时强时弱地跟随着自己，他想不明白的是，怎么能凭这貌似有形、抓一把过去却两手空空的“灯光”来处置一个人的前途呢？

为了摆脱这“灯光”的跟踪，他闪进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于是，在鸣放期间，他便和1927年至1931年间任过广西省省长、当今为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的黄绍竑先生有了更多的沟通。后者向他抱怨，肃反运动中不少清白无辜的人受到了惩罚，原因在于中国至今没有民事、刑事法典法规，只有个别的条例。反贪污了，拍拍脑袋，来个惩治贪污条例；要肃反了，摸摸下巴，又来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有了法典反而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如这样制定半法规半政策的条例，怎样有利于打击敌人，我就怎样打击！

怀有如此心态，企及如此捷径，在中国怎不会像盛产五谷一样盛产冤假错案呢？

黄绍竑先生向他提供了一些看来有凭有据的材料，有的具体到了数字的多少。据此，杨重野写了一篇篇幅不小的报道，在本报刊出后又被新华社独具慧眼挑中，向全国各报发了通稿。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据说有一个县在肃反中被整错的群众纠集起来，拿起扁担、棍棒等物要去法院算账……



浦熙修1946~1948年在南京。

记者们一般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或是晚上回来写稿。每天紧张得似红马甲、蓝马甲们走在华尔街上，一回办事处，有时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得即刻趴在桌子上动笔写稿。因为20世纪50年代电脑、传真等现代通讯技术，还在孩子们读的科幻小说里。稿子写完，先得经浦熙修把关，她审毕后交办事处的译电员译成电码，再由通信员送邮局向上海方面拍电报，而这一切在11点钟左右必须完成，凌晨两点在上海的编辑部便截稿了。

无疑最辛苦的是浦熙修了。

她起得最早，总是赶在上班之前便进了办公室，大家到齐后，一一听取各人当天的活动计划，然后她提出看法，让大家明确编辑部在新闻导向上的要求。倘若通

过有关渠道了解到中央新的精神，她也在这一简短的碰头会上讲一讲，使大家在采访中有所遵循。

夜里，她睡得最晚。除了丰泽园里伟大领袖那通宵达旦、曾被多少诗人浓墨重彩讴歌过的灯光外，她房间里的灯光也该是偌大的一个京城里最晚熄灭的。常常过了十二点之后，她还要越过千山万水与钦本立通话，或是报去最后采访到的重要新闻，或是交换对哪块版面、哪篇稿件的看法。她本来就长年患失眠症，这时只有靠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每天才能睡上有限的几个小时……

浦熙修不但是个实干家，还是个“外交家”。

在鸣放之前，因为《文汇报》追求民主的传统和浓浓的书卷气，浦熙修在重庆七年任《新民报》记者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有的广泛联系与影响，再加上办事处正处于市中心的灯市口，高级知识分子们来市里或是打此经过，总要进办事处坐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吴晗、曾昭抡、向达、华罗庚、著名翻译家高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以及在重庆时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同样蜚声遐迩的《大公报》记者、时任《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彭子冈，还有也是《大公报》出身的老报人、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组组长的高集……常常人未进门，声音就已落地，“浦二姐，浦二姐……”，一个个叫得亲亲热热，也不管自己的年龄是不是该配有这样的“二姐”。

这是一个从重庆带过来的称呼，那时浦熙修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因为在姐妹中她排行老二，老三安修嫁给了彭德怀，办事处的人们便称她做“浦二姐”，而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们也跟着叫“浦二姐”，这称呼里显然含有大家对她的尊崇。

她也真热情得似个“二姐”，过些日子总要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文化人大抵都是些美食家，为了满足他们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她先是经北大几个教授推荐，去北大借了一个厨师。每回聚餐都得借一次，总不是个事，原《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是四川人，向她介绍了个川菜“大腕”，她又派人不辞辛劳地去成都给请了来，这厨师烧出来的菜，还真让那些味觉系统快速运转得似在铁轨上跑着的车轮……

鸣放以后，他们就来得更勤了，办事处俨然成了京城一个社会名

流的沙龙。在满足食欲之外，也畅快地发泄那种自身膨胀思想的压力。难怪浦熙修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当时办事处发来编辑部的稿件，几乎遍涉文教战线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她还趁热打铁，请对方就所议之事给《文汇报》写稿，为此还产生一件费孝通先生或许已经遗忘了的趣闻：

他答应写稿，却提出自己现在囊中羞涩，得预支稿酬去买支好笔。浦熙修真去买了支51号的派克金笔，并给他送去。没几天，鸣放的形势就陡然逆转了，此笔自然没能为《文汇报》排上用场，大抵一开张使用在写那些连篇累牍的检查、揭发材料了……

不仅驻京办如此，当时《文汇报》派往各地的记者，也在本报发出了众多有影响的报道，如《流沙河谈“草木篇”》、《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浙江专业作家陈学昭》等，但在钦本立极力引向的“资产

阶级方向”上，浦熙修仍不愧是《文汇报》一个鞠躬尽瘁的马前卒。27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已被正本清源的岁月时，徐铸成写道：

假如当时的《文汇报》有一点成就和可取之处，那首先应归功于邓拓同志的全力支持。就我们自己的同志来说，我以为，致力最大、贡献最大的，应推浦熙修同志。（《怀念浦熙修同志》）

储安平身上又是一番人生景象。

姐妹俩（摄于20世纪30年代初冬腊月）。左：浦熙修，右：浦洁修。

早在当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徐铸成等新闻界人士，《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党员常芝青也在座。作为民盟中央的机关报，其总编辑从来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与现任的常芝青不同的只是，第一任的胡愈之，第二任的邵宗汉，他们的党员身份未曾公开而已。在对《文汇报》赞赏有嘉之后，毛泽东似乎突然想起了这点，他的目光转向了常芝青：



“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中宣部、统战部立即忙开了，在一番选择之后，“储安平”三个字摆上了胡乔木的案头——

他是英国留学生，本人也风度翩翩，宛如一个英国绅士。且才华出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新月》杂志上，如果说罗隆基大气磅礴的社论让读者振聋发聩的话，那么他的文笔清丽的小说、散文，也常令读者耳目一新。

1946年4月，储安平拒绝了南京政府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只身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创办起《观察》杂志。他亲自起草的发刊词，最好地表达了该杂志的面貌：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杂志约请全国60余位各界知名人士为其撰稿，他们大多是“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对读者极具号召力。储安平自己也几乎每期发表抨击国民党弊政的人木三分的评论，因此日益博得知识界的青睐，创刊号印了5000册，各处纷纷告罄，又六次加印，总印数达11000册。至1948年年底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时，印数已达10万多份，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一个得仰起头看的天文数字。曾在《观察》和他共事多年的林元先生，临终前回忆道：“储为人精明，说话条理明晰，虽然是大学（复旦）教授，却似个事业家。”

刊物遭查封时，储安平正在兵临城下、风声鹤唳中的北平，他忙于搜集平津战役的材料，在自己的笔下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透射出新中国的第一线曙光。杂志社的两位同事锒铛入狱，他本人也在特务的时刻追捕之中，只好暂且藏身于城里的府学胡同。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他直接住进了正像大海一样接纳天下志士仁人的北京饭店。当周恩来到饭店看望大家时，还特地到他房间里坐了坐，两人有过一番饶有兴致的谈话。

在徐铸成先生1949年9月29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以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视察记25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由此可见，改朝换代之时，多少盛举，多少政务，一本区区《观察》却萦绕中共领导人心头。果不其然，胡乔木、胡绳专为此事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总理，后者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

办了一年多，刊物改名为《新观察》，既然加了一个“新”字，便意味有什么旧的东西得抹去，似乎首先被抹去的是花名册上“储安平”三个字。

他被调到新华书店总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调出版总署任发行局副局长。无论调去哪里，他都是一瓶可搽可不搽的增白美容霜。他一定不想总摆在他人的梳妆台上，自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便从“梳妆台”上出逃了，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约记者的身份，去全国各地走马观花，发回的系列报道不仅发在《新观察》上，也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转载……

犹如解放前他是自由撰稿人一样，本来储安平也不想参加任何党派。他信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行为操守：他从不利用谁，也不愿被人所利用；从不去戒备谁，更不愿自己遭人戒备。他不但在风度上，还在人际关系上，都有英国绅士的派头。比起当年同住北京饭店的多数人，他当今的处境显然不得志，他大约有了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他经不起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多次劝说：民盟这边有他20世纪30年代的老友罗隆基，九三学社这边许德珩主席是他尊敬的师长，中央委员会里袁翰青、楼邦彦等位也是他无话不说的朋友。温文尔雅的储安平，无法顾此失彼，便同时加入了这两个党派。耐人寻味的是，进去之后，九三学社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并代表九三学社出任《光明日报》社社务委员；而在民盟这边，他只是一个一般成

员……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上午9时，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各部主任的面前。章伯钧以不冷的口气，说了一句不热的介绍：

“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将会增加《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这句话等于没说，作为作家，储安平早已如雷贯耳。应该介绍的，诸如：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但在“公推”之前，却是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

储安平不会没有疑虑，自己白手起家的《观察》，都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睁睁地由其从自己手中溜走，怎会从天而降地又给自己一张报纸？但胡乔木的热情，李维汉的嘱托，也许还有邬夫十年后刚刚新婚燕尔的幸福，将这份疑虑给打发了。可眼下，又一份疑虑萌生了，几个月后储安平这样交代道：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但以储安平的个性，他不会去在乎章伯钧的态度。而且正因为这态度，他关于施政方针的简短讲话，才表现得相当地硬气与坦率：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储安平很快便拿出了当年办《观察》的劲头。按照胡乔木“多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一上任就给100多位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组织好施工队，转过身来，他又大汗淋漓地将报社搬上了脚手架，摆开一副要对报社全面改造的架势：请人来做主笔。为各领域的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由社委会授权写作社论，关于这点，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解释道：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

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要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

储安平大刀阔斧的行动，去故布新的构想，在京、沪知识界引来一片喝彩声。

费孝通称他的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名记者子冈有了为他写一篇通讯或是特写的冲动，题目就叫《新总编辑上任记》。他到上海时，赵家璧等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设宴接风，约好晚7点开始，9点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刚上了几样菜，几乎凳子都未坐热，来了一辆小车，又将这“鱼儿”沉去了水下……

俨然一副寸阴寸金的“党国栋梁”气派。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储安平也去了，在感觉到“老和尚”无比真诚的同时，他更加深感自己作为八个民主党派喉舌的报纸总编辑，对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负有的重责。面对开初几天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失重”与“晕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你不发言，我点你的名让你发言；你不到位，我努力帮你到位，储安平亲自修改一些重要的争鸣稿件，如国务院参事范朴斋一篇题为《会外之音》长8000余字的文章，经本人删改成7000字后仍显芜杂，问题没有点透，储便自己动手，精要为4000字后发表；你不写稿，我派记者去帮你写稿，此即后来被称之为“最恶毒的”去上海、武汉、南京等九大城市开座谈会的主意。

大批的记者下去了，宛如一队队的战斗机群飞去了四面八方，其任务便是促使各地的知识界，撤去“失重”与“晕眩”的炮衣，从心灵的窗口里勇猛地伸出高射炮口来，去“大鸣大放”，以筑成整风运动里异常壮观的火网。

储安平惟恐有些地方的高射炮推不出来，或是推出来了，一发射便是哑炮，他特别指了几个名字，在他看来这几尊炮不仅挺进快捷，且有相当丰富的弹药储备。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

“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却无事可鸣，

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碰到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

除了极少数的几架飞机偷工减料，马马虎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绝大多数的飞机都拼命地往所在的方位投掷鼓动的炸弹，后一部分人的“家园”更是被不遗余力地炸得一片绚烂。最具代表性的是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一气开了三个。他也没有写通讯的任务，他又走笔如风，唰唰地一写三篇，在炮火里写作，才思还颇为敏捷，诸如“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

两个月后，这些记者们无一不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

民主党派里不是没有人担心：中国的政治天空上，何曾隆隆划过这样并非亮着鲜红的五星、而是颜色杂陈的机群？

就连将他请出来的小同乡胡乔木，此时也在《人民日报》社内部，说了一句怎样理解似乎都不为过的话：现在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已不在《人民日报》手里，而被民主党派的报纸拿去了……

5月7日，在报社一次大会的报告中，储安平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颜色杂陈的机群，却是从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那宽厚的手掌上起飞的。他又否定了个别人危险的想法：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就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西方存在着反对党，各自的政治目的都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区别，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新型的民主制度下，民主党派也参加了政权，不是反对党，自然《光明日报》也就不能办成反对党的报纸。

他以为无论有着怎样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人在料定自己平安无事却又干着什么壮举的时候，总会说上几句豪言壮语，有着英国绅士派头的储安平先生，似乎也难免俗。他的一番豪言壮语是——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

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看要碰上多少暗礁。

于是，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编发了22块整版近13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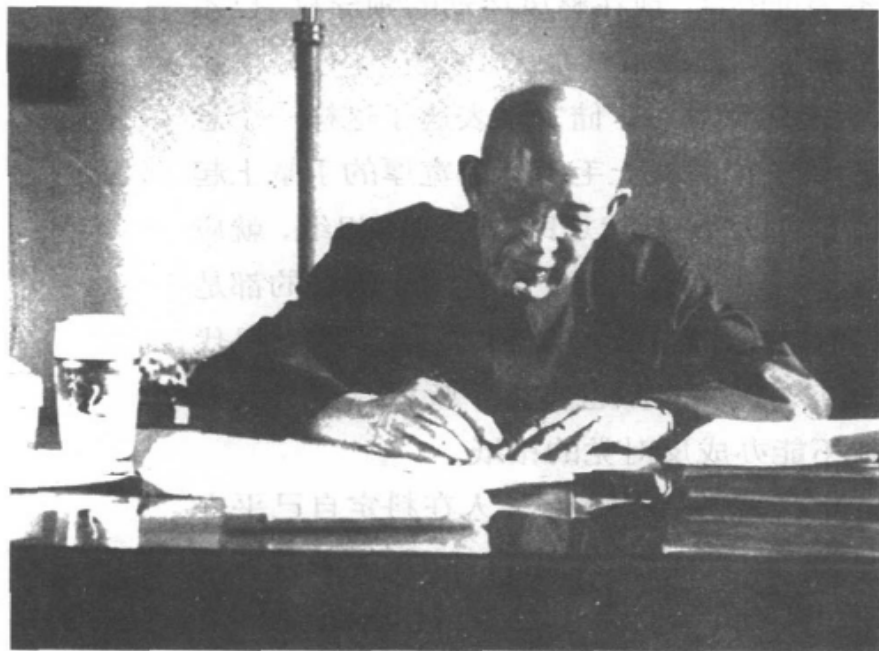
暂时储安平还不会感到自己的豪言壮语，将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因为从5月6日开始，机翼上亮着鲜红五星的战斗机群也陆续起飞了。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

据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

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

如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5月15日

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



1983年春，李维汉带病撰写回忆录。

都打倒)。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5月16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熊克武等人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

其他意见还有,应该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

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

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然,即使写于近30年之后,对1957年已有深深愧疚之意的李维汉,也很难将反右运动一笔勾销,他认为:

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虽然列出了一些“右派言论”,但因未点出是哪些人青面獠牙,在磨刀霍霍,摇旗呐喊,故均无出处;且沿用的一看便是当时经过明显掐头去尾的言论,如果我也列在这里,不足为据,好在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到排山倒海、层层叠叠的“右派言论”。

其实,在上面所列的“正确的、很好的”鸣放里,已经显示了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会有一个怎样的理性走向,以及一个怎样的感情温度。与“右派言论”虽也有区别,

但不过是前者空洞些，模糊些，圆滑些，而后者具体些，明确些，天真些；或者换一个说法，在一个理性方向上，前者走了三十步、四十步，而后者走了五十步、六十步，在同一感情水银柱上，前者升到六十度、七十度，而后者升至九十度、一百度……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毛泽东1955年以来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展现，即使在以上被李维汉认定为“正确、很好的”鸣放里，有让他听了如和风吹拂芊芊春草一样感到抚慰的意见，如“一切搬用洋教条”之类；但也不乏有让他老人家听了似夏日蝉雨般刺耳的言论，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评判，“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一类明明答案已经放好在口袋里的设问……

倘若注意起这两点，就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14 大鸣大放高潮

让我们暂且将毛泽东的心思放在一边，去关注自5月上中旬起，在全国知识界渐成燎原之势的大鸣大放高潮。

5月5日，在武汉东湖之滨一座精致的招待所里，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能看到对岸珞珈山上美观建筑物的窗外，毛毛雨下个不停，正是黄梅时节。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

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谈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处和须教育的地方。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不起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

育、文化、艺术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请教打倒墙的办法。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说：

过去几年的运动，都是党员整群众，现在又被人看做群众整党员。有的人表示，现在把肚皮撑大些，过几年后党员再整群众，过几年……互相整下去，还得了！过去党员犯错误，党内也整，可是方式是反复说理、耐心教育，想不通时还可保留自己的意见，非到不得已时不处分。党内虽整，但对外一致：像铜墙铁壁。因此像是对党员照顾面子，对高级知识分子不照顾面子……

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

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分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他们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些现象……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巫一舟说：

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便有。可是过去多是用两种办法对待：一、鸵鸟式的把头埋起来；二、像对待敌人似的用简单逻辑、简单办法：知识分子爱发牢骚，牢骚就是对领导不满，对领导不满就是反党（因领导大部分是党员），反党就是反人民、反革命。有些具体事例，也令人害怕，所以不说话，不写文章……

座谈会从早晨开到下午六点多，始终发言踊跃。去武汉采访了这个会议的《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吕德润感到：人们去拆“墙”了，一项前景无法估量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正式动工了！

5月5日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连续举行座谈会。

很多人的发言认为：广东文艺界最严重的问题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它所导致的宗派主义。周钢鸣、黄谷柳说，即使在座谈会上，宗派主义仍旧像个幽灵在徘徊。有一位党员作家对秦牧这样说：“你的杂文写得很好，如果参加过土改，会写得更好。”这种讲法，使一些作家感到有一个毕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因为今后再不会有土改。同时，对以后将怎样改造自己也感到彷徨。

欧阳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执行起来有很多障碍，而主要的障碍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思想、作风和习惯势力。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杜埃检查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一阶段的思想，认为自己受了陈其通等人的影响，后来有了转变。他也认为，“在华南，主要还是教条主义的障碍最大，而且很顽强，要彻底反掉不容易”……

5月11日，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参加了福建师范学院教职员鸣放大会。该院各级党员干部全部出席。十几位教授心情很是激动，在会上侃侃而谈，倾吐真情。

物理系主任吴芝兰说：

从1953年到现在，省委一直没有考虑配备懂得教学科学研究业务的党员院长，致使院内各项业务工作停滞不前。学校清一色党员领导，院长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学习，搞了半年还是外行，说明办学决心不大。在团结知识分子、依靠老教师上做得极差，不过是发发戏票，办个食堂而已。几年来二百多讲师中只吸收一人入党……

中文系主任黄寿祺说：

院领导不懂办学，以搞“革大”和在军队一套来办高等学校，作风生硬，工作行不通又不虚心。学校“长”风盛行，行政上一个党员科长比系主任权力还大。某些青年党员负责系的政治工作，说教授思想觉悟差，有埋怨情绪；自己却像个傀儡，不深入群众工作，上面要什么就来一通汇报，常常是片面的。这种青年党员

可谓“太上系主任”……

同日，省委书记江一真在厦门大学，参加了长达十个小时的老教授座谈会。

汪德耀教授说，党领导科学，要善于依靠广大科学工作者，要放手，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干涉过多或漠不关心。

植物学家严楚江说，有人硬说党能全面地领导科学，这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

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批评了党与非党之间冷冰冰的情况，教师看到支部书记很像惊弓之鸟，这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现象要尽早消除……

也是在11日这一天，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邀请部分中学教师来市委座谈。他表示，屋檐水能滴穿石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领导一起推倒人为的“墙”，党一定给大家撑腰。

中学教师们纷纷倾吐衷肠。

第六中学刘恕说，市委本来我们应该经常来，但从未来过，这就是矛盾。感谢毛主席一阵春风把我们吹来了。教师们拥护党，但与党员谈不拢，学校领导不喜欢听人提意见，对看得惯的人锦上添花，对看不惯的一棍子打死。

第十一中学的林柏渊说，校长处处特殊化，不和教师共甘苦，群众不满，总务主任就辩护说，校长革命功劳大，不能和一般教师相等。如有人提意见，就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

第七中学熊万丰说，学校在讨论安排教学问题时，有教师发言不合校长口味，他就批评这是先进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吓得教师不敢再讲。学校在选人民代表时，校长说候选人名单是区委指定的，谁不选谁就是反对区委……

还是11日，下午两点，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了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170人，列席代表950人，和邀请到会的政协上海市委全体委员，共计2700余人。代表中有近半数是非党人士。在此之前，从4月16日起，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在社会各界开了16次座谈会，为这次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

他宣布，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整风运动的开始。他指出：从市委召开的许多次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我们有很多缺点、错误：有少数党员立场不坚定，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把群众看成低人一等，自己则高人一头。领导与群众发生问题时，不是首先分析领导上的是非问题，而是“我总是对的，你总是非的”。不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不是用理服人，而是采取打击、压制的方法来对待群众。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勤务员、民主等等，对少数党员说来，完全是一句空话……

上海党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与市委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上海党在整风中要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五个方面来进行检查。检查要从科长以上的负责干部开始，特别是要从上海市委开始。整风时间至少半年，办法是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边处理。目前应该坚决地放，大胆地放，特别要在放的过程中结合改进工作，让大家看到放的好处，看到批评后的好处。

最后，他向党的负责干部提出：“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他说这四句话，不仅要在整风中这样做，还要今后永远记住，这样就能团结全体人民，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李炳炆说：“即使在几分钟以前，我还是决心不讲话的。”可他毕竟说了想说的话，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了很多的话。这样的人岂止一个？在这次会议的讲坛上，在与此同时召开的政协会议大组、小组的发言中，诸如“这是我第一次‘告状’”，“这是我多年想说而不曾说出的话”……犹如电影院散场后，地下俯拾即是的话梅核、瓜子壳。

老科学家黄鸣龙说：“我原来顾虑我的意见会被视为对抗性的矛盾”，话一出口便担心要打成“南霸天”的他，陡然成了“红色娘子军”的政委“洪长青”，他不但全盘托出，由党报全文刊载，而且还做起他人的工作：“我们既是共产党的左右，他们的偏差实在也是我们的过失，他们错误我们应知愧悔。”

已经14年不敢发表文章的林同济教授，也掏出笔来跃跃欲试，在

过去视为满是网眼的稿纸上，一格格地打开心灵被锁死的抽屉。

上海财经学院叶元龙教授，在宣传会议上听了48个人的发言后，实在坐不住了，激昂慷慨地说：

“我本来是来听听的，听了大家发言，才知道共产党是叫我们来批评他们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叫一批人来批评自己。这不正是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吗？”

连日来，在政协会议上各小组提出的意见已达1623条，牵涉到69个单位。市人委的人民接待室也是门庭若市，群众来访比整风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反映问题的来信也增加了30%左右。全市各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都纷纷举行座谈会，宛如呼警救火，电话从四面八方打进报社：“来采访我们单位吧！”“来听听我们的声音吧！”一批批记者疲于奔命，脚底生烟，一家家报社如牛负重，气喘吁吁……

8年前的5月，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上3万多学生举行了迎接解放的大游行，那震撼黄浦江畔的歌声，至今让上海人民记忆犹新：

和平民主的花儿开，
自由幸福的日子来，
它好好长起来，
别让它遭灾害
……

眼下不正是“和平民主的花儿”，已经摇曳出一片姹紫嫣红的日子吗？

上海，热浪滚滚的5月。诗意浓郁的5月。“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正一丝不苟地在黑板上书写老师教导的5月。

新华社自豪地向全世界报道说：“上海的民主空气空前活跃。”

暮春已过，初夏来临。无论是自然界的温度，还是人们的感情温度，更是明显地高涨起来。目前尚无人在公开场合提醒，在这温度骤然变化的日子里得注意“感冒”，只有人在鼓吹别多穿了衣服，以防“中暑”……

比如，15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接见日本戏剧访华团时说道：

“对人民我们只采取说服的方法，这就是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人民可以宣传社会主义，也可以批评社会主义；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

比如，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向4000多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时，要求打破“五怕”思想，大胆放，大胆鸣。这“五怕”是——

一、怕党员不许放，不许鸣。李富春说，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二、怕整。他说这大概是因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运动时，有些人被整过，感情上还有影响。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已不同了；

三、怕说错。他说共产党还常常不免犯错误，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纠正。要是大家都怕说错，怎么鸣得起来争得起来呢；

四、怕“围剿”。李富春说，党中央对“围剿”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提出了批评。王蒙的作品有缺点，也有正确的一面。是真理就不会怕围剿，真理总归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说那更不必顾虑。大家鸣大家争论，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求得共同的认识。

比如，18日、19日两天，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计听取了教授们13个小时的意见。

大家反应最强烈的是：党群关系紧张，在于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看法不对头。人事部门只知道政治历史，不知道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情就去翻档案袋，查老账。党群关系不好，还因为中间隔了一层年轻的党团员和所谓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根据领导的胃口逢迎领导，又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使领导偏听偏信……

陶铸就此说道，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分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这七年，党和人家已互相了解，疾风知劲草，大家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坚决揭

开这两校的盖子来。

5月酥暖暖的阳光，宛如异性一双妙不可言传的手，在撩拨人们的胸膛。

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将身上穿了多少年的一件本能的“外衣”，即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面孔、统一的颜色下，竭力掩盖自己、省略自己乃至扑灭自己的本能，脱去得越来越多。即使是一些敏感得几乎打个喷嚏，也像是资产阶级透过棺材板打出来的领域里，也是如此——

16日、17日两天，首都经济学家连续座谈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

会议揭露了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它主要表现在对旧经济学和经济学者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严仁庚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和目的性是应被否定的，但是它的某些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中，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各种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和储蓄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消费倾向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的。过去一提心理因素在市场上的影响，就会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市场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是有影响的。

经济学家孙毓棠、范若一认为，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料对经济学界保密太严。有的材料主任能看，处长不能看；处长能看的，科长又不能看，于是经济研究机构变成了意志消沉的“计算车间”。这原因无非是对旧经济学者知识的积累估计过低，对他们在解放后的进步更估计不足。

会议还对经济学界弥漫着教条主义与盲目服从权威的思想，表示深深的担忧。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

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楠说，有些财经方面的重要政策问题，上头怎么定，下面怎么讲。比如轻重工业投资比例定为一比八时，所有的文章都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以后改成一比七，我们又处处宣传解释这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的嘴唇摆来摆去，还算不算嘴唇，这

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重大政策问题的制定，经济学界该不该参与讨论呢？

17日，江苏省过去从事法学工作的专家、教授们，在南京民盟聚会。到会人士一致认为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是一棍子打死的粗暴做法，此后五年来一直没有注意到法学工作者的使用安排等问题，他们犹如一群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有的去教外文，有的去管图书资料，有的挂了一个“参事”头衔实则赋闲在家……

吴学义教授说，目前不能专靠方针政策判案，方针政策代替不了民法、刑法。若要健全法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培养司法人才便是当务之急。王辉明教授说，旧法学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应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几年来我们接受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水平低，但愿继续改造以便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从事工作。同时，法学也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如对旧的全然不知，又怎能批判它、超越它呢？

至今感到“春来春去无消息”的专家、教授们，一致决定上书周总理，呼吁改变目前用非所学的处境……

即使在乍暖还寒晴复雨的杭州，住在市郊龙井乡的浙江省惟一的一位专业作家陈学昭，脚上穿着棉鞋，书房里的火炉尚没有撤去，也敢在专程来采访她的《文汇报》记者面前，脱掉自己身上的那件“外衣”——

今年4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邵荃麟到杭州来的时候，找过文艺界的同志开座谈会，这是浙江文艺界自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第一次座谈会，70多位同志基于热诚来参加了，省委的领导同志却没来。面对文艺界在浙江感不到温暖的现实，我不能不说话了，因为我是党员作家，其他的同志、尤其是党外的同志们都在注视着党员作家在这样一个会上的表现。我决定说出自己的意见，随后其他同志对省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面提出一些批评。但是这个会后，省文化局的某负责干部竟然说同志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是些毒草”，“是出省委的洋相”……

这些年来，人们挨闷棍的事情太多了，往往没头没脑地一记

闷棍下来，这严重地伤害了大家的心。邵荃麟走了，文艺界好不容易起来的热情又冷了，各人也都回到自己的老窝里去了。在浙江，搞文艺工作还是那样难……我是个极单纯的人，虽去国外8年，又到延安，还参加过1942年的整风，可我现在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人，懂得一点生活，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尽管陈学昭女士最后一句话，还是至少说早了20年，但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她毕竟有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

然而，在北京大学琼楼玉宇、叶茂花繁的校园里，一批批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须的年轻人，却自以为有了和中国对话的能力。

这时，在校园外一片鸣放高潮的呼唤下，自五四运动以来，一个一点火就酒精灯般发出蓝盈盈火焰的精灵，一个当局总想抓住却总也抓不住的精灵，宛如苏格兰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从未名湖里急剧地升腾起来，并在他们青春的血脉里躁动；

何况，在这之前校园里广为流传的刘宾雁、王蒙的小说、特写，已拭去他们的眼镜上被理想化蒙住的水汽，与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也几乎天然地拥有年轻人对于批判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使命与激情……

5月19日清晨，第一张批评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大膳厅的墙壁上，来自历史系，署名“一些团员和青年”。内容是质询校团委：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随即贴出的第二张大字报，作者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内容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推动整风。当晚，在大膳厅召开全校团员大会，来自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党委副书记崔雄昆，以一副钢铁般冷峻的面孔，在会上说：我们禁止贴大字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贴大字报是一种好方式。

下面当即议论蜂起。有人似乎深知副书记的内囊并不像钢铁一样实实在在，往上递了一张条子：“请问现在北京大学的团员一共是多少？”作为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崔雄昆信口说了一个数字，会场上又是一片哄笑……

当晚，便贴出一张以讽刺崔副书记官僚主义为题材的漫画。

次日一早，在大膳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贴满了形形色色、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有论理的杂文、短评，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调侃之能事的对联，矛头除对着崔副书记压制大字报、以阻止学生鸣放外，有的揭露了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有的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诸如：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但在是否取消或改进上，有不同看法。必须大大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可在是否取消党委负责制上，又存在歧见。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反对入学时硬性分配专业，要求扩大选修和旁听课程的范围……

在这些内容斑驳杂陈的大字报里，有一首律动着马雅可夫斯基风格的诗歌大字报，题目为《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的发言！
昨天，我还不肯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

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两人均是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编委。在编委会里，还有一个来自苏州的姑娘，她就读于新闻系，原名彭令昭，以后用笔名林昭做了正名。进北大后，她屡屡求教于著名的文学史教授游国恩，后者对其比一般中文系学生更为扎实的文学功底大加赞赏，很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来。

有一年暑假，林昭回家，给妹妹彭令范看了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

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

此人便是沈泽宜。

参加《红楼》编委工作后，林昭发现“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以上见彭令范《心中永远的痛》）

这里的“他”，则是张元勋。

之所以写到林昭这个人物，不仅仅是因为青年时代沈、张两位都对她产生了那份美好且浪漫的情愫，而她因同情、支持了沈、张的这张诗歌大字报，本人也写出抨击极左政策对于人性扭曲的大字报，日后被打成右派后坚不认罪，并向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更重要的是，日后其命运的惨烈与其声名的清寂，恰成巨大的反差。而透过百年北大纪念活动的繁华与喧闹，我恰恰以为她的头颅与脊梁，才真正标志了北大的精神。

犹如在历次运动里，中国的政治厨师们，总是先将文艺这片肉割下来煎炒烹炸，再摆到店面上去展销零售，这首诗也被首先记住，当反击右派开始之时，《是时候了》率先被打成极具“煽动性”、“疯狂性”的毒草……

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在看大字报。教室过道、湖边草地、膳厅寝室、水榭楼台，几乎处处在议“民主”，说“整风”，并就大字报内容的是与非展开热烈的争辩，不过一日之间，自由鸣放的风气弥漫了全校。

20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教授代表党委讲话，他对崔副书记昨晚的讲话表示了遗憾。并认为目前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师生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正是提意见的有效形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希望大家能继续利用这一形式来协助

党向“三害”作斗争……

大字报在北大更加活跃起来。大膳厅周围所有可利用的墙壁和立面都贴满了，这儿辟为“民主广场”、“红楼”，那边叫“自由论坛”、“民主墙”……有个人具名的，有几个人合写的，也有班系学生会主办的，两天之内就出了500多份大字报。批评的内容也更广泛，涉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各个领域照搬苏联的模式、高等院校专业与课程设置的高度政治化、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等问题。

此外，还有相互间争论的：有肯定绝大多数大字报是真情流露的肺腑之言，有认为有些大字报在趁机发泄个人及家庭的私愤；有的指出某些大字报是毒草，有的却以为即使是毒草也何足为惧，争鸣刚刚开始，倘若就要拔除，香花也会连带遭殃……争论的用语极其尖锐，且指名道姓，毫不留情。

不是没有人担心大字报的矛头，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去杞人忧天，其中包括一部中国历史似一只波斯猫一样在他怀里卧着的翦伯赞教授，和银髯飘飘、颇有古道热肠的马寅初老校长。翦伯赞以为，同学们从前有意见没讲出来，直到今天才讲，情绪上有些激昂是可以理解的。大字报就像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在说话，磕磕碰碰没有什么可怕，应该继续大鸣大放，马寅初也认为同学们能畅所欲言，就是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于是在这前后，他本人也抛出了当时被批得遍体鳞伤、20年后国人又悔青了肠子的“新人口论”……

党组织也在支持鸣放。

与北大8000多名学生比起来，贴大字报的人还在少数。除去带有调侃性质的，大字报一般由两种人所写，一种是思想深刻的人，另一种则是有着坎坷遭际的人，而在20岁上下的莘莘学子中，这两种人并不太多。仅仅靠着当前社会氛围和文艺作品的影响，更多的大学生们似乎还舍不得用自己的学习时间去喂大字报，课余饭后去看看它、议论它，那自当别论。

不愿写就组织你说，全校各系各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发动群众和团员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你说不出子丑寅卯，就说鸡零狗碎，你对校内没有意见，也可谈谈校外的所见所闻。

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一向沉默寡言，最后也发言了，他说的是：家中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

此后，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出现了。大膳厅前的广场，开始被人们称之为“海德公园”，成千的师生在这里倾听一场场激烈的辩论。学生会规定每日从下午5时至10时为辩论时间，广场上搭起了讲台，并专辟了两间教室装上播音器材以向全校广播。

23日，法律系学生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辩论开始不久，来自附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程海果，笔名林希翎，身着一件褪色了的列宁装式的女军上衣，晃着一对小辫子，步履飒飒地冲上了讲台，这可是一位让人们心动过速的不速之客。

由“中国人民大学”这庄严而又神圣的校名，我们便可感知，这所当时以培养调干生为主的大学在政治成分上的纯洁性。林希翎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她“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和陈老总带出来的兵”，“在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下长大的革命青年，解放后，经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但是，再纯洁的地方，在鸣放中，还是被纯洁者本身搅成了一锅粥。

此前，林希翎已经在人大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个下午，由她演讲引起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顷刻间遍布了校园。在礼堂对面的墙上，这边刚刚刷出大幅标语：“向除‘三害’的勇士林希翎致敬！”那边即被贴上“林希翎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必须批判！”几分钟后，这条标语的下方，又有人铺纸挥毫：“反对卫道者！”墨迹未干，后两条标语的顶上又出现一条：“坚决卫社会主义之道！”

但是，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对她一对闪烁如墨玉的乌黑眼睛下，那演讲时条理清晰的表达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语言，留有深刻印象。几十年后，当时人大的一位同学，在回忆录里如是说：“我听过不少教师讲课，听过不少同学发言，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林希翎的鼓动力！”（鲁丹著《七十个日夜——大学生眼里的1957年之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林希翎好似一只淘气的猴子，溜出了人大，溜进了政治成分显然复杂得多的北大，大概她想在北大呼唤起更多的知音……

这天辩论会上，林希翎说道：

为了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人民群众能真正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既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南斯拉夫……

她俨然法律专家的口吻，指出1955年被指控为“反革命”的胡风，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行。

她说：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中的百分之一！

她说：胡风致党中央的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反对文艺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现中央的“百花齐放”方针与他的意见可谓一致。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胡风案件原因很复杂，他骂人也够凶的，也很艺术，但依此定反革命罪很不充分，主要是那一时期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当时，斯大林的错误未被苏共揭发，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了……

她又说：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

林希翎最能赢得台下20岁左右年轻人一片掌声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不怕这样讲话。这些日子，我的朋友不断告诫我：“你这个小鬼，你再讲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里去找你，并为你送饭。”虽然这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你们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但是，看样子你们欢迎我，我也来了，我就不怕危险。如果真有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此后，她还来北大作过两次演讲。一时间，她在北大，人大，乃至全国范围，都成了新闻人物，大学生称她为“一枝带刺的玫瑰”。反右斗争开始后，林希翎即被《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她的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十分盛行”。

但在北大，林希翎的“风光”，几天后就被一个本校的学生给分享了，此人叫谭天荣。

在北大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历次运动中被视为“右派”头面人物的，都是理科的，文科好似长着个豆芽菜的身子，尚玩不动关云长的那把大刀。谭天荣便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他组织了“百花学社”，列名于《广场》编委会，它们均为当时北大学生中最有影响的民间社团和刊物。自然，日后均被判为非法。据说此人中等个，头发蓬乱，身上邋遢，鼻梁上架着副黑边眼镜，“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整日里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模样，好像刚刚从量子物理学的泰斗玻尔那里出来……

谭天荣到底讲了些什么，虽然当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所揭露，诸如他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还有“三好学生是白痴”……但这显然是经过剪裁加工后的只言片语，不足为据。

40多年后，谭天荣自己回忆道——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

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个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吾生晚矣，但对于新中国最早的这两位“学生领袖”不妨有一番瞎琢磨，谭天荣大概和林希翎不同：林希翎些许是凭着悟性与勇气跑上讲台的，他则是被一本本自己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还有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世界观，给台阶般送上讲台的；林希翎一网撒下去又捞起来的鱼不少，但风卷残云，囫圇吞枣，他只挑其中最大的，在逻辑的舌头精心地操作下，盘子里头是头，尾是尾，给人一副颇为完整的理论鱼骨；林希翎也能讲，不用稿子依然锋芒逼人，激情灼人，现场气氛热烈，可能在人们心底里积淀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谭天荣的每一次演讲，每一份大字报，都好似狡黠的店主在川味火锅里放进了罂粟壳，能让人们在一番淋漓痛快之后，还有几分绵长的理性回味……

在一份《广场》里，留下这样的记录：“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道，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直到5月25日，人们才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北大运动情况的报道。

27日，《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大学“民主墙”》的通讯，在结尾处，他写道：

就在这个激荡的时候，我看到了同学们是多么地有条不紊，遵守着次序。他们照样地用心听讲，在实验室中专心一意地工作，在运动场上打球。图书馆中仍然是座无虚席。年轻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唇枪舌剑，争辩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不尊重对方所出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权利。他们自己要讲话，但也让别人讲话。

我不禁想：我们党有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什么困难也是能克服的。

可以说，直至1957年6月8日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大抵像北京大学校园里一样，除了预料到党在中国天空上的星阵将会有令人欣喜、鼓舞的变化外，绝少会有人感到自己命运的轨迹，将因这神州充满了心声交响的初夏而顿然发生逆转；

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像刘光华一样，相信在毛泽东开的这家“整风”酒店里，门口挂的是羊头，香气扑鼻时端出来卖的，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羊肉。

15 吴晗悄然去了太湖

不是没有人怀疑终将端出来的是狗肉。

尽管这种人少，少得以致我们可以认为人在某些方面比不上老

鼠：据说，在房子起火或是船沉之前不久，老鼠会成群结队地搬往别处去……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有位党员，是入学前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调干生。鸣放开始后的第一天，他回原单位去玩，正碰上本处的老处长。后者当即似审视犯人一样地盯住他：

“听说你们北大贴了不少大字报，很热闹？”

毕竟干过几年公安，不像一般同学那样未经过世面，对校园里出现的大字报，他既不太兴奋，可也不发怵。党不是号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何况有些大字报上的观点在自己的心里也引起了共鸣……他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正要走开，老处长一把拉住他：

“你没看出点什么东西来吗？”

他感觉处长的目光麻花似地拧了拧。

他熟悉这目光，过去审讯犯人时，每当犯人避实就虚，处长就会投去这样的目光，它宛如一副冷峻的无形手铐，很快便让对方企图挣脱出某个要害处的灵魂，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原处。眼下，他经这一拧，拧出了一身冷汗，他那颗有几分躁动的心，在走向校园的路上就已变成了一块石头……

写出了《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几十部长篇小说、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张恨水，笔下虽沉溺于才子佳人的恩怨，痴男怨女的缠绵，人却也机警得像是在一条无形的战线上干了几十年的老公安。

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吴冷西点到他的名，请他发言，他站起来，马上说：

“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口气极为真诚、谦恭，脸上笑纹的辐射也恰到好处。给人的感觉是，倘若他不是真似一头正趴在禾草堆里反刍的老牛，对一切都感到满意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超级演员……

主持者又点到坐他前面的谢蔚明发言。谢蔚明清了清嗓子，正要讲什么，突然感到后面有人在扯自己的衣服，回过头一看，此公又是张恨水。谢蔚明的话，一下“出口转内销”了……

最机敏的要算吴晗。

历史上有这样一件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当即便酝酿复员之事，即迁回北平，恢复各校。此时国民党当局却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昆明的局势进一步严峻起来。从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以后，在民盟团体精神的熏陶下，和其妻袁震——一位中共大革命时期的党员的影响下，他一直是位以一位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除积极参加民盟云南支部的活动外，他撰文写作，以古讽今。每有集会，必登台演讲：

“……为什么有史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华民国，不仅是一次次重复着民族的悲剧，而在近百年来又一次次蒙受着民族的耻辱。几千年来民众只有一个愿望，安家立业，国泰民安，为什么这个起码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呢？几千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又为什么直到号称‘民国’的今天，仍是如此渺茫呢？……”

揭露黑暗，谴责独裁，召唤民主，呼号救国，是他这一期间一切言论的中心。因此他为广大的青年学生们所敬仰，也与闻一多先生一道，被国民党当局诋毁为“领取了卢布的吴晗诺夫、闻一多夫”。

这时，正蓬勃而起的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学生运动不能停止，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交接，已风闻被特务机关列上了黑名单的闻一多表示：只要昆明还有一个没有复员的学生，我就不走！同被列上黑名单的李公朴、吴晗以及其他著名民主教授，也有此相约。

后来的情况却是，袁震的肺结核病突然犯了。

因妻子长年患病，夫妇二人也长年隔墙分睡，但吴晗对袁震始终



因《海瑞罢官》而罹难的吴晗与夫人及女儿。

体贴入微，恩爱如初，即使在昆明最穷困的日子里，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去肉摊上买最便宜的肉骨头，去河边磨着性子钓鱼，乃至给妻子输血……对此在昆明知识界里传为美谈。

于是，吴晗顾不得自己的承诺，提前走了，送妻子由重庆转去上海治病。几乎他前脚走，后脚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以自己血染的承诺，在地平线上蠕动起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两年后，吴晗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又过一年，他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副主任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清华大学并被任命为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再锦上添花，做了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当年同在昆明的知识界朋友，私下谈起那段往事，总有人心存疑窦……

疑窦总归是疑窦，没有人说得清楚。

能说得清楚的是下面这件事，与吴晗同时代的学者，几乎无人不知他与胡适有很深的一段姻缘：

胡适曾做过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这期间吴晗正在这所学校念书，因家道中衰，父亲卧床不起，除偶尔得亲朋接济，主要靠写稿挣钱上学。临近毕业时，他写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很得胡适赏识，并推荐去《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吴晗即以此为盘缠来北平，按胡适的介绍投考了北京大学。尽管他能凭一条小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行李，从浙江义乌的家乡，一路风尘仆仆走进了上海，又走来了北平，但在数学考卷上却挑不走一个“0”。而当时北平三所一流大学——北大、清华、燕京，有个同样的规定：凡考生成绩有一门为零，即不录取。

他落榜后，胡适即拜托顾颉刚先生为他在燕京图书馆谋到一份工作，以暂栖身。在这里，吴晗又考了一次，他还是挑不去这个“0”。但他利用燕京丰富的文史资料，完成了一份《胡应麟年谱》，其中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先前的假定。此文一出，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这才使清华大学于次年破格录取了他，并直接进二年级。

清华此举，震动了北大、燕京，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此时已来北大

担任文学院长的胡适拟议修改原规定，燕京的顾颉刚等教授则找上门来，希望他仍回燕京，并在燕京就读……

吴晗本人却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多的是走进清华园的才学，少的是走进清华园的银子。胡适赶紧把锅下的火给熄了，又托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为他在校内谋得工读生的待遇，即让吴晗在清华图书馆每天整理两小时的清室大内档案，月薪为25元。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一人每月有四五元钱，就能过上中等平民的生活。于是，吴晗的学杂费用、生活费用，得以一并解决……

胡适不像当今人们司空见惯了的一些“伯乐”：仿佛戴上了3000度的近视眼镜，牵出来的不是千里马，而是偷油吃的小老鼠。与童谣里唱的那只老鼠不同的是，眼下的诸多“老鼠”偷油吃，上得去，也下得来。胡适给中国的史学界牵出来的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而且对吴晗犹如再生父母般的关怀，也不需零星半点“油”的回报。

吴晗却回报了，解放后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论”的靶场上，也有他射出的“子弹”。

吴晗无疑是被迫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吴晗颤颤抖抖的“枪口”，一定招来了一道道疾如猎犬的目光，始终有人认为解放后他未能在思想上很好地清理与胡适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在彭真信任他，彭真平时总亲切地称他为“教授”，只有在公开的严肃场合才称他做“吴副市长”或是“吴晗同志”。可彭真一个人撑不起中国的天，大概从彭真对鸣放、整风的态度上，他已察觉在天空上，那种好似常常笼罩在莎士比亚一出悲剧上的不祥符咒，正在悄悄地会聚。他不会不担心这天空一旦翻过来像口漆黑的锅



胡耀邦为其掀掉“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铁案的葛佩琦。

底，将更加牢牢地夹紧自己那段欲割难割的“尾巴”……

当整个5月，首都知识界在整风中激昂得淋漓大汗之时，吴晗悄然去了太湖度假。在鼋头渚上，他迎着蓬蓬吹来的湖风，通体生凉，恍若新浴……

作家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记录了又一位有识之士，这便是他的岳父张宗麟先生——

他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还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学院院长。

尚在丛维熙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日，这应该是在1957年的三四月间，即政治气候还在乍寒乍暖之时，他回到家里，兴奋得手舞足蹈地向妻子张沪转述了讲话内容。在16岁的花季便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眼下又在《北京日报》当记者的妻子，无可无不可地听完，却兜头给丈夫泼来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工作的人最爱感情冲动。”“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吗！”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妻子是理智型的人，丛维熙只当是她个人的判断，并未打算在意。但是，妻子又一脸郑重之色地补充了一句：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丛维熙“深感突然……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作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党员，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还是一张白纸，他一定想和妻子作一番探究。张沪显然在

“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根本原理”之上，还有一条“相信爸爸”：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

如果说警觉是一双双蝙蝠惊恐不安的翅膀，那么张宗麟的“蝙蝠”飞自历史阴暗的房檐下，而刘宾雁的“蝙蝠”，则扑腾在现实挂着一串串冰冷眼睛的林梢间。

与前者还有不同的是，后者的警觉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表达的，它将使我们感觉到20多年后，作家张洁给刘宾雁起的一个外号“笨人刘老大”，并非戏谑之言，眼下他这样做，是不是真有点“傻”、真有些东北的“二杆子”味呢——

5月间，刘宾雁在上海的那次采访。在写完了交给本报的通讯、寄给《人民日报》的《记者这一行》之后，他意犹未尽，又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

请尽速转交敬爱的毛主席：

自从“放”的方针开始执行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这新的方针以及变化，党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上海的一些工厂里发生了骚动，据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去北京向您请示，又听说您在6月1日将就这一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另一次报告，所以我想把在上海想到的一些意见向您作一报告。

我是党员，《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几年来跑过东北、西北、中南各省与上海，党内与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时常引起我的（如像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忧虑。我衷心拥护扩大民主生活与整风的方针，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说过：“为了取火，免不了就要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这种傻瓜在我们党内是有人存在的，至于连煮饭的火也畏惧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您一定知道党内那种保守势力必然要对这一方针加以抵抗，希望您无论如何不要轻信这种人的意见以及他

们所反映的情况……

请您注意：

一、……（略）

二、……（略）

三、……（略）

写了这许多您一定早已了解的情况，无非是由于一种忧虑：在上海以及哈尔滨与一些负责干部的接触中，深感某些人的感情与中央、群众感情的差别已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而这些人在掌权，他们是“势力”，他们有最大的发言权，中央听见这些人说话的机会更多一些。

这些人的话可以轻信么？当然不能。但是如何改造他们？怎样使这次整风也能对这些人有点影响？他们相互间是那么客气又那么互相依赖，党组织与群众的意见是非常非常难发生作用的。需要中央采取措施。

刘宾雁

5月25日

以后，我们将会遗憾地看到，不是所有的警觉，都阻挡住了他们向“右派”泥坑的急速滚落。

如果再往下看20年，我们还会惨痛地发现：对于一列挂着一个个运动、而且速度越来越疯狂的火车来说，警觉，即使是来自高度理性的警觉，不过像投射在铁轨上的树影一样没有意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几十年来，在风与雨的瓢泼、血与火的熬煎之中，其实，只有灵魂高贵者与灵魂卑微者之分，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侥幸者……

第四章 阴错阳差

16 其实都是左派（之一）

在以下两节，我们要探究的是：

大鸣大放期间，在日后被打成大“右派”的人们，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们究竟又是些怎么样的人。

自然，无论就篇幅，还是就已掌握的材料，我只能择其首要而记之。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父亲以打渔为业，章伯钧15岁时，父亲船翻淹死，母亲卖了地，此后他和两个弟弟由两个叔叔抚养。1920年他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回安徽后即当上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请恽代英、彭湃等革命青年任教，不久被解除职务。先去日本留学，1922年9月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船上结识了比他年长10岁、也去德

国留学的滇军著名将领朱德。在柏林的下榻处，他又见到了热情的主人周恩来。在德期间，他担任了朱德的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章伯钧后来追随过国民党左派邓寅达，然而，他再一次同共产党遥相呼应，是从“旧政协时代”开始的。抗战胜利后，三党（章伯钧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罗隆基、张君勱的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左舜生、李璜的中国青年党）与三会（沈钧儒的救国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会），决定联合起来铸造一把大刀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年后决定打破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并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17个发起人之一。在重庆特园召开的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上，章伯钧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这年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热烈赞颂了在蒋介石身后崛起的这支盟军，内称：

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也许此时感激涕零的李健生还不明白，丈夫的生命在共产党的眼里如此金贵，并不仅仅是为着与蒋介石那两只小小的“鼯鼠”周旋；还因为在两只大大的“鼯鼠”——分别掌握云南、四川两省军政大权、又同是民盟秘密盟员的龙云、刘文辉与共产党之间，他和罗隆基正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每当刘文辉从驻地西康来重庆时，周恩来便在章伯钧、罗隆基的陪同下，与其进行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實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5年7月，章伯钧与黄炎培等人一起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恢复国共和谈问题，主张民主建国，反对内战。民盟更被蒋介石视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宣告解散。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由上海秘密撤到香港，同在香港的其他领导人会合，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组民盟总部，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罗隆基，江西安福县人。

这个位于该省西部的小县，虽不见经传，却给当代推出四位名人，除罗隆基外，还有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王造时、彭文应，和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后者自然得一笔勾去，故世人称“安福三杰”。

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天资聪慧，又受家教熏陶，1913年夏，北平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他以全省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进校后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

1921年夏，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同年秋前往美国，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导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教授。此后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

同学中，便有日后当上了美国总统并遭暗杀的肯尼迪，还有大名鼎鼎、对中国问题甩出一本本砖厚般著作的费正清。留美期间，他还一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季刊《中国学生》的编辑。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兼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出于与胡适、梁实秋的友谊，还担任了《新月》杂志的主编，他对文学性质的该刊进行了改革，倡导发表抨击朝政的时评、政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长袖善舞。被骂得灰头土脸的蒋介石，让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解聘了他，又派特务突然闯进中国公学带走他。在遭监禁6小时后，胡适、宋子文闻讯赶来，将其保释。

本来主张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他，此后却在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踢牢了蒋介石这只“球”，他踢球的风格潇潇洒洒：



1946年8月25日，民盟多次调解愈演愈烈的东北内战无效后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坚持政协决议的立场，反对内战。上图（左起）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在记者招待会上。

他来到天津，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主笔，以后还兼了北平《晨报》社社长，两辆小汽车轮番穿梭于京、津两城。犹如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情一样，他每月几处加起来千余元的大洋收入也银光哗哗地流淌。他有自备的轿车外，还有洋房，厨房里餐具都

有两套，中餐、西餐各一套。就在这铺着纯毛地毯的洋房里，美食伴着美思，他一天写一篇社论，从第一篇《一国三公的僵政局》起，没有一篇不让蒋介石的臀部不觉得火辣辣的，以至于《益世报》从一份教会小报，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他的球还踢得惊心动魄，蒋介石几乎连上洗手间的工夫也在想，

怎样给熟稔西方民主政治的他，上一堂中国流氓政治的课……

1933年秋的一天，罗隆基正要离家去南开上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他即起疑虑，到点上课，天经地义，学生怎会想起问这样的问题呢？在这之前，崇仰他学识和人品的本地帮会头目已悄然转告他，蒋介石派来4个特务要除掉他，请他出外暂避。

他还是按时去上课了，不过换乘了报馆的汽车，又绕道小路去学校。当车终于平安无事快到校门口，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卡车，上面站着4个穿制服的壮汉，且都拔出手枪，一副迎头要放的模样。他赶紧在座位前卧下，说时迟，那时快，两车一接近，十余发子弹就射了过来，司机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头伸出窗外喊了一句：“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赶快说：“快走，别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

司机回头一看，车背后满是枪孔，脸赫然变色了：“哪有这样闹着玩的？！”……

上完课，下午他雇了一辆有篷人力车回家。晚间津门的街头巷尾就在风传，罗隆基身中十余枪，已魂归道山矣。次日晨，京沪友人的唁电便在他夫人的手里泻成了一条瀑布，望着这哀思袅袅、悲愤滚滚的瀑布，一时间他一定反应不过来：到底是蒋介石给了他一个“黑色幽默”，还是他给不苟言笑的委员长开了一个玩笑？

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被推定起草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组织章程，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在和龙云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又和共产党派驻昆明的代表频繁往来，最终使昆明与延安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

1944年春，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策划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颗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

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

“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

“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来人是同乡兼同学，此时正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任上的彭学沛。彭学沛一笑置之后，丢下一句一定让罗隆基十几年后感慨万端的话：

“努生兄，虽然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我同乡同窗，我却知道你并非‘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不会看你是的。现在他们只是利用你，而决不会信任你……”

当时，罗隆基显然也是一笑置之的：难道你国民党不是想利用我，而是会信任我？

他更是“罗隆斯基”了，在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党派里，民盟的代表比国民党多，更比共产党多，每一票无不举足轻重，可仍同共产党定下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小组里，他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好似哼哈二将，轮番上阵，将号称“中国宪法学专家”、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涂在国民党身上的“民主”金漆，给一片片地刮了下来，由其在一阵阵阴冷的土霉味里，露出了中世纪封建古堡白森森的躯壳……

作为民盟总部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在和记者们的广泛接触中，罗隆基也和中共代表王炳南配合默契，心有灵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叫国民党方面处于尴尬、狼狈之中。他成了当时让新闻界十分注意的“脱口秀”人物。

“罗隆斯基”浑如顿河流域的自由哥萨克，走到哪里，都骑在自己意志的烈马上，高举锋光闪闪的爱憎，让人们的眼前无不掠过一片红色的旋风——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

“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杀死他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

会场顿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

罗隆基走下讲台，也在台下听着的共产党人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

“‘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曾征询他的意见：民盟能否先参加政府，新政府调停内战后，再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他告诉将军：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内战不停止，共产党决不会参加政府。这一点是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不是我，也不是民盟任何一个领导人能可以改变的！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勱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当“和谈”破裂、国共两党决意兵戎相见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共驻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的办事机构必须在1947年3月5日前撤离。次日，各报便登出了一则《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内称：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上开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

随即，民盟总部迁入南京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和35号办公，罗隆基本人及周新民、李文宜先生还搬进这里居住。在上海，民盟同时进驻马思南路原周公馆，作为民盟总部的上海办事处。

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常务委员兼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年后，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章伯钧一起实际上成为民盟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载于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章乃器，浙江青田县人，著名的“青田石雕”即产于此。

祖父系清同治9年举人，浙东名士。父亲民国初年任该县议会副会长等职，后赋闲家居，家道也渐中落，差堪温饱而已。江浙两省，清兵入关屠杀最惨，志士仁人屡举义旗，爱国与民主的思想薪传不绝。章乃器自小耳濡目染，辛亥革命爆发时只有15岁的他，便投笔从戎，在南京陆军部下属的飞行营当了一年兵。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后，飞行营解散，他“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国家前途吉凶未卜，个人前途亦四顾茫然。历史似乎觉得中国的将军多如牛毛，逼迫他走了另外一条路：无奈之中回杭州继续求学，可除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外，所有学校都招考完毕。他又无奈地进了该校，第二年，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后，他先后在杭州、北平、上海的金融界服务，虽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自学，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等方面有了相当的研究，以至于严重地损伤了他的健康，他不得不修炼起内功拳法，但面对“去了旧军阀，便有了新军阀，去了旧官僚，便有了新官僚”的黑暗现实，每天被10个阿拉伯数字充斥，在十三档算盘里滑落的生活，实在填满不了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他先是创办了《新评论》杂志，编辑、发行、校对，乃至绝大部分稿件的写作，均由他一人承揽。可在出版了29期之后，被国民党当局以“袒共”罪名，予以查封。

抗战时期，他不断发表文章，是国内率先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主张的人士之一。他还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底，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秘密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他和沈钧儒、李公朴等14人被推举为该会的常务委员。7月10日，他和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作为该会的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

7月15日，他又和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冯雪峰策划、潘汉年参与讨论的文件，强烈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颇有些像中共“八一宣言”的复印件，但却使毛泽东发自黄土高坡的微弱声音，在中国的中心地带被极大地放大了，从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意味着经长征到陕北不久、立足远未稳的共产党人，在险遭吞没的中国政治之河里，有了第一条诺亚方舟……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多月里他两次致函章乃器等四先生，内称：“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毛泽东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一道，“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

吴铁城，这位好容易爬到上海市长的党国大员，却几乎夜夜梦见自己的仕途，将要踏空在章乃器“发光的秃顶”上。在他眼里淹没了上海的救亡热潮泄自于救国会，而救国会的“计谋”，又大抵出自于实际负责会务工作的章乃器那“发光的秃顶”里，他向前者任职的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提出警告，要对方罢免章乃器，否则对银行不利。

同情他的李铭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主意，由银行出钱送他去英国留学三年五载。章乃器却不能让银行受累，更不愿离开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仅在一两个小时之内，他便自行砸碎了耗费20年才捧到手里的金饭碗——该银行副经理的座位，上海滩为之轰动了，在有人惋

惜、有人嘲讽的同时，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在一封200余人的联名来信上，这样写道：

“在两条相反的道路中，你终究毫无疑义的走上了这一条——艰苦地为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奋斗，我们被你这种英勇的反抗感动得掉下泪来……”

救国会的活动更引起日本驻沪总领事的极度仇视，数次要求上海市政府“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在以出动海军陆战队相威胁的压力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并彪炳青史的“七君子”事件。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上下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释放后，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主持该省战时财政。途经武汉时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

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与支持由来已久：多少次他将苏区秘密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送来的外币，通过自己的银行换成钞票，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也是中共党员、后壮烈牺牲的他三弟，通过他将一些处境异常危险的同志，安排进他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奉命来上海，也是先找到他，又通过他与其三弟联系上，由其三弟安排秘密住所隐蔽，后经上海特科安排，转道前往苏联……

这次，他又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尽力协助新四军的嘱托，针对有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实行物质封锁，他告之今后由省财政厅代办。他还在省财政厅系统里吸收了大批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大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建国后，其中不少人担任了财经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该会总会于1946年4月迁往上海后，积极投入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民

建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他和孙起孟等人受命筹建港九分会。为工厂业务，他绕道台湾，在此他办有上川企业公司，并投资拍摄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部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香港后，他又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的营建和交易，这一企业经营得十分成功。

此时，国民党军事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的财政和经济也陷于崩溃，曾是他小学同窗与好友的陈诚想起了他，一度向蒋介石建议，延请他为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多少年间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蒋介石，不禁扼腕唏嘘道：

“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用我所用！”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1948年12月，当他接到毛泽东邀他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他很快把个人正蒸蒸日上的事业，宛如一个打火机一样，扔进了多年好友、后来成为香港超级富豪之一的王宽诚先生的口袋里，自己便满怀憧憬地北上了。他日后回忆说：

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便毅然舍去……（《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新中国成立后，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国家第一任粮食部部长。此外，他还担任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章乃器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见于5月13日他给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送去的书面发言，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以后他又按《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并将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界改造辅导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送交《大公报》，后两文均在6月发表——

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

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主要的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最严重的情况，也只能用“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两句话来形容。这都绝不是什么先天的、本质的，而是后天的、习染的。“阶级的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不会盖进骨子里……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但绝不应过分强调困难到了本质的改造，从而必须在改造近八年仍然需要“脱胎换骨”的地步。这样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正是阻碍了人们的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改造。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话起来……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

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因……

王造时，父亲先是放排工人，以后做起了竹木生意，家境小康。在三兄弟里，他排行老三，老二、老三走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恍若一对笑星。除了1957年之后，似乎他一脸眯眯的微笑，一身甸甸的肥肉，就从没有掉过。

他三十几岁时，邹韬奋先生这样写过：“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6页）

王造时比罗隆基晚两年离开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家乡，而考进北平同一所官费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同是清华学生运动领导机构——学生代表团成员。他带队在东安市场发表演讲，被逮捕关押了5天。又因参与在福华门门口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关押一天。他的这段经历开始显示了这一性格：酒精有水的模样，但酒精决不是水。或者说，古钱是圆的，却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圆。

1925年9月，王造时考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4年后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宛如章鱼浑身吸附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王造时，在美国依然要的是家乡那个与自己定了“摇篮亲”的女子，他节衣缩食，将她接来美国，简朴的新婚仪式上，她从人到旗袍、首饰，一切均是中国“原装”的，惟一不是“原装”的，是随她三寸金莲塞进皮鞋的美国棉花……婚后，他来到英国，又与罗隆基一样，在伦敦大学师从拉斯基教授，研究国际政治。

1930年秋，王造时伉俪回到祖国。其时27岁的他，已被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聘为教授，后者还请他担任了文学院长兼政治系主任。

大器早成且夫唱妇随，本就是一幅人生难得的风景，但似乎流经他家乡的泸河，是一条反叛之河，喝了这河水长大的罗隆基是这样，

后面将写到的彭文应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从自己的风景画里钻出来，披坚执锐，呼啸向前，从几乎导致《新月》关门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其后接踵而至的《救亡两大政策》、《对于训政与党政的意见》、《我为什么主张宪政》，到他创办一个便被查封一个的刊物《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无不以笔去横扫社会这一幅被国民党作践得不堪入目的画布——

“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像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拥护中国的存在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则应之为牛；呼我为马，则应之为马。’”……

读了以上的文字，我们便能说：如果此时的上海滩上，鲁迅的杂文是毛泽东所说的“匕首”与“投枪”，那么王造时的这些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政论，便几近飞毛腿导弹了，很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到了他而立之年当上了“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每每出庭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令法官瞠目结舌，让听众伏天饮冰，以至于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他的风采为荣。

当一个明星总要付出什么代价，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最具政



抗战时期的王造时。

治性却又最忌讳政治明星的国度，他的一个个教职被拒聘，改行作律师，事务所又门可罗雀。如同他的胃在粗茶淡饭里蠕动，他的脑袋也在鬼火般幽蓝的准星间摇动：不断有包着子弹、小炸弹的恐吓信寄来。他的名字列在一张“格杀勿论”的56人的黑名单上，名单上被刺杀的第一人便是民权保障同盟会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建国初期，上海市公安部门曾逮捕一个姓徐的反革命分子，此人在1934年与另两名特务，潜伏在王家住的极司非尔路（今愚园路）中振坊附近，他们领受的旨命便是伺机除去王造时……

这颗政治明星何以渐渐黯淡了呢？



抗战时期的史良。

一个主要原因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除互相保持中立外，还彼此确认两国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的权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也最残酷的年代，斯大林却从侧面给中国的腮帮子上狠狠地来了一拳。一些共产党人吞下了这颗被击碎的牙齿，犹如尽管眼波幽怨却痴心不改的弃妇，仍编织斯大林的“英明”：苏联是击退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浊流的主力，为了扳倒希特勒这只穷凶极恶的龙头，眼下苏联不能腹背受敌。

作为全国救国会的领袖人物，却吞不下这颗牙齿，他们要吐出来，以一泄中国人民的义愤。

救国会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经张申府审查后，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分别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党中央宣部部长王世杰。在此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九人。

王造时始终不清楚这封信竟成了一片薄薄的核辐射物质，十几年间一直在向他的命运作默默地投射。“七君子”里，除邹韬奋1944年死于癌症，李公朴两年后壮烈牺牲于昆明，新中国成立后，其他四人陆续由上海调往北京：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

论学识、胆识和影响均不在四人之下的他，却被投闲置散，虽挂了两个虚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失业在家，穷困却不潦倒。在他的遗稿里，关于这一时期有这样两句话，“我从来没有向人讨过什么事情。我对党也不肯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有苦宁愿自作自受，特别是自以为是被冷漠，更不愿表示靠拢……”

岂料韬奋先生的一句话，真成了他日后的谶语：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7页）

直到1951年下半年，他才有了生活的饭碗，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邀请他来复旦任教。直到1957年年初，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的一次谈话里，他才得知在统战部的保险箱里，历史被做了整容手术：那封信不仅仅是他执笔，还是他根据国民党的意旨、并领了国民党的钱，事先写好后，再逼迫救国会的领袖们签名的。

当时他的情绪异常激动：好在自己没有死，倘若死了的话，这经过整容的历史就得放进他的棺材里，岂不毁了一世清白？刘述周劝他趁即将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同各方面谈谈，讲讲清楚就好了。

3月21日晚，他和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人到沈钧儒家中聚餐，席间，他提出了此事，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众人像是有些难堪，仿佛由于某种难以言说的阴影的存在，如同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何等洒脱，已渐成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彼此在铁窗烈火里所凝成的手足般的情谊，也一点点地变了味……当他们的风驰电掣地经过大街时，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或是一次，想起要过问一下路面上王造时这张被扔弃的冰棍纸？

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沈钧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但当初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由我们大家一起负责任，不该由你单独承担责任。在座的也纷纷劝王造时想开



陈仁炳遗照。

点，反正这事已过去了多少年，现在也终于说清楚了……

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

6天后的晚上，周恩来设便宴款待了王造时。总理耐心地倾听了他的不白之冤后，当即表示要根据他的才能以及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并问他是否愿意进京工作，他表示愿意慎重考虑。总理还流露出解放后救国会的解散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中央有再恢复起它的意图……

他感觉周恩来深谋远虑，不但要恢复自己的历史原样，还要借此恢复救国会冲锋陷阵的那个全民火热抗战年代的原样。如果说在沈钧儒家宴里出来，他还心存芥蒂的话，此时，他“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此后，他便恍若一只被除去锈斑、又被注上润滑油的铣刀，欢快地旋转在整风的机床上……

其实，鉴于他解放后的处境，深居简出的他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尽管这“铣刀”充盈着新生般的激情，可能够在党的身上“铣”下来的意见也寥若晨星。他只在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点自己对搞好教育事业的想法，在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程序的建议。似乎反右斗争一来，被当成绞索将他吊上政治绞刑架的，还是这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

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这篇发言，并配发了他发言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的笑容灿烂得好似9月怒放的雏菊，这是他走出“保险箱”后的第一次灿烂，又是他走上“绞刑架”前的最后一次灿烂。

发言中，他如是说道：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

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陈仁炳，湖北武昌人。

出身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其父陈崇贵，是一位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相当影响的牧师，常年在世界各地传道布教。他又是一位爱国的牧师，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不但自己由法国回到祖国，而且将陈仁炳在法国上学的小弟、在美国念书的二弟、三弟，一并带回国内。周恩来对他颇为礼遇，将其由上海调来北京，安排宽敞、体面的住所，在会见西方友好人士时，多次邀请他夫妇作陪，并担任翻译。

1932年，陈仁炳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同年赴美国自费留学。四年里，先后获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和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他与共产党员刘基平等人组织了抗日教育研究会，这个主要以他的家为活动据点的民间抗日团体，熏陶了不少热血青年去投奔大别山里的新四军。

武汉沦陷后，他领着28位、内有原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夏之秋、著名电影演员项堃等人的爱国学生，在流亡新加坡途中组成了“武汉合唱团”，在短时间里突击练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焦土抗战》、《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并排练了曹禺名著《雷雨》和另一出自编的话剧《逃亡到星洲》。该团在新加坡连演三个多月、场场爆满之后，又到马来西亚五六个城市巡回义演。

每到一地，无不观众如潮如涌，每场演出之前，陈仁炳都要发表亡国之恨、救国之情犹如这岛国椰风一样火辣辣的演讲。演出完后，广大侨胞慷慨解囊，支援国内抗战。除捐献现金的，还有不少女侨胞，当场纷纷摘下自己身上心爱的首饰钻戒，其气氛之热烈，场面之动人，常常不由得使陈仁炳和夏之秋热泪盈眶，双双在台前跪下，以代

表国内抗敌将士和受难同胞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仅在马来西亚，合唱团便通过侨会向国内汇去了捐款、票款，共计国币2000多万元，这一数目相当于当年马来西亚所有侨胞平均每月捐输的四倍多，和当年世界五大洲华侨平均每月捐输的一倍多。

1940年秋，陈仁炳回到祖国。曾任重庆广播电台总编辑，又任财政部秘书等职，在重庆他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所震惊，由此拒绝参加国民党，回到教育界。先后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并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加入了民盟。以后又参加了进步教授们组成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担任了“大教联”干事；同时，还协助创办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展望》杂志，并担任该杂志社副社长。

青年是他心中的太阳，犹如风餐露宿的流亡途中，他和合唱团的同学们一起含辛茹苦，一块引吭高歌；这时在他所在的学校，凡有学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便总能在青年们敬仰的目光里看到他清癯、不息的身影，从青年们火热的胸膛上听到他撞击的金石之声：

“目前大势所趋，政治上也有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就是流向民主，流向自由，流向人民的意志所向。我们广大青年，广大人民，要求吃饭、要求和平、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48年5月，上海高校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的集会，规模大得约有15000人参加。国民党当局自然格外青睐，几乎在掠过校园内外的空气里也布满了猎犬似的眼睛。原本答应上台讲话的几个教授，突然陨石般消失了，他没有消失，却在那里消失自己身上通讯录等一切能牵扯上别人的东西。待“消失”完毕后，在全场山呼海啸似的掌声中，他走上了主席台，即席发表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演讲。

他被安排从后门离开会场，此后他便与大门无缘了，总在东躲西藏，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家里吃上一顿饱饭，睡上一个好觉。就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他还担任了上海民盟支部宣传委员、解放工作委员会成员，直至次年4月，他被军统特务机关列上暗害名单，他才转移去南京，并协助当地民盟组织，为迎接解放南京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仁炳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市政协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还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陈仁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1957年6月9日的《解放日报》在冠以显著标题《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有不同意见》和用黑体字排出、并经过精心处理的内容提要下，刊载了他的发言——

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和放的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上面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不是还有的人在那里压制批评、遮盖错误？希望领导上普遍地去检查一下。我听到很多同志对于搞好这次整风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感到兴奋，可是在听到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反映……我就感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治安策》。拿今天的话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哪儿桩是令人痛苦的，哪儿桩是令人流涕的，哪儿桩是令人长叹息的，又有哪儿桩是叫人感觉很很不合理的。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质上应该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在听大会发言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在把我听见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那里排队，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叹息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古时候，有个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风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地、公道地教育和处理。这对于打消群众的顾虑，比发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

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进来已经好几年了，可对于无论哪一层业务都不太去钻研。一句

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过来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这对日益解决很多单位中的党群关系问题，肯定也有好处……

彭文应，又是一个江西“老表”。

彭文应比罗隆基晚一年报考专门培养留美人才的清华学校，这一年清华在全国共招150人，而在江西报考人数便近两千。出身于书香门第、时年13岁的彭文应，以江西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录取。

恍若三个人是一个命运的模式里倒出来的，1925年，彭文应与之前的罗隆基、之后的王造时一样，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学成归国，他也来到上海，被聘为上海法学院和光华大学教授。

倘若有一天有人写起这三个老表的关系来，那便是现代的“桃园三结义”，或是中国版的“三剑客”了。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上，这三人发动了一次次的言论“暴乱”，似乎在“气焰嚣张”和“居心叵测”上，没有谁比谁更逊色。

在1933年4月15日出版的《自由言论》一卷六期上，有彭文应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内称：

剿匪，剿匪，剿匪。几年来倾政府的全力，集全国的精锐，调兵数十万，转战数百里。兵力总不可算不厚。飞机，大炮，兵舰，凡是杀人的利器无不用；直捣，横攻，包围，封锁，凡是作战的方法无不行。器械和方法总不可算不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军长临阵，总座亲征。计划不可算不周，决心不可算不坚。一次，二次，三次，一年，二年，三年。时间不可算不长，机会不可算不多……

当然，政府号召的是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作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

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这真是一席不折不扣的“通匪”文字，这真是一件远比“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更能让世人同情、理解红色苏区、并贴在太平洋西岸的长篇标语！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这类文字看多了，不但是我，大概谁都会不禁萌生一个深深的疑惑：

到底是比起日后月晕而知风、础润而悉雨的毛泽东来，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从而表现得“一手硬，一手软”，

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性、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

彭文应不但在文字上“通匪”，在行动上也“通匪”。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的潘大逵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的文章，里面提到这样一件事：

彭文应由美回国不久的一天，去看一个朋友。突然朋友家进来一位相貌堂堂却不苟言笑的不速之客，与朋友在过道里私语几句后，朋友匆忙进了卧室，一二分钟过去，复疾步回客厅——

“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

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的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如果说这是彭文应凭着朋友间的义气被迫“通匪”，那么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他主动“通匪”的兴趣也很浓。据曾任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梅燕棣回忆：

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以上引言均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

准确地说，彭文应自己便是“匪域”之人。在感觉人的色彩上，与日后或是平反不断、昭雪不断，或是在某人仓皇出逃之后上下一片震惊的共产党比起来，当年的国民党倒敏锐得接近于毕加索。1949年5月初，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这样一条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此时前者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后者是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倘若像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这样，此刻仍其言不善者，必是这个政权眼里下一辈子也不会放过

的死敌。汤司令要埋葬彭文应于黎明前黑暗的决心，与彭先生自己要拥抱新世界朝霞的决心，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呢？

当特务们赶到彭文应藏身的申江医院时，一摸他睡过的床，那被子里还有温热……

新中国成立后，彭文应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他还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此外，离开家乡20多年仍未改一口浓浓乡音的他，饶有兴趣地做了上海江西中学的校长。

彭文应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8日上海市政协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及18日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材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80斤的人，不要他挑50斤，也不要他挑100斤。国家如此要求，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17 其实都是左派（之二）

除了上节必须介绍的6位代表人物以外，在本节里，我还得不惜篇幅地推出五个人，他们是：储安平、浦熙修、葛佩琦、孙大雨、吴祖光。

前两位因为在鸣放期间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后来被毛泽东视为“章罗联盟”里两员惟恐天下不乱的干将。

葛佩琦，解放后本该是属于有车阶层的大人物，由于某种偶然或者是必然的原因，他成了小人物。犹如疲软的个股股票，经庄家们暗箱操作，不久后扶摇直上，风头劲健，他经政治炒家们一再捣腾出的一句话：“要杀尽共产党人”，顿然举国皆惊，风云变色，自然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位置。

孙大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链里是十分独特的一个，为避遗珠之憾，似有记述下来的必要。而吴祖光，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来自文艺界，则是另一类文化人的代表……

储安平建国前的经历，前面已有所涉猎。

这里需强调的是，这位英国留学生，一定多次去过海德公园，宛如他身上的那股绅士味回国后总未能去掉，一个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的原则，也深深地融会进他的血脉里。在办《观察》时是这样，在派出一批批“战斗机”终于组织起《光明日报》上蔚为壮观的鸣放“火网”时，他也没有忽视另一种“火炮”的声音，诸如马寅初的“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当”一类重要的反驳言论，他同样照登不误。

他不会限制别人，更不会限制自己，尤其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劝大家给自己这个“老和尚”提意见之后，他似乎都未起过这样的念头：面对自己就要送出去的一块颇为烫手的洋山芋，是不是要等它稍稍冷却，再加上个漂亮的包装……

储安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6月1日由中央统战部召

开、已近于尾声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后来被粗暴地以“党天下”三个字概括的发言，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文汇报》上，均予以全文刊载——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情情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恶化。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位置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

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起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章诒和先生评论道：

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他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当时她的父亲章伯钧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对她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是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浦熙修，籍贯江苏省嘉定县（今划归上海市）。父亲浦友梧，南京商业专科学堂毕业，只身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当会计科里的一名小职员。1917年因生计所迫，举家迁往北平。

其实，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大海里，犹如巨大海藻一样饱吸了那喧嚣不定的海水、最能体现这政治的特色也最具某种悲壮性的家庭。

但浦友梧当年不会有这样的眼力，他乐呵呵地查了四回《康熙字典

典》，洁修的“洁”，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熙修的“熙”，光明与和乐。安修的“安”，温润平和。再一个，便是通修了。

除浦熙修本人外，她妹妹安修，上高中时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一进大学就加入了共产党。卢沟桥头残阳如血，即经山西去延安，一别八年姐妹再重逢于重庆时，身边已带来一位脸膛黧黑、好似烙满各次英勇战役烽烟的丈夫。解放后先在轻工业部工作，又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受彭德怀冤案牵连，“文革”中关进监狱，屡遭批斗，饱经磨难。

三姐妹里惟一默默演绎着在中国“平安便是幸福”这条真理的，是离政治有相当距离的姐姐洁修，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与未婚夫同去德国深造五年，解放后丈夫在工业皮革研究所工作，她曾被推选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20世纪80年代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浦熙修也是一块读书的料子，小学、初中成绩门门优秀，数学在班上更是独占鳌头。因家里经济拮据，读完高一，便体谅父母的苦衷，自力于社会，先是在小学当了几年代课教师，继而靠自己积攒下来的学费，考入女师大中文系。

也许悲剧的种子，此刻就开始埋下了，她若不弃理从文，日后何至于会当记者并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旋涡之中，又何至于拜倒在从泸水之畔走来的那个江西老表横溢的才华之下？不学文，她便会似姐姐一样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起码也能做个循规蹈矩、风平浪静的贤妻良母。不仅仅是在那个年代，文科真不啻是一个既给人思想又给人痛苦、既带来憧憬又带来灾难的魔鬼……

在女师大，20世纪三四十年代饶有名气的女作家陆晶清，与她同系不同班。她却还是给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浦熙修“不属于‘闺秀派’，也不是‘活动家’，她的同班同学有的称她为‘名士’，因她



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代表浦熙修(摄于1949年9月)。



1946年，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在延安枣园的合影。

不讲究穿着，不好打扮。她没有脾气，脸上的一对酒窝特别显得善良与温柔”。

在女师大，经同学介绍，她结识了时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经理的袁子英先生，不久两人成婚。女师大毕业后，应聘为一所中学的教员，她生下一双儿女。1936年，因这时父亲和丈夫

均在南京工作，她也到了南京，一时找不到工作。以丈夫的收入完全可以像个蚌壳一样将这四口之家给温暖地包裹起来，她视壳里的珍珠为一个古老的梦，可社会视已婚、且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想做个职业妇女，也是一个非现实的梦。

最终，是《新民报》帮她圆了这个梦，但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后紧接淞沪抗战，南京危在旦夕，该报迁去重庆，她却丫丫儿女绕膝，无法同行，直到两年后婆婆到了身边，她才重返《新民报》工作。

浦熙修在重庆的七年多时间，是她记者生涯里一段最辉煌的日子。

她常年穿一身绿色的中式旗袍，天气转凉时，外加一件深色的外套，手臂上总是夹一个黑色的小皮包。娟秀而又庄重，一看就是位职业女性。她却有一双人力车夫般矫健的腿，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于山城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大路小径，捕捉着新闻，记录下历史。

她擅长写政治新闻和头条新闻，她与《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大公报》高集等五人，以抗议信的形式，率先报道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她还组织报道了次年5月发生在南京的“五·二〇”血案，让蒋介石插满和平花束的彩车下，滚动着的竟是履带碾过血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导致了《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她先后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和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周恩

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张澜、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王云五、傅斯年、郭沫若、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邵力子、张群等沉重地压在中国现代史双肩上的大人物。几乎所有的人物访问记里，都离不开这一内容，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唤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而这些政治主张，无不为当时的延安所极力倡导。

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她无不翔实传神，在春秋笔法之中，力透纸背地传达出自己的爱憎。在当时，《新民报》风行于大江南北，其它的头条新闻为广大读者所盛赞，而它们大部分均出自于她的手笔。鉴于她名闻遐迩，她很快便担任了该报的采访部主任。《新民报》停刊后，经钦本立介绍，正在香港创办《文汇报》的徐铸成立即聘她为特约记者。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署名“青函”的南京通讯《改革币制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是一场搜刮民脂民膏的骗局。直至同年11月16日，她被逮捕并被投入大牢的那天深夜，当特务们破门而入之时，她仍握笔在稿纸上书写眼前这个已见尽头的如磐长夜的挽歌——《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

这一时期，《新民报》被共产党视为《新华日报》的友报。大凡后者不宜发表又想发表的稿子，常常由石西民交浦熙修，转到《新民报》上刊出。一个例子是，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主任李少石，在市郊公路上遭国民党士兵枪击殒命，是蓄谋还是误杀，一时难以确认。当时，国共和谈正进行之中，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丁当碰杯声尚未弥散。此事在《新华日报》上公开，似太过仓促，不予披露，又恐事态恶化，日后进退失据。于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浦熙修在《新民报》上发表了这个新闻。

也是在这一时期，浦熙修和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在姐妹中排列老二，安修叫她“二姐”，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也尊称她为“浦二姐”，她也视自己是共产党人的当然亲戚。皖南事变后，为防止反共浊浪进一步蔓延，党组织决定要秘密疏散一部分力量离开重庆，从为他们介绍掩护关系，到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无不争先恐后，殚精竭虑。

以后到了南京，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前夕，代表团与《新华日报》办事处的联系，立即处于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此



邓颖超和浦熙修。

时恰好有一包重要文件需要从办事处取出，代表团的梅益为之忧心如焚。

她闻讯后，马上驱车前往办事处所在的中山北路，到了前门一看，已有特务布哨，又转去不为人所知的后门，她装作找人问路的模样进了办事处，取到文件后刚刚上车，突然一阵凄厉的警笛声，伴随一片“咚咚”的脚步声，向她压了过来。她吩咐司机向美国大使馆的方向疾驶而去，仿佛中国的“人权”是一窝洋鸡蛋，只有置于洋人的眼皮底下，才能孵化出一点点毛茸茸的内容，特务们果真怕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抓人而引起围观，从而让她得以逃脱……

梅益日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去做。

浦熙修还不仅仅满足做一个“亲戚”。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石西民，在逝世前4个月，和谢蔚明先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告诉后者，浦熙修在重庆一度很苦闷，曾经向他表示要离开重庆到延安去。他劝她以党外人士身份留在重庆工作，起的作用更大。

由此能透露出她的政治志向外，联系到1945年中共重庆办事处组织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新民报》分到一个名额，本是她去的，因丈夫担心她一去泥牛入海，出面多方阻止，才改派赵超构去，我们便

可以感觉到她在重庆时的苦闷,其实是源自于政治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两个层次。

她与前夫袁子英结婚后生下一双儿女,冬林和士杰。但是,两人志趣不同,据姐弟二人回忆,当年家里客人很多,父母各有一圈朋友,坐不到一块。(朱嘉树《浦二姐琐忆》,见《忆浦熙修》一书)

1947年,她与袁子英终因志趣各异在南京宣告分手,也证明了这点。还可以提及的是,与浦熙修“志趣各异”的袁子英先生,人生结局却与她大同小异——“文革”动乱中,遭非法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9年11月死亡。10年后,上海市公安局作出“被迫害致死”的结论。

大抵浦熙修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在重庆加入了民盟,并在为民主和平而斗争的风风雨雨中,结识了罗隆基,并为他的胆识与学识所倾倒,从此两人有了长达10年的亲密友谊……

不但在新中国的诞生上,还在这个新国家的成长上,浦熙修也倾注了满腔的忠诚与心血。抗美援朝初期,她支持一双儿女参军,曾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解放前我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3年中,她本人三次去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采访,此时,她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是同行的记者中年纪最大的,又是极少数的女性之一。雪地冰天之中,她整天笔记本不离手,不停地问,不停地记,本子里记下的许多英雄故事,陆续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访朝归来,风尘未卸,又去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宣传抗美援朝,记录各地多姿绚烂的风土人情,讴歌各族人民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新生活。这是在继重庆七年多的记者生涯之后,她的又一段声名如日中天的日子。在重庆时期任《大公报》记者、两人相知很深、经常联手采访的子冈,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常常萌发出一个预感:熙修将要入党!

漫步在共和国第一个金秋的星空下，浦熙修曾含有几分兴奋、几分羞涩似地告诉子冈：她想用5年的积极努力，加入共产党，而且，彭总也是这样鼓励她的。早在重庆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子冈想，她说的五年虽未到期，但付出的努力必使入党的日期提前！如果熙修能早一天入党，不仅如姐妹的我会高兴，不仅新闻界会鼓舞，而且，数十年一直关怀熙修的周总理和邓大姐也一定会微笑的！（子冈《熙修和我》，1980年《文汇报增刊》第7期）

本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大会 愤怒揭发浦熙修反党活动 同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篡改本报方向 执行右派分子方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本报讯】近几日来，本报编辑部的工作同志们都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了右派分子浦熙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本报编辑部在4月27、28、29日连续举行了三次全体大会，全体同志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本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同志也参加了同样的特殊会议。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4月24日深夜“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中指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文汇报在这样一个时期内，受了右派的好恶和奸恶的欺骗，但是，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了大有人在。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把右派分子和左派分子混在一起，这是有目的的。”

浦熙修对罗隆基唯命是从，罗隆基甚至对本报北京办事处直接发号施令。

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说：“我们几年来在北京办报，浦熙修一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我们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浦熙修指逼记者、采访右派分子，发表大量反动言论。

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说：“我们几年来在北京办报，浦熙修一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时期的基本政治方向，却是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浦熙修处所罗罗基等

建国后，浦熙修一直担任《文汇报》编委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后又升为副总编辑，此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

鸣放期间，浦熙修似乎没怎么讲话。犹如天使变成了魔鬼，米兰化作了苍蝇，她的名字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惊恨，是在整风形式陡转、《文汇报》遭鞭挞、示众之时。

在这之前，无论是她对于鸣放的认识，还是她从各种渠道所感知的毛主席对于整风的诚意与决心，都使她觉得在眼下这个新中国罕见的思想丰收的季节里，她得以自己曾一天之内走访北大燕东园、燕南园、燕西园的教授、学者，去采撷宝贵意见的速度，去加倍努力地摇动驻京办事处这个榨果汁机，以使更充沛、更鲜活的“果汁”，能从

《文汇报》的字里行间流淌下来……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山东省平度县人。

父亲务农之余，教点私塾。家境贫寒且人口众多，在兄妹中他排行老五。1929年，18岁的他自身来到北平，当学徒工，替人开汽车，又给订户送奶，依靠半工半读，读了3年中学。193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新生报到时校方要查验高中毕业文凭，初中读了一年、高中也只读了两年的他，哪来的毕业文凭？眼看就要被关在校门外之时，一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了到却没有来上学，一位同情他身世的老师便让他给冒名顶替了……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并非“原装”而在校园里韬光养晦。“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当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入了该组织，又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陈忠经、黄华、姚依林等人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仿佛因为他的名字便是个秘密，他与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单独策动伪军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他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职于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随长官部迁往西安后，以筹办“研究书店”的名义，参与设立中共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站。1947年3月，胡宗南率17个旅进犯延安，在他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多次通过这个联络站送出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一向聪明且自负的胡宗南屡屡败走华容道，不得不退出了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麦城……

葛佩琦又出现在沈阳，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这时他才韬光养晦了。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仅在通辽一地他便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在智商上，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

均是优良的，葛佩琦却不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而且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了自己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东北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单枪匹马的他，利用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采用了哪些策略和手段，似乎在近半个世纪后——至少在他和我见面的1992年年底，这还是个不可泄露的秘密，他写的那本薄薄的《艰苦奋斗六十年》里稍有涉及，便要送给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时至他魂归道山之日，此书还未见问世……

于是，历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视着“辽沈战役”这只硕大的果子被摘下来的那一刻，并由衷地赞叹起毛泽东、林彪的双目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桠上已被葛佩琦一类的“鼯鼠”不避一脚踏空的风险而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牙印”……

“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抵人类的历史，又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总是将小人物忽略不计。对此，出身农民世家生性宽厚、且又受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长期磨炼的他，不会有什么异议。使葛佩琦魂飞魄散、度日如年的则是，1947年年底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武，又在西安陷入敌人魔掌，两人被押送南京后下落不明，这显然是两位虽肝脑涂地却决不苟且偷生的硬汉，他得以安然无恙，可犹如他早年丢弃了“葛畔珩”一样，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战斗在一条特殊战线上的经历，也被冥冥之中不可测的命运给丢弃了……

1951年2月，他进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系（后改名为工业经济系），做了一名物理学讲师。几乎从他到校的第一天起，他便要求系党总支就自己的这段经历进行调查，并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他每一个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催问事情的进展，而对方每一回的答复总是使他感到，这事要搞清楚，好比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为此，他又先后给学校党委写了三封申诉信，并将华北局经过函调证实他人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党委。他好像碰到了一堵能吸去他几乎呼喊得沾上了血丝的声音的高墙，一个心已被踢得伤痕累累却依旧踢不进去的球门，从1951年到整风之前，人民大学党

委没有找他谈过一次话，也没有就他的三封申诉信给过他一个字的回音……

看着袞袞诸公坐在小车上，好似河鳗滑过水面一样轻盈地滑进滑出校门，看着他们几乎已经摆上了云端里的架子，葛佩琦的感慨无疑比起一般人来会更深一层：

按照资历，自己也算是高干了，可就算自己是老百姓吧，就算这老百姓提出的不是事关政治前途的呼吁，而是一般的日常生计问题，你们也不能表现得如此冷漠无情！

犹如自己抗战时期辗转于河南、河北、陕西，却没有住过一天旅馆、客店，都住在群众家。他们并非猜不到这匆匆过客，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没有一户、一个人出卖自己；你们不也是靠群众的高粱、玉米填饱了辘辘的饥肠，被群众的独轮推车、跋涉千里的骡马给送进了京城的吗？

怎么人一阔，脸就变，城一进，腰就粗呢？难道当年你们的誓言写在了流水上，抑或是这誓言本身就是不能走出逆境，一走出去就得变味的誓言？

无疑，他为自己的不平境遇感到了些许的悲哀，但更让他悲哀的是，自己与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织成的新生活的锦缎，却被某些人当做了脚下的一方地毯……

人民大学党委终于想起了葛佩琦，这是在1957年5月，他连续三次收到党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请他去参加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

犹如戴假发的男士不愿上发廊，他这个被迫戴上政治假发的人，自然也不想坐去被界定为“党外人士”的椅子上。头两次，他都没有出席。第三次会的书面通知是系党总支的一个干部送来的，脸上神情异常庄重，几近德国大使在向莫洛托夫传达第三帝国的战争通牒：

“这是学校党委第三次请你去，你再不去，可不太合适。”



本书作者采访葛佩琦先生之合影。

他勉强去了，这一天是5月24日，地点在人大小礼堂。

主持会议的是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虽说校长是吴玉章，但吴老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学校主事的还是胡书记。对于一般的师生来说，这也是一个人抵平日只能透过小车的玻璃窗才能见到的人物，可在今天，他一脸的皱折里都溢满了亲切和平易，在宣讲了党发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后，他强调：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毛主席反复讲过的，请大家打消所有顾虑，踊跃地向我们党和人大的各级党组织提出意见。

在一些人的发言之后，葛佩琦也发言了。次日的《北京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单为他的发言归纳在一个小标题下——“葛佩琦谈党群关系”。一个多星期后，《人民日报》亦作了摘载。现在看来，归纳者、转载者的思路，无疑风调雨顺，曲径通幽。现依据几方面的途径，将他的意见大致恢复如下——

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而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新中国的成立快八年了，我的组织关系还没能得到恢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自然感到焦急，但按理党组织应该比我更焦急，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儿女。可人大党委不焦急，今天当着胡书记的面，我说一句：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把流过血汗的同志，长期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冷若冰霜……

外行还是不要领导内行，你非要领导，那就会闹出许多笑话。我是教物理的，在编物理学讲义时，按力学、电学、热学、声学、光学五大部分来编。学校有位领导则说，声学、光学，玄而又玄，有什么用？你们只要讲力学、电学、热学就行了。物理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有自己的系统性、严密性，拿掉哪一部分，我这课都没有办法上。后来亏得苏联专家支持了我们的意见，这讲义才编得下去。在这里，领导不是尊重了知识，而是在尊重苏联的国籍，仿佛苏联的国籍就是要比中国的国籍高明，这样发展下去，离开了苏联专家，我很难设想人民大学该怎么办？

我们学校不是没有人才，教师里不少人过去当过校长、院长

或是系主任，但领导不重视他们，有时反而还要去表现得比他们高明，怎么个高明法呢？如果你教授上课迟到了五分钟，就要通告批评，将你的名字贴到布告牌上，让全校广而知之，这是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羞辱呢……

现在的党群关系是不如从前了。解放前干部常常和群众在一张桌上喝小米粥，同一个炕头上睡觉。我做过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能够有惊无险地活到革命胜利，主要也得力于群众的保护……现在进城了，坐上小汽车，穿上呢子服，草鞋给了博物馆，脚下是油亮的皮鞋了。但是离群众也越来越远了，老百姓进城来有几个还能见到当年的同床人？过去在学校搞地下党时，我们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团结广大的师生；现在呢？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都是可疑的，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更是几近坏人了。这一套，和“朕即国家”有多大的区别呢？

看到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我不但感到生气，也还有点担忧：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再发生对敌斗争的形势，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便难再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杀掉……

孙大雨，祖籍山东，六朝五胡乱华时，祖上避难至浙江诸暨，父亲为清代翰林。

小时在家读私塾，9岁便随堂表兄学习英文，在上海一教会学校读完中学，喜爱诗歌，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处女作《海船》时，只有15岁。1922年，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与朱湘、饶孟侃、杨事恩等四人，被称做新诗坛的“清华四子”。

毕业后，被清华保送到美国达达穆斯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兼攻西欧哲学史和美术史，获该院高级荣誉称号毕业。又进耶鲁大学研究院插班两年，再攻英国文学，从此对莎士比亚一往情深，心中也自命为中国深得莎翁真髓的第一人。

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英国文学，30岁做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时，学生中有一位叫胡鼎新的，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胡乔木，直至风烛残年，他还念念有词：这

个学生当年最为用功，上课时问题不断，且穷追猛打，没几个老师不感到头痛，但他从未问倒过我……欣赏之意中，又有几分自得之情。

抗战时期，孙大雨应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邀请，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外国教育系任教，并经孙科、梁寒操介绍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即来上海，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几十年后，孙大雨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青年时，是个相当糊涂的知识分子，虽然早在1930年回国后，就对蒋政权起了憎恶，在抗战前已对他不时痛骂，在重庆的四年中，深感非打倒那个统治，国家就没有希望；但决心走出象牙塔，参与实际的革命工作（动笔杆、口头、煽动、跑脚），还有不少的成分是李、闻的被杀激起来的……

他讲的是大实话。而在他一旦觉醒了之后，1946年即经罗隆基介绍，参加了民盟，次年春天，又由彭文应介绍，担任了“上海市大教联”临时召集人和干事，他的所作所为无不表现了他是个实干家：

同年5月20日，在南京、上海，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孙大雨等人立即起草了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跑脚”，征集到76位教授的签名，除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外，英文本还在香港的《子林西报》、《密勒斯评论报》及美国的《民主周刊》、《新共和》等报刊上刊载，将这一血案向全世界做了曝光。

26日下午，他还和复旦张之让、邱汉生、卢于道等教授，会同交大、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前往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迫使对方在当晚释放了被捕的同学。

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以魏德迈特使为首的考察团来中国调查，以听取公众舆论，决定对华政策的走向。魏德迈先到南京、又赴各战区考察后，8月15日到达上海。经“大教联”策划，孙大雨“动笔杆”，用英文写了一份7000字的备忘录，对蒋介石及其家族的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揭露，并要求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促进中国国内和平，协调建立民主联

合政府，保障民权实施，推动民主政治。随备忘录附上的还有67件硬得可以去当铁打的原始材料。

在获得中共地下党的认同后，他与张子让、宦乡等人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去会见了魏德迈。他以流利的英语向后者阐述了备忘录的内容，以及中国人民唾弃蒋介石政权的不可更改的意愿，并多次批驳后者对该政权的不实之语。

显然通过这次会见，魏德迈对眼前这位口若悬河、心连广宇的大学教授，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及中国春汛般泛滥开来的民意，留下了同样鲜明的印象。结束会见时，魏德迈将在备忘录后面他签了名的地方撕了下来，放进裤子口袋，眼睛向他眨了眨，泛出一股孩子般调皮的光芒……

魏德迈离开中国前，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次一定让宋美龄脸上的脂粉扑簌簌往下掉的谈话，正是去年靠着她在美国国会走廊里绽开的三春桃李般的绚烂笑容，才使她的“大令”在源源不断美元的垫脚之上，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将中国江山尽纳囊中的良好感觉；而魏德迈这次及回国后再次在国会批评蒋介石政权五六点的谈话，却如冷雨一样，让那三春桃李纷纷败落于国会山上。孙大雨颇为激动地注意到，这五六点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备忘录里所概括的……

1949年4月，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将在巴黎、布拉格两城市同时召开。民盟中央决定由孙大雨、张光亚等人起草拥护世界和平宣言。他在宣言里又一次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本质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经年不息的战争灾难。文稿经陈仁炳、孟宪章修改后，他将其译成英文，又亲自打字油印，分发收集签名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征集到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文化界、工商界共229位著名人士的签名。

他又一一分送上海各报社和外国驻沪通讯社，结果在这个大会召开期间，《大公报》发表了宣言的中文本，《密勒斯评论报》刊载了宣言的英文本，塔斯社上海分社将宣言发往莫斯科，并转巴黎、布拉格，中国代表团的许广平女士得以在大会上全文宣读这个宣言，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作为一个不曾闻过硝烟的文人，他却又一次感觉到大将军般“横

扫千军如卷席”的酣畅，他视这是自己在东方既白之前向敌人放的一发重炮……

孙大雨万万没有想到，东方刚刚既白，他却挨了一发“重炮”。

5月27日，上海“大教联”举行由地下走到地上的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在他这个干事会主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后了解到也未经联系“大教联”的中共方面领导人的同意，有人动议对于干事会进行改选。结果，其势似风卷残云，按影响本该是重量级的他，此时却不比一块橘子皮重多少，一下被抛出了干事会，仅选上了个候补干事。

他愤懑不平，百思不得其解：在上面这几件沪上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的事情之外，还有在民盟被迫转向地下斗争时，好几个支部都停止活动了，而自己领导的大学教授这个支部一直在坚持斗争，还有蒋介石想起他来，牙床一定像硌着了石子似的剧痛，仅仅一个多月前，国民党特务还在全市到处搜捕他，只是躲藏在姐姐家才得以逃脱……

他可以找到几十上百条事例，来证明自己是一位革命功臣，而寻不到一条理由自己应该成为“橘子皮”！

换上其他一位知识分子，也会愤懑不平，但在这之后，便有可能“一日三省”：自己是不是俨然一副功臣模样，而使众人感到咄咄逼人了呢？或者是因为自己有过一段参加国民党的历史，而让人觉得难以放心了呢？

乃至想得更深沉一些，在东方既白之日，你一个口头上革命、而且成串的英文句子动辄便像唾沫一样冒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要求和那些玩真刀真枪、浑身枪疤宛如梅花般怒放的工农大众，享有一样的权利呢？

这么一想，心境便会淡泊下来，犹如在应试教育中孩子放了爆竹、领了压岁钱、欢天喜地过完年，还得去当书虫子，在一本本教材教辅中去爬爬不完的路，知识分子不就是回书斋吗，何况在你的书斋里，莎士比亚正从高得接近天花板的西洋书里，伸出个漂亮的脑袋，向你发出悠长、期待的微笑……

孙大雨没这么想。

他的祖上在山东时也上过梁山，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水泊的因子；他从美国回来，先到的是武汉。一天他乘黄包车上街，一个洋人

开的小汽车碰了他的车一下，他从车上翻了下来。洋人没道个歉，却咧咧大嘴，便要离开。他马上跳起来，一把将洋人从车里揪出来，接着几拳，电闪雷劈地揍过去，洋人一定以为自己碰上了中国的“霍元甲”，弃车就跑。他紧跟在后面追，洋人跑到附近的码头，他追到码头。洋人上了一条船，他也上这条船。在船上，他又是大气磅礴地几拳，洋人被打落到江上，剧痛得好似滚着个绞肉机的脑袋，以为这场噩梦总算做完了之时，岂料他也跳到水里，似乎今天非把这脑袋砸成个柿饼不可……

或许，可以称这是一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但细加琢磨，在这与中国士大夫“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信条相悖的拳头下，也表露了孙大雨的几分桀骜，几分狷介，乃至心理逻辑的某种单向性。

这时，在他怒涛翻滚的脑海里，这种单向性的心理逻辑，便似黑黝黝的礁岩一样升起了：自己既然是彻头彻尾的革命，那么那些打击、排斥我的人，还有那些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一定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从1949年8月至1957年整风，他先后多次致函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中央和上海市的领导，状告上海市存在一个涉及党内外数十人的反革命集团。全国政协、高教部和上海市委，包括陈毅本人，多次对此进行调查与调处，在承认“大教联”改选不妥、对他安排不当的同时，也明确了这是一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并希冀双方改善关系，增进团结。但孙大雨不为所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在复旦被连整8个小时的遭遇，更使他觉得这个“反革命集团”魔鬼般地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继1956年2月给民盟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送上一份长达8万多字的材料、同年12月在市政协全体会议、市人大小组会上发言，坚持作出相同的指控后，1957年6月7日，在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作了长篇发言，除了列举自己在外文系主任任上与系党总支书记相处的种种困难、困惑之处，并以对方长着一副“法西斯面孔”作了总结外，主要的内容让人听起来，依然是他好似堂·吉珂德，骑着瘦马，手执长矛，在和一个风车般巨大的魔鬼进行殊死的斗争……

次日,《解放日报》终于承认了他的重量级地位,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他的发言。标题也赫然醒目:《孙大雨指控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人是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

吴祖光,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从小在北京长大。

他父亲吴景洲是一位著名的古文物鉴赏家,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擅长绘画、金石、诗词及书法。他本人的中小学是在一所十年一贯制的名牌学校——北京孔德学校就读的,校长为蔡元培,鲁迅、刘半农、杨晦、冯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后面二位还担任过他的语文教师。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如果不能培养出日后的吴祖光来,那就像凤凰窝里爬出只麻雀一样令人感到唐突了……

孔德学校毕业后,他升入为输送留法学生而创办的中法大学文科。只读了一年多,因家庭突遭不测风云,他离京辗转半年后,去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上校长秘书。本想工作一段再回京继续学业,岂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上无望,还得随校南下,由湖南而至四川。他转而搞教学,先后教授过国语、文艺概论、中国戏剧史,其时或其后不久,曹禺、张骏祥、黄佐临、马彦祥、应云卫等星辰般闪烁的名字,也出现在教师的花名册上,一时间,该校银河漫过,成为了大后方的戏剧中心。

正是在这俊彩星驰的艺术氛围里,刚刚20岁的吴祖光,依据东北义勇军的素材,一气呵成了处女作《凤凰城》,这个四幕话剧本当即被搬上舞台,连演百场,盛况空前,轰动了乃至香港在内的大后方……

人最怕找不到自己,或者是找到自己后,又恍若一根荒草丢失于泥沼,将自己丢失于社会妖媚的诱惑之中。他找到了自己,自己不就是那个经常从孔德学校里溜出来,跑到天桥的戏园子里一泡就是一天的小男孩吗?

他找到了自己便没有丢弃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他,一个剧本接一个剧本:《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少年游》、《捉鬼传》、《嫦娥奔月》、《国魂》……无不像呼呼燃烧的井喷一样,映红了国统区广大观众风雨如晦的心空。

在重庆演出讴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话剧《正气歌》时，剧团租用的是电影院，要等到夜里9点多钟电影散了场，话剧才能开演，可观众依然如夜潮之涨。位于市郊的沙坪坝有不少从内地迁移来的大学，大学生们徒步来市区看戏，看完戏又摸黑走回去，回到学校时，天边都透出了鱼肚色……

他的前期作品升腾着充沛的爱国激情，后期作品则斧劈般鞭笞独裁，灼热地呼唤民主。因此，那一时期，为反对独裁，呼唤民主，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奔走呼号的中共，宛如俄罗斯传说中那个被铁链捆在高加索山上、宁愿让老鹰啄去眼珠也不肯屈服的英雄，实令他魂移魄动。

1942年他认识了夏衍，此后便一直引以为老师与知己，1946年他与挚友、著名漫画家丁聪在上海合办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清明》杂志时，夏衍也有一把编辑部的钥匙，以他和丁聪“自由人”色彩为掩护，多次在这里召开党内的重要会议。也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他结识了周恩来，给他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的，倒不是对方对自己的称赞与了解，而是他亲眼见在餐厅里，周恩来以伟人之身与一个浑身油腻的厨房师傅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因为小时目睹了梨园子弟的悲惨命运，他自小的人生信条便是“同情弱者，平等待人，与人为善”，在他半个世纪后仍有激情与堂皇于北京的国贸中心打一场官司，我们便可看到他毕生“最恨那看不起人、拿人当奴才的人”！

于是，他认定了共产党得人心将得天下，而国民党失人心将失天下。他在《嫦娥奔月》里，让月下老人说了这样几句话：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一统天下二十年，颠倒纲常，逆天行事，如今众叛亲离，仍旧执迷不悟，真是可叹！

1945年，他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当主编时，在



抗战初期的丁

友人处一看到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他便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举轰动了国统区，并向世界预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99年，丁聪重访故居。

与丁聪不同的是，吴祖光却从来没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也许他深知从小学常逃学起，自己身上便有那么一股“不修边幅”的劲儿。1942年下半年，他和丁聪，还有画家黄苗子、音乐家盛家伦，一起住在重庆一位进步文化人唐瑜的家里，金山、吕恩、张瑞芳、高集、高汾等文艺界、新闻界名流也先后在此住过。几乎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大家一起讨论时局，切磋创作，高兴时手舞足蹈，乃至插科打诨，悲愤时借酒浇愁，或是指桑骂槐。生活上也是兵营化的，有钱一块儿下饭馆，没钱也一起练肚皮，日子过得天马行空却也生机勃勃。

有一次郭沫若来，开了一句玩笑：“你们这些人啊，都是二流子……”吴祖光雅兴顿发，接口就说：“那么就把这里称做‘二流堂’吧。”并要郭沫若提词写匾。一时没找到毛笔，但这个称号就此传开，在别人眼里，或许还在他自己眼里，他成了这个“二流堂”的“家长”、“族长”。

解放后，他和丁聪、黄苗子、盛家伦及唐瑜等人，同住北京东城栖凤楼的一所大房子里时，脑袋里多长了一根弦的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二流堂”在北京又开张了，为此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二流堂反革命小集团”……

试想想，如自己这般的“不修边幅”，这般的脑袋里少了一根弦，这般的不会将党性原则刷糨糊似地刷遍全身、而后像蚕蛹卧在蚕茧里一样老老实实蹲在那层糨糊壳子里，怎么能加入共产党？倘若加入了，这不是给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纪律的党招惹口舌吗？



1950年夏衍与“二流堂”的朋友们。左起：冯亦代、夏衍、吴祖光、黄苗子、郁风。

或许，还因为在他眼里，艺术创作是世界上所有职业里最具个性、最富天性的工作，除了一颗始终在感应生活的心灵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工作无须什么领导。如果说一定要领导才能出大作品，那么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曹雪芹是谁领导的？莎士比亚是谁领导的？托尔斯泰是谁领导的？而且艺术创作又是世界上最具公开性的工作，它不是秘密活动，它耍不了阴谋诡计，它一在社会问世就得经过千千万万人的检验，因此对它惟一权威的评判只能来自广大的读者和观众。

在这个领域里，谁也不是孙子，谁也不要装老子。不懂文艺的闯了进来，犹如黑熊要教猴子上树，没有哪只猴子会当真。懂文艺的要拉大旗做虎皮，那我就要问你，我领导你，你干不干？你绝对不干。那你绝对不干，为什么就要领导我呢？

大约这是颇为标准的“自由化”言论了，可他就在这几十年一贯制的“自由化”想法之中，在衷心地拥护共产党对全中国领导的同时，也以自己与党的怀抱始终隔着一扇门的距离，来力图保持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水灵灵的个性与天性……

新中国成立时，吴祖光只有32岁。

这本是日奔中天的年纪，按理他的创作更应该大江东去，此后他却只导演了几部反应平平的电影，在日益灼热的政治气候下，他再膺

力如弓，也不过似蚂蚁放了个屁而已，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已见黄斑斑的枯萎之色……

但我们不一定要通过作品，通过另一个角度，一样可以证明他对于新社会并不亚于对新娘妻子新风霞的那份感情，以及他在这个社会里绝对是个大大的良民。

1987年年初，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他谈话，在谦逊、夸赞、散发着浓浓热情的道道小菜上完之后，副部长终于端上了一盘正菜——劝其退党。

8年前，也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巍峙找上门来，作了一番肺腑之言：

“‘文革’以后，党的形象被破坏得不成名堂了，现在是历史上党威信最低落的时期。这个时候，党特别需要朋友们的支持，你跟随党那么多年，周总理生前对你那么关心，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想请你郑重考虑一下，是不是现在可以写张申请……”

他不能不被感动，可还是有些犹豫。回家后开了个家庭会议，妻子力主加入，她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家没有人是共产党员，吃苦吃大了，吃亏吃多了。两个儿子也同意此举：爸爸早该是党员了，如果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念书时也不会遭人歧视。惟有女儿吴霜沉默不语……

少数服从多数，他决定要“支持”党了，可真写起申请书时，平时妙语连珠的他，脑海里这方面的词汇，却是一片不毛之地。实在无奈，他去请了也是“二流堂”“家族”成员的田庄捉笔……

早就有某种预感，他对于自己被“请”进来的8年之后，又被“请”出去，并不感到惊愕。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副部长面前清理一下自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于是，我们便借此有了认识他的另一个角度——

在和国家的关系上，我做过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解放不久，我把父亲从上海接到北京。在旧社会他的薪水几乎全都买了文物，他识货，有时钱花得不多，却能买到很珍贵的东西。虽在抗日战争里颠沛流离，丢失了一部分，但

还有相当多的文物。父亲一到北京，我跟他老人家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历经千辛万苦收藏的那么多文物，拣起来困难，带起来也困难，现在国家安定清平了，何不全部捐献给国家？那时他脑溢血不久，导致中风、半身瘫痪，说话都说不清楚，头脑却还很清楚，他立刻就同意了。



吴祖光与新凤霞。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发了一长篇建国以后民间捐赠国家文物的通讯，其中提到了三十多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景洲。我家捐出去的文物有字画，有玉石，大都是国家一级品，有的还价值连城，总数达240多件……

第二件事是我与新凤霞结婚以后，她就参加了国家剧团。她算得上是财产的东西是两箱戏衣，一共一百多件，戏衣对演员来说是很值钱的。还有一些珠宝钻石，这都是她从小演戏挣来的，我要她把它们也捐给剧团。捐出去以后，我丈母娘才知道，她还不敢跟我说，而是去和风霞说：“我这姑爷一定是疯了，你知道吗，你们这等于是把一所房子给捐了？！”

第三件事是我到文化部来的时候，艺术局局长就告诉我，今后你要用车，尽管给部里打电话，我们马上给你派车去。第一回坐部里的车，我对那司机便不满意，一路上无论怎么跟他寒暄，他都紧绷着一张脸，好像我欠了他的钱没有还似的。又有一次，我和文化部的另两位艺术家一起从人大大会堂开会出来，他们见我有车，就说：“我们家离你家不远，带我们一道走。”司机这时说不乐意，走到半路上，他吭声了：“祖光同志，你那东大桥到团结湖有公共汽车吗？”我一下未体会到啥意思，应道：“有，有43路车。”车到了我家门口，司机才向另两位发话道：“你们下去吧，去坐43路车，我这车还有事。”他一掉头，一溜烟地跑了，好像人大大会堂里在等着他开始国宴……

望着两位一下被霜打了的脸，我也气极了，从此后我就不坐

文化部的车，有事要坐车都叫出租车。丢掉的不算，现在我抽屉里压着的出租车票，就有几千元钱，我从未到部里去报销过一次。

第四件事是1955年时，与凤霞结婚之后，又接父母来北京，房子不够住。

我买了一所带18间房的四合院，花了12000元钱，有一部分是向朋友借的。“文革”一开始，邻居们就借红色风暴杀将进来，18间房他们占了8间。朋友来看我，劝我说：你这里真成大杂院了！他们住你的房子，用你的家具，还一天到晚眼睛盯着你，不时向你发发革命群众的革命脾气，你还是赶快搬开这里。我觉得是挺窝囊，惹不起还躲不起？便用剩下的10间房换了楼房，住到和平里去了。

“文革”结束后，要落实政策了，房管局来找我，问我怎么办？其实结论他们早已摆在那儿：你假如要恢复原来的住房，那我们就把那些人统统赶出去，再给你修复原状。但里面住了6家人，一住住了十年，房子、院子都损坏得不成名堂了，要修复得很长时间，这时间长得我们都不知道。我当即就说：这四合院我不要了。我两个儿子结婚都生孩子了，如果再一起回去，老俩口、俩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女，我不成老地主了？你们只要给我儿子一套房子就行了。我这人在这方面不会动脑子。

搬出四合院后，我得付房租，6户人家还住那里，房租则是付给房管局的，我等于把这所四合院白白地送给了房管局。前不久还有人对我说：你那房子刚好在王府饭店背后，属黄金地段。要现在卖的话，至少好卖二百万。我说，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我再算账去，还不是跟国家算账，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正鼓动“兴我中华，修我长城”吗，就算是捐给国家修长城了……

第五件事，文化部的医疗关系是在友谊医院，但我住老房子时离协和医院近，搬到和平里后，离朝阳医院近。身体有毛病，我一般都是到这两家医院看。所以二十多年来，我都是自费看病，等于没有公费医疗。

我就说这五条。如果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能是不够，我从来也不参加政治学习，不那么俯首帖耳，也不太相信马列主

义。我只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以这五条看来，我认为自己够得上是个好人……

吴祖光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见于5月31日他在全中国文联党组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发表在1957年第11期《戏剧报》上的《谈戏剧工作中的领导问题》一文，其要点是——

组织制度应用在文艺工作上，是不合适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成为一个戏剧家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解放后个人奋

斗受到了批判，依靠组织变成了依赖组织，因此在各种舞台上出来的新人，简直寥寥无几。

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必然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组织制度使长期不演戏的得到演员的称号，长期不写作的得到作家称号，并且受到极好的待遇，努力写作的反而被一棍子打死。这种组织制度造成的恶果，就是鼓励好吃懒做、不劳而获……

我拍过几部电影。这片子是怎样拍的呢？开拍之前，每一个镜头，每一字每一句，事先都得经过局长审查。在摄制过程中，精力都花费在打太极拳和应付人事工作上去了，又怎么谈得上艺术上的创造呢？这次《文汇报》发起电影讨论，领导马上说，成绩是主要的。我看电影局的工作的确做得很坏。我们编剧、导演、演员可以站出来说，我们一概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做的。

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又必然接踵而来……



晚年吴祖光。

18 “红门”汹涌地撞开

通过对以上十一位人物经历的展示，我们大抵能看出在20世纪30、40和50年代，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的心理轮廓及情感线条。

这两代知识分子从开始的风闻，到逐渐认识，直至最后坚定地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并不是类似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强迫“洗脑筋”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战乱不止、苦难不止、忧患不止的东方大国里理性的必然选择。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和斗争中，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实力：

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当蒋介石穿一身飘逸的香云纱长衫，挽着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走出他送给她的“美庐”别墅，在卫士的簇拥下，登上当年最新型的“雪佛莱”轿车，去含鄱口看云起云落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没有电灯，用蜡烛。没有自来水，用的是警卫员从井里打来装在搪瓷盆里的水。能算奢侈品的是一个木制浴桶、一架老式留声机和几包缴自敌人那里的名牌香烟。他不能送新婚的妻子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件衣服，昔日上海滩的影星身上是一件大肥军装，不过中间束一根带子以展示她的蜂腰……

更何况前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将一级又一级的政权推去了包括蒙藏在内的广大国土，而后者拥有的不过是几块被分隔开的山寒水瘦的僻壤之地，那常常是土布染就的红旗在暮色的微风里拂动，不免有几分苍凉……

他们看重的是双方在这一较量与斗争里所各自表现的人格精神和道义力量。从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到“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叶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当今血与火的洗礼中绚烂地升华。

从共产党扛着斧子，闯进国民党那貌似壮观、实际上强烈弥漫了腐败、专制气息的树林，并锲而不舍地发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

的斧劈之声里，他们并未发现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在欧风美雨里耳熟能详的西方民主政治有多大的抵牾。

其实，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不过民粹主义的内容，在前面几章尚未能充分展开；另一本是现代民主政治，此时也未翻到实际操作部分，也许还仅仅停留在波澜壮阔地攻打巴士底狱之前的序言。

是否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说——

知识分子中，少数反对前面一本书的，一定是右派了；

觉得这两本书似乎相同又不尽相同、还得继续往下看看再说的，便是中间派了；

而像他们这样，无比兴奋地视这两本书为中国苦难大地上的同一本《圣经》，自然就是左派了。

因此，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事业，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着自己所信奉的道义。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到，正是道义的力量使他们不但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予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而且为了中国在如磐的夜空中能闪电狂舞般地挥起道义之剑，即便得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他们也会在所不惜……

由于这批左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毛泽东有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精神后方，蒋介石却不得不同时间面对两个战场。

一个战场上，他越来越被枪林弹雨掏空了体力；

另一个战场上，他被越来越喧嚣的舆论拖垮了心力。

在前一个战场上，一颗子弹只能结束一条生命；

后一个战场上，一篇文章、一次演讲却能唤起千百个麻木、迷惘的灵魂！

建国以后，对于前一个战场，在汗牛充栋的回忆录、小说、影视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描绘；对于后一个战场，似乎除了闻一多、李公朴等有限的几位，在天之灵能得到些许的抚慰外，大抵上只有沉默。

仿佛他们是被请上人民共和国的列车的，而让他们在软席车厢里有自己的座位，更是一番海纳百川的宽容。

殊不知与那些肩章上扛着一颗或几颗星的将军一样，他们的青春岁月、中年时代，连同他们的智慧与肝胆，也在机车的炉膛里呼呼地燃烧，并牵引着列车终于穿过了历史黑暗的隧道！即使如1949年时自我感觉确有点过于良好的孙大雨先生，他起的作用亦应该不会比一位将军小……

我不敢说，如果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并苦口婆心地游说蒋介石发动“改革”；储安平、王造时，大汗淋漓地操纵起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浦熙修在《中央日报》的版面上冲锋陷阵；葛佩琦是军统的高级反谍报人员，打入了共产党内部，又被共产党派遣回来；还有吴祖光，无须全部的才华，只需舀出一两勺来润润笔毫，便能用脚握笔，写出一出出讴歌委员长“丰功伟绩”的大戏来……

乃至更多的知识分子，效力于蒋介石的麾下，中国历史的进程是否会另外一番模样？

我敢说的只是，倘若蒋介石不是身后始终有一个风雷激荡、笔走龙蛇的战场，新中国在母腹里的分娩，一定会更加漫长、更加曲折、因而也更加惨痛。

毛泽东也不会在55岁、尚未白头的年纪，便在一辆美制“舍尔曼”牌坦克的前导下，衣冠楚楚、心潮起伏地站在小车上，在人民的欢呼声里，隆隆地沿着皇宫前的大道，驰进二十多年来他待在山沟里一直感到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战场上，他们虽然不着军装，但直言不讳、嫉恶如仇，已经像军装一样牢牢地贴在了他们的肌肤上。他们也正是以直言不讳、嫉恶如仇，形成了为共产党人所欣赏和鼓励的威武的阵营，凌厉的攻势。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显然，他们是以这样一种心态，随开国大典缤纷绚丽的焰火，升腾在北京十月清朗、靛蓝的夜空的。

当他们日后渐渐发现，自己当的并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一批可以走动的精美的景德镇瓷瓶，或者说是一串众所周知的会说话的橡皮

图章，那两本书翻下来也并不是出于同一个版本，他们便似蛇蜕一样，已经在日益痛苦又悄然地脱下身上的“军装”，

如视张东荪被捕为“一个信号”的章伯钧，口里决不会持有异议，有的只是关起家门的窃窃私议；王造时建国后一直被冷藏在冰箱里，他也没有试图走出冰箱，却在里面无奈地找到了看“冰花”的“乐趣”……

他们之所以痛苦，许是因为自己所信奉的道义，遭到了自己积极乃至冒死参与创建的这个国家某种程度的嘲讽。

他们之所以悄然，许是在自己投身的那个战场尘埃落定后，便发现身后也被开辟了一个战场，虽然还不曾发生雷霆万钧般的战役行动，但从不时可见的小规模袭击中，他们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战场……

他们本该继续痛苦也继续悄然下去，心门静止，恍若一扇钉着狮头铜环、颜色斑驳的红门，在默默地坚持昔日辉煌的沉寂。

1957年的整风运动，却如黄钟大吕，汹涌地撞开了这扇“红门”。

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日后也被划为右派的许杰先生，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

自己原是非党成员，但党却要我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党竟然这样看重我、信任我，我能不感恩图报，拼出性命来投入这个运动，以报知己吗？

在毛泽东的金石能为之所开的诚意前，是知识分子理性的某种迷失；

在毛泽东1956年以来所表现的朗月般的清醒照射下，更是关注社会主义命运的知识分子们理性的某种坚挺——

从苏共二十大，到波匈事件，仿佛有一种不祥的诅咒笼罩在社会主义阵营上空，分裂、冲突、流血、死亡……接踵而来，好像莎士比亚悲剧里的血腥事件那样频繁。

宛如被风暴淋湿了的鸟儿耷拉着翅膀，社会主义往日的旗帜对此无能为力。

能让她的每一根经纬充满弹性与活力，放歌于天地间并扫荡这诅咒的，惟有在这面旗帜上写上两个金光跳跃的大字：民主。

政治上颇有几分天真的吴祖光就不必说了，连政治经验丰富、一开始就存有疑窦的章伯钧，最后也将那脱下的“军装”，又穿在了身上！

不知这算不算一种悲剧性格——

要忘记自己的坎坷曲折不难，要忘记国家与民族积满忧患的现实和前景难；

要正视历史并插入锋刃不卷的真话不难，要在商业性的微笑下给权势送上假话难；

要信任党不难，好似一盏酒精灯，再多的悲怨也沉去了瓶底，而好话只要有一句，扑哧一声，便能点燃蓝精灵般欢快的火焰；

要不信任党，难上加难，无论现实之海掀起多少问号的浪花，总如海边不改本色的沙滩一样，貌似湿淋淋地被涂抹了，可片刻之后，又露出纯金般的底色……

于是，我们便能理解在五个星期自由批评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暗藏多时的机锋恍若巨鲸墨色的脊背，已经不时露出水面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何还在煞有介事地投身于整风，而章伯钧等衮衮诸公更在处心积虑地为党考虑，怎样引导这场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整风——

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最后一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香凝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内称：

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革命党一定要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古已有之。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仍然有左、中、右。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其实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显然是右派……

民主党派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也必须同时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我查阅了大鸣大放期间的大量报纸,似乎何香凝先生是在反右运动之前,第一位使用“右派”一词的人。

也就在这同一个会上,储安平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书面发言。

6月6日,发生了两天后便被视为“右派”的进攻达到了顶点的“六六六”事件,即这一天应章伯钧的邀请,六位教授在全国政协俱乐部紧急聚会。

在这之前,5月26日,借北京市高校运动会在清华举行之际,北大学生到清华园内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

大约在5月27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部分章节,已在北大张贴出来,这是由好事者从《纽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英译本中节译过来的。虽在西方去年便有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译本,但这在中国还可谓关系到社会主义形象的顶级机密。北大党委在一两天内揭掉了这张大字报,可这一报告里所透露的1937年至1938年苏联国内大规模血腥的政治清洗,无疑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精神震撼……

28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现多次学生集会,贴出500余张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少数大字报公开提出游行、罢课的口号,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6月2日,林希翎在人大校园内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引起众多师生的强烈关注。校党委当即做了林的工作,要她取消这一活动,她答应了,可次日夜晚又有人发现她在抄写秘密报告。

随后的几天,北大学生频频发出邀请,要章伯钧去该校演讲,在清华,学生们议论得沸沸扬扬:真正实行民主选举的话,清华的校长将不是蒋南翔,而是钱伟长。上海的一些高校也开始了动荡,时任高教部部长的杨秀峰已赶去处理问题……

教授们感到无论从民主党派的责任,还是从为人师长的责任,自

已都必须尽快拿出一个鲜明的态度来。

看样子颇似民盟的一个有组织的活动，这天上午10时到会的，不仅仅是分别来自于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计13人。

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他请大家谈谈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的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整风的形势下进行工作。

曾昭抡说：当前学生有很多问题，事情已经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旦学生走上街头，市民将与他们汇集一起，情况就会更糟。因为各单位鸣放中的大量意见表明，党脱离群众已到了严重的程度。再加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使得目前的形势已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前夕的形势极为相似……

钱伟长说：最近我收到一些学生家长的来信，要我劝告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这样做了，但学生们打算按父母的话去做的不多，眼下颇有些像“五四运动”前夕的情况。学生们不愿意听他们父母的劝告，也像我们做学生时不愿听自己父母的劝告一样。而且，我看学生现在要找带头的羊，期待教授们站出来说话……

费孝通也认为，现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教师如果真去做了学生带头的羊，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如果真和社会上的群众搅在一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道：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看毛公是有估计的。按过去的经验党外来的意见总是客客气气，他没估计到现在各方面揭露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

担心学生闹事，担心学生上街，担心学生引发社会的动荡破坏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良苦的用心，还担心党中央是否掌握了各校运动的实际情况——这缕缕忧思，好似茅草充塞沙发垫一样充塞了他们的腹腔。

虽然两天后毛泽东称他们为“利令智昏”，“将无产阶级的绝对优

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但是他们还未“利令智昏”到自比中国的权力中枢。不过，从他们异常严肃、焦灼得恍若一个中国爆炸的开关就在自己脚下的神情里，他们显然感到了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对大学生、普通知识分子乃至对整风运动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多年以来不得不做会走路的景德镇瓷瓶、能说话的橡皮图章之后，他们只是“利令智昏”地想凭借这种影响，去滚滚疾风中证实民主党派以及自己，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依然是一棵棵劲草……

教授们的结论是，他们必须站出来，但决不是去给情绪激昂的大学生们充当带头的“羊”，而是不能让英明领袖进退维谷，得尽全力帮助共产党稳住整风局面。

在5日晚间，章伯钧已分别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6日当晚，史良向周总理反映了章伯钧和六教授的意见，周恩来未置可否。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参加了，“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注：指昨日参加聚会者）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章伯钧的有关交代。）

不知一个念头，是否在史良、章伯钧的脑袋里倏忽一闪：一向为事果断、说话明确的周恩来，此时怎么变了？

第五章 黄雀在后

19 这是为什么？

犹如豆荚在暑天里炸开，当整风的“豆荚”一进入盛夏之日，那机诈的“豆粒”便一颗颗圆滚滚地成熟了，并随即不断发出令人心悸的爆裂声……

第一道声音发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了让这一声响得似晴空霹雳，有遏阻流云之势，据说，毛泽东吩咐过好些党内的笔杆子去草拟该报这一天的社论，最后让他觉得满意的还是4月间他已经召见过的王若水写的稿子。他作了某些修改，又冠之以一个十分大众化、又十分赫然醒目的标题：《这是为什么？》——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

台”，他们企图趁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员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被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的，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在这篇明白如话、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一看就懂的社论里，惟一必须加以注释的是卢郁文其人，因为从表面上看，他收到了恐吓信一事，正成了这篇社论论点的缘由。

卢先生是何许人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地主阶级出身，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做了多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半生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实在些，他做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在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里担任秘书长。和谈破裂后，他随代表团的成员一起留了下来。卢先生因收到恐吓信而一时风头劲健之时，正做着民革中央委员，还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他说即使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共产党不应该也决不会对错误的言论放任自流。他还指出，几乎在每一个高级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都有人喋喋不休地提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并不胜任……

在这番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发言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在6月6日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公开了这封恐吓信。从信的内容看，并没有夹寄上一颗子弹，一根雷管，或是写着“决

不轻饶你这条狗命”——类让卢先生毛骨悚然的话，只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给了他敌对的道德评价，诸如“为虎作伥”，诸如“无耻之尤”……

有人以为将此信称做“恐吓信”是夸大其词的。在民革中央，在私下，不是一两个头面人物和中央委员，更以为此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给自己的。“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年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好似一个浪花在历史的长河里倏然一闪，便没有了戏剧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民主人士被扫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崛起了，俨然成为紧贴在党身上的一件泛出青铜色光泽的坚硬铠甲，仿佛不击穿这件铠甲，阶级敌人就无法向党作出进攻：

卢先生自称，从第一封匿名信公开之后，他在6、7、8三个月间，收到了来自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30封匿名信。这些信的内容，除了“没有气节”、“少了人格”、“不折不扣的奴才”一类咬牙切齿的辱骂外，便是张牙舞爪地恐吓：“不要继续为虎作伥，否则自寻其恶果”、“你的性命难保”、“波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共产党不满三年将自取灭亡”……

一封盖着石家庄市邮戳的匿名信里有这样一句话：“请不要卑鄙地追究这封信的墨水、纸张，你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卢先生据此认为写信的人一定是一个老牌特务。即使这些信没有似公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往来书信一样被肆意剪裁，可凭着他如此敏锐的政治嗅觉，十有八九，它们都被他犹如挖到金缕玉衣一般兴致勃勃地交出去了，并让公安部门够忙乎一阵……

与此同时，卢先生又自称，他还收到了除西藏外的来自全国各省市的71封慰问信，有的是以工会、学校、合作社的全体名义寄来的，有的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慰问，是支持，是鼓励：“如果恐吓者，真要动一动您的一根毫毛，他就要粉身碎骨”，“我们虽然不相识，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勇于前进吧，亲

爱的同志、随时都有一群青年人在支持你”……

不知他是否像交出匿名信一样也交出了这些慰问信，如果交出了并得到妥善保存的话，它们应该放进博物馆，让后来人在参观一部往往沉重得令心尖发痛的历史时，也能稍稍地幽默一下。

卢先生还发现，自《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出来后，周围的人们对自己的面孔起了显著的变化：

平素相当要好的朋友中间，有的人对他冷淡起来，甚至在背后将他夹在上下牙床之间，唾沫里滚动一阵后，像吐瓜子壳一样吐了出去。相反，有些人平素和他只有一面之交，现在碰到了则格外热情，从那一片崇仰自己的盈盈眼波中，他感觉自己是被一群小行星包围的大行星。乃至对他的老底十分了解的他过去的学生，原来为着他替反动政权帮凶深感憎恶，20多年来与他压根没有来往，现在也来信问候，言辞之歉疚、温暖，宛如写信人自己是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对于这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有着卢郁文这般良好感觉的，只是凤毛麟角。不久，他被提升为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

还在这几天之前的一个炎热的夜晚，当丛维熙从妻子张沪口里听到一份党内文件的内容：“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他已经瞠目结舌了！好似妻子参加了这份文件的草拟，他一下扛起悲愤的“火箭筒”，向她作出一连串的击发：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变成了撞网的大鱼？”……

张沪“我自岿然不动”。她正在奶孩子，怀里的孩子显得那么弱小，像只煞是可爱、极易受到伤害的小动物，吮吸态又那么恬静，好似天欲晓未晓之时那沾满晶晶夜露的花萼……一股带乳香的温馨味，撩拨着她的鼻翼，她不由得低下头，在孩子的前额上轻吻了一下。

顿然，一股为人之母的情怀，犹如雨水渗透土壤一样渗进了她的胸间。也许为人之母的情怀与算计生命、摧残生命的“阳谋”比起来，无异于正高唱赞美诗的教堂与红头苍蝇飞舞的公共厕所间的区别；她

一下还进不去眼前这个龌龊的现实世界，她一直沉默不语。

最后，她讲话了，还是以--一个母亲的善良，来解释眼前这个并非善良的现实世界：

“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当晚，丛维熙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是1957年里他第一个失眠的夜晚。

他想起在中宣部召开的在京青年作家座谈会上，自己这个因出身不好平时寡言少语、且讲话口讷的人，竟当着“红色沙皇”周扬的面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写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言辞之莽撞，以至于--讲完，好友蓝翎便耳语道：

“薰人出豹子！”

他还想起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阳春三月》，这是根据京郊一个合作社因过分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生活拮据、被迫去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稿子寄给了天津的《新港》杂志，不久就给退了回来，理由是这篇小说存在着不健康的思想苗头。他没有以那位编辑冷峻的政治眼光，像掐蒜苗一样坚决掐去这苗头；相反，却以为自己的创作在摆脱流行的理论说教后，这苗头上沾满的是生活之晨的点点露珠。稿子在改名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后，又交给了《长春》杂志，该刊已发排在7月号的头条位置。能抽得下来吗？十有八九来不及了，这新改的题目怕是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道谶语……

天快亮时，他才昏昏沉沉睡去，可枕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普希金的一则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不过梦境里，那海不是明晰的碧蓝色，而是深不可测的墨黑色；钻进那小口大肚缸里的金鱼，也不是一条，而是摇头摆尾、欢快得好似去踏春、赶集、幽会的一片鳞光闪闪的鱼群……

猛然醒来，他把这一梦境告诉了妻子，张沪似乎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她不无凄惻地说：

“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从维熙的梦，便应验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

那份感觉，即使是在几十年后写来，也显得那般似迷似惘，如泣如诉——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播音员，还在盛赞鸣放的莺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然而，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列车上被甩了下来，那时还不像后来中国的好人要习惯将自己当成“坏人”那般容易。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还端然端坐在车厢里，只是随身子的猛烈摇晃而惊讶：这列车何以做如此急、如此大的转弯？

她有事可径直去周恩来的办公室。中国威风凛凛的十大元帅，她见了也几乎都能走上前去打声招呼。过去倘若她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不解之处，她总去找党，好似孩子有道题目不会做了，总要去问自己的父母。这既出自于她自感与党之间的那种近似于血缘关系的情感联系，也出自于她努力追求事实真相的职业品格，因为她不仅仅是一名记者，还是《文汇报》伸向中国政治天空的一片雷达天线。

读罢6月8日的社论，她习惯性地拿起了话筒，接话人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她问对方：这篇社论的发表，是否意味着大鸣大放已经结束？

陆定一作否定的回答。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不会不清楚：

一场强劲的政治风暴，业已在一年多来阳光朗照、百鸟闹林的中国开始登陆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要误导几个月以前他还颇为心仪的《文汇报》，在这场风暴中粉身碎骨。从他在“文革”里的磨难经历看，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高级官员，而不是那类心眼犹如网眼一样密布政客。何况在这时他也远未料到，在22天之后，《文汇报》及浦熙修本人，竟会被毛泽东由过去几近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

了的宝贝，一下变成蟑螂般被恶狠狠地踩死在7月1日……

可能的答案是，毕生忠实于党的陆定一，不会发出任何有违于党的声音。虽然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却还未对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者之间原本极为排斥的关系，作出冠冕堂皇的决议和解释。

读罢社论，储安平先生则一下明白了这社论的矛头首先是冲着自已“党天下”的发言来的，犹如刀子划过肌肤一般，他明彻而又痛楚地感到，自己在做了几十年的好人之后，一下给混成了个“坏人”。

6月8日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未等章伯钧说什么电话就挂断了。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个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章伯钧敢在史良面前如是说，当然是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章史两家亦亲密无间。从几件生活小事可见一斑：有一天，史良送来两打雪白的洗脸毛巾。笑眯眯道：“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见后，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叫人送来，她还带话给李健生：“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

样单做。”

章诒和更是从孩提时起，对史良的天生丽质、气度与品格，一直羡慕和崇拜得五体投地。可能在她的眼里，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与其说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她更像是个英格丽·褒曼或白杨那样的电影明星。她写道：“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

然而，正是当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眼里的“三美”相加的“史大姐”家里，像是有条热线和新华社通着——次日新华社发出通稿，通稿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话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80年代初，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委员活动，已垂垂老矣的李健生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前者的一个女婿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难道李大姐忘了吗？”

当然这是后话。还是回到6月8日这一天上来，从史良家出来，郁结的心情稍稍得到排泄的章伯钧，不禁想起这一天，储安平在《光明日报》总编辑任上仅仅干了68天，比起两个多月前不冷不热地在报社介绍起他来，显然这时的章伯钧对他有了相当的认识。可能突然有些不放心的章伯钧决定去看看他。储安平在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的家，实在是不好找，但章伯钧依稀记得听人说过他家对面有一个“正兴石油商店”，寻着这个标志总算是找到了……

客厅不大。好一阵默然。章伯钧欲言又止，从他看去了几百年后的超脱中，我们便可感到他对于现实想法铅块般的沉重。既像是自己心迹的流露，又像是相濡以沫，他终于开口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槛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

腾的话语，简洁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性之光。在储安平的死寂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人，还没有……”

在1957年6月8日这一天——

不知有多少人轰然坠毁，脚下的绿草红花遁去了，只剩下一堆幻影、逻辑和记忆的散乱的碎片；

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了力量，没有了意志，没有了希望，好似森林里一种又白又圆的小蘑菇，只要轻轻一触，它就变成了粉末；

不知有多少人预感到此后自己将微弱似山门的蕨草，以一片片黯淡的叶子，计算着每一个苦雨浸濡的长夜，每一回清霜覆盖的寒晨……

不仅仅是开始进网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死于1957年6月8日。

20 非“阴谋”而“阳谋”

在这一年的五六月间，中国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统战部门，一边以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热情，召开着消耗了千万吨茶水、千万吨纸张的座谈会，一边又频繁地接受着来自北京的雪花般绵延不绝的秘密指示……

真可谓是夏天里的冬天。

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地报刊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对于一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

5月15日，毛泽东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下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文章指出，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还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新党员，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连在一起，亲如兄弟。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0%。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文章强调，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并提出，右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何去何从，主动权只在一个短期内掌握在右派手里。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指示中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要根据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

指示认为，在整风运动已经展开的北京、上海等地，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翼分子反动言论的同时，特别注意登载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

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指示说，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要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指示认为，反动分子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指示说，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机关、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场大仗（战场既在党内，也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

指示说在北京条件已经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这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

一张非“阴谋”而是“阳谋”的大网，便这样一经一纬地加速编成。

所谓鼓动鸣放、号召向党组织提意见，便成了·一家原本只有在恐怖小说里才存在的婚姻介绍所，它专事推出光彩照人、两颊酡红的

“真诚”。谁信任这“真诚”，并随她而去，谁就等于签订了一份死亡合同书；谁怀疑这“真诚”，并扭头离她远去，谁就能在风声鹤唳里苟且偷安……

所谓整风运动，便没有了春风中冰凌的解冻消融，阳光下禾苗的拔节扬花，而成了充满诡异气氛的大战前夜：一边，稚嫩的“民主”，孩子般沉浸在自己花好月圆的梦境里，宛如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另一边，一支从中世纪走来的“军队”，因为兴奋而烧得发出绿光的眼睛，好似一片片流萤，悄然出没于草地和山林。偶尔几件冷兵器相撞，发出了一阵令人心寒的声响……

所谓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便成了镜框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一个掰开来不见肉馅的包子，一位年过半百的遗孀关于少女时代怀春的梦。

试想想，当猫在玩捉弄老鼠的把戏的时候，猫怎么可能腾出爪子来清点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呢？当猎手在瞄准湖畔嬉戏的天鹅，以溅血的枪口去拓展人类新疆域的时候，他怎么会去想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占领的疆域其实已经太多……

“在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上，毛泽东在1957年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在如何“解决”上，李维汉心知肚明，并身体力行。

一系列座谈会的头几天，章伯钧并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闹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伯老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章伯钧去了，临出门前还跟夫人李健生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到了会场，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他“给中共提意见”。

章伯钧讲了几十分钟，时间上不长不短，内容上不咸不淡。最后他总结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

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未见有任何不悦之色。章伯钧大概以为对方是称许于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27年后，李维汉说出了当时为什么要采取他自己称之为的“引蛇出洞”的做法——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划为右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于是，我们便能明白，在5月底6月初的那些日子里，中共北京市市委何以频繁地召集各高校党委书记谈话——

……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

于是，我们便能明白一副儒生相的葛佩琦，何以在几天之间成为一名震惊全国的“杀人凶手”——

5月24日，他在校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了他的发言，内称：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

务……

当天下午，葛佩琦来到校党委，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聂真，情绪异常冲动地说：

“《人大周报》如此断章取义，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聂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嘛！”

下一期的《人大周报》并未作出更正。6月8日的《人民日报》却报道了他的那次发言，标题为《人大教师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内称：

“我要重述一遍，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继续腐化下去，那就总有这么一天：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又被拎起领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汗毛陡立，深知这台阶是通向绞刑架的，可他还存些许天真：党中央堂而皇之的机关报，怎会堕落成旧社会靠流言与谣言编织版面的无聊小报呢？只要澄清事实，这台阶就是纸糊的，自己还能从绞刑架下拣回一条命来……

当天，他写好一条更正，次日一早便送去《人民日报》社。

编辑同志：

6月8日你报出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取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报》无视他的更正，除了在8日这一天在发表“他”的言论的同时，就已发表了三篇批判他的文章外，《人民日报》有条不

素地将巨掌一次次地压在他的身上：14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各地工农兵群众愤怒的唾沫要将他淹没的报道外，还刊登了他的学生将他的斯文几近扒得一丝不挂的文章。15日，又发表一位著名人士写的《我对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一文……

随后，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他已被《人民日报》吊死的“尸体”上，大脚小脚纷至沓来，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跳起了盛大的迪斯科。而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将他的发言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说了一辈子假话、空话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至少给全人类留下了一句真话：

谣言说了三遍以上，便成了真理。

于是，我们也能明白被郭沫若视为“黑色文人”的萧乾，何以会在大鸣大放之时，突然被委以重用——

那时《文艺报》有三个副总编。负责文学部的侯金镜是最重要的，陈笑雨（马铁丁）负责社会生活。两人都是延安来的老党员。亚负责国际部。“大鸣大放”期间，“邻居”特地来找亚交谈，像是漫不经心向亚提出个要求，说金镜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休息一下；笑雨要去中南跑一跑。他满脸笑容地同亚婉言情商，在这个时期，亚可否出任一下执行副总编辑。还补上一句：

“一切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我不必过目。”

亚显然不可能窥知这个深远布局。但他是很犹豫的。他纳闷为什么两位党员副总编一下子同时暂歇，连这位总编辑也想撒手把刊物交给他。然而亚从来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经过反复动员说服，他想进《文艺报》以来，一直受到尊敬，也确实保证了自己的充裕写作时间。如今，总编提出这样的恳切要求，他碍于情面，不便一口回绝（这是他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磨了半天，他最后是在一个条件下答应的：即他决不直接往印刷厂发稿。一切稿件按旧要“邻居”过目。事实上，这期间有些文章如刊载在第六期上的《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5月12日出版）倒是由总编直接发

工厂的，亚连文章的来路都不清楚。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亚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亚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文洁若《“奥妖婆”自述——我与萧乾》）

文洁若是萧乾先生的夫人，文中里的“亚”，即是日语里“他”——“亚克桑”的简称，婚前文家每提到萧乾，便用这个字，婚后一直沿用了下来。而文中出现的“邻居”，则为当时的《文艺报》总编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邵荃麟。

吴祖光也是一条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

5月下旬，由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全国文联的两位领导人也亲笔写信派专人送达，请他去出席文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率真的吴祖光感到自己再不说些什么便有些狗肉不上秤了，临出门前，夫人新风霞劝他不要去，新风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以为她的这个经验在新中国早已是昨日黄花，他说：“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他老人家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大概是一副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劲头出门了。座谈会上，他只是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情绪稍有激动时，也偶尔露了一点“峥嵘”——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

他的发言在《戏剧报》上发表时，田汉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由此，吴祖光当上了戏剧界头号右派。

于是，我们还能明白所谓的“六教授会议”，大约颇近似于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的性质——

最早提出开这个会议的是章伯钧。他的秘书给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金若强打来一

个电话，内称章伯钧想通过民盟北京市委的渠道，了解一下首都几所最具影响的高校近期大鸣大放的情况，能否请对方邀请些教授，在近日内开一个汇报会。

金若强不以为然。

一来民盟北京市委深受其主任委员吴晗的影响，无论是眼下的章伯钧、罗隆基，乃至日后担任了民盟中央主席的胡愈之，都不被吴晗看在眼里。虽然在月白风清之夜，他与胡适的那段情缘，也偶尔萦绕于怀，但解放后他的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使得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人虽然资格比他老，年纪比他大，影响也不会在他之下，但恍若试管婴儿与普通婴儿的差别，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几近天然，而自己受党的重用也是不带引号的。

何况，民盟受统战部领导，部长李维汉在党内的地位也在彭真之下，而为他敬仰、也欣赏他的彭真，和他就在同一层楼里办公。他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拣起芝麻丢了西瓜呢？

吴晗每有机会，必强调我们民盟北京市委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即使在他本人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后，他似乎也嫌这把交椅会脏了自己的裤子，他来民盟中央极少，民盟中央有什么决议与指示，他依然置若罔闻。

反右斗争以后，经李维汉同意，各民主党派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联袂举行一次自我改造大会，为求声势浩大，以展现一场暴风雨洗刷过后的“崭新风貌”，没有多少人的民盟中央机关只能像其他党派一样，主要得靠北京市委的队伍。其他党派蔚然壮观地出来了，可民盟的旗帜下还是三瓜两枣。赶忙去民盟市委查问，回答是吴晗将此举向彭真汇报了，彭真未作答复……

吴晗这一被称做“腰斩民盟”的做法，造成民盟内外议论纷纷，矛盾重重，可无论是李维汉，还是民盟中央，都成了铁扇公主，不能不由着操起了金箍棒的吴晗，在自己肚子里揪肠扯胆……

二来，金若强感到时间安排上也有困难。得派人下去联系通知，对方还得有所准备，怎么能说开就开？但还是勉强去联系了两所学校，人民大学表示愿开，而北大态度消极，他立即以此为由反馈给了民盟中央：此会难开。

很快，金若强收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闵刚侯，时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当过司法部副部长，民盟中央秘书长。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身体不好离休养病，“文革”初期病逝。这时，他与胡愈之、李文宜、周新民等人一样，是民盟中央里身份未曾公开的中共党员。他在电话中说：

“老金，章伯钧提议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已做了安排。会议定在明天开，地点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你也得来。有一点现在讲清楚，这会不要当面做记录，可你得用脑子记，会后我们一起再搞份文字记录……”

第二天上午，金若强去开了会。会后，他凭着记忆搞了一份会议记录，交给了闵刚侯，由他们进一步补充去，他当时以为会上不做记录，为的是打消人们的顾虑，而会后追记，则是民盟中央需要这份材料存档。

他决没有这样的想像力，即自己刚做完的不是一份文字材料，而是在参与制作一枚将置章伯钧和六教授于死地的炸弹。他们不是决定由钱伟长去统战部走一趟，并请史良转达总理能否拨冗跟他们见一次面吗？无论是去统战部，还是想找总理谈一谈，他们要反映的都是自己对目前首都高校鸣放形势的几分忧虑，以及作为共产党的挚友，民盟得站出来为党讲话为党排忧的真诚愿望，这里会有什么不可与天下人言的奸诈和诡计呢？

直到这枚炸弹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爆炸开来：

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会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金若强才意识到，不但在想像力上，自己是个侏儒，闵刚侯则是位巨人；而且在导演兼剪辑水平上，闵刚侯也有相当的才情。

7月3日，为了与1日的社论相呼应，《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闵刚

侯写的一篇长文《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该文说，章伯钧和这些到会的教授们在紧急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一致认为，成功地反对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并称：

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条大船一定会被掀翻。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到处散布各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此煽动人民群众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其目的企图是在这条大船上钻几个孔，使大船倾覆得更快。

从5月中旬，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反击社论出来之前，党的各级组织大抵都在忙着“引蛇出洞”，好似一幕大戏即将首演的后台，化妆师、服装师、美工师们怀着半是紧张、半是兴奋的心情，在各自的行当里精益求精，纵横捭阖，以便开场铃声一响，即往台上隆重推出各个品种齐全、打扮齐全的“右派分子”。

可我们也不能排除在这期间，有一部分党的干部，或是出于良知，或是出于有利于日后工作的考虑，或是出于个人的友情，还也许在这之间兼而有之，他们也确实保护了一些人——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眼下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神态急急，步履匆匆，已经走到了后台，硬被李维汉给打发了回去：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回忆与研究》）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郑少文，虽名列部长史良之后，却是部里主事的人物，必要时，有资格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天，又通知他去列席会议，会上恍若放了一部惊险样式的电影，他看到一列高速运行、车厢里正播放着圆舞曲的火车就要出轨，一幢被霓虹灯装点得好似水晶宫般璀灿的酒店即将爆炸，但他不能向沉浸于美妙旋律的乘客和痴醉于壮丽灯光的旅客打声招呼。会议结束时一再强调，与会者必须以党性担保，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

在“党性”的炉子里，他宛如一只剥光了毛、无所作为的北京鸭，可良知不甘心就这么被烤成一汪油来，它驱动着鸭爪最终还是在半空中划拉了几下，在部党组会上，他说：

“我老生常谈一句，我们党组成员都是党员，虽然现在上面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但我们谁也别忘了自己是党员。”

就这么一句话，司局长们在整风运动中都成了水泼不入、刀插不进的铁狮子。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一旦灾难来临，要从这灾难里解脱出去也得按照你的级别：在列车里不坐在软席车厢里的人、在大厦里不住在高层上的人，郑少文无法打招呼了，只能婆婆泪光里，看其纷纷出笼，翩翩划水，最后一一撞上枪口，跌落网里……

周扬虽是中宣部副部长，在文艺界一言九鼎，在党内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在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三天后，即5月18日，才获悉毛泽东肚子里新的打算，他一天也未耽搁，当晚就给邵荃麟打了招呼。此时，恰好黄秋耘也在场：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顿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色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

“嗯！嗯！”

最后只说了一句：

“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哎，转了！”

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

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

“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

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说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黄秋耘《风雨年华》）

需要情报，还得是“准确”、“及时”的情报，这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在阳光朗照、江山明媚的社会主义中国？

还是在战况瞬息万变、惊魂裹有一层淋淋冷汗的火线指挥部？

抑或是在庄家于变幻莫测的价位中，好似大鱼玩弄虾米般玩弄中小散户的股票市场？

如果，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凭着诚实的劳动、自由的思想，去获得自己安定的生活，而只能靠着是否能在几分钟之间打探得某种消息，才能得以苟全政治生命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被阴谋如乌云般深深笼罩着。

如果硬要说这一阴谋是“阳谋”的话，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阴谋，尚需提心吊胆、噤噤嚅嚅、左顾右盼。

而“阳谋”，因为有权力的强有力支撑，则能大张旗鼓、振振有词、一意孤行。

而且，阴谋只会造就一个罪恶的小集团，或是一支林立果式的别动队来；

但在这大面积的“阳谋”之中，我们将会看到：投机心理，明哲保身心理，更有落井下石、顺风扬沙等人类最为卑鄙的品质，便会毒液般大面积地侵袭人们的血液中，从而造成这个国家大面积的道德滑坡……

21 突然冒出来的六条标准

现在，我们得探寻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四次整风历史上，惟有这一次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运动，在破尽重重阻力、刚刚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何以陡然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为本书的写作，我发现——犹如提起中国革命，人们就会提起杜鹃喋血的井冈山，霜天寥廓、秋风呜咽的万里长征，和高原上雄浑无边的黄土好似惊涛一般拍打的延安；只要一提起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1957年，便是几代知识分子们一个魂牵魄绕、挥之不去的话题。

是1957年像个斯芬克思之谜，坐落在他们无法绕过的精神历程上；

还是在历史收下了几十度的春华秋实之后，还很难说人们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梦魇？

我能肯定并为之感受良深的只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以为1957年和1966年一样，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精心炮制的几件史无前例的作品之一。换言之，即反右斗争并不是在这一年的五六月间狂飙突起的，而是早在这之前便写上了他案头的台历。

从毛泽东的人生观、哲学观来看，在雄险新奇的斗争中求得平衡、创造、发展，并充分满足自己的使命感、愉悦感，是他毕生都在努力追求的社会境界与人生境界。

1913年，年仅20岁的他，在《讲堂录》里这样勉励自己：“夫以

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四年后他读《论理学原理》，又在批语中对刘邦与项羽不共戴天、汉武帝与匈奴逐鹿大漠、魏蜀吴三国草木皆兵……赞叹不迭：每当其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写进历史，则“令人喜读”。相反，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承平之世，如长缨般的雪亮斗志，被漫世的绮靡之风日渐剥蚀，写进历史，则让人“殊厌弃之”……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中国的大地上做完了最终的较量后，他的心理屏幕上那起伏不定的曲线，并未得到一江秋水般的安宁与舒展；他的思想雷达里如果失去了异常光斑，他的大脑似乎便会像孙猴子被唐僧念上了紧箍咒一样巨痛不已。

他面前必须站有敌人！

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里，他必须发动一次又一次战役！

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一直讲工农是这个政权的基本群众。

这个政权的敌人呢？蒋介石在叫嚣“反攻大陆”，可他的话还不及台湾海峡的风涛，真能在东南沿海撞出一片轰响的浪花。美帝国主义固然不可一世，但是志愿军将它赶去了三八线外，这证明毛泽东的“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的论断有着牛顿三定律的科学。

地主、富农还在，但在土地、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他们大抵只剩下一顶肮脏的帽子，给压在子孙们的档案袋里。资本家还在，可好似一下油锅便炸得鲜红的龙虾一样，他们几乎在一个夜晚，便将几代人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产业，纷纷交出去“公私合营”……

他们成不了毛泽东的心头大患。

从他建国后一次次发动的批判和斗争里，可以看出，他可以叫山河变色，他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变了同样的颜色，却始终心中无底。他可以没收一个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他对于知识分子植根在脑袋里的私有“生产资料”——知识，却始终未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打击良策。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知识分子是工农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一想法还只是电花石火，那么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这一论断已经根深蒂固：

在所有制领域的革命完成之后，思想领域内革命的主要对象便是知识分子。

波匈事件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两个必要性：一个是党牢牢掌握枪杆子的必要性，另一个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惊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训正在于：成分复杂的军队，与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联起手来，置工农政权于血泊之地。

在中国，这支大抵是农民出身、并跟着他二十多年里南征北战的军队，没有丝毫让毛泽东不放心的理由。他像熟悉农民一样熟悉这支军队。他像钟情于农民一样钟情于这支军队。即使有彭德怀、林彪这样功高盖世的元帅跳出来向他挑战，或是美国的原子弹打到了中国，把地球击穿了，乃至将地球炸毁了，他如果不得不重上井冈山，他后面还会跟着这支铁骨铮铮的军队……

在中国要出问题，便出在知识分子身上！

多半毛泽东觉得再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去进行批判、斗争，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已经显得杯水车薪了，工农政权必须正面地、全面地与知识分子做一次大规模的较量，这既可以彻底卸去这颗“定时炸弹”上来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从由于合作化运动造成的农村各方面紧张关系上，转移到新的兴奋热点上来。

在这一热点上，与在经济问题上他总感到力不从心相反，他的思维极易转换成战争思维：诸如5月15日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步骤；6月8日强调这场运动是一场“大决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7月9日又指出大字报是“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而他只要一进入战争思维状态，犹如春风中缤纷的花雨，他便会涌出无限的才思灵气和摇撼山河的魄力，从而振兴他本人1955年以后一度疲软的威望。

是否真如此，不妨姑妄听之：有人分析，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他在全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一不是毛泽东在作“诱敌深入”的战略假象。

最典型的例证是第二个报告，它的录音传达，睿智、通达、亲切、不带一点强权味和八股味，浑如一盘梦幻曲的磁带，舒缓地行进于人

们心灵最敏感的部位上，涟漪般地推及全国的大江大河，也不放过小溪小潭，从而最大规模地调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露出水面的热情。

然而，这“鱼饵”好像是砒霜外面裹了一层白糖，刚进嘴里，也许尚未到胃，便让你叫苦不迭。

1957年6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华沙记者西德尼·格鲁森从波兰共产党那儿弄到的这个讲话的原本。毛泽东显然不想让这个已与中国国内陡转的形势大相径庭的文本，搞乱全世界的视听，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讲话的官方文本，人们惊异地发现，前一个文本里“删”去了后一文本里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在大鸣大放里人民如何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些标准看来明确，实际上却泛而无际，随时能按掌权者的意志演化出60条、600条来。储安平这样鼓噪“党天下”的大鱼钻不过去，你对某个党员、某位科长提有批评的小鱼，也难钻了过去……

好似进了外面贴满“出血价”、“跳楼价”广告的超级市场，让你尽兴采购一阵，当抱着一大堆商品来到缴款处时，收款小姐神情异常优雅地告诉你，所有货架上的价牌上都少写了一个零；

几近给你服了一帖海洛因，让你迅即堕入光怪陆离、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幻境之中。在一台特制的设备里，一盒录像带录下了你所有的

幻境。最后这像带放映在法庭的屏幕上：根据你带枪上了飞机，判你一个劫持飞机罪；或是你跟人家的老婆睡觉了，判你一个强奸罪……

此外，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还比比皆是，比如：

前一个文本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在后一个文本里变成：“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前一个文本里：“百花齐放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只要不搞秘密团体”，在后一文本里变成：“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后一个文本里没有前一文本中对某些人“左”的错误的颇为辛辣的讽刺，以及对王蒙等人的作品的热情肯定。

后一个文本里不见了前一个文本中对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人们的严厉批评，多出了“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章伯钧不能不瞠目结舌！

作为现场的洗耳恭听者，本指望靠着毛主席这篇讲话的公开发表，多少能够“漂白”一下自己，及至看到正式文本，他不由得惊呼：

“完了、完了，全变了！”（见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最清楚答案的，自然是章伯钧这样亲耳听过毛泽东讲话，或是听过这讲话录音传达的人，他们却拿不出答案，因为在4、5月之间，宣布了一条纪律：所有当场做了记录的人，都必须将记录交上去。即使拿得出答案，或是以群体的名义站出来证实毛泽东当时就是这么说过，也无济干事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人类理性法庭上的一件官司，这时奉行的已是大森林里弱肉强食的铁一般原则了……

尽管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盛产过五花八门的文字狱，可你还是会

惊叹这是一张多么巨大、而且网眼设计得多么严密的网呵！

尽管世界上决不会有哪一部军史去记载这一场以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战役，可你还是会承认这是一次多么漂亮的由“诱敌深入”到“聚而歼之”的战略转折呵！

决不是对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作调侃之言，在本书的采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对毛泽东在五个星期的自由批评之后陡然作出的急转弯，作如上之想，尽管可以理解，也貌似成立，但是否太情绪化、太脸谱化，因而对毛泽东有欠公允了呢？

一个在青少年时代便立志解祖国于倒悬、救人民于水火的职业革命家，一位终身有着巨人情怀、视古往今来为袖里风云、中国与世界为掌上乾坤的哲学家和诗人，一颗梦里也常常让工农群众激动得笑醒，乃至泪水溢出眼眶的红太阳，为了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以及加起来决不会超过十万人的九个党派较量，何至于连篇累牍地发表一次次庄严的宣言，又不辞鞍马劳顿地南下游说各路诸侯？

根据毛泽东在这之后的两次南巡，分别发生在“文革”前夕他起意要从中南海里放逐刘少奇，和1971年他察觉到林彪的异动之时，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次南巡的心理动机，同样是对着他已经开始不太以为然的某种局面。

犹如风暴与黄山松的交锋，只有在强者与强者、并证明谁是最终的强者的交锋中，毛泽东才会像针叶耸立、枝干虬舞的黄山松一样，撑起自己全副的心智，并投出“杀手锏”。而他的南巡，正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运用得十分漂亮的“杀手锏”之一……

毛泽东发生于建国后的悲剧，并不在于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总戴上了戏剧舞台上乱世枭雄曹操的一副白色脸谱，也不在于他看起来有点像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弗利，此人为中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献上了一部《君主论》，书中所热情称道的切萨雷·博嘉，是枢机主教罗德里果·博嘉与其一位情妇所生的儿子。当其父当上了教皇之后，他依仗父亲的权势，也成为了公爵，并娶法国皇帝路易十二的侄女为妻，随后认定为了目的可以不计一切手段的他，运用欺诈、谋杀、阴谋、背信弃义等各种手段，将整个意大利恍若一块馅饼一样放在恐怖的油锅里烹炸……

从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悲剧在于：

建国后他的重大举措，不时闪耀着某种理性探求的光芒，并给中国的和谐与发展打上金色的希望，从而显示了在这块要搬动一块石头也时常不那么容易的国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气神儿十足的改革者；

可结果，他的新思维总好似有魔鬼附体一样，泛滥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的最大的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国后他的每一回重大举措，无不自视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它绝非什么个人或是小集团的阴谋，而是能坦荡地展示于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时间这块土地上也总山呼水唱，凤集影从；

可结果，常常蹂躏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让人民在战胜贫困的旗帜下去进一步发展贫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义下去互相厮杀。当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之时，人民再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里那个颇为孤单的身影，便会多多少少地感觉出他身上散发出的宫廷政治的气息……

毛泽东建国后在创造什么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破坏着什么。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来说，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才有了一张可以思索与探求的安静的课桌。

毛泽东建国后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疏远着人民。因此，当1976年1月，北京三十里长街上的人流，披着满天素净的雪花，以绵延不绝的哀思去一寸寸地挽留周恩来的灵柩时，人民就已经在心头开始埋葬那个毛泽东仍抱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时代……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理想与实践的分裂；

理性与感性的抵牾；

是晚年毛泽东这出悲剧的苍凉且又无奈的基调。

在1957年，毛泽东已经走进了这出悲剧。因此，我不认为早在1956年，反右运动就已写在了他案头上的台历上，即他殚精竭虑发动的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为的是搞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为“阳谋”。

关于它们被发动的背景，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心理轨迹，在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已有粗疏探讨；现在得探询的是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最终却表现为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为“阳谋”，这里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2 心情陡然急转弯

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担心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在新时代的辞典里几乎可以删去的“罢工”、“罢课”的字眼，日渐频繁地出现在党内来往的电报和文件上。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1万多名工人罢工，1万多名学生罢课……

在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

这一情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必须避免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类问题，而应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使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说，此时面对毛泽东在全国推开整风运动势如破竹的决心，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态度均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了鸣放温度趋于白热化的5月，尤其是感知并获悉首都高校校园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震荡，以及那潮头上意气风发、俨然圣女贞德的林希翎等人的演讲，昔日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也曾领导过学生运动、并深谙此中三味的他们，那份担心便如集雨多时的乌云，不可抑制地溢于言表了。

5月25日，刘少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

“……使整风运动搞得更好是每个人都应注意的问题。如果指导得不好，就可能出问题，人民会走上街头……大学和中学已经在活动

中，如果工人群众行动得慢些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工人、中小学的教员和其他群众组织也开始动员起来，我们将无法坚守阵地……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事态，那么很快成百万的人将会起来，使我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对我们将是不利的。”

对于校园里那些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没有做过工种过田、更没有打过仗的大学生们，党和政府不计他们父辈的前嫌，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给他们足以高过农民生活水平的助学金；可他们的下巴上才长出几根软毛来，或是刚刚能在大庭广众前讲话不红脸，就貌似老到地装出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政治家模样，就党和政府的事务妄加评说，乃至图谋不轨……对此，刘少奇无疑怀有深深的不满。

5月间，他对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讲了一次话，面对台下走进礼堂前才放下手里“反官僚主义”小旗的大学生们，在给他们以某种嘲讽之外，他似乎也不自禁地视毛泽东就在眼前，表露了自己对以反官僚主义为首要目标的所谓“整风运动”的强烈抵触——

人们说，“好极了，你们是党员。但是你们夸耀自己是老战士，并且还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这种评论并非不真实。

然而你们呢？你们不是党员，你们生来就居住在城市，你们是否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呢？我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高——我仅仅是个中学毕业生。我昔日的同学，有些已经是大学教授了，他们有没有一点官僚主义呢？我认为，那些从不是党员、从未在山区待过的人，可能受官僚主义的影响更深——并且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我们呢？仅仅是受到一点官僚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即便有，也非常少……

刘少奇的这种情绪，在党内显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是党员非党员、文化高抑或是文化低的人都会沾染上的官僚主义危险呢？

还是匈牙利事件业已证明了的、猎犬般随时企图冲上来咬断社会主义咽喉的资本主义危险呢？

人总是不那么乐意听取反面意见的，与一般人稍有不同的是，相当多的党员和高、中级干部，他们不仅是不习惯听到不同的声音，还

几近从骨子里认为对方没有资格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一个自视为新社会的缔造者眼里，除了工农大众以外，其他阶级、阶层，大抵都是那个已被钉进棺材里的旧社会的飘零子弟……

天鹅湖畔可以接受来自南美洲丛林里的响尾蛇，但得先把它毒牙拔下来；新社会已经收容了这些破落户，就该从政治上抽掉他们的脊梁骨。倘若他们还在那里肆意置喙，尤其是对着革命的象征、真理的化身——共产党品头论足，除了表现他们正在积极聚拢自己政治上的钙质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意味吗？

现实生活里似乎又反馈了这方面的信息。

据新华社6月20日报道：

6月17日早晨零点十分，北京市报子胡同12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的住宅里，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炸弹是用火药、铁片、滚珠等制成的，爆炸时曾将窗上的玻璃炸碎，落地后曾经起火，但经住在室内的人及时抢救，损失极小，也没有伤人。报道断定炸弹是反动分子从临街的窗户投掷到屋里去的，并称北京市公安局对这个案件正在侦查中……

据新华社8月5日报道：

6月12日、13日两天，在湖北省汉阳县，一小批反革命分子利用该县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了一千多名学生举行罢课及暴力活动，他们冲进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捣毁国家财物，殴打党员干部，并张贴反动标语：“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打倒县委会”、“毛主席要下台了”、“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

虽然这类公诸于报端的事件，都发生在6月8日之后；但能意料的是，在6月8日之前，在中国这么一大片国土上，要搜罗些令人想起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猖獗气焰，如同在鸣放终于被烧得开了锅之后，要获取知识分子已经蜥蜴般变色、民主党派几近沐猴般雀跃的证据，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它们一定似壮阳药物被服了下去，使

党内反对整风运动的力量更坚挺了。

据罗德里克的分析研究，在整风问题上，政治局委员中，支持毛泽东的有9人，其中态度坚定并能积极参与辩论的只有5人；而他的反对者也有5人。考虑到政治局候补委员虽不能参与政治局内的表决，他们的政治能量却不能低估，这样连同他们也算在内的话，站在毛泽东一边赞成整风的有11人，即：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陈毅、李富春、贺龙、董必武、李先念（罗德里克认为，董、李两人虽绝对忠于毛，但在此事上态度有些动摇）、陈伯达、康生；对整风表现冷漠乃至持反对态度的有9人，即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真、彭德怀、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此外，还有罗德里克无法确定其观点的刘伯承、罗荣桓两位元帅。（以上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中国，要准确弄清某些政治事件，比如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或者高级人物们在这之中真实的态度，几近于站在3月的春水边，要弄清水里活活盈盈的蝌蚪是雌是雄一样困难，更何况一个外国人？

将陆定一划在毛泽东的另一边，似乎就大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即使朦胧如云遮雾绕的庐山，也总有满目青葱的时候。好似一只勤勉的书虫，在中国当时及“文革”时期一地鸡毛般的官方、民间报刊资料里，爬去十几年光阴的罗德里克先生，起码“啃”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随着整风运动将一面巨大的镜子耸立在党眼前，并在这镜子里展示出一个脸上、肩膀上沾有历史灰尘的影像时，在中央政治局里，因此而清醒起来的人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甚至还因此失去了往日决意要在河山已定的中国一心发展经济的清醒，又将一块“运动”的石头紧攥在手里，只待合适的时机便向那面镜子砸去……

省一级领导也大抵如此。

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书里，引用了一位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的话说，“毛主席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在这场内部危机中，电报雪片般地飞来，所有的电报都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

罗德里克也在上书中写道：

无疑，一部分电报出自省一级领导人之手，他们担心批评的迸发会使自己的下属官员们威信扫地。有证据表明：至少有9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这9个省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以上。在这些省份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

周恩来一定看到了天边越积越厚的乌云，脚下越堆越高的石头。

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已发出一连串秘密指示之后，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社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此时复杂的心境，内称：

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急需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应该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这样做，希望大家也这样做。

6月3日，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在这之前，他曾分别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否要在这个稿子里表示出党即将要进行反击。

毛泽东在审阅了稿子后，仍不愿意提前几天披露出自己的“阳谋”来，他只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即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则对李维汉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作了这样的表示，你也可以讲。似乎周恩来是想通过李维汉的嘴巴打声招呼，在这中国的政治原野上每一刻都有“飞蛾”在浑然不察地扑向一堆危险的篝火之时，能提前几天悚然于这危险，不算太早，可也不算太晚。如果李维汉真这样讲了，起码不会有三天后的“六教授会议”……

仅仅是因为来自于党内强大的压力，毛泽东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

衷。九年之后，这压力更是强大到让他在政治局里几乎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可他依然发动了一场置党于九死一生境地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年多来他迸射激情的火苗的初衷，正是在党内压力的锻床上逐步成型的。

导致毛泽东陡然作出急转弯的，是否首先是他的心情作出了急转弯？

当初他坚信通过建国这些年来他亲自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批判和斗争，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造，他更坚信自己不是斯大林，不是拉科西。因此，在这场整风运动里，他不会失分，相反，当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清除他所缔造的党身上的腐败，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尘灰，以及批评那个庞大、纷繁的体制对于人所隐含的异化时，他们更会发自五脏六腑地感知他的英明与博大。

他早已习惯于登临天安门城楼，以一种谦虚得似乎不为所动的面容，去垂听广场上芸芸众生们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在当前他眼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充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别动队的时候，毛泽东似乎更看重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们火辣辣溢于言表或是水滔滔奔涌于胸的称颂……

在这同时，他预料在整风运动里失分的，只会是被“八大”的石芯试纸试出了心灵真实颜色的某些同事。

结果，整风运动却释放了比他预计更多的不满和牢骚。这不满和牢骚并不仅仅于冲击他所期待的目标，它们也针对建国以来他在经济领域的诸多主张：诸如马寅初提出根据1956年冒进的情况，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得放慢一步。陈叔通要求中央检查一下8年来的经济工作，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张奚若将党在领导建设事业方面的缺点，总结为“四种偏差”，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则干脆点名毛泽东，“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作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它们还着力冲击了建国后他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并以为他们从中得到了相当程度改造的一系列运动、批判和斗争，以及由此在新中

国开始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的文化形态。

你可以拿走贾宝玉的许多东西，但你不能摘去他脖子上的“通灵宝玉”。

孙猴子可以给唐僧提一些意见，但决不能对他不时给自己念上一段紧箍咒表示不满。

在毛泽东眼里，这些运动、批判和斗争，从来不是可以从共和国的耳朵里掏走的耳屎，腹腔中截去的盲肠，而是标识一种革命精神、一种政权性质的共和国的呼吸。

而且，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没有谁能比毛泽东更本能地感觉：在中国从来没能像在俄国一样赤裸裸地穿起理论外衣的民粹主义，在分量上却和披着威武雄壮的金属铠甲的马克思主义没什么两样，它一旦被撼动了，便无异于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

毛泽东的愤怒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愤怒之外，一生中很少有过沮丧的他，或许他还得像咽下射出满口酸水的青葡萄一样咽下沮丧：他精心清理好的一副牌，关键时刻却让对方得分、自己失分了。他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尽管众多的知识分子随后有了被一个“阳谋”愚弄了的感觉，殊不知在这之前，毛泽东多半就有了一个遭知识分子欺骗了的感觉……

此刻，他一定看到了：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所掩护的一个个“斐多菲俱乐部”；

此刻，他脑海里无疑又重现了匈牙利事件的腥风血雨中，那些曾铅块一般压迫他心脏、雷电一样刺激他瞳孔的镜头……

如果说是毛泽东心情的改变导致了国内形势的急转弯，那么，他在这心情的笼罩下，目光再度投向1956年以来风雨未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种似曾有过犹豫至今才得以明确的结论，则更使这急转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力度，即从长远看，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受其害。

尽管大鼻子的赫鲁晓夫，不久就被毛泽东视为当代修正主义营垒里最阔的烟筒，可在这时——1957年5月，这座“烟筒”，却与毛泽

东手里的烟卷冒出了同样的信息：赫鲁晓夫断然宣布，在苏联结束伏尔加河春汛般汹涌地送走一个时代、也将他本人送上政治顶峰的“解冻”文学运动……

我们还得进一步发掘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心理与心情有联系：心情是太阳光的话，心理则是紫外线。心情是情侣间的肌肤相亲的话，心理则是双方最敏感的动情点。

心理与心情又不是一回事：心情会依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可心理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植根于灵魂的隐秘处，在不同环境下的区别，只在于或是继续蛰伏，或是骤然吐露。而且，心情不一定能表现性格，但心理却绝对营造性格。

李维汉这样回忆到，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反右，李本人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他都及时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5月中旬作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时：

……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本人也是通过这次汇报，在毛泽东紧拧的眉头下，才开始有了反右的思想准备。

罗隆基的这几句话，无疑似刀尖一样捅破了毛泽东心里早年的一个旧伤疤——

13岁以前的毛泽东，放过牛，砍过柴，帮助父亲种过田，读过私塾，记过买卖小账，干着所有农村的孩子都干过的事情。一直到17岁时，他才走出闭塞落后的韶山冲，得以避免其他的孩子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死于斯的命运。

对于这个高1.82米，爱吃辣椒，操着一口浓厚的湘潭口音的青年，外部世界将其视为呼风唤雨、应者云集的英雄，那还是几十年后



毛泽东和的柳
亚子在北平。

的事情。在这之前，他未少白天揽着只影，晚上枕着孤独，他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过征友启事，可应者寥寥，仿佛他充满激情的呼喊，不啻于长沙城里一片悠悠而下的黄叶……

当他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穿着绽有补丁的青布大衫、挑着书箱走进北京城时，冷眼也未少似雨点一样，向他已拥抱了中国的滚烫胸臆打来：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一个月薪8个大洋的助理员（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是200至300元），他因用一手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招致高级职员训斥。他多次在胡适、周作人等人来馆里借书时，以特别周到的服务与特别谦恭的微笑，期待结识这些誉盖京华的名教授。他们却几乎从未正眼瞧过他，连讲几个字也极吝惜，好似从他们口里飘出来的不是汉字，而是金末。

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埃德加·斯诺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西行漫记》）

即使在他就要当上杨昌济教授的乘龙快婿时，他在杨家，有人敲门他去开门，进来的是梁漱溟先生，对方向他点了点头，便算是打了招呼，径直离他朝客厅走去，有如他只是杨家的一名男仆……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自卑的，那就犹如进了大观园并被众多夫人、小姐所调笑的刘姥姥，日子并不会感到有太多的难过。

他恰恰又是异常自尊的，1910年早秋，当他和他那专制、暴躁的父亲大吵一架后才得以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他写下了此生的第一首诗，这诗里便透露了他决意要如流星雨一样冲击历史苍穹的抱负：“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为此，可以相信，这类对他的漠视，更有以后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对他颐指气使，或漫不经心地评点“山沟里的马列

主义”、“游击习气”、“狭隘经验论”……都曾使他心头伤痕累累。

当毛泽东终于一了夙愿、将中国的乾坤一揽于袖中之日，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为着一种在历史上富于道德魅力的形象，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仿佛胜利者放弃了胜利的特权；其实，他却从未对旧日的伤疤冰释于怀。

他的自尊是强悍的，也许他的自卑也是深刻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一旦有人触及到他旧日的伤疤，他何以勃然大怒，肝火顿升，犹如电闪在雷霆之前，几乎未经思维，一个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念头，便在脑袋里炫然而过……

我注意到建国后除罗隆基外，似乎还有一个人也触及到了毛泽东的伤疤。此人便是彭德怀。

他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就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写上了关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得不偿失”、“有失无得”等言论。当刘少奇第一次拿到这封已被毛泽东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时，他略略翻了一下，起初并不感到有多大问题，可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字眼一跳入眼帘，他的心就好似被绑上了沙袋一样，沉沉地下坠了……

果不其然，还在庐山上，毛泽东便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上，这般写道：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是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其实，比起彭德怀的信来，是毛泽东自己在庐山一个个愤海无涯、怒潮升腾的讲话和批示，好似连珠炮一样，“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下山没几天，他又心潮难平地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信中说：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党内投机分子，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他所说的两首诗是《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已被人祸折磨得许多地方饥民塞野、饿殍毙路的中国，在诗里则变得朝晖满目，葱茏一片……

我想，毛泽东在分别写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和“王八蛋”时，多半像便秘多日、在服用泻药后终于能一泻而下一样，有了一种全身通泰的快感……

他的震怒，以及他对彭德怀几近悍妇骂街似的羞辱，显然与他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词组刺痛有关。

1957年由整风而一转为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而一变为反右倾，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毛泽东心中存有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悲怨：

在罗隆基这样喝过洋墨水、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面前，他恼于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

在彭德怀这样大老粗出身、且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耻于被看做是“小资产阶级”。

其实，依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他在中

国这片土地上已有了“人间神”的效应之后，他本可以不必自卑。

有谁会去探询释迦牟尼是否有大学文凭，或是拥有博士、教授头衔？有谁会去考究摩西在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去寻找福地的途中，是否亲赴沙场、身先士卒？人们崇拜都崇拜不过来了，哪里还能从脑袋里抽出一根筋，去将他作常人一般的审视……

因为青年时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境遇，以及从来没有玩过枪的经历，毛泽东却似乎确确实实地在骨子里刻进了一种难以抹去的自卑。

人呵，即使像毛泽东这般自尊、自信与自豪可以垒出一座喜马拉雅山的人，也摆脱不掉某种深刻的自卑，由此对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便有了无尽的感慨……

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在解释历史事件的时候，无疑主要得从这一历史过程的矛盾互动中寻找结论，但又不可忽视这一过程里沉浮于胸臆的重要人物们的心理因素，尤其是像毛泽东心头的这类悲怨。

它们宛如多年前战场上埋下的炸弹，无论鸡飞狗跳，雪压雨泼，它静静地躺在地下，好似成了一堆没有生命的钢铁；可倘若它感觉到了足够大的压力，全副生命的喷涌就在这一刻了，不仅能使触弹者灰飞烟灭，而且常常令举国山河失血，风云骤黑！

纵观毛泽东从1956年以来至反右前夜的心路历程，我们不胜扼腕唏嘘——

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剑鞘里拔出来的却是一把遭农民文化锈蚀斑驳的旧剑；

有高屋建瓴的目光，但高屋又是小屋，小到只能由几只可人的鸟儿飞进飞出；

能悟宇宙，能察秋毫，却将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当成打翻了可以再去买一瓶的红墨水；

能沐大喜，能浴大悲，旷世脱俗的巍巍身影里，竟也有一段鸡狗般锱铢计较的碎肠子……

当毛泽东决意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时，他无疑也深深地陷入了一个政治上的困境。

这个困境是——

他制造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罗德里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倘若这是发生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只能掩面而泣，辞职回家了。就是在中国，倘若发生别的人身上，他的政治前途也会被这宛如剪子锋利两翼的两个信用差距，给剪得一片残鳞碎甲。毛泽东却竭力要走出这个一踩下去泥巴便翻作浪的困境，而且竭力要不以弄脏自己“英明”的鞋子为代价：

5月15日以后，经毛泽东起草，或是经他看过后再发出的犹如雪片般应接不暇的党内文件，似乎无不在向全党表明，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这都是为着“引蛇出洞”最后予以“聚而歼之”的战略假象运动。

事过几十年之后，当年直接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恐吓信好就好在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

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始末》）

6月8日以后，毛泽东则通过他亲自起草，或是经他修订后再刊出的社论，丝毫不打隔地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这里从来没有阴谋，只有阳谋，这是一条阳光下的真理——毒草只有让其出土，才能锄掉。牛鬼蛇神只有让其出笼，才能歼灭。

阶段不同了，言论转向了。在这急剧变化的时空之中，惟有他没有变化。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那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他还是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贤明君主……

天和地焊在了一起。
猫与鱼抱成了一团。
水挽着火的腰婆娑起舞。
麋鹿生下了漂亮的马驹。

你可以称这为天才的韬略，或者称其为韬略的天才，毛泽东硬是弥合了这两个本来不可调和的信用差距。

纵观建国后二十几年的历史，毛泽东常常是通过反右来走出左的死胡同。

他的威望是走出了，党的统一似乎暂时也达到了，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却一步步地逼近疯狂的动荡和空前的苦难。同时，犹如他总能由政治上的被动一跃而为主动一样，他也总能将当初主动地听了他话的党内党外的朋友们，栽进一个结结实实、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被动”！

将建国后的毛泽东视作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或视如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弗利，这有欠公允。

如上的评说他对“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是否也言辞过烈了呢？

23 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

这一节，似乎与本书的主旨无关。但我劝读者，为了回答上面的疑问，并从中感受毛泽东身上的另一种我至今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还是不妨读读它，也许你们将会给予定位。

一位曾担任过省级主要领导、记忆力惊人地好的老人，在一次聊天中告诉我——

1962年上半年，鉴于三年困难时期业已证明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极度萎缩，毛泽东当面同意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一年多大量调查研究形成的“三自一包”的新方案。于是，邓子恢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兴奋异常，到处游说。在中央党校就此作了一个报告，又去农机部作报告，在这两个报告里，他讲了两个观点：

一是在中国解决农民问题，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早了一点。现在看来，还是得暂时把地让给农民自己去种，由农民自己做主，种什么，怎样种。二是中国的农业目前不能好高骛远，还得靠一根扁担两个屁股。即运输得靠挑担子，肥料得靠猪屁股、牛屁股……

8月6日，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当晚，毛泽东便召集大家讲话，一开口，风云突变：

同志们啊，现在党内、党外刮起了两股风呀，一股叫翻案风，一股叫单干风。翻案风是彭德怀刮起来的，翻什么案吗？我在郑州会议上不是说过了吗，全错全平，半错半平，不错不平。怎么还来搞翻案呢？翻案是不得人心的喔！还有一股风，是邓老刮起来的，叫单干风。他跑来跟我说，将土地分给农民，试试看嘛。中国的农民已经试了几千年，几千年都是单干的，要试验到什么时候？所以农村工作部不该叫农村工作部，有一个名字倒恰如其分，叫“破坏部”，专门干破坏的呀，我看把它撤了算了……

人站什么立场，就说什么话。我到济南，碰到许世友，许说火车一往南开，那声音丁丁哐哐，听起来就像“大有希望，大有希望……”火车一往北开，呼哧呼哧，听起来好似“一片黑暗，一片黑暗……”说一片黑暗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张家口的书记胡开明同志，他就跟邓老这一伙是一个观点。有这个观点的，在中央也大有人在……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

次日，似秋风扫落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牌子便给摘了。

邓子恢，这位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随即被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绳索给高高地吊了起来，从此再未落地，直至1972年12月在北京心情郁闷而死。

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里，详细透露了1965年9月23日，即庐山会议过去整整六年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

这次会议的表面背景是中央决定派彭德怀去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而他坚持想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并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解铃还须系铃人”，毛泽东看过信后，当即决定次日找他谈话——

9月23日早七时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约他八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答：“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来就来吧！”彭德怀马上乘车前往，八点十五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了手。

彭德怀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向和颜悦色、专门等候着他的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那么严重的“翻案书”，被毛泽东一句话就化解为轻松了。

彭德怀说：“好！”

然后，心平气和地向毛泽东解释了他向彭真、贾震等人谈过的不愿去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

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出的三条保证：“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回乡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

八点四十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

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辞。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他感到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

此次会面的真实背景却是——

“1965年3月，美国出兵越南。中共中央在4月12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沿海为第一线，华中为第二线，第三线是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全国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经中央同意。”

“9月7日，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康生在会上讲话说：‘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

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另一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彭德怀开始结束吴家花园冷僻得几近农家的生活，向分居多年的夫人浦安修和杨尚昆等老战友一一辞行，提到毛泽东的这番起用，每每掏深情、乃至怅然泪下……而此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认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并强调：“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地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1965年11月28日，许是怕引人注目，身着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的彭德怀，搭乘33次列车，随汽笛一声长鸣，心潮半是浩茫、半是激越地向祖国的西南边陲奔去，他尚未看到已在同月10日刊载在《文汇报》上的一篇磨刀之声霍霍可闻的长文，即姚文元在江青授意、张春桥主持下写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他是在30日到达成都这一天，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篇被转载的长文。他看着看着，额头和脖子上的青筋一条条突起，好似夏季饱满的豆角。几十年来被战火熏燎得黧黑的脸膛，片刻间更黑了，宛如一柱被怒火烧透了的焦炭。他一下将报纸摔在桌上，一声嘶喊，整座胸膛都在为之共振：“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思索了一会儿。中国革命近半个世纪的各个重大事件，几乎无不藏在他脸上层层皱折里，他饱经了中国革命的沧桑与奥秘，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是缺乏把毛泽东和这篇长文联系起来的想像力。他扔给身旁的工作人员一句话：“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随后，彭德怀以67岁的高龄，不辞鞍马劳顿，风尘仆仆于内江、自贡、威远等地，了解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情况。这时，12月21日，在秋光仍未退尽的杭州，神清意爽的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说：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笔者注：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直到1967年七八月间，彭德怀才察觉毛泽东与自己的那次会面颇有鸿门宴的意味：

1966年年末他被押到北京，受中央警卫部队和首都高校红卫兵共同看押。他不会去计较在审讯过程中为追问他“为什么反对毛主席”，而对他拳脚相加、造成肋骨骨折并昏死过去的红卫兵，他视这些重新调整后被充实进自己专案组的娃娃，为一块热情的野草疯长、而历史知识却几近颗粒无收的薄田。

或许，他也不会去计较自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自己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地“揪斗”。其中六次为万人大会，七次“游街”。“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愤怒中几度昏迷。”

在北师大“揪斗”的那次，当他被从三轮车上拖到台上时，他看到了拉来陪斗的、一别又是两年的妻子，她深陷下去的眼窝里是溢不住的痛苦与迷茫。她惨遭殴打，昏倒在地，他大声呼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

此次批斗后，浦安修精神上彻底崩溃了，20天后，她独自走到王国维投水、“文革”中又是众多冤魂萦绕的颐和园昆明湖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侥幸的是被人及时发现，与阎王爷擦身而过……

我想，彭德怀对于这一“批彭高潮”的理解，最终完成于——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使得他本人迅即成为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

他自押来京后，1月与4月间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在颇为冷静地汇报自己被抓、被斗、身陷囹圄的言辞下，显然在要求毛泽东对此给个“说法”。

泥牛入海，黄鹤不回。但可以使他确信出自于毛泽东首肯的“说法”终于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

集团的决议》的播音。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想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他笑什么呢？莫不是想起了毛泽东的那番私房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滑稽……

他点头是悟出了什么呢？莫不是他终于悟到了所谓“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其实，是在“支持”他以一个陨石坠落的速度坠落于彻底的毁灭……

1974年11月29日，一位早就被剥夺荣誉与自由的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死不瞑目于一间阳光与空气也被剥夺了的黑暗小屋。

我们由此发现，虽然毛泽东可以和傅作义、李宗仁等人握手言欢，可以与柳亚子、周谷城等人吟诗唱和，甚至似乎视罪恶深重如山的薄仪、沈醉等人为珍奇的出土文物，以一种颇为优雅、宽松的心情去欣赏、把玩……

但越是毛泽东真正的同志或是战友，倘若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有哪段让他冤枉过，痛苦过，冷清过，他人约是要在心里记上一辈子的。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清楚地回忆道：

毛泽东指着张闻天对我们说：“此人曾想要我的命。”

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惟有苦笑。

毛泽东又指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

周恩来坦然说：“历史上我反对过主席，反对错了，所以才坚定地站到了主席这一边。”（见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

而一旦被视作现实政治上的对手，他更是会待之以韬晦，却不会施舍一点仁慈之心。

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明枪暗箭，目睹了河山般厚重的鲜血与死亡，以至于他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常常可以像芥末一样忽略不计。

也不仅是“他似乎认为，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有时必须强硬到近乎残忍的地步，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在毛泽东身上一定还存在着一种如同他既自尊又自卑一样深刻的心理因素。

本节未能发掘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因素，却提供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行为依据：

在政治斗争的案板上，在毛泽东的一双粉尘掀扬不止的大手下，既然很长时间里被其称为“战友”、“同志”的邓子恢、彭德怀的命运，都会被搓揉得如此狼狈不堪，乃至惨不忍睹，更遑论毛泽东眼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配冠之以“梁上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

24 辛苦了，胡乔木

对于毛泽东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胡乔木作出了官方正式的、全方位的解释。

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起草的题为《不平常的春天》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胡乔木宛如一个泥水匠，吃力而又轻松地弥补着毛泽东在党内、党外造成的那两个信用差距。

说他吃力，是因为在毛泽东威望好似长城一般伟岸而去的墙上，他需要弥补的是两个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窟窿，他得大量填进从一孔非逻辑的窑里烧炼出的却又闪耀智慧之光的砖块，还得凭一种对党内同仁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直觉，去抹平砖行与砖行间出现的将有可能挂上疑惑目光的浆灰毛刺。

说他轻松，毕竟他是高站在权势的脚手架上，除了搅拌浆灰的声音和他手里的瓦刀偶尔撞上砖块的金属声，天地间几近一片缄默。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标准、我就是标准的工程，因此他很可以进入一种随心所欲并为此而深深陶醉的境界……

不论是对胡乔木本人的文字生涯来说，还是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来说，这篇社论无疑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得一起来领略一下这经过修补后俨然有着大理石般光洁的墙面——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以致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结果如何呢？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做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做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

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做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他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胡乔木。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

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真是辛苦了胡乔木，他为1957年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叱咤风云、而且怎样踢怎样有理的毛泽东，设置了一道看上去固若金汤的球门，无论党内、党外，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这球门里得到一分。

毛泽东不会不看这篇社论的原稿，可他罕见地未作一字的修改，胡乔木大概一定从中欣喜地感到了自己此番作为守门员的坚定、泥水匠的熟稔……

十有八九，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会去在乎这非用事实而用文字铺排成的修补工程，一个事后诸葛亮汗光津津地耸起的球门。他颇为大度地接受并且参与制造了这一官方正式、全方位的解释，不过从用下线标出的他所添加的话里，我们细加品味后便会察觉，与胡乔木或是毛泽东比起来，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出于先前的态度，他显得更为剑拔弩张……

第六章 煮豆燃萁

25 “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你可以在心里称其为“引蛇出洞”的韬晦，或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现代翻版，可你无法阻挡的是，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推出的不容置辩的口气和君临一切的气势，毛泽东口袋里的那只民粹主义鸟儿，终于能在躁动不已、忍耐多年之后，陡然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尽兴地滚过大地……

新中国揭开了自己不到八年的历史上的第七次斗争。

中国现代史上驶动了第一场全面围剿知识分子、征伐现代文明的进军。

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五篇社论，同时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

声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消息，也汪洋恣肆般遍及国内大小报纸。

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乍看上去无不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逻辑，无不有五岳磨拳、四海呼应的坦荡；反右运动，一开始也很注意了自身的群众性。

眼下，人民群众虽还未享受到20世纪60年代后糟践自己的“自由”，可在批判他人的“自由”上，已经可以小试牛刀了。之所以说是小试，而不是大试，一来是犹如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样，人们只有通过日后不断深入的运动，才能感知只需泯灭良知，这事其实是再容易不过、也再时髦不过的了；二来，显然是因为文化素养的高低不同，与某些左派知识分子熟稔地运用这一“自由”比起来，工农大众运用得还比较本分、单纯。

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孟泰、王崇伦，以及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黄德茂，就是这一“本分”、“单纯”的典型。6月18日晚，似乎决意要跟上新形势的浦熙修，将孟泰、王崇伦等人邀来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在聆听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劳模们当即举行了座谈——

王崇伦发言：葛佩琦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我们工人很生气。国民党统治时，一面袋的钱只能换一袋高粱米，而我们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面。鞍钢的工人们现在有四所业余中学、一所业余大学，146个浴室及许多幼儿园。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叫我们警惕，现在不能睡太平觉……

孟泰以亲眼见到的例子，驳斥葛佩琦所说只有过去穿破鞋的党员干部生活有提高的谬论。

有一个星期天，他去鞍山市委一个领导干部家里做客，主人请他吃韭菜鸡蛋包的饺子。他问：“怎么没有肉？”主人回答：“买不到了，跟大家一样。”孟泰打听后，才知道这位领导也和普通工人一样，除过节半斤肉外，并无例外增加，这使他感到很难过。（笔者按：何等本分、单纯得可爱的批判啊。前面，王崇伦刚说工人今天能吃上肉、大米和白面，这里孟泰则说一个市委领导家里吃不上肉。倘若是左派

知识分子们的批判，是决不会露出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大窟窿的。)

孟泰说：“领导干部过去流血流汗，今天负的责任又重，他们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顾，我们工人决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工人一样。如有人问：‘猪肉少，谁吃了？’我说，是因为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大家吃了，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么！葛佩琦说只有党员干部生活提高，我认为他是糊着两眼说瞎话……”

座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十二时许，临别时劳模们还一再叮嘱记者，要其转告全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并以增产节约、促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来临的实际行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的猖狂进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付出生命和他们作斗争！

黄德茂，则在鞍山市有着1200百多名职工参加的声讨右派分子的集会上发言：

葛佩琦等右派分子企图抹杀共产党的成绩，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请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鞍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但恢复了鞍钢，而且钢铁产量早就超过了日本法西斯侵占时期的最高水平……

还有龙云，他极力破坏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叫他来鞍钢看看。在建设鞍钢时，我们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苏联派来了专家教我们；我们不能制造的设备是苏联供应的；我们不能设计苏联帮助我们；还帮助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请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给予我们这样多的帮助？说苏联这不好那不妙的人，真是坏了良心，该天打五雷轰……

工人阶级义愤填膺了，劳动人民同仇敌忾了。那种顺者昌、逆者亡的气势，逼迫得民革、民盟、农工、民进、九三学社……一个个像来不及多想的饺子，急匆匆地投去那口咕嘟、咕嘟冒着气泡的大锅里，左右翻腾，上下旋舞。

例如民盟，几天之内，全国有24个省、市的民盟地方组织致电民盟中央，要求民盟中央公开表示立场态度；民盟的许多基层组织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责问民盟中央要把民盟引往何处？那份急迫，还有

其措辞的强硬，颇有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6月18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向民盟成员和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民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了在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和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

在反右运动迅疾地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之后，它很快在走向自己的纵深性、目的性。毛泽东显然不满足让“葛佩琦”这一时家喻户晓的名字，从六亿人水波般滚动的嘴唇里滚上一遍，而后像一块嚼了几次便味道寡淡的口香糖，给吐了出去。如同他认为右派分子们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他要的是抽走他们身上的“肋骨”，而要让他们永远似软体动物一样，陷于政治沼泽地里爬不出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将他们打成集团！

惟有集团，才有组织、纲领和路线，才能冠之以“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这类阴森、恐怖的字眼，从而最大程度地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唤起全党上下的警惕；

惟有集团，才能施展抻面条的政治艺术，根据需要，要小可仅涉及几个人，要大，可从中央一直抻到基层，罗织成千乃至上万人，从而最大程度地震慑异己的力量；

惟有集团，才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让对方好似一筐沉甸甸压在一起的螃蟹，为了求生的欲望，而彼此血淋淋地撕咬，即使得以逃生了，也让你带着个永远残缺的灵魂……

建国二十多年间，上上下下、林林总总的“集团”，大约多似相声大师侯宝林身上的喜剧细胞：“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三家村”、“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

几乎每挖出一个“集团”，人民就得神经亢奋、手忙脚乱一阵，国家就得虚脱昏迷、伤筋动骨一回。可其中有几个“集团”大概像那么回事，从而能经得住历史风云的叩问呢？但毛泽东不管这个，他“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好似少男少女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只飞碟，他抛掷起“集团”的飞碟来，同样轻松而又迅捷……

眼下，毛泽东仅仅走了两步，便扔出了手上的又一只“飞

碟”——

第一步，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该文章指出：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两家在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的报纸，何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窜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上呢？

而且，这——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一是民间性质的报纸，何以会配合默契、南北呼应地发表“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呢？

这答案，即使对于只有中学生的政治智商水平的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犹如救生圈对于溺水者一样，又是对方必须接受的。

希冀不至于被彻底淹没的民盟，立马就接受了这答案。

中国搞市场经济是这十几年间的事，可政治上的市场化早有年头了，只要斗争需要，一批批优质的“揭发”便很快地从流水线下来上了市：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授意办报，于是民盟内揭出了第一条纵的反党之链“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

《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对罗隆基言听计从，于是民盟内又揭开了第二条纵的反党之链“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这两条纵链有没有横向的联系呢？

用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先生在那次紧急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来说：“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前几

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毛泽东的第二步是，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7月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这篇社论锋芒料峭，字字千钧：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由此，钦点之下，“章罗同盟”被盖棺论定了。

随即，“明火执仗”的“杀人犯”葛佩琦恍若点火的媒子，火点着后被暂置一边；而这个“同盟”及其从中央到遍及各省的成员，则纷纷被架进反右斗争的烈火狂焰里烧烤……

26 最懂方块字的人们

6月21日，罗隆基由锡兰首都科伦坡飞回昆明。

几天之前他还徜徉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情趣盎然地给女友，还有千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他此生颇有女人缘，早年结过两次婚，离婚后也一直没有断过女朋友。圈内皆知的是浦熙修，可在浦之前，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史良亦对他频频放电，目送秋波。只是在罗、浦热

恋之后，她才毅然分手，匆匆找了一个年龄比她小、资质比她低的律师结婚。罗隆基的女友，还不只这两位，当然其中有的只是彼此形而上的吸引。据说他的家中，一口箱子里专放他情感方面的日记和女人们的情书、丝发，反右斗争开始后被抄走。

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惟一可以表现自己、发泄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像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终生半辈子……（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一抵达昆明下榻的饭店，罗隆基的头一件事，就是找来自他3日出国后这半个多月的报纸。

此次出行，他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宣传部长，随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

在这个椰林鼓风、棕榈涌绿、宛如印度洋中一块碧玉的岛国，年过花甲的他，穿一身纯白的西装，结一条绛色的领带，再加上他会内会外那妙语横生、和汉语一般流畅的英语，总让不同肤色的各国代表联想起他的祖国：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她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信心和风度比起来，她的沉重的历史、曾经历的巨大磨难，便像雪泥鸿爪一样变得渺小无力……

在他和各国代表一起切磋如何在这颗星球上以橄榄枝战胜炮火之时，他决不会想到放他出国多半也是一根橄榄枝，并遮掩着一场朝他越逼越近的炮火。从6月初关于他的报道里可以看出，他的心境正舒适得好似几天后他在水天一色、细沙软浪的岛国海滨漫步：

“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里，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笔者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饭店恍若一片树叶在秋风中簌簌摇晃，可红土高原上的昆明并没有发生地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一张张报纸，都像是被打红了炮膛的火炮，是报纸上蚁阵一般涌动的一篇篇关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指控与揭发，将他打得灰头土脸，炸得心壁摇晃。

他尤其惊悸于新华社6月18日发出的一则长篇通稿，它报道了这天下午由民盟中央举行的紧急扩大会议，副主席之一的马叙伦在会上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凭罗隆基在解放后的政治经验，这“联合”一词，不啻于毁灭民盟，更是毁灭他和章伯钧政治性命的一颗“重磅炸弹”。正是这“联合”，进一步演绎成了7月1日以后的“章罗同盟”、“章罗联盟”。

这则通稿，提到章伯钧出席了这个会议，却没有发言；可从罗隆基即将要打出的三个长途电话里，我们可以断定，在这后两天里，章伯钧也被迫接受了“联合”的指控。因所寻旧报纸有限，我手边没有这后两天里章伯钧的有关检讨，但在7月4日的《文汇报》上，我读到了前一天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联合”一说所作的解释——

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章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政治联盟是否有具体纲领呢？具体纲领写成具体条文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他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

罗隆基全力撑持起自己的心壁，一连往北京挂了三个长途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章伯钧家中。拿起话筒的，先是章伯钧夫人李健生。罗隆基一听是她的声音，立马喊道：“去把章伯钧叫来！”

老太太赶紧把丈夫叫来，章伯钧刚应了一声，话筒里便炸开一连串高分贝的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你我‘联合’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你‘联合’的，又是怎样‘联’的？你说呀！你说呀……”

章伯钧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仍未移开话筒。一时间，他竟难以分清这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愤怒的质问，抑或是多少天来自己心头钱塘江潮一样陡耸不息的悲愤呼喊？

许是在这悲愤呼喊的反复冲刷下，他的心变得礁石般的麻木，他的神情也有几分麻木。他嘴唇嚅嚅了好一会儿，只吐出了一句话：

“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等你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俨然一血气方刚、横刀立马的侠客，还在下着战表：

“我明天就回北京，一出机场，我就要找你算账！”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他早年也留学美国，曾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张东荪、费孝通、钱伟长等一批在民盟内部被称之为“英美派”的教授一样，他和罗隆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后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时，他是该部的副部长，当后者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时，他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

罗隆基在电话里问叶笃义，章罗之间何以有“联合”一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叶笃义却和他一样，虽有人已称他为章罗间的“联络员”，但他对于自己何时何地执行过这一“联络”任务，也是一头雾水……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浦熙修的。

不见黄河心不死的浦熙修，如同她将孟泰、王崇伦等著名的劳动模范视为一支精干的救火队，请进了《文汇报》，便以为自己的报纸能火海逃生一样，她本人，还有《文汇报》，已站在悬崖边上，耳际阴风森森，她却不相信党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堂堂两位部长，给一脚踹下万丈深渊。在她眼里，眼下多半只是大难临头时知识分子

们为了解脱自己而撕咬别人的一场没有章法的混战。她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不要被报纸上那些邮票般大小的黑体字给弄慌了神，问题并不严重，回到北京该检讨的检讨一下就行了……

女人是水，男人是火。

浦熙修的话，一定让罗隆基感觉到了自己身上那股侠客式的冲动，当他冷静下来多半会同意她的结论。民盟内部几乎无人不晓，中央统战部也有风闻，这些年来，他和章伯钧之间歧见不断、摩擦不休，这一铁坨一般坚硬的事实怎么能化成一盆糨糊，去糊出危言耸听的“联合”一说来呢？

在我这几近四十年后的采访中，我所接触到的民盟老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为“章罗联盟”确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综合他们的回忆，章罗两位的关系，像是这样一回事——

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两人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公开争执，基本表现在对盟内事务的主张与人事安排上。说起来双方都慷慨激昂，俨然有几分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气息，可一个不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不必为中国的天灾人祸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党，一个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连活动经费都由统战部拨给的政党，里面能有多少原则性的冲突呢？无非是两人的脾性不同，以及中国人在享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后，便极易沾染上的“权力病”，也许，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们更难免俗……

章诒和先生对此这样解释——

……从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

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罗隆基先生大约是一位长处与短处都十分鲜明、而且透明的人。他性格旷达却又有时胸怀狭隘，他心无百忌、直言不讳，却又咄咄锋芒，不免伤人。据说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罗隆基可以领导一个大的运动，但交不了一个朋友。”梁先生的这话未免太刻薄，而且也前后矛盾：既能领导一个运动，怎会交不上一个朋友？

不管怎样称呼这个小集团，但在罗隆基的周围，始终有一个朋友的圈子存在当是肯定的。他们均留学于英美，在民盟内部被称之为“英美派”。而且如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叶笃义……一个个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翘楚。

罗隆基显然以此为自豪，并苦心“经营”这个圈子，对这批朋友们给予了尽可能多的关照和提携。但在这个圈子之外，他多半发自额头上的目光便好似蜻蜓点水了，别说一般人，对号称党内“大笔杆子”的胡乔木，他也不以为然。对从山沟里千辛万苦走出来、自学成才的华罗庚先生，他亦存有某种偏见……许是喝多了洋墨水，偏偏他又不会像众多的国人一样虚与委蛇，他若藐视一个人，则多半要公然藐视。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储安平到《光明日报》赴任时，决定将报纸改版。他先去请示了担任社长的章伯钧，后者对此讲了十三条意见，他听得心花怒放，跃跃欲试了，可后者又交代说：你还得去老罗那里一下，因为在民盟中央里是他分管宣传。

储安平又去了罗隆基家里，听完对方的想法和章伯钧的意见，罗

隆基顺口就犯下了在中国官场上即便是个白痴也难犯下的忌讳，他说：伯老的这些意见，作为框架是不错的，但要有可操作性，你还得靠我将它们细致化。

与其说储安平感到了他在自夸，莫如说感到了他自夸时孩童般毫无羞涩的可爱。

他又说，我开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文教、科技界的一流人物，可以组成《光明日报》的智囊团，你去把他们请来，我们就改版开一个座谈会……

储安平按罗隆基的意见办了。几天后，名单上的人都被请到了罗隆基家里，大家刚刚在客厅里一一落座，门外走进一个名气不算小的作家。不知是储安平在名单之外自作主张请来的，还是作家自己撞上门的，罗隆基刚刚还眉眼活泼、面容生动的脸，一下便水泥似的凝固了。他缄默不语，不宣布开会，又不作任何解释，在众人一片投向他的纳闷目光中，他的目光冲破重围，利剑一般直指那位作家。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直到作家终于晓谕到自己眼下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不搬开这块石头，客厅里就将有永远的缄默，才蹑蹑离开了……

储安平过意不去，送作家出门后，对罗隆基说：

“老罗啊，你这是何苦呢？不就是开一个座谈会吗，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开会……”

罗隆基的脸上，丝毫不减严肃：

“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光明日报》智囊团的成员。他算什么作家，不过是一个语文教员，远没有进智囊团的资格和声望，我不能不请他走！”

做党派工作的人，倘若不能容人，不会讲究妥协，那就不如去做山林田园里纵情放性的嵇康、陶渊明，可历史偏偏又给罗隆基打开了一条政治家的通道。这种个性与命运的深刻矛盾，大约恰恰就像章伯钧对待他的颇为两难的心境：

一方面，胸襟较为开阔的章伯钧始终认为，与罗隆基相比，自己先天不足，以政治家最需要的口才为例，早年给学生上课时一上讲台脸就潮红，话也讲得疙疙瘩瘩起来……自己的政治素养与才能，是在

日后几十年错综复杂的政治风浪里给训练出来的。而罗隆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才华像是天生的，不但在政治学和法学上，当今中国没有人能与他比肩，就是在洞察力的犀利和文笔的练达、深刻上，即便是名教授的费孝通、钱伟长，和他放在一起，也会黯然失色。凭他的才华，凭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以及他周围像星斗一样熠熠彪炳于中国知识界的朋友，作为成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民盟来说，不但得海容他，而且在许多事上还得仰仗他。

另一方面，实际政治活动经验极为丰富、老到的章伯钧，又远比罗隆基清楚：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没有分寸感的政治家，就像摸遍全身也找不到乳房的女人。你只能要求自己孩子的目光里溢满诚实，你不能要求政治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像罗隆基这样直言无忌、宁折不弯去搞政治，在旧社会些许能做个到处掠起红色旋风的自由的“哥萨克”，但到了新社会，便有几分似未掌握好平衡术就走上了钢丝绳的杂技演员，哪怕再心高气盛，总有掉下来的时候……

此外，章伯钧可能还有一种被威慑感，开国后他当部长在前，罗隆基当部长在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隆基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他身跨两个党，在农工党是主席，在民盟是常务副主席，罗隆基当上民盟副主席只是1953年后的事。

他不会不清楚个中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1947年以后，罗隆基和张澜、史良均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就剩下了在香港的沈钧儒和他。以后，他和沈老由香港到东北，再转曙光朗照的北平，按照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以迎接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倘若不是这样一个原因，罗隆基的政治地位不会在他的之下……

犹如金钱对于葛朗台，权力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这样一种东西：得到了的就不想再失去，未得到的还想再得到。从罗隆基多年来对自己所持的不合作态度里，还有他在貌似名正言顺的理由下将朋友们一一提携到民盟各级重要的位置上，章伯钧察觉他对自己在盟内的地位早有挑战之意……

当然，以章伯钧的胸襟，还不至于视之为“与狼共舞”，可也决不会掉以轻心。

对罗隆基，章伯钧一边尽可能地做到尊重他，逢有大事总是找他商量；另一边，又戒备他，如有了合适的机会，章伯钧也未免不乐意在他历来良好的自我感觉上敲打一顿。

张东荪“里通外国”事件出来不久，适逢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章伯钧肯定了解，1949年张东荪还在多方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对和平解放北平立有大功。难道仅仅过了一年——1950年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共产党？他虽然不希望中共外交完全倒向苏联一边，但也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

而且，平心而言，章伯钧也感到：

“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胡适就非常佩服罗生，连沈衡老（沈钧儒）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罗生即获答案。像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罗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但章伯钧还是抓住罗隆基与张东荪交往频繁的关系，以及罗隆基的名利思想，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不重不轻地干了他一家伙。被浪花湿了羽毛的鸭子，上得岸来抖抖双羽，立马身上就不见了一颗水珠；罗隆基虽难过了一阵，但不久他破损了的自我感觉不仅修补如新，而且更皮实了——他当上了民盟中央的第二副主席。由此，不但两人的摩擦更加趋于表面化，似乎罗隆基那个圈子的人对“伯老”也视为路人。

《文汇报》驻京记者们注意到，常常来该报驻京办事处满足自己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的“美食家”里，从来不见“伯老”的影子，即便是待人接物力求持平和态度的浦熙修，对章伯钧，也有几分

微词……

连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章诒和也发现，那个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看上去比父亲还要小五六岁的罗伯伯，父亲对他似乎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到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对于章罗之间既有对峙、又有合作的关系，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是：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二十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并且有过多次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今天的合作，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新结合。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的主观见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个性和作用是决不相同的。我们今天的感情并不是真正融合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一次，这就说明我同章伯钧两人合作的真相内幕了……

……民盟四个副主席是分工的。章伯钧负责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和学习；史良指导组织和妇女；高崇民指导监察和社会联络。民盟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是由副主席分别掌握的。一年多来四个副主席形式上是集体领导，一切事先由四个副主席同秘书长（笔者注：当时的秘书长为胡愈之）五人小组协商，重要事必经过中央常委会的座谈和批准。高崇民一再表示，任何事只要章、罗、史三人意见一致，他就没有意见。他的确对盟务管得比较少。他在章、罗、史



1943年，章伯钧（后左一）、李健生（前左一）、章诒和（李健生怀中）在重庆。

三人中起了些调解纠纷的作用。史良同章伯钧从解放以来是比较合作的。她对章伯钧在盟务上的意见是比较推崇的。她是第三副主席，盟中许多事，她亦的确让章伯钧同我多负了责任。过去我同章伯钧对峙，盟内许多事的确很难决定……

当时许多民盟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沈志远、潘大逵等十儿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他们分别力劝我同章伯钧合作……章伯钧本人一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你在盟中不合作的态度不满。”……史良常对我说：“章伯钧的理论高，对党的情况了解清楚，应多接受他的意见。”……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盟中有些右派分子交代时说接受了“章罗联盟”的纲领和指示，实际上都是指民盟中央发出的正式文件说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没有单独地，或同章伯钧两人联合对任何地方组织或任何人发出过任何纲领或指示。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陷于民盟的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在《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对我谈过，我亦无权过问。他在民盟以外做了些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更没有同他合作……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一年多来在盟内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绝对没有捏造，我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罗隆基《我的补充交代和检讨》）

罗隆基写出这份材料的日子是在1957年11月7日，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已近尾声。

这时，他仍硬得像块花岗岩，不愿向毛泽东已盖棺论定的“章罗联盟”的指控低下头来，我们便可以想见在这5个月之前，当他由昆明回到北京，仅去乃兹胡同的府第放下了行装，接着就驱车去了章伯钧家，他对已经在这指控前低下了头的章伯钧，会怀有多么强烈的愤懑！

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下午。

如果说在这之前，尽管磕磕碰碰不断，章伯钧却从未为两人的关系感到良心不安的话，那么现在他一定深觉愧对罗隆基，他宁可下地狱去和魔鬼握手，也不愿上天堂去和罗隆基见面。可罗隆基像一头野牛撞上门来，他不能不由着这头“野牛”在自家的客厅里来回冲撞，咆哮如雷：

“伯钧，我们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你去承认什么‘联合’，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我们明争暗斗，不可开交？你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近3个小时里，多半是罗隆基喊累了喘口气，喘完气接着又喊。章伯钧则颇像一头劳役一生、油尽灯枯的老牛，静候着死亡的雪锋刺向自己的咽喉。

仅靠羞愧撑持不了这份镇静，更有一种深刻而又痛楚的理性思索，在维持他走向绝境前的镇静，他对女儿说过：我早年之所以脱党，就因为目睹了它内部斗争的黑暗和残酷。如果我不低头，就没有办法。党是不会认错的，只有我认错。如果我再坚持下去，事情就会越搞越大，连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决心整起人来，是很有办法的……

其实，比起这一在历史的燧石上溅着血泪打磨出来的理性思索，他面对罗隆基所感到的良心不安是很肤浅的。可他又不能将这一耶稣必须赴难式的结论告诉罗隆基，犹如家牛很难与野牛产生共同语言，抛开两人多年的对峙不说，一向书生意气的罗隆基，能理解在某些时候宁折不弯恰恰不是在对历史负责吗？

章伯钧的眼里一定溢满了浓浓的苍凉，以及一条涸辙之鲋眼见另一条还在涸辙里蹦哒的鱼儿的悲悯。而罗隆基临走时，依然怒火填膺，气冲霄汉：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合’，现在没有跟你‘联合’，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合’！”

说毕，罗隆基拎起手杖，双手握住两头，猛地往大腿上一压，只

听见“客嚟”一声，手杖断成两截，他把它们往章伯钧的脚下一扔，又厉声扔下八个字：

“你我之间，如此而已！”

历史终将评说罗隆基此举是否就是书生意气，而在章伯钧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里，是否就没有涂上一点不得已的圆滑与畏缩？

可在当时，历史决不会听到这手杖令人心折的断裂声，它好似暮秋一片树叶无言地离开枝头，冬夜一瓣雪花悄然地贴上窗棂。历史的全部注意力，被中国林子里的一场山火映照得通红，《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正似来自西伯利亚的浩荡北风，将这场山火翻卷得更豪迈、更生猛，那飘拂、奔窜、仿佛全球的幽灵都聚会于此的无边焰头，也更具有了魔幻的色彩……

罗隆基被烧得几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像热锅里的豆子一样爆裂开来，又纷纷带着针戳似的刺痛落回他的身心。他倒在满是黑炭与灰烬的火圈里，透过火焰层层帘幕，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张张平日高贵的、典雅的、仰慕的、慈祥的、亲热的面容，浮动在火焰之外，竟也像被火焰吞噬的树干一样扭曲变形，额头上分不清是汗光还是油光，眼睛亢奋得几近出血，每一道眉毛都拧紧，恍若是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仇恨，每一条皱折都在撑起刀尖般的锋利……以至于看上去几乎每张面容都有了几分狰狞之色。

最要命的是那些在保养得洁白的牙齿中吐出的艳红舌头，以极高的频率蝉羽似的颤动着，即使托出来的是成百公斤的虚假与拙劣，它们也一样运转得潇洒自如。以至于你难分清楚，它们到底是人的舌头，抑或它们就是燎烤中国的火焰……

整个5月，首都知识界在整风中激昂得淋漓大汗之时却悄然去了太湖度假的吴晗，精神饱满地出现在7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讲台上，他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

笔者不可能照录这篇发言，只能择其心智最为雀跃、情感最为自醉之处，列之如下——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鼓掌）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失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6月6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举

行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历史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的鼓掌）

我想，吴晗一双读历史的法眼，对罗隆基，对毛泽东都有深透地了解。正是在这双重的了解中，他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后者是最经不住撩拨的，因而对前者便是最要害的，而他这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尚不足以称为要害。

按传统道德观衡之，把朋友间私底下的谈话播于稠人广众之中是可耻的，更不用说以此作为批判的利器了。但吴晗先生顾不得这些，几天后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揭露：“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见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也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发言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两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做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她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自己的记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

早在6月中旬，史良就把本月6日这一天章伯钧到她家里发泄的一番不满抖落出来，又将矛头直指在科伦坡大约还想着给她买礼物的罗隆基——“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她希望他能够有所交

代。”

吴晗的发言尽管猛烈，但在上面看来，在章、罗的眼里，吴晗一直是民盟内部的一个异数，因此由与章罗关系都非同一般的史良站出来揭发、批判，便不啻于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能够从内部炸开民盟的围墙来！

据说，让“三美相加”的史良变得一身火药味的，是胡愈之。6月6日的六教授会，也是闵刚侯按照胡的旨意给安排的。而且，组织民盟内部对章罗大规模揭批，火力配置一应俱全：长枪、高炮、短刀、暗箭……其挂帅人物也是胡愈之。

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沈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暗是中共党员、明里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

在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胡愈之发表了《章罗联盟的透视》一文，内称：



毛泽东与沈钧儒。

……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

章罗联盟是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削弱以致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时为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则是各种会议上忙得不可开交的人物。他正值英爽之气奕奕逼人的年纪，他的职务又显然不是虚

职，在民盟反右斗争的最前线上，他便如蛟龙得水，鹰隼盘空。在组织“火力”并亲自倾泻“火力”之外，他还和几个人披星戴月，以最快的速度将章罗的历史“删繁就简”，编出了一本《章罗同盟反动言论集》……

在7月3日晚间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当场揭发了罗隆基的小集团的名单，并且，指出他在全国十几个地方设立了据点。

这个小集团的主要人物有：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他所设立的据点是：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

也是在这个会上，费孝通开始“反戈一击”了，他说现在自己终于明白了，罗隆基是在不断地利用他，他事实上是在罗隆基的掌握之中，并且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现在他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他揭露说，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此，一向勾心斗角的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他们对知识分子突然关心起来。章罗合作的共同目的很明显，是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他还说，自己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因此，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在批判章罗的大小会议上，踊跃发言的名人，尚可以列出一长串：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马叙伦、华罗庚、楚图南、童第周、萨空了、梁思成、高真（闻一多先生之遗孀）、冯亦代……

小人物也不能寂寞，《大公报》记者采访了罗隆基的家庭护士王美兰，她眼睛一下红得似五月的烂桃：“罗隆基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东西……”

好似马路边以铁栅覆盖的排污口，章伯钧、罗隆基身上落满了语言的“浓痰”和“鼻涕”。章伯钧习惯了，罗隆基也不得不习惯。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罗隆基站起来交代一个问题，他讲完了要坐下

去，结果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震飞了，原来他的椅子被人抽走……

在满场开怀的哄笑声中，在人们林立的、犹如在看一个精彩马戏节目的目光里，他似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在地上蠕蠕地爬行，直到一双沾满灰尘的手终于摸到了眼镜才抖抖地站了起来。这么一摔，倒摔出了他一个童年的记忆，仿佛眼下他身处的，不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会之处，而是一群拖着鼻涕的山野孩子在简陋的教舍里“大闹天官”……

罗隆基或许终于明白了，当文明被打落在野蛮的沼泽地时，你就不要指望那些最懂方块字的端庄、严谨与美妙的人们的嘴里，能再吐出金玉与珠玑来。

即便如此，在三个人，即“一个是我所谓的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站出来对他进行了“不真实的揭发”之后，还是让他魂飞魄散，因为“那不只是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党的领导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以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就万口莫辩了……”（罗隆基给那位“亲信”的信，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

其中，一向躲在后面打他小报告的机要秘书邵云慈的揭发，让他脖颈后似有冰凉的蛇腹爬过，阴嗖嗖的，而最叫他五雷炸顶的，无疑又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的揭发！

“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尽管在口被用刀子捅了之时，罗隆基发出的这九个字，也让我感到里面包容了无边的情愫，无言的隐痛……

他们相识于194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时年罗隆基50岁，浦熙修36岁。她去采访作为38名政协委员之一的他。

在这之前，他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和史良又有一段情感历程，而她有一双儿女，因与丈夫志趣相左，婚姻已名存实亡。早就不是生活的原野上乍看乍都是五彩缤纷的年龄，早该没有那种好似电花石火、奇峰突起式的一见钟情。他们却一见钟情了。

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

“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

“共产党方面的？”

“我暂时不讲出来，将来你会知道的。”

——（张林岚《巴山旧雨——忆熙修》见《忆浦熙修》一书）

她不会为他炙手可热的名气所吸引，作为风行大江南北的《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她自身就饶有名气；他也不会为她的清丽所陶醉，他的前两位太太都有沉鱼落雁之容，他的女友也个个风姿绰约。他们完全是感到在饱经世事沧桑的磨砥后双方对于社会、人生有一种深刻默契。

还有一种人格，一种不为强权所屈服，只为真理而折腰的人格，也让他们彼此引为知己。此外，罗隆基的绅士风度，典雅而又精致的生活方式，大约也让浦熙修心动；而浦熙修因为东奔西颠的记者生涯及缺乏爱意的家庭生活，那张白皙、蕴藉的脸上，流泻出一层疲惫且有几分忧郁的温柔，也让罗隆基看了心疼。

总之，他们感到在茫茫人海里，自己的心，早就像鸽哨呼唤碧空一样在呼唤着对方……

两人的倾心相识，自然加速了浦袁离婚的进程。次年，浦熙修断然在南京与丈夫分手。离婚次日，浦即乘机飞北平，与大姐洁修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离开南京时，在给罗隆基的一封信上，浦熙修写道：“我现在真觉得心情非常轻松……”

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正风起云涌，作为这场斗争中的两员悍将，他们还无暇安排自己的生活。

1948年初春，浦熙修仍回南京新民报社工作。近年末，银铛入狱，罗隆基积极奔走营救。解放前夕，罗隆基又在上海遭特务软禁，浦熙修冒险前去探视。直到1949年初冬，经国务院安排罗隆基在北京乃兹胡同原北大校长蒋孟麟公馆安家，而《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又在东单灯市西口朝阳胡同找到房子，两处相距不过百米，于是，“在北办的院子里，不时可以见到穿一身灰制服的罗部长，由一位年轻的

女秘书陪同来访浦二姐。浦也偶去罗府，有时也为他买毛衣，相互关心……”（朱嘉树《浦二姐琐忆》同上书）

尽管彼此来往不无谨慎，但两人流动在眼光里的挡不住的依依情意，仍令京都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

这又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悲剧。

尽管只有一箭之遥，浦熙修却始终未能明媒正娶、披红挂彩地走进乃兹胡同。对于她与罗隆基的结合，彭德怀夫妇坚决反对，妹妹安修再三劝姐姐离开罗隆基，找个共产党员交往结婚。中共妇女界的领袖人物也一个个断然摇头，仿佛在他们眼里，在统战的色彩下，你罗隆基可以做政务委员，可以担任部长，但实打实的婚姻无法统战，你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女婿！

自然，这是一份为着浦熙修前途的好心，但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一种早就融于血脉的关于自家人与外来客的敏锐区分？

一对儿女更是反对。

部队上回来，士杰、冬林都上了大学。平常他们住校，罗隆基三天两头过来坐坐，有时浦熙修自己过去。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是节假日，儿女便来办事处看望妈妈，这看望便带有几分监视的性质。形影相吊的罗隆基，难免不思念近在咫尺的恋人，可只要办公室的电话一响，他们顿起中南海卫士般的警觉，马上赶在母亲的前面冲过去。电话倘若被女儿接到了还好些，她只说妈妈不在；如果是儿子接到了，他一听是罗隆基的声音，脱口就是两个字：“混蛋！”随即把电话重重地挂上……

姐弟俩“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自己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袁冬林《怀念我娘浦熙修》同上书）

早年敢于与命运抗争、乃至不畏惧生死的浦熙修，现在却畏惧人言。没有女主人的罗府，院冷房旷，花暗苔深，罗隆基望穿秋水，死死地等了她十年，一直在家里为她专门腾出一个房间……

浦熙修一定左右为难。自打相恋起，整整十年间，他给她写信就称其为“熙修小学生”、“亲爱的小学生”，而她也以“小学生”自居，

凡事不能绝断，总找他拿主意，自己的文章，有时也送他去修改……但尚在1952年，她在给已在空军服役的女儿的信中，又表示自己准备和罗先生结婚，出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相处为好。显然，这“朋友相处”的方式，在她自己心里都有怀疑。

耳里塞满外面的流言，又日日眼见对面桌坐着、一闲下来便显得有些郁郁寡欢的浦熙修，有一次，谢蔚明不禁关切地问道：

“浦二姐，你和罗先生的事情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她顿然似梨花带雨，脸如川注：

“只能这样了……我知道外界说什么，也知道我对不住罗先生，可我又没法子和他分开了……”

这不是中国千万中年男女宛如吉普赛人一样可以自由漂泊于情爱之河的20世纪80年代，也不是情人现象比比皆是、而在京、沪等大城市老人们实行同居业已得到官方默许的90年代，教养与地位非同一般人的罗隆基和浦熙修，被迫走在这伦理与情感时时冲突的狭隘小道上，无疑得付出一定的名声代价，内心世界更得经受一回回岩浆般翻腾的巨大痛苦……

浦熙修付出的代价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她就从一张张“马列主义先生”和“马列主义太太”们见了她皮笑肉不笑的神情里，感觉到了党与自己关系的疏远。

罗隆基付出的最终代价是，在旧中国两人有一人罹难时，另一人还有自由之身可以为之斡旋；但这一次他在被葬送于政治火海之时，他暮年才获得的宝贵爱情也同时被葬送了！他始终在期盼他和她的名字能公开列在一起，以展示于世人，结果他等到的这一天，并不是在大红的婚礼请柬上，而是在把她和自己绑在同一根耻辱柱上的《人民日报》上……

浦熙修看了7月1日的社论后，好长一段时间浑身冰凉，呼吸也像是停止了，恍若成了幽深、远古的金字塔里一具不知外面是何年的木乃伊。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高集，这天特意来了办事处，以肯定无疑的口吻告诉谢蔚明，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下的。

谢蔚明又将此事战战兢兢地说给浦熙修听，她木木的脸上又活了，浮现出令人心悸的巫婆般怪诞的笑容……

也许她想起了6月8日的社论出来后自己给陆定一打的那个电话，他的口气仍似往日一样亲切、随和。多半她还想起罗隆基从昆明打来长途电话时自己的回答，当时她真是这样想的：党洞幽察微，能够把一百多年的筐里一堆乱麻似的旧中国，短短几年间织成一匹光彩照人的锦缎；怎么会在整风的大海上，仅听那泛出铁腥味的泡沫的鼓涌，便将紧随党的舷尾出没于风涛的海鸥，视为一条穷凶恶极的鲨鱼？

她也有理由想起前些日子的上海一行。

6月8日的社论一出来，《文汇报》的处境就日下江河，14日，《人民日报》又发出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本报更成了过街老鼠。她不能不火急火燎地赶回去，和徐铸成、钦本立一起，应付这突发的“七七事变”！当三人绞尽脑汁也想不清楚一向对本报予以支持和关照的邓拓，这回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时，石西民来见了她，他正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解放前他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与浦熙修有过颇为密切的联系，他对她曾一往情深……

这天，他告诉她，《文汇报》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她可以放心。鉴于他是柯庆施的亲信，柯庆施带着他一道来上海走马上任，而柯老又是人所共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石西民的这一消息无疑是“通天”的。

当她把这一消息转告徐铸成、钦本立时，“七七事变”几近一下化成了“台儿庄大捷”，兴奋得徐铸成亲自执笔，写下了《明确方向，继续前进》的社论。真是自己恭喜自己发财，恍若前一阶段本报只是戴了一副蒙上水汽的眼镜，现在只要揩去水汽，本报一样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得山青水绿……

一扇巨大的风车，以有条不紊的叶片，将浦熙修所有善良而又天真的想法全部击得粉碎。

她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这叶片如雷如涛的力量正来自于那只手，那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己在婆婆的泪眼里曾经握过的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为此，不仅仅是她的想法，还有她的全副身心都被这叶片给卷得支离破碎……

她一下卧病在床。大约是怕她自杀，全国记协通知已从空军转业的袁冬林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党委，要女儿赶快回家。一个多月里，女儿一边焦急地盼着母亲赶快与罗隆基划清界限，争取获得党的宽大，一边牢牢地看守着床前的安眠药瓶，因为胃病与加重了的失眠症一起袭来，浦熙修吃不下饭，睡不了觉……

民盟中央开她的批判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勒令她作出交代。在全国妇联第三届全代会上，她是一支让女人变得比男人更亢奋的荷尔蒙针剂。

她像蜂窝一般被打得稀烂。她猎狗一样气喘吁吁，有时一天要赶两三个批判会。开始时，每走进一个会场，她都竭力将打散的心智装回到自己的躯壳里去，好似逢人便絮絮叨叨儿子走失了的祥林嫂，她一遍遍地解释——

“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请过一次客……”

也出席了全国妇联第三届全代会的陆晶清，记住了在前门饭店里浦熙修对她说过的最后几句话：

“我拥护党！我相信党！我问心无愧！问题总有一天能弄清楚的！”

自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信件被诉之以手枪、发报机、毒药一类的“反革命材料”之后，中国人对于查抄他人的信件便有了性变态者搜罗女人胸罩般的爱好。人们要她交出罗隆基给她的信件，她的前夫又揭发说：1947年罗隆基曾嘱咐她以后的信都留起来，从此她便把往来信件都慎重地锁去了报社里……，她只交出了3封解放前的信，并一口咬定：其余的再也找不出来了……

很快，犹如春天糟了心的萝卜，她再也挤不出一点心智的活水，任凭自己冰凉的躯壳里吐出一串串阴嗖嗖的话来。

“罗隆基是通过我来控制《文汇报》，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但这种控制是无形的，我不知不觉在两帅之间挂了一帅。”

“张东荪事件暴露后，叶笃义在民盟七中全会上揭发了张东荪的

一些情况，罗隆基回来就骂叶笃义是‘投机’。罗隆基是否和张东荪暗中还有来往，值得研究。

“据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隆基和这个特务在解放前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他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他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成是党内的宗派主义；

“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再肉麻不过的事。他还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剧本写出来后，一定会‘惊天动地……’”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终于交出了她十年间所保存的罗隆基给她的所有信件。顿时，人们似蚂蚁附膻一样在这覆满情意的芊芊青草的字里行间穿梭着，践踏着，许是罗隆基的“反革命经验”比起胡风来要“老到”，大抵能找来让国人“触目惊心”的话，只有这么一条：

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响应。

于是，罗隆基这条写于1948年上半年、针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话，被演绎成他“想做王莽”，并决心与章伯钧一起，在中国策划、制造出“匈牙利事件”！

就在7月1日社论出来后的次日，罗隆基还给浦熙修来过一个电话。

无疑，在这天崩地陷的时候，他想尽可能地给她以力量，也更期待从她那里获得力量。哪怕是全中国都像口黑锅扣在他们的身上，可只要有彼此的扶持与信任，彼此就有一点清亮的所在，那点清亮里透出的是来自伊甸园的星光，和诺亚方舟掠起的轻风。只要有这星光、

轻风，他们便不会被窒息而死，就能维持生存下去的起码的呼吸……

罗隆基绝没有料到，浦熙修以背叛结束了他们既充满了深刻的幸福又充满了深刻痛苦的十年情谊，从而堵死了他眼里的最后一点清亮。

在这浓稠得几近墨汁的夜晚，他无须再用理智的目光去引导笔杆了，而任凭自己一颗破碎、怨恨的心，在稿纸上簌簌地颤抖。7月里，他在给自以为是多年好友郭沫若的一封信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扶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八十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

真可谓病急乱投医了。在这良知被剥得烂碎，并被做成炒肝在前门口贱卖时，浦熙修可以背叛爱情，郭沫若先生焉有坚守友谊之理？

罗隆基多半还不知道：

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民盟中央深受鼓舞，一连就双百方针的贯彻、科学研究规划、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将调研出来的结果写出材料上报给党中央。反右斗争一开始，正是郭沫若首先在大会上指控，这些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

反右斗争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依然住得相距不远。但他不再和她有任何来往，他至死都没有原谅她。

日子转去了12月，随着满城的银妆素裹，反右运动在许多单位都走出了高温阶段。但在民盟中央，寒冬却在人们高昂、坚韧的斗志前融化。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举行的批判大会，使罗隆基心力交瘁、气血两空。12月26日这一天，他终于明白，他的一切几近喋血的辩解，除了给那扇巨大风

车的轴承上填加更多的润滑油外，实在不会再有任何结果。他低下了自己一辈子不曾低过的头，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一开始定下的调子，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

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27 精神返祖现象

像罗隆基这样迟迟不肯在官方派给的伏罪书上画押的“右派”，大抵上很少。但有两个人，比起罗隆基来气焰还要“嚣张”，态度更要“顽固不冥”，可谓毛泽东称之为的“花岗岩”级的人物。

一个是章乃器。

他的言论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几乎一夜之间，他由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涂抹成“极右派”、“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资本主义的吹鼓手”、“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

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对他的多次批判会上，他风度洒脱，仍然手持被视为他的行头的烟斗，称自己“心安理得，轻松愉快”，“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气得已经做成了左派的先生们，一个个大跌眼镜，几乎大脑

溢血，得赶快召来救护车送去协和医院抢救。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在民建的社务委员是黄炎培、章乃器，但往日日子报社的有关活动，总是由前者包揽了；现在，在前者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众叛亲离的章乃器倒坦然赴会，宛如他在当部长的日子里去出席一次国宴，并有心要将储安平从泥淖里拖出来：

储安平的言论（《党天下》一文），从政治上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要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当然要提到当前的反右，当然要对作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名部长沦为“右派”，表现出义愤填膺。这天，一副俯仰无愧态度的章乃器在座，听着，听着，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直逼周恩来：

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了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四十三年后，有文章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头不对，群起而驳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舌战，场面纷乱……（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 见《百年潮》，2000年第9期）

即便在斗争情绪滚烫得能做全聚德厨房的全国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别的“鸭子”已经在炉火上俯首就范了，纷纷在各自所在的小组内作出违心、屈辱的检讨。有不服的，也不过打算以死来保持沉默。

如会议期间，黄绍竑两次吞安眠药自杀，均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章乃器却不作检讨，更不想死，他这只被扒掉了毛的“鸭子”竟还想飞出去，那扑扇不止的翅膀，便是他的一份书面发言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还往往是觉得出于意外得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反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后，章乃器写道：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铄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真金不怕火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毛泽东似乎盯牢了他“杀人”。

10月13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毛泽东又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看他怎么办。”

1958年1月，仍要从毛泽东的视线之网里冲出来的章乃器，写出了三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在这份名为“检查”实为“申诉”的材料里，他宣称：

“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受处分）。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对他的“检查”，很快就有了回音——

同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38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首次被排到名单里的首位。

另一个则是彭文应。

7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刊载了一篇题为《质问彭文应》的文章，作者是化名为“常熟”的张春桥。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与姚文元一样，他是极善于“解剖”人的，并且从中充分享受着一种“庖丁解牛”的快感：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就在这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上海民盟市委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有人从旁边的会议室赶过来接了，一听说对方是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要找彭文应接电话，也不问个为什么，当即便作河东狮子吼：“彭文应是右派分子，现在正开他的批判会，不能接电话！”一下就将电话给挂了。

病榻上，彭文应的妻子生命垂危。

8年间，她两度成了一只惊弓上的鸟，解放前夕丈夫遭国民党特务追捕，东躲西藏，席无暇暖，她刚好坐月子，被吓得患了严重的高

血压和肾脏病。这两个月间，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丈夫似陀螺一样被一条条挥舞得霍霍生风的疾鞭所抽打，即使“滚”回了家里，原本南昌路上令多少人仰慕不止的一幢花园洋房，突然间好像成了罪恶似蝙蝠一样纷飞的“渣滓洞”。

邻居们陡然阴沉下来的目光，扫得她全身黏乎乎的，窗外周围孩子们有节律的呼喊声：“右派分子——彭文应！右派分子——彭文应！”……更使她觉得自己掉进了柯南道尔笔下的某个恐怖故事。就在她的神经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她看到了今天的《解放日报》，血压立马腾升，哧地一声倒在了地上……

她额头敷着冰袋的脸上一片惨白，随着一声比一声轻微、可一声比一声更揪人肺腑的呼唤“文应，文应……”，一串又一串的泪水，从她的眼角里汨汨地溢下。

年幼的女儿不得不鼓起全副勇气，一次次跑去外屋的电话边，又一次次被那恶犬似的电话给“咬”了回来。她的小脚的母亲也陪着一边掩泪，老人实在搞不明白自己并非小脚的女儿，在旧社会走得战战兢兢，怎么在新社会走得还这般如辄在身？！

彭文应未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套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人耳熟能详的一条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当张春桥的“庖丁解牛”的快感尚未享受尽的时候，彭文应年仅44岁的爱妻，抛下丈夫和六个孩子，也抛下中国之弓上的一颗永恒惊魂，撒手西去……

他是如张春桥所说，曾慷慨申明：“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可现在他生命的一半已经死了，除长子、长女在北京上大学暂不明情况外，他身边8岁的小女儿、13岁的二女儿、15岁的次子，在痛失母亲之后无不遭大人白眼、受小孩唾骂，几乎夜夜以噩梦枕头，日日以泪水洗面，除了上学，尽量蜷缩在家里，好似林中跌入陷阱、泪光迷茫的三头小鹿……

为人之父，此时的他或许应该以政治上的妥协，来担保这个已失主妇、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能苟全于板荡；他却依然顾不了这个家，

在“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后，仍以全副的力量去一个个批判会上抗争，并由此带来对自己更猛烈地批判，对家庭更剧烈地震荡！

妻子辞世的次日，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批判会上，彭文应不改“钢口铁牙”：

“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8月20日，在市人代会预备会上，他又一片赤诚可鉴苍天：

“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是使大厦更好……”

会后，一位朋友私下劝他：

“你不承认错误就不要讲话，何苦再去辩论、再去上书，把问题越搞越大。”

他正色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除去章乃器、彭文应等极少数“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外，运动真是一座“伟大”的学校——

它可以使你去中世纪的炉火上敲出一具锋利的犁头，并拿着这犁头，将自己原本春华秋实、蜂喧蝶舞的思想的田野，给翻得满目萧索、一片死寂；

它可以使你以一颗破碎的心填进枪膛，又朝自己开枪，从而将自己的心打得更加破碎；

它或者让你说服自己，哪怕有再好的动机，一个人稍不留神，就会从好人变成坏人；

它或者让你平衡自己，刨开历史的冻土层，世上哪里没有屈死的骨架？远有岳飞近有彭德怀都屈死了，与他们相比，今天再委屈回自己，不就好像委屈只蚂蚁；

在报端上工农兵海啸般义愤的斥责声中，它还能叫你背负一种深重的罪孽感，自己穿工人织出来的布，吃农民种出来的粮，却和劳动

人民的看法大相径庭。在知识这条黑色血缘的安排下，自己不是黄世仁的儿子，也是南霸天的外甥；

在交代便会宽大的庄严保证下，它还可能使你萌生侥幸心理：宛如童年时，你将妈妈等着买米下锅的钱去买了图书，或是你在学校里打碎了一块教室的玻璃。但是在你向妈妈交出了图书，你对老师承认这事是自己不小心干的之后，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老师也不会因此而逼你走上绝境……

于是，本该著作等身的教授，王造时却几近检查等身：

1957年7月15日在复旦大学作第一次检查。8月10日在学校作第二次检查。8月14日，在文化俱乐部又作检查。8月24日，在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会上再作检查。12月31日，写出长达几万言的《我的忏悔》。次年1月17日，又交上万余言的《我忏悔我的罪行》……

伴随昔日君子风采的荡然无存，当年在上海滩上他高举着的理性，一一被埋葬在稿纸的方格之中。他也曾高举着的骨头，在那方格里软得似用筷子夹都颇觉困难的海蜇皮。

几乎惟一能证明他和邹韬奋先生所描绘过的那个人物有某种联系的是，在天塌地陷之时他还保存着的善良。

1957年12月18日，他交上去一份《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报上刊出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后，过了些日子，我陆续由复旦历史系转来外地来信多封（约在十封以上），都是赞成我的发言的，其中也有诉冤的，我一概都没有回答，预备交给系里去处理。但是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就迟疑起来了。到了复旦开斗争大会的那天下午，我情绪激动，觉得自己被斗得很厉害，如果交出去，那些写信的人也要被斗，我于是都把它们撕毁……

于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却似当年的小日本鬼子打进了南京城，对自己和别人的历史大肆“烧杀掠夺”。

经过民盟复旦大学支部从7月5日到10日的六天里七次会议的批判与揭露，陈仁炳终于作出了初步交代：

“我承认我是个可耻的右派分子，我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破坏党群关系，夸大和捏造缺点，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威信。我承认我

是罗隆基集团的上海的首要分子，从1949年起，就参加这个集团，靠拢罗隆基的时间还要早些。1947年以后，我到了上海，开始和罗隆基有了联系，1949年年初，罗隆基要我去南京，夺取民盟的领导权。这年冬，罗隆基将我提拔为民盟中央委员。盟四中全会时，罗隆基一直与史良斗争，我是参加罗隆基方面的，张东荪、何公敢、彭文应、潘大逵、曾昭抡、彭迪先都站在罗一边……

“在我的分析，这个集团有这样一个纲领：一、集结一班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以上的人，进行盟内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以与进步的、靠拢组织的同志对抗。二、因为是对抗党的领导的，因此必然也是公开和隐蔽的反苏的，反对好好学习苏联。在1953年总路线宣布以后，这个集团又加上一条纲领，仅仅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新事物、对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修正主义态度……”

于是，一家旧社会里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中一座民主的灯塔，八年间两回遭封闭却从不忏悔的报纸，却成了早年浪荡不羁的聂赫留朵夫，面对法庭上出现的穿着囚衣的玛丝诺娃，心灵里涌起了一片深深的悔意……

在《人民日报》7月1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次日，灯下熬了一夜的《文汇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

里面有这样一段如泣如诉、多半令今日的鬼神看了也得动容的话：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受到党对我报所作的爱之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一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至于此？

所以，我们在这一期间，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着觉，有的出外采访无脸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

民请罪！

我们立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运动对于更多的批判者来说，也是一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学校。

它可以使人世间最具良知的一双眼睛，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掘去这份良知，以便面对眼下太多的苦难时眼睛里不再燃烧，只像灰蒙蒙的日子里一幅木然的风景。

1957年9月，巴金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内容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并正式宣布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巴金看到了坐在前排边上、好似鸵鸟把头埋进沙里一样深深缩着个脑袋的冯雪峰。

对丁玲、艾青，巴金不是很了解；但对冯雪峰，自1936年年底在鲁彦家里第一次见到刚从延安来到上海的他起，四十年里巴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耿直、真诚、善良并为此而值得尊敬的人。

一个多月前，巴金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还去他家里看了他，因为有了反右斗争，人代会开得惊心动魄而又气壮山河，吃起来，一个个代表胃口大开……巴金却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冯雪峰在听了巴金对反右运动的一些疑问后，即将沦为幕燕釜鱼的他，脸上依然是漏不下一滴水的党性原则，他有力地摘去了老朋友的疑问，又殷勤地邀巴金去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吃完饭，他依依不舍地拉着巴金和他们夫妇俩在附近走了一会儿。现在，当巴金在首都剧场里回想起来，才觉得这是冯雪峰在向自己作最后的告别。

一个在党所置予的大祸临头面前，仍在极力维护党的威望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分子”呢？

但巴金很快地挑落了这一思绪，走上台去，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

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联”等等。我并不像某些

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它可以使天底下人本来最应该像金子般袒露的品质——善良，顿时必须用凶恶来掩盖，仿佛这是一件偷来的东西，你必须藏藏掖掖。

只要看看老舍先生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发言，在反右斗争里他作为一名披坚执锐的斗士形象，比起吴晗来丝毫不会逊色。他批起吴祖光来，曾使吴祖光深感自己的“罪孽”，只要从中挤出一小瓶来，几乎便可以毒倒整个世界。

在吴祖光被发配去北大荒后，老舍特别关心起新凤霞来，只要见到她，必问：“祖光怎么样？多给他写点信吧，最好一天写一封信，你不是喜欢学文化吗？这样，你通过写信既学了文化，又对祖光是个鼓励……”

1961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碰见了老舍。老舍的神情不见一点尴尬，仿佛也经自己的手打发出去的这位老友，并不是去炼狱里走了一回，而只是刚刚从北国的风光中旅游回来……

他满脸是真诚的、溢不住的亲热：

“祖光，我听说你回来了，你怎么不到我家来？”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我谁家都没去。”

老舍不为所动，俨然憨厚得似自己笔下的骆驼祥子，他坚持要拉吴祖光去他家。

到了他家，他去书房里一阵，拿出一幅画来，吴祖光接过来一看，好像是自己过去在画店里买的一幅名画。再看画轴，上面确有当时自己买下后用铅笔写下的年月日和签名。像这样的名画，吴祖光曾收藏有三四十幅，落难后家境拮据，被一个过去熟知的画家，以比买一堆白纸高不了多少的价钱从妻子手里“买”走。

原来是老舍日后去一家古玩店又买回了这幅画，到家后见了画轴上的签条，才知道这画是吴祖光的，他便决意保存好，日后要还给祖光……

“您花多少钱买的？我得给您钱。”

“祖光，我知道你丢了很多画，没给你全买回来，就算对不起你了，我怎会收你的钱？！”

两个人都是聪明人。在这往事似乎未曾发生、其阴影却又始终挥之不去的氛围里，吴祖光遵命接过了画，同时也接受了老舍递过来的某种情谊……

运动这座学校，还能使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转眼间成为彪悍的职业“屠夫”，无须任何人的指引，便知道在已被圈起来的颤颤抖抖的性灵上，该从哪里下刀。一刀血肉横飞下去，往往直抵置对方以死地的政治命穴。

在上海作家协会对傅雷前一二次的批判会上，许是傅雷那树叶般弱不禁风的模样，还有两个月前他才被从书斋里拖出来发出的几声也如树叶一样轻微的感喟，让人易生恻隐之心，或是令人难提上斗志，会议开得似不冷不热的温吞水一样。

此后，正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泪里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姚文元，踌躇满志地出场了，他一双暴突的金鱼眼，恍若燃烧正炽的煤核，加上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直截了当地称傅雷为“右派分子”的一顿批判，使得作协圆厅里的温度一下便高上去了！在这之前，傅雷尚可勉强支持的神经，顷刻间烛泪一样融化了，脸上也蜡黄、蜡黄，浑身瑟瑟好如筛糠，令人想起市场上与小贩已达成交易、被买主倒拎在手里的鸡鸭……

王西彦也发言了。他对傅雷的历史情况知之甚少，但他读过傅雷翻译的一些法国文学作品，他挑中了傅雷所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里的附录《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里的一段话：

法兰西大革命，展示了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这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特当塞尚纳，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民主和专制的搏斗方终，社会主义的殉难生活已经开始……

他认为，“傅雷在这里说了一句意义含糊的话，既然他说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专制是指封建主义，可是为什么要说社会

主义的生活是‘殉难’的呢？联系20世纪40年代后期，傅雷曾经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呼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证明他那句意义含糊的话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的诅咒。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的罗曼·罗兰，后来于1931年发表了《和过去告别》一文，坚决地表示自己拥护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从巴黎走向了莫斯科；而以翻译罗曼·罗兰的著作自炫的傅雷，却和罗曼·罗兰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王西彦以一段醍醐灌顶、气冲霄汉的话，将自己的发言推向了高潮：

傅雷“分明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利令智昏，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生活要在中国复辟了，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斗争里。”而这种情况，“完全出于傅雷的阶级本能和阶级盲目性，是一次明目张胆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以上的引言，均引自王西彦先生于1992年完成的“文革”长篇回忆录《焚心煮骨的日子》。

在中国的墙头剥蚀掉35年的风云，作者本人亦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焚心煮骨”的日子之后，他在回忆起以上的这件往事时，还在书里说了一段颇为“焚心煮骨”的话：

尽管和当时一些人的漫骂相比较，我的言辞，还不算是最剑拔弩张的；但为了自保，为了表示自己和傅雷划清思想界限，不惜从文字语句中搜罗罪名，向他作出政治性的攻击这种行径，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关道德和品质的问题，将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歉疚和悔恨。

运动这座学校，更能使知识分子原本看得与书本一样珍惜的脸皮，变得无足轻重起来。人们几近可以将脸皮当成塞满稻草的厚实的鞍马，在上面玩起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托马斯全旋”——

萧乾先生便被几个人在“鞍马”上的表演给弄得头晕目眩。

一位是康濯。

在萧乾调《文艺报》之前，作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行政管理一般由小组进行，他所在小组的组长就是康濯。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曾托人请他出山给民主党派编一本刊物，他当即谢绝了，而且又立

马向康濯作了汇报。反右风云一来，就有人批他是“章罗联盟”在中国作协的代理人，他慌不迭地写了份小字报，将这件被视为主要证据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他的这份小字报的糨糊还未干，康濯写的一份大字报就贴上了墙。康濯矢口否认他就此事向自己作过汇报……

一位是曹禺。他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称：

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

再一位，当萧乾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伦敦做《大公报》驻外记者时，他也在英伦三岛的风涛里闯荡，多少可算是萧乾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因而他丢下去的这块石头，大抵在人们的怒潮里激起了更高的潮头，或许还会溅出几片粉红色的浪花：

在批判会上，他讲了一个几近《红与黑》的故事，萧乾处心积虑地想挤进英国的上流社会，结果领萧乾走入这个绅士如林、淑女如云的社会的人，是一位贵夫人。结识贵夫人的“钥匙”，则是一只与她种姓同样“高贵”的猫，一只萧乾不知从哪里弄来、再用能说得椅子跳舞的舌头给涂抹上“高贵”之色的猫……

读了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发现她当年也曾被这政治“托马斯全旋”给弄得瞠目结舌。

她提起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红玛瑙集》，曾使 20 世纪 60 年代正上中学的我，无数次地感觉到白羽般纯洁与玛瑙似的鲜亮……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污纳垢，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

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普希金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谈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不是一个人。

由此，我们的子孙大抵能明白什么叫做运动了——

运动，是一个将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由文明世界引向大森林里去的精神返祖现象；

运动，是一场将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给湖水般蒸腾掉、只在人们的脸上剩下无耻、虚伪、残忍、狡黠、苟且、自负、麻木、自卑等白花花盐碱地的酷烈的夏季季风；

运动，是一次自杀不叫自杀而叫“交代”、他杀也不叫他杀而叫“揭发”，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法院会睁开眼睛加以理睬，多半要等到遥远的日后，历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才有可能审理的空前规模的集体犯罪。

28 党对自身动了真格

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眼下又“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连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这一社论标志着社会上的反右斗争正方兴未艾之时，党内的反右斗争又揭开了帷幕。

7月流火，极少有资料注意到，这个月的上旬，毛泽东到了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倘若不是宽额下溢满了黑脸周仓般的严峻，他老人家是不会来到此时这座几近一条扔在热沙上的毒蛇的城市——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右’嘛！你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

他还带着幽然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上述的描述，惟妙惟肖地展露了两人的神态、心态。

毛泽东那连珠炮式的发问，毫无疑问地盯牢了党内的右派。他之所以不畏酷暑来到南京，是因为有江苏的干部打来了小报告，上面确凿的证据令他触目惊心，寝食不安；还是在华东地区，在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两个分别以省长沙文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如两条被割去腮的大鱼，正在渐渐浮出水面，毛泽东决不相信，作为华东第一大省江苏的长江江面上，却裹在一片金属汁液似的日光中，木然，沉滞，令人昏昏欲睡……

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毛泽东决不让江渭清担纲的江苏省委在此次反右运动中“蒙混”过去的旨意是肯定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对江本人极为信任，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后者即成了江苏政坛第一号人物，这一安排直至“文革”，走马灯似的官场，江却磐石似的不动。

不久，毛即派出两位中央大员前来督阵，彭真龙盘南京，康生虎

踞苏州……

江渭清的冷静、圆通、谦卑，那在对毛的心理的把握上，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的拿捏，浑如杂技演员握根长竿走钢丝的功夫，好生了得，也一下跃然于纸上！换上其他一个什么人，在这几近进谏的场合，被毛那一阵断喝下来，大抵早就形如筛糠，满身都钻着蚯蚓似的大汗了……

此公极为聪明，他请彭真来省委常委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这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却仍不见打一个右派，彭真亦不悦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还有没有右派？”

江渭清信誓旦旦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最终，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只是以批评几个厅级干部的“右倾”而结束。党内外右派加起来，据江渭清在回忆录中称，江苏划了13349名，占官方统计的全国右派总数的2.4%，算是划右派较少的省份，若联系上江苏是个人口大省，这比例就更低。

由此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如江苏省这样“蒙混”过去了的地方一定不多。

9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社论惟恐各级党委动了菩萨心肠，义正词严地交代了对于这批“红皮白囊”的家伙该如何“严肃”：

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了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他们恰恰没有去想：既然如

此，这些人更不应该犯错误，他们成为右派就更不能够宽恕……

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9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在猛烈抨击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所流露的严重温情主义之后，认定已经发现的党内右派约有三千余人，其中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

我们不妨从这两类人里各找一位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沦落”为“右派”的：

冯雪峰，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不但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战友，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党团总书记，而且比起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奔泻革命之泉的周扬来更有“资历”的是，他还用自己一双磨破了血肉脚板，丈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比起周扬来，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非同一般，他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的同时，还四处奔走设法找到了毛泽东流落沪上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又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至莫斯科第三国际儿童院。他每有微薄的稿费收入，便想起延安的战友，多次买好纸烟和围巾等物品，托人送到西安，再转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

1957年6月6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根据1955年年底党中央关于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调查结果，讨论为该案平反的具体措施。会上，周扬好似一个制造出废品的工人，面有羞愧之色：“对丁、陈的斗争有偏差，太过火了”，党组书记邵荃麟也颇为真诚地承认“丁陈集团案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帽子应该摘掉”……

8日，《人民日报》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诘问，举国山河变色，周扬宣布会议休会。这一休便休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29日才召开第四次会议。

此时，举国上下都在忙碌地制造大大小小的“章罗联盟”，作协有个现成的“联盟”，怎么能让它冷藏了？周扬从“冰箱”里端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了让这个集团有现实感，以便看上去似一盆新鲜的草莓，周扬宣布“丁玲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叛徒问题”外，

她还在建国后“勾结冯雪峰、陈涌、罗烽、白朗等人，疯狂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文艺界领导人”，这一端，便把冯雪峰给一起端了出来……

会上，当即就有人要他就近些年的“反党”言行作出检讨。这位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百思不得其解，自1955年离开《文艺报》后，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长。大概是中国的文坛打从建国起就不像个文坛，倒似个辙乱旗靡、刀光剑影的疆场，他疲乏了，也厌倦了，一到了出版社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几乎以全副的精力去抓《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

从收集、校订、注释，到看清样、装帧、发行，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或是亲自动手。在梯子胡同的出版社的集体宿舍里，他那简陋的房间的灯光，总是每一天熄得最晚，常常七星西斜了，擦擦清样上的斑斑银发，还在无言地陪伴着天上的星光。这时，他大抵也在陪伴着生前感到寂寞、死后在一片殊荣中也未免不觉得悲凉的鲁迅……

经过与会者的点拨，冯雪峰终于明白了，人们要撕开的还是1936年那场以周扬为一方和以鲁迅为另一方的“国防文学”与“民族解放战争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历史伤疤。作为鲁迅先生的一条臂膀，胡风在两年前已经被砍去了，现在看来人们打算再砍断先生的另一条臂膀，鲁迅是供奉在香火里的神，而神是不会喊痛的……

国人追溯历史以追溯自己正确的执著，与国人遗忘历史以遗忘自己谬误的执著，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冯雪峰终于开口了，与胡风一样不得不承认了周扬的胜利：

“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党……今后，我要接受周扬同志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同志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

散会时，在会场的出口处，周扬大度地和冯雪峰握手。握着前者的那只手，他多半有触着了冷兵器上的感觉。周扬说：

“你的发言，我听了觉得还不错。人嘛，谁能是不犯错误的神仙，可只要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也不要紧，将来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三四天后，他又被叫到文联大楼会议室，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

刘白羽已经等在那里。四位中国文坛上众所周知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起，这是在向冯雪峰昭示，今天的这次谈话，完全代表了党的意志，绝对不带有个人的任何恩怨。

周扬开门见山：

“叫你来，就是要通知你，现在决定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

尽管已是意料之中的事，冯雪峰还是在自己的目光里插入了一枚疾利的铁钉。周扬触到了这枚“铁钉”，但轻松地似拍打一只蚊子一样给“拍打”而去：

“你前几天的检讨，我当时是认为还不错，但大家不满意。”

其他几位也纷纷讲话了：

“你是一名老战士，我一向敬重你。可为了党的利益，必须与你斗争……”

“在中国文艺界，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提意见……”

虽比不过前前后后“消化”了十几名“大右派”的全国人代会，但中国文艺界同样情绪激昂、胃口大开，仅有丁玲、陈企霞两道“大菜”怎行？于是，冯雪峰成了第三道“大菜”。

有人揭发在一次出版社的青年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他居然鼓动“现在是大鸣大放，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

又有人揭发他因“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被罢了《文艺报》主编的官后，他耿耿于怀，说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但人们的刀叉奋力撕戳、并在嘴上泛出一层层油光的，依然是鲁迅先生的另一条臂膀，即他“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没有谁比冯雪峰更容易感到鲁迅不是神，而且瘦骨伶仃的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为了让胜利者满足以权力撑持的胜利，他可以戴上沉重的荆冠，但他不能让先生的英魂也戴上荆冠。

在8月14日的批判会后，他再也不能忍耐，晚上他打电话给周扬，要求当面说明某些历史事实。周扬不那么大度了，说的话宛如他所接触过的那只冷兵器般的手：

“既然是运动，什么问题都得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

好处……”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冯雪峰的名字前有了一串串血淋淋的定语:“丁陈集团的参与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文艺界的反党头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自然,当年少有人能看清这血,并知道这血流自哪里。

戴煌,1957年时尚不及而立之年,可他的履历摆出来,凝重得能放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当台阶。

1941年在小学读书时就当了操起红缨枪的儿童团团长,1944年正式参加新四军,因爱好文墨,分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三年后,又被调到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临行还觉得当记者不如搞创作自由自在,但炮火硝烟自有它的色彩与魅力,第一回上前线,采访的就是一场真正的白刃战,与他同来的另一位记者倒下了,他行军途中刚刚结识不久的许多干部、战士倒下了,他从敌人身上拔出枪来投入了肉搏……

在血如雨泼、肉似墙横的战场上,人类最强烈的情感在冲刷着他的胸膛,又似一口热锅在炒豆子般升腾、迸裂着他的文字,他很快就感到当一名军事记者,实在是具有血性的文化人最该干的工作。

从此,戴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血与火更稠密的地方”:战江淮、袭徐州、围蚌埠、渡长江……令当年孙大雨、戴望舒等教授们听了恨不得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的消息,不少正出自于他溢满激情的笔下。

建国后来到新华总社,几乎还未等椅子坐热,他又跨过鸭绿江,奔赴了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他走过北朝鲜的烽火海岸线,攀上被美军称为“伤心岭”的人民军高地,他让中朝两国人民永远记住了“罗盛教”这个伟大的名字,又在板门店为历史留下了硝烟被橄榄枝拂去的那一刻……

他胸挂勋章回到了北京,刚刚和新婚的妻子接了一个吻,又得去拥抱万里之外莫边府被炮火映红的风云。

这次,在越南待了一年多,他不但熟悉了那支在亚热带的丛林、山地里骁勇善战的军队,他还熟悉了这支军队的白眉毛、白胡子的父亲——胡志明。胡志明也熟悉了这位置生死于度外的中国记者,那时

在越南，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记者都有，可胡志明去哪里巡视，视线总扫过真理报、塔斯社的大块头记者，每回都带了他去……

反右斗争开始之前，戴煌没有发表过一条意见，写过一张大字报。

1956年秋季，他进了外交学院接受培训，学制两年，学员都是来自中央各部委的干部，以新华社内定的驻外记者为多。他则是自己要求来的，似乎还未过完战争瘾，他想到祖国还得解放台湾，真打起仗来少不了要和美国鬼子打交道，自己得先学好英语。人近中年学外语，学习显然感到吃力，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干脆搬到学校来住，省得每天要耗费两个小时在路上奔波。



戴煌近影。

未来的前景在激励着他，英文的26个字母在蹂躏着他，他实在没有精力去关注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即便回到糊满了大字报的新华社大院，他也步履匆匆，归心似箭……

宛如一个抱了孩子才品味到恋爱滋味的人，他是在6月8日反右斗争的信号弹升空以后，才刻骨铭心地感知党发动整风运动的伟大与英明。

作为班级的党支部书记，他参加了一个由彭真亲自召集的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对于彭真在这个会上的一番十分清醒的讲话，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像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联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戴煌本来就不是桃花源中之人。他的记者职业，他在战争风云里

练就的对历史的宏阔把握能力,以及他难以忘怀的多少逝去的年轻生命所留下的美好憧憬,都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变化极为敏感。

1956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北故乡一次,原以为有了七年的和平建设,家乡“必定已呈现一派兴旺发达、姹紫嫣红的新姿”,但他的心很快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这个历经战火涂炭的小镇,几乎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改观!更让他揪心的是,刚住了三天,恍若过去搞地下斗争时的鬼鬼祟祟,喊冤告状的乡亲便一个个影子似地飘进了门……

也许,还因为耳濡目染了胡志明在如日月受到越南人民爱戴的同时,他始终保持了大地般的沉稳,河川似的淡泊,戴煌早就深感“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大隐患”,为此,在进入外交学院之前,他就已经展纸提笔,要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万字以上、入情入理的长信,但结果这事被繁重的学习给压下了……

彭真的一番话,使他感到对于党的忧之所忧,自己还未能急之所急。他很快加强了自身的党性修养。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发了言,中心点就是反对神化与特权。他说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将来可要摔大跤。他认为要消除特权,就得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人民真正享有监督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必须有一套制度给予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我们不能也不必要照搬,但其中一些科学的部分,可以采纳来完善我们自己的民主建设。

他还认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是不是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举了最近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讲的一番话为例,其大意是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人,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就会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他以为战争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也不是浪漫的畅想曲。不说别

的，就说美国人民，不像我们很多的同志当年投身革命，其实都是被逼上梁山，不拼一下就活不下去，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当时在会上，并没有谁对戴煌的发言持异议。

他开完会回到学院，依旧准备自己的期末考试。真是偌大一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像是与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相呼应，就在这前几天，学院宣布不再进行期末考试，以便学员集中精力投身反右斗争。

随即，他被叫回了新华社，在大伙儿常聚在一起学外语的一层楼里，已经贴出了几张用稿纸写的批判他那回发言的小字报，这种文里还称其为“戴煌同志”的小字报形式，以及每天他该看的文件和《内部参考》、《参考资料》，依旧还发到他手里来，似乎表明“左派”同志们，要把戴煌这样一个从经历上比起他们来更像是原装左派的人，推到右派的位置上，还不得不先作出某种试探。

社长同志，极大地鼓励了“左派”同志们的积极性，更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在月底全社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的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标志，是揭露了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戴煌，和以戴煌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他把军事组里几个与戴煌关系不错、都饱经战火硝烟的记者划进了这个“小集团”。

当晚，“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大院满墙的大字报上，戴煌的名字到处绚烂地开放。次日，“一支红杏出墙来”，在新华社一篇中央机关深入揭露党内右派分子的综合报道里，又有了这个名字。

8月中旬，新华社还就这个“小集团”发了一篇4000余字的专门报道。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傍着新华社，一时间，戴煌穿云破雾，“黑”遍了全国所有的报纸，乃至港台报纸，还有路透社、法新社也作了转载或摘载……

戴煌只有坐在家了，眼见自己昔日的同事们，怎样将自己好似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此外，目前尚可看的只有《参考资料》，《内部参考》和文件已经不送给他了。

惟有一次例外，送来一本《内部参考》，上面登有台湾国民党电台致他的一篇广播稿，想起来还真有点哭笑不得，从越南回来后，他

就盼着能参加解放这块宝岛，现在对方却要先“解放”起他来，欢迎正“受中共迫害的戴煌先生”投奔到台湾去享受“自由生活”……

当然，一向和定律一般严肃的领导不一定能发现这里的幽默，他们给他看，依然是为了证实一个有名的政治定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凭国民党怜香惜玉这一条，打你一个右派就不冤枉，你还是赶紧悔悟了吧……

从冯雪峰、戴煌的遭际里，我们可以发现党内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大抵是出于两种情况。但两种情况难以截然分开，有时，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一种便是宗派原因，早就是面和心不和了，可找不到机会整倒你，虽说台面下不尴尬能踢你几脚，但在台面上还得与你握手。反右斗争恰好给了一个机会，运动历来像一位手脚利索的魔术师，不要两下子，就能将一个千真万确的好人，无须商量地变成一个千真万确的坏人。

在反右斗争之前，河南省的任何一个公民即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指控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潘复生为党的敌人，浙江省委机关里即便有长了一双捷尔任斯基的鹰隼般眼睛的干部，也不会察觉在省委鸟语花香的院子里，竟闪动着—一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魔影，在这个“集团”里，头号人物是1925年入党、解放前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现任省委常委兼省长的沙文汉，还有省委常委兼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兼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等高级干部……

除了宗派原因外，事后看，沙文汉一案里，或许还闪动有更深处的黑手：1938年，江苏省委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江青在沪上的社会关系很是复杂。此电落入康生之手，正为毛江联姻不遗余力“保驾护航”的康生，自然给了江青过目。后者从来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955年，借潘汉年冤案发生，正在上海的江青便和当时华东局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一唱一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要追查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三十年代后期，在江苏省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且主持沪上“文委”工作的，恰

恰是沙文汉。而且，沙文汉、陈修良夫妇也确与潘汉年有工作关系。于是，在肃反运动之中，“浙江有潘汉年之二”的传言，早一度蜂起……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何一个干部、战士，绝难想像极为勤勉地主持全军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自己却是一个“伪劣产品”。

陈沂，贵州遵义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起，在山西晋城参加八路军，奔赴太行山区进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而后到冀南根据地和山东从事新闻、理论宣传和文化艺术工作，历任冀南区党委冀南日报总编、冀鲁豫日报社长，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他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激励部队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期间，他转战南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先后参与了著名的辽沈、平津和海南岛战役后勤保障的领导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沂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舆论广泛认为他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的文艺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而被誉为“文化将军”。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上海对他有过短暂的采访，那时他刚刚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退下来不久，他几乎一开口就否认自己被指控为“右派”主要是为宗派原因。

他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派性，我们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一派，哪来的派别？”

我十分理解他这样的视1957年为“母亲错打了儿子”的儿子，在饱经劫难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维护“母亲”。

据说对陈沂一直比较了解的罗荣桓元帅当年对他被批为“右派”的意见是：一定要批陈沂为右派，那就得写上三条，第一、20世纪40年代他在山东的工作，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办《大众日报》是有成绩的；第二、在东北战场，辽沈战役里他连升三级，成了大军区

级的领导干部；第三、到总政治部工作后，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我有些纳闷的是，既然主管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如此肯定他，保护他，若非宗派原因，他怎么会当上全军头号的“右派”呢？

从白桦先生戴帽的经历里，我们能够看出在1957年由谭政大将任主任，萧华上将任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里到底是不是存在“宗派问题”，此处暂且不表。

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对官方日趋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动摇、怀疑乃至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比如在省一级政府中，共有4个省长、9个副省长受到了“党内右派”的指控，他们被批判的要点，除了“小集团”、“山头主义”之外，大抵是：

“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肃反政策和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低估政府部门内党组的工作能力，妄图取消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

搞地方主义，强调本地区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内，重用资产阶级“权威”，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提供保护伞……

在司法界，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有4位身居刑事审判庭庭长、副庭长和研究室主任的高级干部，受到猛烈地批判，他们的“罪名”是：鼓吹“审判独立”，主张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党的干预；污蔑法院内党组成员颐指气使的多，对法律有所了解的少；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减刑或免于起诉，反对或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西方国家的司法观念称慕不已，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

在人民解放军内，受到“右派分子”指控的，大多是那些与政治思想工作相比，更加重视军事技术、强调规章制度并且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是武器而不是人的军官……

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知识拥有权力的载体，而又没有被权力诱惑、腐蚀得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倒过来以摧残知识为能以阉割知识为乐的话，知识便更有力量寻找机会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文明的品格。

于是，面对一条以钳制思想、毁灭文明为特色的左倾路线，正像浓湿的夜雾一样悄悄地爬上时代的屋脊，抛开众多的、表象的、偶然的因素，和我们习惯沿用的“立场”“世界观”一类的名词标签，正是知识自己在本能地作出挑战！

诚如浙江省委在1957年12月13日通过的决议中特别指出的：

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长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图使用他们的影响，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下，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要看清这一底蕴，历史此后花了二十年苦难的沉重代价。如果当时就能看清这一底蕴里的必然性和尖锐性，党内众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们，便不会对今后自己的出路，仍寄予颇为天真的幻想。

我还没有听说在遭批判时有谁拂袖而去的，人们“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无论是真诚地交代，还是被迫地检查，无不像触犯了族规的浪子一样在乞求族长，万万不要将自己放逐出这一方热土的“故乡”……

即便如刘宾雁这样拒绝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北“二杆子”，在《中国青年报》全社职工对他的批判大会上，也说了以下一番话：

刚才我坐在这里想，也可能是从我自己的立场想：×××、×××同志说要在反右派的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因此，希望同志们不要讲感情，尤其是工商部的同志比较了解我，希望积极地揭发我，但要实事求是。

说我是“右派分子”，是章罗那样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我

的思想是百分之八十错了呢，还是百分之三十错了呢？我相信是会搞清楚的。

我入党十几年了，不会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错误。同志们帮助我，我是很欢迎的，因为我还要活下去，还要写文章，还要工作，说不定还会在青年报工作。我坚决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有些事实提得不对，如我写的稿子都是批评、都是找毛病吗？我不会像个别人那样想去拆党的台，而是刘宾雁有些忧虑，在想办法。希望同志们从多方面去看问题，不要较多地考虑人家的错误，可以想一想刘宾雁也说过好话，写过好文章。毛主席在肃反中提出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在反右斗争中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划清界限、无情斗争是对的。×××同志讲要辩论。对。假定我的思想还不被人了解，同志们就无法与我划清界限，因此，不妨把刘宾雁提出来，看一看，是和章罗一样的右派呢，或是其他一种类型的右派？或是报社内部的问题？假如刘宾雁是反革命，可以无情地斗争，如果不是呢？

最后谈谈我的希望：刘宾雁才三十二岁，还要活下去，还要写文章，希望明天不要把我见报。我是知道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的——今天开会，明天见报。我毕竟还是个共产党员，如果目前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请别把我搞得全家身败名裂。这样对党、对报社、对我自己都没好处……

许是因为百感交集，刘宾雁讲得有点拉杂、重复，不像他平时所写的那些逻辑思维严谨的文章。然而，字里行间，理不可谓不足，情不可谓不重。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国青年报》照旧明天见报，刘宾雁照旧被整得身败名裂。

对于整人者来说，除了少数为和党保持一致，必须像割掉阑尾一样颇有几分痛苦地割掉温情主义；多数人则犹如铜塑的金刚没有血肉，身上是从不存在温情主义的。

平日他们感觉不到知识的力量，却充分感觉得到知识挑战的力

量，由此反右斗争一来，对于这一斗争底蕴的必然性与尖锐性，与被整者的糊涂相反，他们倒有了足够的清醒，并在这清醒中贡张着金刚怒日式的无情！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党内被论定的“右派”远不止300人。

抛开情况极为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不说，在中国的现、当代史上，还找不到一个运动或斗争，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反腐败斗争，像1957年一样党对自身凛然动了真格。

似乎只要不涉及文化形态的抵牾，一张网总具有弹性：说你小你就小，千斤重的问题能化为二两，即便迫于社会舆论不得不判刑，可判刑之后无须太久便能保外就医，照样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说你大你就大，二两重的问题能拎起为千斤，你也不必上诉，就算是为革命作了“奉献”。要不“奉献”，下辈子你也去投身做个“太子党”，或者恭逢什么帮……

只要一涉及文化形态的抵牾，这张网便毒似入骨见血的法眼，小鱼难漏，大鱼也难逃，而且，在一番煎炒烹炸以后，你再鱼刺般绵密的革命履历，你再鱼肉般丰腴的革命热情，也统统会被彻底消化成一具白森森的鱼骨。

这是一个异常强烈的反差。

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深长思之的反差。